


# 暴风雨的记忆

## 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

北岛 曹一凡 维一 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本书由十七位北京四中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毕业的老三届学生和一位一九七〇届学生撰写。这些当年的弄潮儿，如今虽已过花甲之年，但仍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清理记忆，力求复原这所百年名校在那个年代中发生的热点事件和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活场景，即便各有不同的经历和当年的不同立场，但都在努力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细节。

ISBN 978-7-108-040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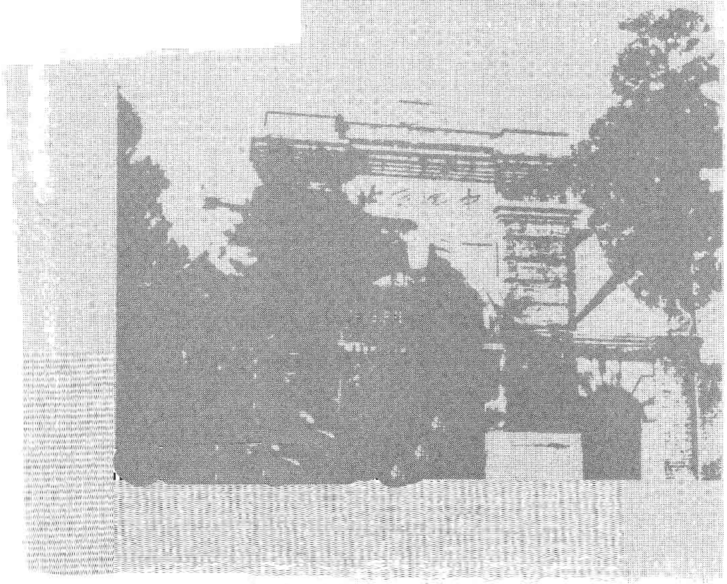
9 787108 040107 >

定价：36.00元

# 暴风雨的记忆

## 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

北岛 曹一凡 维一 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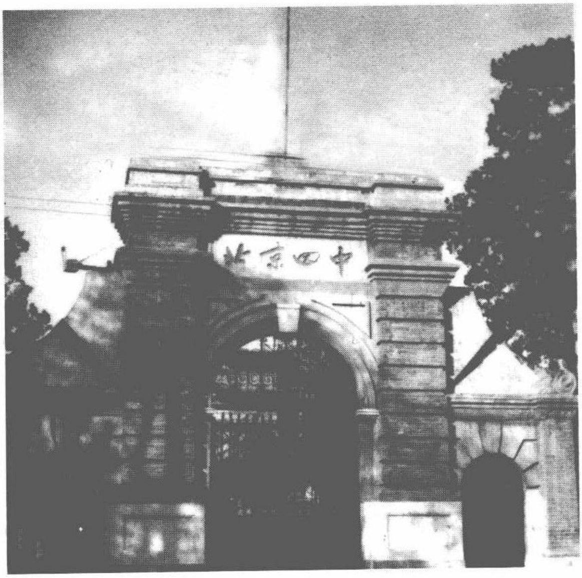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 / 北岛，曹一凡，维一编
——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2.3
ISBN 978-7-108-04010-7

Ⅰ．①暴… Ⅱ．①北… ②曹…③维…Ⅲ．①北京四中－纪念文集 Ⅳ．①G639.2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5164 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3月北京第1版
201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4.875
字　　数　260千字
印　　数　00,001-20,000册
定　　价　36.00元




校门



二校门



传达室和老校门。传达室电话号码是4局1118，正符合库仑定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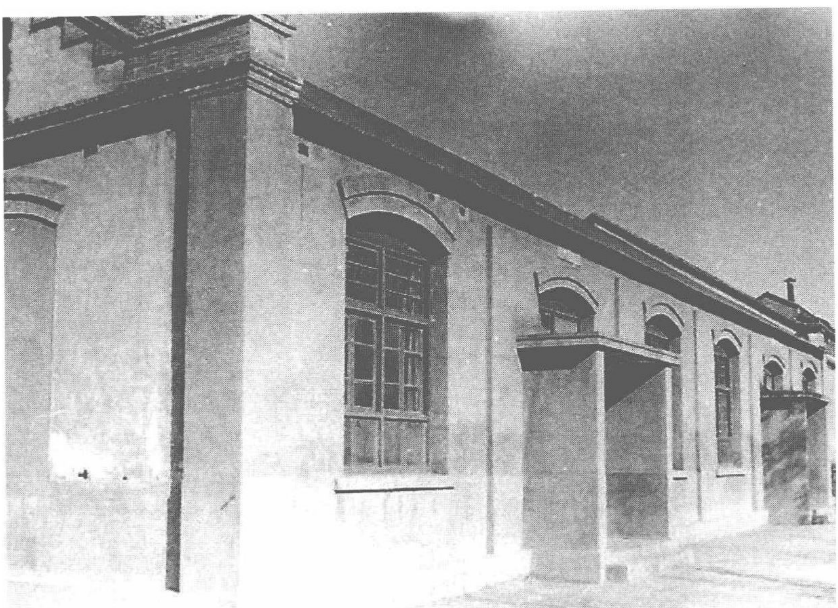
会议室、校长室。



教研组和办公室。树是后种的，原为槐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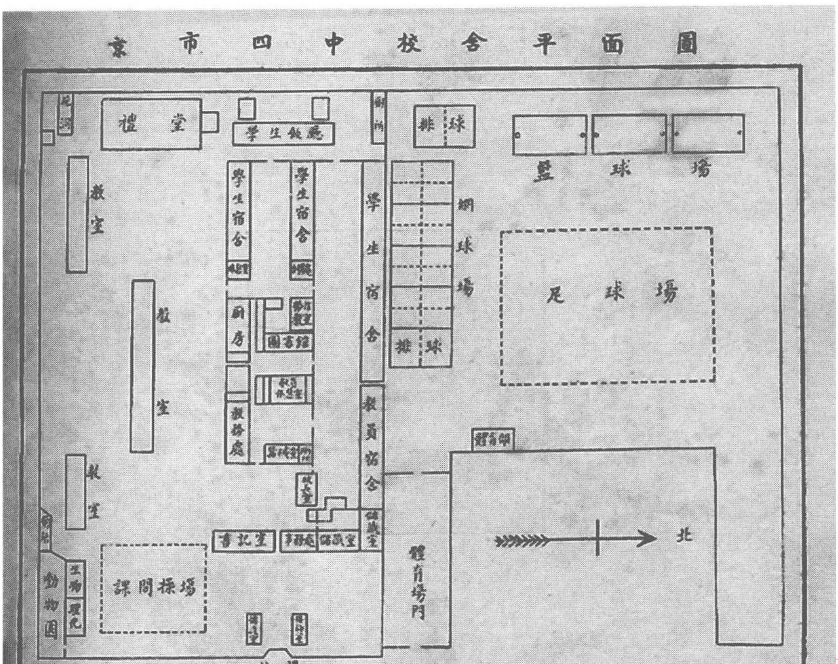
教学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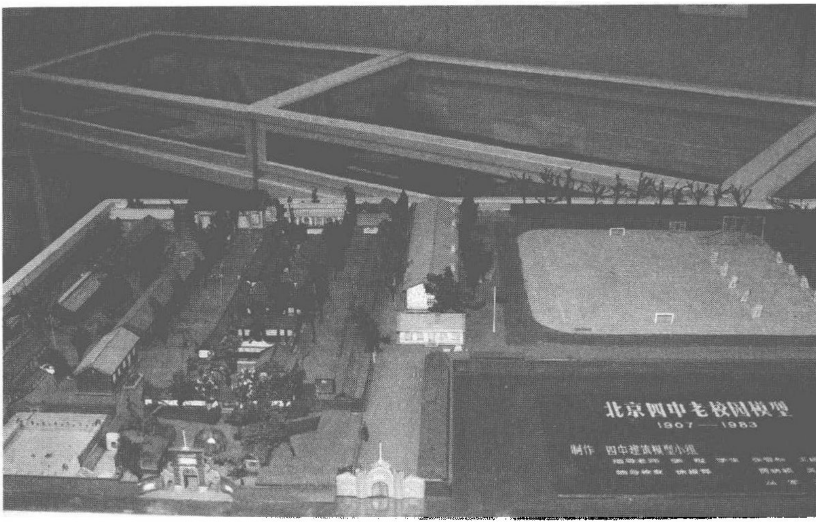
饭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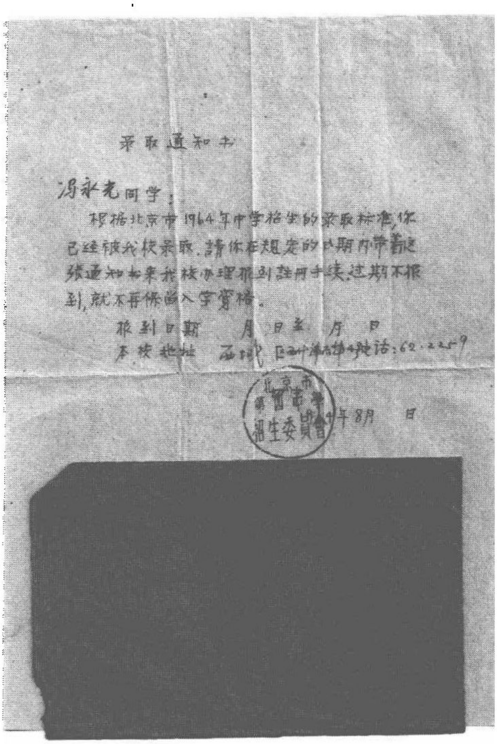
学生宿舍小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四中平面图




四中校园模型俯瞰



录取通知书

冯永光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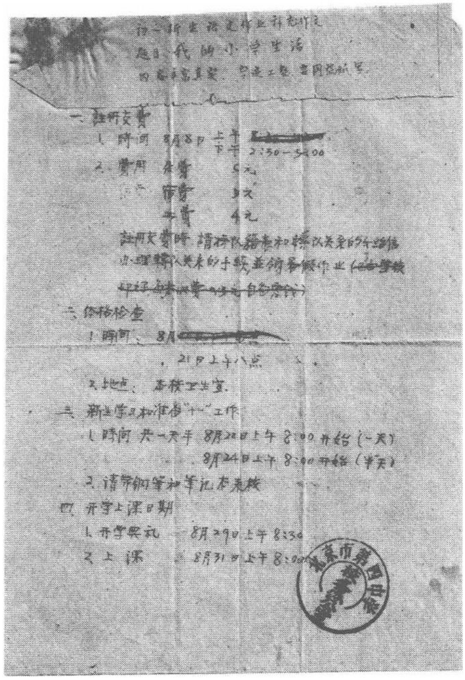
根据北京市1964年中学招生的录取标准，你已经被我校录取，請你在规定的日期内带着这張通知书来我校办理报到註册手续，过期不报到，就不再保留入学資格。

报到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本校地址　西城区西什库后街4号　电话：62.2259

北京市第四中学招生委員會　年8月　日

· 北京四中录取通知书



题目：我的小学生活

一、注册交费

1. 时间 8月8日 下午 2:30—5:00

2. 费用 杂费 5元
   书费 3元
   学费 4元

注册交费时，请将队籍表和转队关系的介绍信……办理转队关系的手续并缴暑假作业

二、体格检查

1. 时间、8月……21日上午八点

2. 地点、本校卫生室

三、新生学习和准备"十一"工作

1. 时间 共一天半 8月22日上午8:00开始（一天）
   8月24日上午8:00开始（半天）

2. 请带钢笔和笔记本来校

四、开学上课日期

1. 开学典礼 8月29日上午8:30

2. 上课 8月31日上午8:00

北京市第四中学

注册缴费单



奖给三好学生 冯永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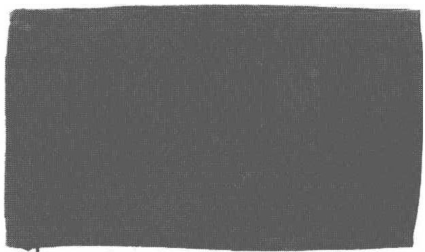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北京四中 1966.2.11.

四中一九六六年的三好学生奖状



杨滨校长



北京四中红卫兵袖章




新四中公社袖章




历经劫难的 《中学文革报》



新四中

最高指示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首都中学红代会新四中公社主办 第四期

1967年8月20日 （本期共四版）

新四中公社总部严正声明

一、关于武斗问题

三、关于中学运动

《新四中》报



新四中

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

《红卫兵组歌》词

一、东方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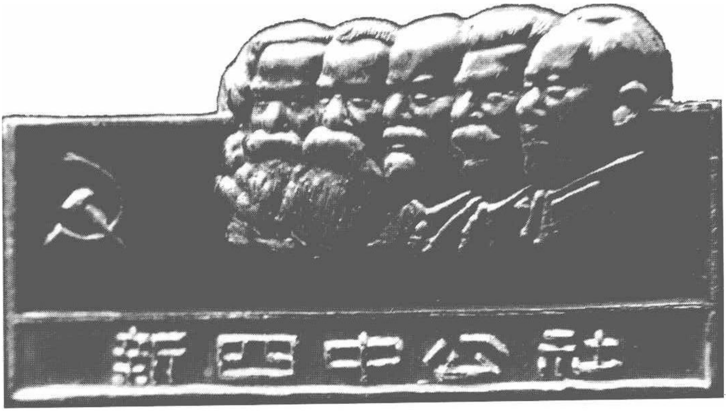
二、革命烈火（《长征组歌》中《告别》曲）

六、破四旧、立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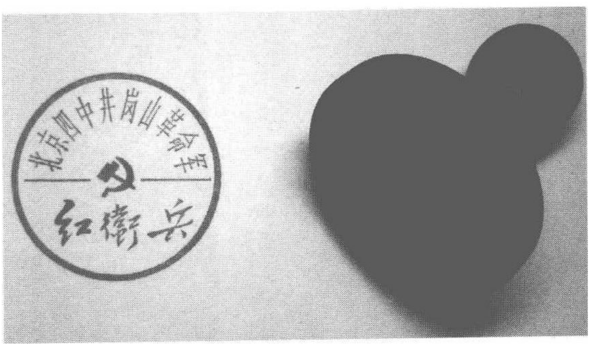
《新四中》刊登的《红卫兵组歌》演出照。



《红卫兵组歌》歌本




新四中公社纪念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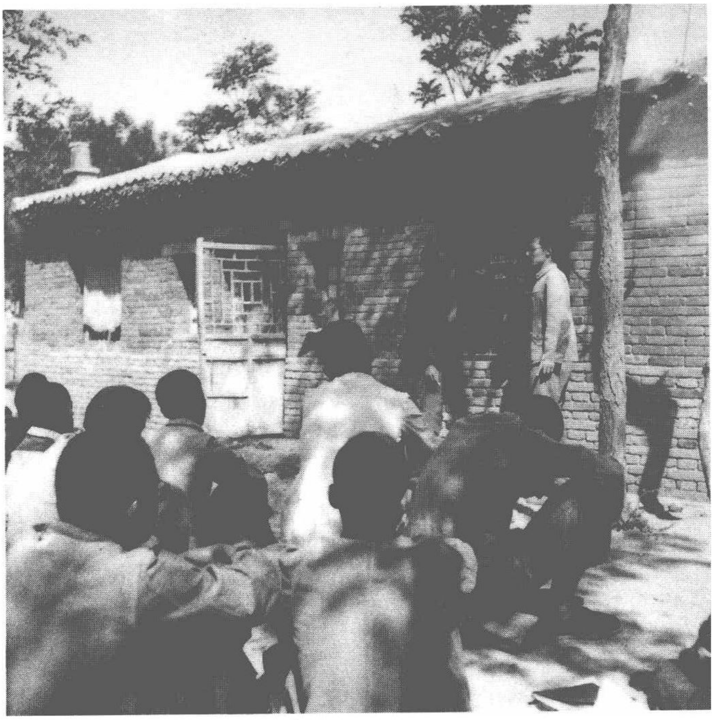

冯永光建立的战斗队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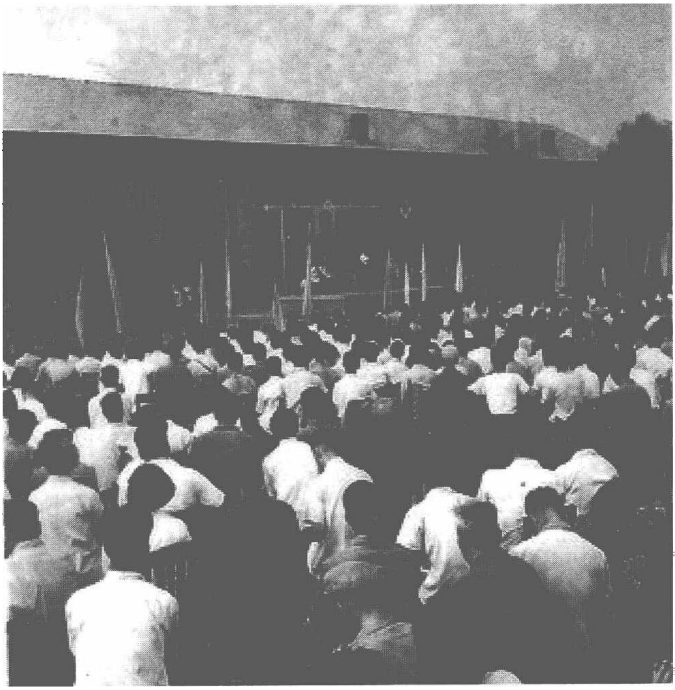
上山下乡知青列车乘车证



一九六六年四月的“半农半学”中，田佣在上辛堡给高一（五）班教课。




一九六六年废除高考制度后的庆祝游行



废除高考制度后的庆祝集会



一九六六年四中批斗校领导及教师的“牛鬼蛇神”批斗大会
后排右一廖锡瑞、右二黄庆发。

# 序

这是一本关于北京四中的回忆文字的结集。十八位作者曾是北京四中的学生，除白羽是七〇级初中生外，其他均属所谓“老三届”，即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时间跨度大致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〇年，共五年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老三届”的年龄大约在十三岁到二十岁之间，正值青春年少。

北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曾处在暴风雨的中心，在这小小的舞台上，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这些回忆文字，正是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记述了这场暴风雨中的个人经历。有些叙述往往会溢出校园以外，因为暴风雨是没有边界的。

记忆往往具有模糊性、选择性及排他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所谓“历史的真实”，或者说，“历史的真实”存在于不同的记

忆的重合、错位与对立中。

为了尽量容纳当年不同的视角和立场，我们特别选取了当年具有代表性或争议性的人物，同时也兼顾不同类型的角色，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未能尽如人意。但愿今后会有更多的当事人加入进来，完成对这场暴风雨的共同记忆。

本书是我的同班同学［原高一（五）班］曹一凡和原初三（一）班的维一（黄其煦）和我共同编辑的，从策划、约稿到文字与图片编辑，历时七八个月。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来自各方面的帮助，在此特别感谢田佣老师、王行国老师、王海明老师、吴迪同学、崔承同学、毛胜英同学、沈毅同学，以及唐欣先生和米鹤都先生。

暴风雨过去了，如果连什么记忆都没留下，我们不仅愧对自己，也愧对我们的后代——所以有了这本书。

北岛

二〇一一年一月三十日于香港

# 目　录

# 似水流年

牟志京

牟志京，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九年去白洋淀插队，一九七一年转到山西省山阴县插队，后在山阴县化肥厂和大同铁路分局当工人。高考恢复后，就读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大同铁路分局总工程师室工作。一九八四年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博士等学位，先后在美国布兰德斯大学、IB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波音公司等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和咨询工作。

小学毕业时，对北京的中学几乎一无所知，听老师讲到男四中的好处，不知深浅报了志愿。暑假从海滨回来，收到四中的一封信，想起落考生由第一志愿学校发通知的说法，心头一凉，打开方知虚惊一场。我和四中长达八年的不解之缘就这样开始了。

那时的四中，除了北边那栋不起眼的二层教学楼外，主要由

平房小院组成。北面的小院是教研室，毗邻的是少数住校生的宿舍。礼堂兼学生食堂有些残败，坐落在校园西南角。藏书可观的图书馆，还有数个设备齐全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分布在校园南边。操场在教学楼北面，标准的四百米跑道环绕足球场，北面靠墙还有几个篮球场。完整的院墙，把四中与外边的世界隔开。校内建筑大多年久失修，但从东面正门进来，还是能感到一种肃穆的气氛。

上了中学，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虽难免为作业和考试所缠，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种领会新知识时醍醐灌顶的神奇感觉，特别在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和生物课上，老师就像来自天界的导游，把我们带进满是宝藏的神圣殿堂。我们这帮毛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长大成人。

本以为政治和数理化差不多，靠的是不断钻研与质疑，其实不然，那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自己引向是非的旋涡。

## 一　“四清”运动

初中毕业时，老师在评语中，把我的政治表现说得一塌糊涂，让我很伤心，看来上高中是没指望了。一九六四年暑假从海滨归来，竟然收到四中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为初三（一）班升入本校高中的少数学生之一。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却没怎么察觉。一天，我

在操场打排球，正在兴头上，同班同学杨百朋走过来对我说："你还在这儿玩啊！还不快到班上看看，墙上贴的都是什么。"说得我莫名其妙。匆匆走进教室，才注意到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小字报。

同学们那些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最令我不安的是对事实的扭曲，其次才是那一顶顶惊人的帽子。我奶奶穷苦人家出身，天性善良，出嫁后一直想方设法周济穷人，几十年后，包括党支书在内的村民还时常怀念她。爷爷曾是大连、烟台一带的富豪，早在抗战胜利前，受到汉奸市长的敲诈迫害而突然离世。还没到解放，爷爷的土地资产散失殆尽，家里一贫如洗。虽不是文化人，新社会给穷人带来温饱，让自己家享有福利，奶奶还是看在眼里，心怀感激，怎会有变天之想。爷爷的花园楼宅被弃置多年，后来成了一所学校的宿舍，公私合营后，奶奶领到些微定息。我十岁以前住在大连，有时陪奶奶去领钱。不知这如何演化成奶奶指认大片房地产的"变天账"的故事。

由于男校的特殊环境，女性自然是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课题。到了高中，受外国电影和文学的熏染，对爱情有了朦朦胧胧的意识。有一次骑车，一位小学女同学迎面而来，见到我毫无缘由地扑哧一笑。我也许对同学讲过这"艳遇"，就成了我的"资产阶级恋爱观"的有力证据。

那一阵我看了很多外国电影，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护国寺影

院看《堂吉诃德》，深受感动，当晚在日记中自我抒发一番。有人对我的日记表示兴趣，我毫无戒心，拿出来与之分享。“四清”时给我戴的那些帽子，有不少取材于我的日记，只是在批判中被歪曲和亵渎了。

除了文字讨伐，还开过面对面的批判会。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十几岁孩子，如何熬过那些令人难堪的场面，我真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西什库大街北口的小铺，我买了碧绿的青酒，一饮而尽，虽伤感有余，但还是没找到足够的勇气和决心。而“四清”的风波也慢慢平息了。

后来战死在缅甸的同学张育海，在“四清”高潮时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讲了不少令人费解的道理。他还找我到操场东墙边，坐在石头上促膝长谈，其中玄机多年后我才领会，无非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杨百朋也给过我类似的劝导。可惜我那时悟性差，白费了他们一片苦心。

## 二　《海瑞罢官》的辩论

一九六五年后半年，报刊上开始出现关于《海瑞罢官》一戏的文章。家里订了《光明日报》，其中有不少相关的重头文章，我饶有兴致读进去，慢慢看出其中一方的蛮横，心中不平起来。姚文元就是我当时最反感的笔杆子之一。几个月下来，我一篇不漏细细地读下去，在报上留下的批语也越来越长。到了一九六六

年春天，语文课竟然出了这题目，在作文中，我趁机把几个月的激愤发泄出来，结果当然再次成了众矢之的。不过经历了“四清”的风雨，这场闹剧就算不得什么了。让我不解的是，在讨论中，大家似乎对实质内容并无兴趣，都在关心我这个迟钝的人捉摸不透的某种东西。

一年后有人帮我解开这个谜，他就是我后面还要提到的遇罗克。相识不久，我们谈起《海瑞罢官》。说到语文课的作文，罗克马上问我时间，我说大约六六年的三四月吧。他脱口说出让我惊讶的一句话：“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在那个时候写那样的作文。”难道真理有时间性吗？我狐疑满面，等待着他的解释。

他从屋角找出一张一九六六年二月的《文汇报》，上面有一篇署名遇罗克的文章。读下来，明明与我的立场一致，更加深了我的疑惑：难道只许他在大报上发表文章，不许我在课堂上写篇作文吗？

觉察到我的疑惑，他说他那篇文章投稿时间早在头年十二月，几个月后发表前并未再与他商酌。在大报发表文章让我暗自羡慕，不知其不满从何而来。“编辑把我的文章篇幅消减了三分之二，文字上改得面目全非，显得咄咄逼人不说，更重要的是，我根本就不想在六六年的春天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到底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出这一‘辩论’不是学术性的，

而是政治性的。在那样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无异于自投罗网。”

我终于恍然大悟。

## 三　血雨腥风

进了高中，学校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每年都要去农村生活几天，除劳动锻炼，还有政治教育。对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男孩来说，倒也不失为有趣的经历。

上高一时，我们去了北京远郊区的桃山。据说那是抗战期间所谓“拉锯地带”。开忆苦会，副校长刘铁岭把一位白发苍苍、情绪激动的老太太搀上台。谁料到，这位没文化的老太太哪懂政治，讲到痛心处，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八路军和日伪军统统都骂了。台上台下全都懵了，还是刘铁岭校长镇定自若，把老太太当即扶下台去。

一九六六年春，我们被送到郊区的农场劳动，睡在大马圈里。夜里被蚊子包围，浑身是包；白天在烈日下干农活，挥汗如雨。日子过得很苦，我迅速消瘦下去。幸好校方突然宣布提前结束农场劳动，我们长途跋涉，一路高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回到学校才知道，世界已变了样——“触动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校园变了，变得让我难以辨认，恍惚如梦。教研组小院南墙贴出许多大字报，针对北京市委和北京教育局。我觉得很神奇，

身为学生，他们从哪儿得知那么多校外动态呢？

某日，校领导和部分老师被拉出来游斗示众，他们胸前挂牌子，头戴高帽，一路被抽打推搡，还有学生往他们身上泼墨汁。我回到教室，从室内扩音器听到老师们带哭腔的发言，支持“小将们”对自己采取的“革命”行动。

某日，在总务处小院，我看见教地理的汪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坐在书堆上默默流眼泪。第二天就听说她和丈夫在香山一同自尽了。某日，在校园有人用担架抬着教历史的朱老师。他一脸平静，问起来，据说是自杀未遂。

新成立的红卫兵身着军装，武装带要么系腰间，要么在手中挥舞，威风凛凛。校园到处是娇艳的美人蕉，一夜之间，被抽得七零八落。南院堆着大量图书馆的书籍被点燃，化作青烟缕缕，升空而去。

不知何时，校园竟出现了“小监狱”。解放牌卡车进进出出，从车上推下被反绑的人，从“小监狱”传出一阵阵惨叫声。某日，我见有人扒在校长室后窗往里张望，也凑了上去，眼前竟是一排跪在地上的女生的背影。一个持武装带的人，时不时吼叫，那些女生把屁股纷纷抬起来，任他抽打。

一位同学带全班去批斗他父亲，我实在不忍看那父亲所受的侮辱，便溜出去到颐和园游泳，没想到回到班上，竟受到他本人的严厉指责。由校领导和部分教职员工组成“牛鬼蛇神劳改队”，

时不时被拉出示众，低头弯腰请罪，还要唱所谓“嚎歌”。此歌含半音，唱不准，就要受辱被罚。刘铁岭副校长唱得最好，经常躬着腰领唱作示范。

我走在校园里，耳闻目睹这一切，不禁疑惑起来：这是个什么世道啊？

## 四　荒谬的“对联”

有一天，我们被召集到教室听重要讲话。演讲者是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最初就是从她口中听到的。

这怎么可能对呢？我查阅了《毛选》和中央文件，为自己找到理论根据，写了批判“对联”的大字报，骑车到红卫兵发祥地——清华附中。原以为会受到红卫兵阻挠而发生冲突。但那天校园十分清静，没什么人影，我把大字报贴好，安然离开了。

八月一日，听说中央音乐学院正开“对联”辩论会，我和同学李家柱一起骑车去了。在音乐学院校园，我们偶然碰见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他胸前挂大牌子正在铲煤。会场内外人山人海，几乎都是身着黄军装的红卫兵。主持大会的是个梳两把刷子的女生，我报名发言，她先问明我的立场。在我前头报名的不少，看起来且轮不上我呢，可没过几分钟，就有个女生过来让我准备上台，我感到意外，她解释说发言大都是支持对联的，让我这反对

派上台，好增添大会的辩论气氛。

几个主持会场的全是穿黄军装的女生，我在后台等着前面的发言结束时，她们毫无粗鲁表示。没想到，我上台还没几分钟，那几个女生就冲上来，满嘴脏话，抢夺我的话筒。我双手攥住，她们使出全身力气也没用，接着她们拽我，用拳头在我背上乱捶，也没什么效果。让人讨厌的是，几个女生转到我面前，朝我脸上吐唾沫。我的发言就在这样有点滑稽的场面中结束。

下台后借来纸墨，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留下大字报，并署了名。过几天回去一看，居然有不少回应，大多是无理谩骂，只有一篇还算相对讲理，领头署名的居然与我同姓，是红旗学校的学生。明明是一帮女生，却在结尾处学男人的粗鲁腔调："你×××要是有种，就到我们学校来，让我们给你点教训。"

有约在先，我只好去赴"鸿门宴"。她们非但没给我什么教训，谈话气氛反而颇为友善。那位同姓女生容貌姣好，临别她像对待好友一直把我送到校门口，竟有些恋恋不舍。作为一个男校学生，那是我第一次与同龄女生打交道。

一天我在家中葡萄架下读书，一位同班同学找上门来，以班"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勒令"我立即去开会，宣布全班同学都正在教室等我，要跟我清算反"对联"的罪行。"你不但公然反对，还在外面到处散布反动言论，像什么话?"他愤然对我说。

全班同学果真在教室等待。一场所谓的辩论开始了。我发言

后，一位高干出身的同学发言，讲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井冈山出发三十万，到延安只剩下三万。“我问你们，那剩下的二十七万人上哪里去了?”他激动得尖声细气吼叫着，以此证明“对联”的正确性。

最难忘的还是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讲话，结尾时他情绪高昂地喊道：“我出身反动，我就是×××。你不承认我是×××，那你就是×××。”讲到那最后三个字，他满面通红，脖上青筋暴出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老兵”推波助澜的运动打倒了“走资派”，于是“老兵”中的核心人物成了“走资派”子女，按他们的逻辑，就是成了“狗崽子”。然而，“老兵”们断然拒绝这一逻辑的合理性，并组成以“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为首的威慑力量，活跃于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与造反派抗衡。

## 五　“大串联”

“对联”辩论结束了，听说兰州“文革”形势激烈，我和同班同学刘捷、赵颐庚和王建复一行四人，取道呼和浩特前往兰州。谁料到，在包头被一伙当地红卫兵查问出身，以非“红五类”出身为由，将我们押送回京。一到北京，那些包头红卫兵就溜掉了。我们要继续“大串联”，却遭到学校和班里红卫兵的阻

挠，于是来到中南海北门等待，盼着能拦到一位中央首长为我们做主。

一天晚上，在中南海北门外等得太久，赵颐庚担心他家院门已锁，我把他领到四中学生宿舍，打算介绍给别人，安排好留宿再回家。

我俩刚坐定，宿舍里一个熟人突然恶狠狠地问赵颐庚："你什么家庭出身?"赵颐庚不快地答道："你管得着吗?"那人便说："好，你在这儿等着。"转身出去了。不一会儿，宿舍小院人声嘈杂，七八个手持武装带的红卫兵冲了进来，高声叫喊："是哪一个?"带路人指指坐在床头的赵颐庚。为首的那人方脸盘，个儿不高，但肩很宽，目光凶狠。他上去就给了一拳。

我见状便朝那打手喝道："你凭什么打人?"他转身朝我走来，站在我跟前，上下打量着我说："看你蛮会打架的样子，不过，老子不怕你。"语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脸上挥来。我本能地举起拳头，突然想到前不久有人反抗红卫兵而被公审的案例，立即止住。那几个打手却认定我要还手，一拥而上，把我掀翻在地，拳打脚踢。我当时没有任何感觉，从小院出来，我感到牙齿有些异样，于是来到四中旁边的口腔医院。一位女大夫检查后，把一颗门牙复位再用钢丝箍好，她轻声问道："这是怎么弄的?"我回答："骑车摔的。"她叹了口气说："唉，这年头啊。"后来才知道，那个为首的就是为"对联"谱曲写歌的刘辉宣。

此后我们不再寻求红卫兵的许可，在北京站找到站长，开了一张乘车记录，在八月三十一日，一行四人搭乘十五次特别快车，从北京直抵广州。在越秀山下的农村参加了几天劳动后，刘捷只身返回。其余三人离开广州继续旅行。我们在桂林饱览了漓江山水，在遵义拜访了革命遗址，在贵阳吃到大馅汤圆，在闹市碰上被小孩们围追的巨人穆铁柱，在重庆参观了“中美合作所”，在成都目睹了刘文彩的“收租院”。再沿宝成线，窗外闪过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街亭。在宝鸡过夜，第二天搭上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

一个多月在路上，早已习惯了列车的拥挤，但这装满学生的列车还是远远出乎意料。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我只能“金鸡独立”，好在夹在人丛中，无须保持平衡即可放心睡去。上厕所是最大的问题，只能抓行李架，脚踏坐椅椅背从空中穿行，没有点真功夫不灵。厕所也挤满了人，勉强钻进去，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如厕。

快到新疆，车厢一下子宽松了，我躺在过道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发现周围睡着好几个男女学生，脸贴脸，手脚互相交错，令人哭笑不得。

在哈密逗留后，游览了乌鲁木齐和石河子，再搭上东去的列车，我撺掇两位同伴去我向往多年的吐鲁番。火车停靠处，我们从车窗跳下来，四处张望，一片荒凉的戈壁滩。一打听才知，城

镇还有几十里，仅有长途汽车，而红卫兵并不享有免费搭乘的特权。两位同学打退堂鼓，而我自费买了车票，与他们分手。在戈壁滩颠簸了几个小时，景色突变，汽车驶进充满异国风情的吐鲁番古城。

在街上游荡，不知当夜在何处栖身，见到县委的牌子便闯进去。侯书记是汉人，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把我安排在招待所，并打电话到吐鲁番火车站，安排王建复和赵颐庚与我会合。我提出到维吾尔族村庄劳动时，他满口答应下来。

走出县委，心里踏实多了。来到唐代遗迹苏公塔，只身爬到塔顶，从小窗孔眺望这低于海平线的吐鲁番盆地。回到招待所，被悠扬的歌声吸引，在另一房间，几个青年男女弹琴唱歌，与北京听到的汉人编的新疆歌曲几无相似之处，格外动听。

第二天，侯书记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主食是一种叫“馕”的面饼。我把面饼转圈咬了一遍，竟连个牙印也没留下。只见旁人挥斧先砍个缺口，再用牙齿扩大“战迹”，我如法效尤。除了一碗粗茶，无菜，饭后端上本地西瓜，沙甜可口，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西瓜。

从县城步行约一两个小时，来到红星公社前进大队——维族人村落。我寄宿在塞提老汉家，彼此言语不通，靠手势交流。第二天跟二小队下地，收割当地特产的白高粱。队长利普兹个儿不高，但身体健硕，天性开朗，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起干活的大

多比我们年纪还小，也喜欢唱歌，有个满头小辫子的姑娘，歌声最甜美，她叫玛尔江。每当夜幕落下，村里阵阵歌声荡漾回旋，仙境一般。

一天，队长利普兹请我到他家吃饭，在炕上盘腿而坐，当热气腾腾的羊肉饺子端到桌上，出于礼貌，我等候主妇共餐，一番比划，利普兹明白了我的意思，便告诉我女人与客人不同席。那顿饺子特别香。饭后，他提议轮流唱歌。我很喜欢他唱的歌，问歌词大意，他摆摆手，用生硬的汉语说："男的，女的，不好。"

我跟一起干活的孩子学了点维语。每天早上，人人以"亚克西"彼此问候，模仿起来并不难。两位同学从村庄撤回到县里，我独自留下又住了几天。临行那一天，在塞提老汉家整装待行，心里竟充满依恋的感情。

正独自伤感，忽听到门外有动静，推开门，只见玛尔江泪水满面站在院中。她见到我，擦掉眼泪，面色凝重地递给我一本维文小书，其中夹着维文的信。盯着我的眼睛，她说出一串连一句也听不懂的维语。我示意让她等一等，冲到屋里，解开刚刚打好的背包，找到一本汉语书，递给玛尔江。

在回吐鲁番县城的路上，一想到村里那些淳朴的人们，眼泪就止不住往上涌。县城在望，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掉头往回走。在田里找到利普兹和那些孩子们，我终于哭了出来。

离开吐鲁番，到达西安，从那里徒步"长征"八百里，终于

来到延安。一路上，以每小时十二里的速度，每天走一百里。途中拜谒了保存完好的黄帝陵。一路在老乡家的棚屋过夜，吃的是小米饭加盐粒和辣椒粉。第七天我发起高烧，幸好赶到某空军基地，得到及时治疗。休整两天后上路，第十天终于看到巍巍的宝塔山。参观了革命遗址，我们响应中央停止“大串联”的号召，带着一身虱子回到北京。

## 六　《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的诞生

“大串联”归来，京城风向已变，老红卫兵不再是天之骄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收缴了“老兵”行使权力的牌照，出现造反派（或称为第二代红卫兵）诞生前的真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大会，周恩来、江青等出席。我们班同学王祖锷和高二（五）班汤池分别作了《宣判反动对联死刑》（同班同学朱景文起草）和《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言，其中提到我反“对联”的经历和代价，周恩来在随后的讲话中，对“这位同学”予以赞扬，让我十分感动。

十二月底，在北京西什库一根电线杆上，我读到油印的《出身论》，极其钦佩。在“对联”的辩论中，我的勇气来自本能的反感与义愤，仅此而已，几乎没有什么理论武器。《出身论》的作者却把出身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逻辑严密，正气凛然，文风

清新，让人为之振奋。我当即按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的遇罗文。他是遇罗克的大弟弟，身材颀长，带几分书生气。我们相谈甚为投机。第二天他到四中回访，聊到扩大宣传途径，便产生了把《出身论》铅印传播的念头。

在校多年，固执的天性总给我带来重重险境，谁想到反“对联”之举，竟在新的形势下赢得正面的名声。靠这点政治资本，我向学校总务借贷，五百元轻易到手。我小学同学朱大年，是男三中造反派“刺刀见红”的头头，与“三司”（“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宣传部长有交情。我们骑车去地质学院，开出盖着“三司”大印的介绍信。

回家路上，经过北太平庄附近的解放军一二〇一印刷厂，乘兴闯进去。负责接待的是业务部金科长，他戴金边眼镜，笑容狡黠，但一看介绍信，态度立即变得严肃认真。那时“三司”如日中天。印刷业务很快就谈成了。

那年头纸张极紧。六部口纸张批发部缺货，柜台后的职员，建议我们去地安门的农工民主党总部试试。那里果然有货，但很贵，终于买到十五令上好道林纸。这就是《中学文革报》创刊号用纸与众不同的缘由。

罗文从“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取来《出身论》新手稿，那是一叠白底蓝格的超长稿纸，字迹小而清晰，让人望而生畏。可拜读后，我感觉行文中透着一股怨气，文字也显刻薄，

大大削弱了理论客观性的分量，会让人对作者的个人利害关系产生猜疑。我虽对“小组”充满敬意，却并不妨碍我对《出身论》新稿刀砍斧伐，作了大量修改。在理论上我了无新意，但无疑改变了文章的色彩与基调。不料遇罗文读罢，一反他温文尔雅的风度，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回到四中，他又向我道歉，说“小组”很欣赏我的改动。《出身论》修订稿就这样敲定了。

再到一二〇一厂与金科长商酌，决定采用四开版五号字，本以为差不多，没想到排好版竟多了个“天窗”。金科长问如何利用这一空间，办报的念头油然而生。

我起了个毫无创意的名字——《中学文革报》，拉出“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唬人的大旗，并请擅长美工的三中学生朱维理拼出毛体报头。

我从小学同学朱大年和刘姜仁处各征一文，还有四中同班同学李宝臣署名“敌敌畏”的杂文，再选用师大女附中陶洛诵和汪静姗编的一组动态消息，准备完毕，我在原四中语文教研室连夜撰写《出身论》的编者按，和署名“司令部”的“坚决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公告。天近拂晓，我把版面、字体、字号、花边等编排好，把坐在椅上打呼噜的罗文唤醒，打了招呼，只身骑车去一二〇一厂交稿。第二天我到厂里拿到清样，校订后签字付印。《中学文革报》（以下简称《文革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

八日正式发行。

## 七 《中学文革报》的历程

《文革报》问世，在社会上激起极大反响。我们设在四中的办公室总是门庭若市，来访者络绎不绝。其中索买观望的最多，而热情支持和恶意相向的也不少。支持者讲述他们受“血统论”迫害的亲身经历，反对者在联络处外墙贴满侮辱性的标语和大字报。

北京气象学校的李金环和纪亚琴来到接待室，要求参加我们编辑部的工作。我问起来，她们居然还没看过《出身论》，但从反对者的言论，她们坚信这是一篇好文章。在她们前后加入的，还有十三中的阎世钧和帖汉，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二十五中的遇罗勉和王嘉材，某校的陈加华，五十三中的韩基山，无线电学校的魏雷，轻工业学院的郝治。我们报社不断发展壮大。

《文革报》虽然只在北京发行，与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相比，印数微不足道，但全国的读者来信与日俱增，到了连邮递员都不能负载的程度，我们只好每天蹬三轮车去邮局领取。处理读者来信成了艰巨的任务，其中多数为附款邮购，但也有不少是为了向我们倾诉的。遭遇之惨烈，心声之真诚，往往让我们怆然泪下。

在一个贵阳市青年的信中，讲到他在市中心见到人们簇拥在

长篇累牍的大字报前，（不知哪位热心人抄写了《出身论》一万五千字的全文，要多少纸张和功夫!）出于好奇，他从头读起，刚读了一小部分，就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号啕大哭起来。为避免尴尬，跑回住宅，哭罢再赶回现场，读了几行又忍不住哭了。就这样，他不知跑了多少趟才终于读完《出身论》。

除西藏和台湾外，读者来信在全国各省分布均匀，来自北京的在数量和质量上并不突出。在《文革报》出版后短短几个月，各类小报纷纷出世，其中多数滞销缓销，而《文革报》刚好相反。每一期仅在市面出售半数，其余半数留给外地邮购和来访者。从读者来信中得知，有人花两块钱买一份《文革报》。一个小报交易市场在北京西单应运而生，其中《文革报》成了“硬通货”，可用来换任何小报，还出现过比值达一比五十乃至一比一百的交易。

我因杂务缠身，很少参加卖报。有一次跟着去了，我们的三轮车被围得水泄不通，无数只手伸过来，我的手中塞满大把钞票，刚递出的报纸，不知被谁一把扯去，甚至来不及找钱。转眼间报纸被抢购一空，我双手不停哆嗦，才知卖报的艰难。遇罗勉——罗克的小弟弟，也向我讲述过他卖报的类似经历。

据我所知，《中学文革报》是第一家没有官方背景的小报，此后非官方小报如雨后春笋，不少卷入《出身论》的辩论，有的为政治利害，有的为开拓销路。仅北京一地，就有《东风报》、

《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北京评论杂志》等。李冬民的《兵团战报》曾以“首都兵团”名义登出“取缔《中学文革报》”的“通令”。

其中《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分别由我小学同班同学朱大年（三中）、刘姜仁（京工附中）主办。在《文革报》问世前，我们仨在大年家偶遇，看了我带来的《出身论》，一致认为值得广为传播，对出版、印刷和发行有过商讨与策划。后来果然各自推出报纸，互相配合，《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各为出身问题留出一版，由我负责编辑。从策略出发，这两家报纸对出身问题采取中立态度，同时刊登赞同和反对的文章。罗克对此十分欢喜，特地采用辩论文体为两家报纸撰文，以活泼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暴露反对派的荒谬。

《只把春来报》是我们班张育海、杨百朋、李宝臣、何大明和吴景瑞等人办的，高三的沈大伟和他弟弟沈大智，还有杨百朋的弟弟杨百揆也卷入其中。他们个个都是非凡人物——业余爱好多，擅长体育，平常不用功，但学习成绩好，头脑的机智从报名就能看出来。在班里的“对联”辩论会上，他们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表示反对。对《出身论》的作者，他们都很敬仰，曾有意加入《文革报》。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使他们在佩服之余，也意识到出身问题背后所涉及的特权利害，便急流勇退

了。他们那些文风晦涩、立场暧昧的文章，难免让读者猜疑与《文革报》的关系。

第三期出来后，我们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了大会，由罗文上台发言。但开场不久，就有一伙人点燃鞭炮，朝主席台冲上来。负责保卫的是一帮初中小孩，吓得呆若木鸡。有个汽车司机组织刚与我们结盟，头头问我要不要把他们在场的人调上来。为避“挑动工人斗学生”之嫌，我谢绝了，报社成员从主席台一侧的通道溜出会场。《文革报》第四期五、六版对这一事件作了报道，并刊登了未宣读完的发言稿。

冲击会场的很可能是“老兵”和“联动”的人，我们在四中的报社也不断受到骚扰。有一次回到四中，有人告诉我彭小蒙刚率领上百之众，骑车呼啸而来，把在场的王建复吓得夺窗而逃。

其实，“老兵”也有比较理性的一派。创刊后第三天，几个身着黄军装的学生来访，通报学校姓名，原来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目。他们态度平和，跟我谈及“配合”与“协作”，让我深感意外。办报后期，有些“老兵”在兵马司胡同开办《出身论》的辩论场所，气氛严肃而健康。反而在校内外造反派中有少数人深怀敌意，做过损害我们的事情，在此也就不谈了。

《文革报》多次惊动有关领导人。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红卫兵会面时，被当众问到对《出身论》和《文革报》的看法，他说没看过，人们就递给他一份，他当时读得人

神，直到有人提醒他回去再读，才把会继续开下去。不久在另一场合，人们再问他的看法，他圆滑地回答："太长了，没时间看。"

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我参加过一次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会晤。我当场解下鞋带，把一套《文革报》捆起来，请前边的人传给江青，只见那捆报纸辗转递到她手上。帮我开过介绍信的"三司"宣传部长，向我索取全套《文革报》，他说这是受"中央文革"之托，为毛泽东本人准备八种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文革报》应在其列。另有传闻，中央政治局曾以大号字体翻印过《出身论》。

自《文革报》创刊起，就有两名自称《红旗》杂志社记者的神秘人物定期造访。第三期出版之际，他们郑重向我转达"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的传话：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

"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讲话中，点名批判《出身论》和《文革报》，从而为我们报纸的命运画上了句号。林彪在同年五月一次讲话中，大谈出身问题，他讲到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反动"的观点，虽未点名，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 八 《中学文革报》的终结

由于出版一再受到"联动"等势力的严重干扰，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到了第七期，在北京出版已不可能。我独自乘火

车去天津，在火车站外蜷身露宿，终于联系上一家小厂。再次赴津，我正在厂内小屋校稿，抬头看见李金环和纪亚琴二位女生站在院中，神色沉重。她们告诉我戚本禹的四月十三日讲话，并说罗克建议我立即返京商议对策。

回到北京，我从火车站径直去罗克家。罗克把我迎进他的“冰窖”，讲了一下大形势，他抱歉地对我说：“你这样年轻，就由于我而置于这种形势，真对不起。”我不以为然，一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心里惦记的还是报纸的前途。罗克问起来，我说：“我看一共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对抗，原定第七期照印不误；二是投降，在第七期上作检讨；三是停止出版，既不对抗，也不认错。”“那你准备走哪一条路呢?”“走第一条路是不识时务，走第二条路有违良心，我看只剩下第三条路还可以走。”“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致。”随后，我召开报社全体会议，宣布这一决定。《中学文革报》由此告终。

《中学文革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创刊，同年二月二日、二月十日、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六日和四月一日分别出版了第二至六期。这六期先后在解放军一二〇一印刷厂（第一、二期）、西四印刷厂（第三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第四、五期）和西便门印刷厂（第六期）印刷。第一期印数是三万份，其他几期印数在三万到六万份之间。除了这六期，还在景山胶印厂影印了一万五千份创刊号，另外还出版了以

《出身论》为主要内容的特刊，先后付印两次，总数约六万份。除第四期为六版（售价三分），其余每期都是四版（售价二分）。全加在一起，总印数共三十万多，销售总额在六千元以上。

在我们报社，大家都尽力而为，谁也没有正式头衔。卖报时各自拿一垛，回来把钱交上，无人点过报、数过钱。大家因公外出办事，从来没想过报销这回事。这在当时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其实很不寻常。

遇罗克作为特邀主笔，以“北京市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在六期报纸上分别发表了《出身论》、《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和《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六篇文章；此外，他在《中学论坛》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发表了《谈鸿沟》；他还在《首都风雷》创刊号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署名“步曙明”的反对《出身论》的文章，另一篇则是以“小组”名义驳斥步曙明的文章《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罗克还以二十五中“齐声唤”的名义，在《中学论坛》发表了以对话形式讨论出身问题的文章《〈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而第五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略评〈雄一师〉报的四个版两万字》，则是罗克和我不约而同各写的一篇同主

题文章然后合成的。

## 九 《中学文革报》成员及其命运

报纸创刊时，我们只有三人：罗文、同班同学王建复和我。我的语文老师毛宪文当过技术咨询（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婉拒了加入的邀请），他曾任《内蒙古文艺》编辑，我向他学了不少编辑知识，受益匪浅。《文革报》的版面设计美观大方，显然与毛老师有关。王建复“大串联”与我同行，跑遍大江南北。罗文初次造访，建复在场，就这样成了创办人之一。

创刊号问世后，不少人陆续加入报社，前面已提到。到了后期，女五中张颖和王玲，女十二中张君若和张富英也加入进来，报社成员一度接近二十人。

在创办之初，罗文是“小组”和报纸之间唯一的连接，没有他办报是不可能的。后来出特刊，与“老兵”在兵马司辩论，也都有赖于他的操持。

财务最初由我掌管，办到第三期赚了钱，如数还清学校贷款后，还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王建复毛遂自荐，从此由他接手财务。

李金环、纪亚琴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并为订户邮寄报纸，工作繁重，却从无怨言。帖汉从名字到相貌都不像汉人，却矢口否认有外族血统，虽是初中生，却显示特有的稳重与才能。他是唯

一与我分担过编辑工作的人。阎世钧出身“革干”，憨厚实干，为报纸各种杂务跑前跑后，总是笑嘻嘻的。韩基山社交广，举手投足带江湖气。我一到会场，他总是喊“司令到”，在危急时刻他对我说：“司令先行，有我护后。”在联络等事务中他功不可没。王嘉材和陈加华头脑灵，点子多，腿脚快，在后勤与卖报的分工中贡献最大。郝治是罗克的朋友，高个子，一张喜剧性的长脸，化名马列。按他的话，这名字别人不敢喊“打倒”。由于年长智深，他常在会上对我的决策表示嘲讽。魏雷年岁稍长，唇上留髭须，每逢棘手事，最是老谋深算。张颖、王玲、张君若和张富英等女生加入时，我们已陷入逆境，她们没领略报纸昌盛的风光，倒甘愿与我们分尝这最后的苦果。

有一次，陶洛诵和阎世钧在清华碰到“三司”司令蒯大富，一场舌战把蒯大富说得哑口无言。他问洛诵是哪个学校的，“好厉害的一张嘴”。他们二位随后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讲起这趣事，大家笑弯了腰。

由四中“红旗”战斗队写的《我们为什么支持〈出身论〉》一文，登在《文革报》第五期第四版上。罗克从不干涉报务，但读了此文，深为赏识，极力劝我邀请“红旗”加入。谁料到“红旗”第五期后加入，第六期还未出就倒戈了，他们在四中校园贴出大字报“出身论是大毒草”，还到西便门印刷厂，企图抢走刚要出厂的第六期。

还有一个小插曲。“首都兵团”派了个间谍打入我们报社。此人第一次见面我就起了疑心，罗文却极力推荐。随后其他成员也都觉得可疑，最终查清他的身份，于是用各种方式捉弄他。我们常在景山和北海会面，却故意把他引到别的地方，还屡次向他提供假情报。在严峻的形势下，给大家平添不少轻松快乐的时刻。

《红旗》杂志社记者向我传达关锋的话后，我陷入激烈的内心冲突中，几天未在报社露面。然后我召开全体会议，向所有成员转达了关锋的话，指出再往下走，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请求对牺牲没做好准备的成员离开报社，而别人对他们“没有理由予以任何指责”。让我难忘的是，全体成员无一人畏退。

一九八〇年夏天，在全国各大报刊纷纷为罗克平反正名后，我召集报社成员在陶洛诵家相聚。我这才知道除罗文在六十五中受到严重迫害，其他中学生大都未遇到太大麻烦。而郝治、李金环和纪亚琴几位大专学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分别在轻工学院和气象学校被残酷批斗。

那次见面，本以为看到的是大家的无悔与自豪，没想到更多的是看破红尘的自嘲，令人怅惘，但我永远忘不掉当年那集体的勇气。

我们也为少男少女提供了浪漫场所。遇罗文与陶洛诵之间有过恋情，后与另一成员张富英结婚。陶洛诵与四中“红旗”的赵

京兴结为连理，他们的罗曼史被传为佳话，并历尽重重艰难，在此不谈。

由于主办《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我的小学同学朱大年与刘姜仁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刘姜仁曾很长时间被关在学校。《只把春来报》成员中，张育海和沈大伟越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先后战死。吴景瑞（毛子）和我一起去越南从军未遂，不久赴东北后失踪。何大明在张育海一案的调查中受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幸好后来完全恢复，并写过办报的经历。

## 十　遇罗克其人其事

《文革报》创刊号出版时，我并不知道“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身份，随后去罗文家拜访，初次与罗克见面，哥儿俩全无相像之处。罗克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得难以置信，深度近视，扇风耳，大驼背，其魅力却在动态之中。他一张口声音洪亮，言辞清晰明朗，妙趣横生，一圈圈厚镜片挡不住那犀利的目光。

罗文把我介绍给他，他开玩笑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就大笑起来。一张口就让我感到绝非一般人物，并开始猜疑他与“小组”的关系。第二期出版后，交往渐深，他向我讲明他就是《出身论》的作者。基于形势，他请我对此保密。多数成员在办报期间，从未被正式告知“小组”的身份。

罗克在写作上不愧为突破时代局限的巨匠。“文革”对中文

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在政论文章中仍清晰可辨。而罗克的文风却出淤泥而不染，自成一体。读过其文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其思路宽广，条理清晰，广征博引，文辞犀利，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遗风。

他的写作速度惊人。由于出版上困难重重，往往无法预知下一期的出版时间。罗克放下话，只要头一天告诉他，他能第二天交稿。他在报纸发表的所有长文，都是这样一夜写成的。

罗克非书痴，小脑也很发达。和我玩一种打手游戏，他总把我的手打得噼啪响。他能同时下两盘盲棋。我试图捉弄他，告知他说的棋子不在其位，他沉吟片刻，坚称我所言不实。

他独自住在正房与院墙间搭成的小屋，严冬无法取暖，号称“冰窖”。我与他常在“冰窖”对坐，彻夜长谈，直至天近拂晓。他兴趣广泛，跟我谈的主要是哲学、历史和文学，而非当时的政局或报纸的命运。

他是一个机敏的人。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们同去东北。在火车上，一个面相凶恶的人突然问他：“你还认识我吗?”此话不知从何而来，让人莫名其妙，但他毫不迟疑地巧妙答道：“我看你面熟。”

罗克对自己的口才相当自负，蒯大富曾讲过我们成员的坏话，罗克一再托付我向蒯下书，在公开场所辩论，而蒯从未应战。

他一直在不断思索。我们同游北戴河、秦皇岛和沈阳三地，并约好各写游记一篇。在沈阳街头，看到大量日伪时期的建筑，他不快地问我，为什么解放多年的建筑，竟不能与日本在某占领地短期留下的痕迹相比。

在报纸停办后，罗克开始写一篇新作——《工资论》。他向我列举论资排辈的贻害，并以此为起点，提出工资政策的建设性方案。可惜那时此文已无处可刊载，他被捕后不知下落。他进一步观察到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病，并设想改革的方向。郝治曾讲罗克是“东方的曙光，宫殿的一角”。我常想，十年后在中国开始的体制改革若有罗克的参与，不知会获益多少。

有一次，我注意到他书架上有一本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就提起我也有一本。他听后很兴奋，当即与我拟订共同攻读此书的计划，并交换读书笔记。

他批评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必定借助语言垄断。“猫睡觉做梦时，四腿有时会作出跑的姿态，胡须也会颤抖。难道它也使用某种语言吗?”有时他会问我从未想过的问题，比如“你做梦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罗克问到我对鲁迅的看法。他把鲁迅的作品比作一盘珍珠，每颗都很明亮，却没有串成一条彼此相关的项链。他喜欢杰克·伦敦，提到濒死的狼和一个人的搏斗，最后以人饮到狼血而获胜。“他的人物在逆境中表现的毅力，在别的作品中是难能看到

的。”他向我推荐梅里美的《卡门》，并把书借给我看，谈起女主角那奔放自由的性格，极为感叹。

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很有见地。谈到《浮士德》一书的翻译：“郭沫若的译本比起冯至的拙劣错讹之处甚多，但被出版的却是前者。”他对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成就非常钦佩。他讲过一些朱生豪的故事，如何在战乱逃难的途中不辍译笔，但终未实现译完莎士比亚的宏愿而早逝。

在他的小屋，我们一起不知度过多少时光。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感叹：“你的知识多么渊博啊！”他听后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一反他平日的诙谐，用严肃的语气说道：“等你到了我的年龄，你的知识会比我更渊博。”虽然我对他无比信服，但还是不相信这番话。

讲起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他找出一张鲁迅赠给瞿秋白的手迹：“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他神情郑重地把它送给我。

他对毛泽东相当尊敬，对毛泽东诗词的造诣尤为钦佩，特别喜欢《蝶恋花》一词。

## 十一　遇罗克之冤案

从东北回来后不久，形势越来越紧。罗克告诉我他已被跟踪，出于幽默，他转身找到跟踪者，开他们玩笑，弄得他们很尴

尬。凌晨从他家离开，我也被跟踪过。有一次我骑得飞快，把跟踪者甩下一大截，再转身慢悠悠迎面骑回来。在昏暗的路灯下，跟踪者看看我，又看看前方，一时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朝前方骑去。

一九六七年年底，罗克告诉我，他感觉自己被捕的日子不远了，建议我从那一天起，为了我和大家的安全，终止往来。他还请求我在将来的调查中，不要犹豫，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因为“不管你承担什么责任，他们要加给我的‘罪责’是不会减轻的”。他把事先写好并封口的一封厚厚的信交给我，请我“在今后情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罗克于一九六八年一月被捕。此信屡屡更换藏匿地点，但插队多年后竟不知下落，实有愧于他的在天之灵。

那时四中在“军宣队”掌控下，我与负责我们班的当兵的和指导员常常激烈辩论，反倒给他们留下坦诚的印象。有一天，当兵的在操场找到我，说有人来“外调”，又说“指导员让我告诉你，不用紧张”。进了指导员小屋，两个穿警服的坐在里面床上。指导员把门关好，对他们介绍我说：“他一贯忠诚坦白，你们可以完全信任他。”那两位听了这话，满脸不快。但那时解放军的势力远在公安之上，他们也只好忍气吞声。

此后一两个月，这二位多次来四中找我。我一口揽下自身的责任，这态度让他们诧异。我讲话时，两人面面相觑，不知所

措。我意识到，他们的调查无非是两条，一是罗克是《文革报》的幕后操纵者，二是罗克的“反动”言论。这两条均非事实，我毫不费力地挡回去。

他们要我揭发罗克的“反革命”言论，我回答“一句没有”。无可奈何，他们退而求其次，要我写下他的言论。几日后他们当面一读，勃然大怒：“照你这么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分子了。告诉你，他是中央定了性的反革命分子，你还包庇他，你可知道性质的严重吗?”其中一个掏出把枪来，朝我晃了晃，又“啪”地拍在桌上，显得十分滑稽，我忍不住失声大笑。

相持一阵，他们的调查忽然转向，集中到“手榴弹事件”上。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心里不禁一惊。与罗克停止见面后，出于同一安全考虑，所有报社成员也都停止来往，我无从了解原委。他们试图把罗克说成这一事件的指使者，却发现在我这里找不到任何线索，便对我失去了兴趣，从此不再打扰，竟让我多少有些被冷落的感觉。

罗克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被捕，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的公告中被列为二十几名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一月二十七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除了遇罗克，公告中所列死刑犯当日都被枪决。而他的死刑延至三月五日，是在另一次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公审大会后执行的。一九六八年他曾先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但他拒绝签字。据说，他的死刑是经最高层亲自

指示，并委托重要人物办的。在最后关头，罗克保持一贯的机智和幽默，在一月二十七日公审大会后，他声称有重大案情未交代，作为“五·一六”分子，他与某某单线联系。为自己争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为何从十五年徒刑改判死刑？判决书上的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出身论》只字未提。

罗克是如何涉嫌暗杀的呢？一九六七年夏天，东北武斗正盛，部分《中学文革报》成员结伴北上。一到长春，在火车站就给每人发武器，离开长春时，我曾嘱咐大家将所有武器退还，以免留下祸根。后来才得知，罗文并未退还领到的手榴弹，把它带回了北京。

罗文是个酷爱化学的人。他曾对我说，对他来说搞政治纯属误会。他曾恶作剧地在我家洒下几滴威力极大的催泪剂。他还为报社成员表演火箭发射，火药想必就来自那颗手榴弹。私下带回手榴弹也罢了，他却在风声正紧时，找了几个靠不住的人去香山埋藏。被抓后一恐吓，有人就招供了。他们也曾试图让我证实罗克是这事的幕后操纵者，我当时尚不解，直到读到判决书，才知道这一企图。罗克、罗锦、罗文、罗勉兄妹虽个个聪慧，但办事往往有失周全。罗克当年托罗锦藏日记，她竟藏到中山公园公厕里。罗文从东北带回手榴弹，罗文、罗克拒绝销毁读者来信等，也是明显的例子。不过，把罗文的手榴弹归结为罗克的暗杀阴

谋，并非愚蠢的推理，而是懦弱的陷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十三年后的夏天，为罗克平反的时机终于到来。我和罗锦在《光明日报》社与记者王晨数次会面后，《划破夜空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于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登载纪念遇罗克的文章，他成了广为人知的英雄。

## 十二　峨眉山

一九六七年四月报纸停刊，我陷入严重的危机状态。不久，我和杨百朋、吴景瑞、王建复、陶洛诵、遇罗文等四中同学和报社同人一起到了成都。

从成都搭乘慢吞吞的长途车，我们来到了峨眉山，下车就去报国寺投宿。大殿里有三尊佛的立像，全然不为尘世纷争所动，安详地俯瞰人群。早听说蒋介石国难当头时曾在此隐避，所以对这座寺庙格外好奇。虽是动乱年代，在庙里挂单的游客却不少，大多数是学生。到斋堂用饭，师父先问每人饭量，据说饭越少，菜越精，收费都一样。菜端上来，见到鸡蛋很惊奇，这才知道素食的涵盖比想象要广。在报国寺还吃到“雪磨芋”，味道和口感让我想起北京的冻豆腐，但更鲜美。

翌日起了个大早，草草洗漱后开始上山，抵达洗象池天色还不算晚。大家决定在此歇脚。庙里住宿费本来就不高，我正要交

钱，被百朋拦住了。在寺外与一群猴子逗耍一番后，百朋招呼我再去登记，果然价钱又降下不少。这里名不虚传，果然有白象在池中，但我们混沌不解其含义。一夜平安，早上发现厕所悬空架在悬崖边上，方便时往下一望，让人心惊肉跳。

离开洗象池不远的山路在云雾缭绕之中。离开上山正路，拜访了几个小庙，殿中无人，经书满地，显然遭过破坏。但像峨眉山所有寺庙一样，佛像都是完整的，这在那年头也算得奇迹了。

一路上林茂竹密，鸟叫猿啼，此起彼伏，令人惊心动魄。与几位同伴钻进林中，很快被枝蔓纠缠，无路可走，只好用菜刀开路。没过多久，我们已筋疲力尽，并完全失去了方向感。绝望中齐声呼救，本以为无望，却意外听到回答，在不断应和声的引导下，我们终于回到正路，对周围草木有了敬畏之心。

暮色降临前接近金顶，浓雾中，下起瓢泼大雨，未带雨具，很快就成了落汤鸡。到了庙前，一位比丘尼迎上来，把我们引到生着火的殿堂，帮着烘烤衣服，让我感到亲人般的温暖。耳边雷声滚滚，闪电的蓝光不时照亮殿堂。有人喊看神火，从山门口望出去，果然有蓝色荧光在暗中游弋，灿烂夺目，实为奇观。

翌日晨，为看日出早起。第一次见到云海，汹涌澎湃，几座天际的雪山如海中仙岛。太阳跃然而出，苍茫云海瞬间换了颜色，由铁青到雪白。稍晚，无人应邀同行，我独自去了千佛顶和万佛顶。海拔三千多米的山顶，植被与山腰不同，依然赏心悦

目，散发出浓烈的草木香气。

为观看天下闻名的峨眉光，我和建复留到下午四时后下山，然后与他人在九老洞会合。这一奇观定点定时，在上有阳光下有云海时才会呈现。一位比丘好心引路，岂料头上阴云密布，只好败兴而归，那师父忽在我们身后喊道："有了。"只见阴云裂开一道缝，阳光射下来。待我们赶上去，阴云又合上了，可惜终未看到这一奇观。

从金顶到九老洞本是一天的行程，我们却在下午四时后才出发。上路不久，天色渐渐暗下来。在黑暗中穿过峨眉山有名的险路，坡陡路滑，到处都有坠入悬崖的危险。天完全黑下来，仍看不到九老洞的影子，我们早已精疲力竭。而鸟鸣兽吼，被夜的寂静放大了。眼前又是个大坡，我俩认定翻过坡再看不到九老洞，就只好死在这里了。爬到坡顶，居然远处有几点昏黄的灯光。

用餐时间早过了，僧人还是为我们备了饭菜。夜宿的大堂有几十张床，只有我们一行人。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陶洛诵是同行中唯一的女生，她不敢独宿，请求我们允许她与大家一起过夜。我煞有介事把菜刀枕在头下，但很快被疲劳征服。再睁眼，一片光明，夜间的恐惧显得非常可笑。

在火车上听到九老洞的传说：几个和尚备了七天食物，打着火把，走了三天未达洞底，又折返回来。如此神奇的洞，我非进不可。听僧人说洞口离寺庙往返三十里，众人都失去兴致。我独

自而行，来到洞口，周围尚有大片积雪。进洞没走几步，便是令人魂飞胆丧的轰响——无数只受惊的蝙蝠从洞中飞出。没走几步，陷入无边的黑暗中，用小手电筒照出去，什么都看不见，只好跌跌撞撞摸回洞口。

从九老洞下山，一路从容，与同伴们在报国寺相聚。当晚与毛子（吴景瑞）商定去越南的计划，次日便踏上东行之旅。

## 十三　越南之行

越南之行其实目的不明。过去虽在政治风波中屡遭批判，政治信仰并未动摇。办报的失败，才使我真正陷入迷茫。莱蒙托夫的诗句“他在疯狂之中祈祷风暴，幻想着风暴会带给他平静”，或许正是我那时心境的写照。

与峨眉山之行的同伴分手，我和毛子踏上去广西凭祥的旅程。按照计划，我们买下几斤巧克力和一把快刀。

“如果我的手指被毒蛇咬到，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帮我把它切下来。你答应吗?”毛子严肃地凝视着我。虽说彼此承诺，但这还是心理上的严重挑战，我问毛子如何想，他却摆出不屑的姿态。

北上成都，东抵重庆，与几位各地游客凑在一起，步行至九龙坡扒货车。九龙坡是个大编车场，几十股轨道上机车呼啸滑行，让人目不暇接。我在一条轨道上行走，陷入遐想，对人们的

呐喊和调车员的哨声毫无反应。突然有人猛然把我推出轨道，我正要发作，只见一节车厢从我身边悄然滑过，这才意识到是一位铁路工人救我一命。他追上那节车厢，跳上去，没给我一个道谢的机会。

从九龙坡搭上的货车，在贵州某站被查处，我和毛子自恃一路练就的本领，漫步到车站数里外，等开动后再扒飞车。那火车司机早把我们的意图看在眼里，列车一启动就全力加速，汽笛长鸣不已。不顾毛子的呼喊，我奋力疾跑，几次伸手抓到车厢扶手，可每次都被魔术般反弹回来。列车驶入前方隧洞，轨道上只剩下我们俩。我看出毛子为我的失败而庆幸，果然，在他估算出车速后，并未像我那样尽力。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我买下两张短程车票，搭上一列东去客车。在靠窗座位上，我要了杯热茶，安然坐下，读起斯蒂文森的小说集，毛子在我对面昏睡过去。几个小时后，列车员查票，我和毛子将在下一站被赶下去。

对列车员的粗鲁很反感，我心生一计，叮嘱毛子留在原地，车一靠站，我就跑到售票处买了两张票，还买了些食品。待我回到车厢门口，出示车票后，列车员仍拒绝让我上车，毛子也被两人从车厢架到门口，他拼命挣扎着，拒不下车。列车启动了，我扔掉手中食品强行登车。经过一番搏斗，我被踢下车门阶梯，我们的背包被扔出车外，而列车载着毛子消失在远方。

我向站长抱怨，讲述了刚才的遭遇，他把我请到办公室，挂了几个电话，建议我到车站附近用餐后再来找他。在小饭馆昏暗的灯光下，满耳犹如异邦之语。沮丧和屈辱之中，想起斯蒂文森笔下一对老夫妇的悲惨遭遇，感到十分凄凉。再次见到站长，他告诉我已安排好毛子在贵阳下车与我会面。他语调平淡，面无表情，刻意掩饰那与时代相悖的善意。

在贵阳车站候车室见到毛子，让我欢欣不已，毛子却摆出无动于衷的嘴脸，仿佛这重聚早就在他神算之中。

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广西凭祥。一踏上站台，便感觉到浓重的战争气氛。南下的列车满载大炮和装甲车等重武器，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人。让人惊讶的是，从制服、帽徽和肩章上看分明是越南人民军，在饭馆吃米粉时发现他们讲的竟是中国话。一位同桌的士兵向我们炫耀说："美军在越南五十万，我们人数从不在他们之下。只不过说起来一个没有，因为我们是人民军，不是解放军。"讲到此，他诡秘地一笑。我心中甚是羡慕，他忽然叹口气加上一句："剩下半年，咱回家看媳妇喽。"顿时让我扫兴，怎么会有人在媳妇与打仗之间作出那么糊涂的选择。

从凭祥到越南的捷径不是南下而是西进。在无区域地图的情况下，我们靠指南针一直向西走，一路上绕开有人烟的地段。傍晚时分，进入茫茫无际的山区。每座山丘虽不算高，但陡峭危险，满山齐腰高的野草，茂密得迈不过去，每一步都要把脚抬到

草尖上，再踩下去。举目望去，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苍山绿海，让人怀疑是否能走出这无人地带，再度回到人间。

夜幕降临，下着毛毛细雨，在半山腰踩倒一片草，铺好塑料布准备安营扎寨。由于坡度陡，必须用脚蹬地才不致滑下去，再加上湿衣服贴在身上，看来这夜难熬了。伤感之余，也为境遇的荒唐与危险而兴奋。我探出头，瞥见一串摇曳的光点向我们移动。我唤醒毛子，用食指放在嘴边示意不要做声。我们屏息观察，断定那是一支打着手电筒的巡逻队。不一会儿，这些光点接近我们的宿营地。令人不解的是，光点的大小亮度并没有因距离的变化而变化。我下意识伸出手去，居然抓住其中一个。毛子打开手电筒，我松手一看，吓个半死。原来是一种带荧光的丑陋飞虫，与常见的萤火虫毫无相似之处。

第二天一早，吃上几块巧克力，我们又踏上行程。我浑身都是蚕豆大小的蚊包，不时停下来抓痒。毛子手持木棍在前边打草开道，反复嘱咐我准备好刀子以防蛇咬。有一回我刚要落脚，瞥见草丛中盘着一条蛇。它仰头与我对视，毫不示弱，最后还是我绕道而行。下午时分，在山谷中遇到一条小河，我们脱衣洗浴，毛子身上的蚊包还不及我三四成，心中有些不平。

晚上宿营时，估计已进入越南，百感交集，我在手电筒下写了很长的日记，其中有对父母的歉意，对祖国的离别之情，以及对前景的期望。夜里梦到西贡，梦见电影院门口有许多外国电影

海报。再上路，草丛没那么密了，坡度也平缓多了，我们加快了行进速度。忽然在山脊看到一条蜿蜒小道，穿过漫无边际的山丘。我们坐在小道上，正享受美味的巧克力，忽然有个人从坡下冒出来，让我们一惊。我故作镇静，先后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跟他打招呼。他专注倾听，却只是连连摇头。我和毛子不禁欢呼雀跃，庆祝我们越境成功。那人受我们感染，也咧嘴笑了，然后弯着腰朝山下指去。沿着他指的方向走下去，来到一个仅几户人家的小村子。

在村口碰见一位年轻农妇，模样标致。她招手示意，让我们跟她走。她家是架在几根木桩上的竹棚，地板和墙到处是缝隙，透光漏风，对我们来说，异国情调十足。语言不通，但她的微笑充满善意。她生火做饭，又围过来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好奇地打量我们。她端上热汤，又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能磕磕巴巴讲几句汉语。看来他把我们从北京来这事说清了，围观的人不禁欷歔。农妇问到我们此行目的时，他似乎未听懂我的回答，农妇听了翻译照样满脸疑惑。喝完汤后，并没有再上饭菜，让我大失所望。

与农妇道别，踏上山间蜿蜒的公路。不知为什么，毛子在后面越落越远，我知道没有岔道，便大步先行。走了一两个小时，忽然有人在我肩上一拍，是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他把夹在后座的书递给我，示意让我搭车。我跳上车，翻开书，首页是托尔斯

泰画像。再一翻，是沃伦斯基与安娜在火车站分手的插图。在这战火中的国度，遇见一位托尔斯泰的热心读者，让我无比感动。我们开始用英语简单交流，他对我所说的一切都理解都认同，似乎远比我见过大世面。我们来到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年轻人放下我，我们告别。

我在街上东张西望，一个小姑娘凑过来，用标准普通话大大方方问我："你饿吗？你要吃东西跟我走。"我感到惊讶，问起来，她指指胸前的毛泽东像章说自己是中国人，问她这是什么地方，她说谅山。我告诉她在等一个同伴，她向我保证会领他与我会合。跟她走进一个院子，全是身穿制服的武装警察。一个中士能讲流利的中文，我向他讲明去河内参军再南下的意图。他摇了电话，告诉我第二天有车带我们去河内。大约一小时后，那小姑娘果真把毛子领来了。

晚餐除了清汤只有一小碗米饭，我们饿坏了，就是十份也填不饱肚子。大堂里，不少人在烟雾缭绕中围观下棋，居然是中国象棋。毛子在旁观战，时不时摇头叹息，很快就被请上去。毛子的棋艺在四中是有名的，那帮越南人哪是对手，不甘认输，又到镇上搬来援兵。毛子不失大将风度，不动声色，越杀越勇。我感到无聊，倦意袭来，便独自去睡了。

数日来第一回头上有顶，肚中有食，这一觉睡得香甜自不必说。醒来，毛子还在梦乡。我到院中漫步，碰到会讲中文的中

士，问起去河内的车何时能到。不料他态度粗鲁，让我起了疑心，回去摇醒毛子，提议逃跑。可不管我说什么，他只要睡觉，终于误了大事。

一辆吉普车到了，一位英俊的少尉跳下来，向我们行了军礼，把我们请上车。他讲的中文无懈可击，却绷着脸不与我们交谈。问起我们是否正去河内，他说先带我们见一位首长再说。一路上时有石峰拔地而起，有桂林山水之秀。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吉普车拐入一座戒备森严的军营。我们被领到一间厅堂，不一会儿，连汤带肉外加米饭端了上来。虽有不祥的预感，我们吃得好香，只是牛肉太老，把腮帮子都嚼酸了。勤务兵收走碗筷后，一位有首长风度的胖中校走进来，坐到我们对面。他和颜悦色，通过少尉翻译听完我们的陈述，对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表示欣赏。接着他讲到抗美援越要经由政府安排，我们应回国申请。绝望之余，我言辞越来越激烈。那少尉停止翻译，居然直接与我争吵起来。毛子拉拉我的胳膊，说了句很可笑的蠢话：“别那么说，要注意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啊。”转念一想，抗争也不是出路，便假装认输，盘算在回中国的路上另想办法。

两位军官消失了，一个头戴瓜皮帽的下士进来，示意跟随他走。我以为他就是司机，可从厅堂走到营外不见车影。问起，下士只咧嘴微笑，露出一颗金牙。没走几步，路一拐，前方忽然出现一座城楼，上面刻着“友谊关”。下士走到关前，与中国士兵

互敬军礼，然后金牙闪闪与我们道别。刚一入关，我们被一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拖进小屋，不由分说地在胳膊上扎了一针。走出来，又到另一处登记，并递给我们一份中央文件，是专门写给自发去越南的“革命小将”的，又是那些套话。本以为天下去越南的，只有毛子和我二人，吃饭时遇到好几十个学生，才知道在那个年代，亡命之徒大有人在。回凭祥的卡车上，我打量其他学生，发现胳膊和腿也满是搔破的蚊包。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都穿着红卫兵的黄军装。

我们从越南回来不久，张育海和沈大伟成功地越境到缅甸，加入了德钦巴登顶领导的人民军，先后战死在沙场。

## 十四　长春三日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与《文革报》大部分成员外加遇罗克，一行十几人去北戴河，当夜步行到秦皇岛，搭上一列无点运行的列车北上沈阳，游览故宫后与罗克分手，我们继续向北，抵达长春。

我们刚下站台，脚跟还没站稳，就被一伙全副武装、戴袖章的人领到站台一端。与上百个年轻人一起，莫名其妙地成了他们的兵源。有人发言致谢，然后把枪支、弹药和手榴弹发到我们手中。

对我们的款待包括一顿丰盛的晚餐。我把武器搁在一边，正

大快朵颐，同行的王嘉材面色凝重地凑到我桌旁。“嘿，你知道站台那些席垛下边是什么吗?”“粮食呗。”我信口说。“不是。跟我来。”

到了席垛跟前，四面张望，他猛地掀起苇席一角。我心一沉：哪里是什么粮食，而是一具具尸体。“昨天夜里抢武器库给打死的。”有人凑上前来，扔给我们这么一句。

晚餐后，我们被唤上了几辆卡车。每辆有六七个保镖，驾驶舱上架着一挺轻机枪，两侧站着自动枪手。我们这帮学生蹲坐其中，车队以疯狂的速度向城区驶去。出于好奇心，我刚试着站起来，被大声喝住。另一保镖见我不快，侧过身来歉意地向我笑笑：“上一趟死了两个，不能大意啊。”

目的地是长春地质学院。晚上与嘉材住同一间宿舍，睡得正酣时被他唤醒，只见夜空被焰火般的弹道切割，传来一阵阵柔和的爆炸声。我刚要走到窗前探身出去，嘉材喊道：“你疯啦！趴下。”第二天早上，在走廊里听说两个与我们一起来的学生死于半夜的流弹。大院里在开追悼会，十几个死者都是二十岁上下的汽车司机。一个悼亡者在喃喃自语：“妈的，拼了！拼了!”

嘉材在追悼会场转了一圈，双手围拢在我耳边说：“嘿，你知道他们怎么开车？蹲着开，看见电线杆子拐弯。”在白花圈和黑袖箍的包围中，我感到极度麻木。

下午时分，我被唤去处理一个不快的事件。我们同行的几个

人，发现附近文学研究所无人看管，顺手牵羊拿走几本西方小说。而遭殃的只有君若，她被剪了头发关起来。她来自女校，受过舞蹈训练，长得美身姿也好。从北戴河步行到秦皇岛，她一路向我倾诉：关于黑暗的现实和绝望的心境。此后我有意无意避开她，没想到这回倒霉的偏偏是她。再见面是在回京的火车上，她头戴假军帽，见到我默默无言。

第二天嘉材和我找到一个自由市场。国营商店全部关门，自由市场反倒繁荣起来，琳琅满目。走着走着，忽闻一阵枪声，一辆吉普车载着几个全身武装的人，在人群中疾驰而过。有位老汉摆摊卖蒜头，我上去问价，老汉满面堆笑说：“老总，看上就随便拿。”不管怎么说，他死活不肯收钱，最后我拿了两个蒜头走开。心里正纳闷，嘉材在旁冷笑说：“不看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原来我手握折叠水果刀，削过萝卜忘了收起来。没走多远，只见前面聚众成群，围着一个倒在血泊中的人。有人感叹道：“唉，就为了跟那帮人要苹果钱。这年头。”

听说长春有座大楼原是伪满洲国的银行，坚实到连大炮也啃不动。一路找去，四周渐无行人。远处有一座雄伟建筑，我抬手一指，一阵枪响，在头上方的标语牌留下一排弹孔。我和嘉材立即扑倒在地，敏捷地匍匐前进，向附近的墙角爬去。速度之快，超乎我自己的预料。越过大楼的视线，我们站起来撒腿就跑。

当晚我把大家召集起来，决定次日去哈尔滨。临行前，我

说："重要的是所有武器一律上交，以免招嫌。"我带头把武器上交，以为大家也都跟着做了，后来才知并非如此。

第二天赶到火车站，才知道因武斗客车不敢进站。候车大厅拥挤不堪，我跑到站外，刚在一个门洞躺下，就昏睡过去。不知睡了多久，被密集的枪声惊醒。一个枪手藏在我的门洞，向斜对面的铁路局大楼射击，大楼上闪烁着还击的火光。"进站里去，这儿不安全。"那枪手头也不回地说。"别跑，慢慢走。他们专打跑的。"他补充道。我犹豫着迈出几步，周围的枪声格外密集起来。身不由己，我飞快地跑起来。那枪手朝我大喊："别跑，别跑啊！"

车站大厅，人们围着一位老汉，他胸口被炸开碗口大的洞。他大口喘息着，在众目睽睽下咽了气，身边留下一箱没卖掉的冰棍。这场枪战，更让我怀疑搭乘客车的可能，便决定带大家搭货车。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一列北上的货车。车长好说话，让我们坐在守车里等着发车。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同行中有人不顾我的反对，非要去买食物充饥。走后不到一刻钟，列车哐当一晃缓缓驶离车站。嘉材和我对视一下，随即把他们的背包推下守车。我们终于离开长春。

在武斗的硝烟中，我和嘉材游历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连。我们在哈尔滨横渡松花江；我在大连看望亲戚和童年好友，在宁静的海滨游泳、抓海蛎子。途经沈阳时，竟又奇迹般与长春

分手的同伴会合。

据洛诵说，最后一次与毛子见面，他说要去东北找我。从此杳无音信，如果他真去了，很有可能在那里丧生。

## 十五　插队之际

一九六八年年底，辍学两年的中学生开始去农村插队。一位小学女同学到山西绛县，我和刘姜仁到北京站跟着混上“知青”专列。站台上，车厢内，哭声震天，连欢送的锣鼓声都被淹没了。列车启动，这告别的一幕达到高潮。

在晋南与列车上的“知青”分手，我们南下渡黄河，西进抵华阴，在严寒中游华山。再回山西，跟着姜仁去他老家。那是晋南襄汾的小村。两个北京学生到来的消息传开，招来一些好奇的老乡。其中有个原北大的学生，打成“右派”后下放到这里。他个头矮小，衣衫不整，满脸稀疏的胡子，戴着厚厚的眼镜。他滔滔不绝，连讲了好几个小时，从农村的贫苦到政策的失误，能看出他心中无尽的苦楚。

村边有三嶝山，孤零零坐落在平原上，并不算高，但很有气势。我和姜仁爬到山顶眺望，在薄雾下，村落星星点点，阡陌纵横，方整的田地一直延伸到天边，令人心旷神怡，一时忘掉心中的烦恼。

我们来到山顶的古寺。听村民说，虽寺舍残缺不全，一位法师却拒不下山。踏进山门，那法师双手合十迎上来。他身形清癯，神情安谧，黑色须髯飘逸，真有如仙人一般。

古寺不大，院中有各朝代留下的石碑，不少已毁，但文字尚可辨认。我边看边向法师请教，他回答简要。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对话离开碑文，涉及宗教本身。

我对佛的认知大致来自《西游记》，实在少得可怜。问到佛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佛像你我一样，是一个人，如果你发愿，你也可以成佛。"他又告诉我，人生有八苦，一个人通过修行，达到不以八苦为苦的境界，那他也就成佛了。

只身离开襄汾，我又到盂县看望刚去插队的小学同学，下了火车，才得知长途汽车因大雪停运。在雪地徒步三日才到目的地，在那里，我对插队生活多少有了些体会。

在太原火车站搭上回京的夜车，座席已满。我站着，注意到一位坐在窗口的姑娘满面泪水，不断用钢笔在小桌上画画。待我坐到她身旁，聊起来，发现她也是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在周围乘客的阵阵鼾声中，我们一直聊到北京。她转乘去唐山的火车，我陪她在车站等候。即将分手时，我们突然变得沉默。把她送上火车，走到天桥上，望着那列火车冒着浓烟消逝在天际，十分惆怅。不久收到一封厚厚的来信，一张是《牛虻》中亚瑟的肖像，另一张画的是在火车站两人分手时相对无言的情景，其中的我戴着那顶黑色狗皮帽子。

## 十六　尾　声

罗克的被捕，使我失去了良师益友。而我的交游由此扩大

了，逐渐形成新的圈子。“文革”的疾风骤雨，无情摧毁了我的信念，在心里留下一片空白。即将步入成年，发现自己对人世间几乎一无所知。与新结识的朋友一起，我们开始如饥似渴的读书生活。其中包括当时内部发行只供高干阅读的“灰皮书”，诸如《新阶级》、《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赫鲁晓夫主义》，在政治上增添了新的视角。在哲学上攻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企望从中找到社会与人生的“元素周期表”。与此同时，我陷入文学狂热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等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家，尤其让我着迷。而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莫泊桑、司汤达、拜伦、雪莱、莎士比亚、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霍桑等欧美作家也开始进入我的生活。

我在四中的最后一个冬天，晚间时光大都是在冰场度过的。与八年前不同，我的冰鞋从三十五号换成四十三号。幸运的是，四中的八年时光，在自然科学上让我打下坚实的基础，政治上的磨难为我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一九六九年春，姜仁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学鲍有悌。他俩收到白洋淀一个叫吴世陆的同学的邀请，姜仁不能赴约，由我替代。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在徐水站下车，步行到安新县城，在城东码头搭上去郭里口的六舱渔船。从县城到郭里口十几里水路，碧波荡漾，煞是好看。到了那四面环水的岛村，刚坐到炕

上，一个陌生人闯进屋来，莫名其妙拉着我们去大队部，显然被误作他人了。一位村干部拉长脸嘟囔着，给我们开出户口迁移证，所在地是安新县王家寨公社郭里口大队。将错就错，我从此离开四中，开始了在白洋淀的插队生活。

# 昨夜星辰昨夜风

## ——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

刘辉宣

刘辉宣，笔名礼平，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学生。一九四八年九月生于张家口，一九五一年随部队进驻北京。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四中。一九六九年入伍，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员、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一九八〇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议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二〇〇八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

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热流行过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一首关于这“血统论”口号的歌曲，唱遍了全国。这首著名的红卫兵“战歌”就是我谱写的。

人们普遍认为是《出身论》导致遇罗克被枪毙的悲剧。据我

所知，遇罗克之死恐怕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在推脱责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我与遇罗克当年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教研室小院。我有个同班同学叫史康成，也是他们一伙的。当年我们为这口号打得不可开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捕，史康成受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工宣队关进学校，正好与史康成为邻。我们俩，一个是因为鼓吹“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血统论”，殊途同归。

“出身”这玩意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血统论”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反对——它本来就很烂。遇罗克的悲剧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质疑，作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问题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前不久发表的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比我们站得高，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远远高于《出身论》。这绝非抹杀《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采飞扬。他是出类拔萃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那口号流行不到半年就臭街了，连我们自己也知道错了，甚至一开始就知道那是错的。他的被捕让我不解：是我们错了，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一九七〇年他被枪毙时，我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这到底是想干什么？

红卫兵喊出那口号带有很大的胡闹成分，却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那首该死的歌，让我对不住周围的很多人。我们班主任叫田佣，是个青年教师，只比我们大七八岁。后来当了四中的副校长。田老师六十岁退休时，点名要见我这个班长。徐金波他们和我一合计，说干脆给老师祝寿吧。寿宴中拉起家常，当我知道田老师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时，十分惊奇，于是问："您什么时候结婚的啊?"田老师用筷子点点我鼻子，说："你还问呢，都是你的那个破歌，害得老师好久找不着老婆!"

"文革"中我们一指头也没动过田佣老师。他很有威信，同学们都喜欢他。但政治上的魔咒比什么都厉害。

"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

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做“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

就此而言，“血统论”选错了对象，为我们自己在“文革”中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人家可什么都不怕。正是这一强大对手，最后把我们从“文革”的戏场上扫地出门。

红卫兵运动有其复杂性——怀疑过、思考过、反抗过，其中包括不少当年的学生领袖。我称他们为红卫兵中的理智派。相对而言，红卫兵中另有一帮疯狂派。这两派的能量都不小，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冲突碰撞，就土崩瓦解了。当时四中有一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他“文革”前就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文革”中写文章、办报、组织团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精英，像马凯、薄熙永、秦晓和李三友等。我们这些校友直到现在还团聚在他们身边，可见其威信和影响了；这是四中。另外还有八中的陈小鲁，六中的董良翮，都是“文革”初期的理智派。陈小鲁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到处

泼冷水，老是说："这是干什么啊？你们瞎闹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对"文革"充满无奈和不屑。我校有个徐小岩，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杨成武上将的儿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凡事不卷入，不闻不问。

孔丹他们热情洋溢，本想在"文革"中有所作为，结果差点儿送了命。孔丹和董良翮都被"中央文革"抓了起来，一九六七年判决书都拟好了，要不是周总理干预，他们肯定死在遇罗克前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一个多月了，四中就一直顶着，全校都顶着，就是不成立红卫兵，一直到"八一八"前夕，听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才匆匆成立了。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际那三四个月中，形势变化莫测，令人目不暇接。红卫兵是从海淀区的几个重点中学，主要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起家的。一些学生对教育体制有意见，"文革"一起，率先罢了课。不久工作组进校，他们就跟工作组顶了牛。工作组在共产党政治传统中从来就是钦差大臣的角色，谁敢惹？可学生中有不少干部子女，天不怕地不怕，在圆明园的野地里开了个会，写了篇《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署名"红卫兵"，造工作组的反。这就是红卫兵的由来。

毛主席见他们敢反对工作组，就想通过他们打倒刘少奇。因为工作组是刘少奇派下来的。除了工作组全数撤回，毛主席还亲自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于

是这把火烧遍全中国，刘少奇遭到重挫。乱天下者红卫兵也。

那一阵，江青对红卫兵那股亲热劲儿，让人肉麻，今天抱着这个掉眼泪，明天搂着那个擦鼻涕，反复暗示这些红卫兵：你们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才算数啊！当然指的是刘少奇。可那帮红卫兵就是按兵不动，心里明镜儿似的——坚定地站在刘少奇一边。最早揭竿而起的海淀区的红卫兵，已经跟江青暗顶了起来。城区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时候走上“文革”舞台的。

“文革”初起时的气氛，在很多方面暗合了人们的普遍情绪。但“中央文革”那帮人，包括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江青，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看不过去。城区的红卫兵做事的风格与海淀区的红卫兵很不相同。如果说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我们只能算第二拨，而第二拨对开创者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对“红卫兵”三个字就瞧不上——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显摆什么？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盛装游行似的。所以我们四中就是不成立红卫兵，还照旧打着共青团的旗帜，尽管那时连团中央都不存在了。

四中校领导不是被学生打倒的，而是随运动的到来自动瘫痪，工作组进驻就交了权。不久工作组被撤回，学校出现权力真空，于是由几个高年级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完全是另一

路。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群龙无首，其中的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骆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张承志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红卫兵”就是他命名的。可他们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的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小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

红卫兵运动有很多过激的行动，比如抄家，“破四旧”，开批斗会，而在红卫兵高层，却有过非常理智的核心。群众造反，有两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斗领导，二是抄档案，因为档案中提供了可攻击他人的材料，这是各地档案大量失散的主要原因。而接管四中档案的是马凯，他看管得很紧。四中档案完整保存下来，马凯功不可没。后来李敖从台湾访母校，还找出当年的成绩单给他看。在一个疯狂的时代，简直是奇迹。

理智是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属于那些最优秀的人。而我在“文革”中不是理智派，凭冲动凭本能干事，犯了不少错误。要说那年头人人都犯错误，但人家错得不丑不浑不烂，这就是品格。在“文革”中无论是谁，无论做什么，只要有品格，就令我深怀敬意。四中有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是我们对立面。其中有个同学叫杨小青，与我们积怨甚

深，见面总是怒目而视。有一次外校武斗打进四中，我在混战中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性命把我救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而我心里一直都很敬重他，倒不是因为他救了我。

城区的红卫兵兴起后，势头一下子就盖过了海淀，“中央文革”整天催原创“红卫兵”去打倒刘少奇，他们磨磨蹭蹭，躲着闪着，死活也不上套儿。城区红卫兵却是另一番气象，由四中、六中、八中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专管红卫兵的。李三友号称“李铁笔”，两个月中连写了十三道“通令”，口气大得不行，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抢文件，不许斗干部，不许这不许那，声动海内，各地批斗浪潮一时有所收敛。而中心思想就是要保住刘少奇。在这一两个月中，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出专门的办公地点做“西纠”总部。董良翮和陈小鲁成了“西纠”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最混乱的期间，周总理通过“西纠”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第一个被打死的部长是煤炭部长张霖之，打手主要是煤炭学院学生，事发仓促，令总理措手不及。不久冶金部长吕东又要被带到冶金学院批斗，一旦落到学生手里肯定没命。“西纠”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冶金部的干部随后赶到“西纠”。董良翮集结了一批队员待命，我校的袁赛路和国少庄也去了。后来他们跟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况，惊心动魄。“纠察队”只有十几个，面对数千群众，居然挡

住那股洪流，对峙了整整一夜，群众才散去。

还有一件事很离奇。宗教学院的学生将香山碧云寺的佛牙掘了出来，扬言要砸碎，先开大会“批斗”佛牙。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纠察队”正缺人手，于是值班的赵胜利只身前往。他赶到现场说明身份，群众与和尚居然让他将佛牙取走了。我问过赵胜利佛牙什么样，他说他也没看，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塞进书包带了回来，交给西城公安局。

更重要的是，陈小鲁受周总理之托，前往海南岛筹办红卫兵农场，准备将北京红卫兵都送到那里种橡胶，这实际上也是“文革”的结束方式之一。我们都手舞足蹈，跃跃欲试，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一些人就到越南和缅甸打仗去了。“西纠”的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揣摩分析，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对四面楚歌的总理，手边有这么一股可左右形势的力量又是多么宝贵！

但后来“西纠”却在群众中留下恶劣的印象。除了以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妖魔化外，我们自己也有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后是我编的那首烂歌，再有某些纠察队员不仅不管红卫兵，反而跟着一起折腾，直到纠察队员打死了人，事儿就闹大了。

先说说我的朋友唐双津，他为人大度豪爽，一身侠气。“文革”初期，他带着一帮同学把他邻居的家抄了。唐的父亲是共产

党中将，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那邻居是旧将领世家，从前清到北洋到国民党杂牌军，三四代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这两个中将之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吧。“文革”爆发不久，唐和谁都没打招呼，就把人家抄了。四中“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于是我就去了。当时校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

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十几个中学生把老军人绑起来，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里听。老将军说起的往事，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那是一个不眠之夜。老将军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端给他一杯茶。唐双津后来当了兵，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我可不想夸大我的作用，但那歌还是难辞其咎的。说起来还是有点儿偶然。我校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这类争论很多，支持谁反对谁没什么理由，完全是瞎起哄。当时到底辩论什么连我们也没搞清，似乎并没有涉及出身问题，对立的两边不是以“红五类”和“黑五类”划分的。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混淆视听，先声夺人，这一招往往很奏效，让对方一下

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些。谁也没料到，在会场上一唱就轰动了。各路红卫兵不听辩论了，纷纷过来抄谱。那年头和现在一样，出洋相的玩意儿说不定就成了流行艺术。这首歌唱遍了全国。我到贵州"串联"，甚至还听过铜管乐队演奏。

这恶作剧的意外效果，让我既错愕又得意，到后来就不可笑了。批判"血统论"时，各路红卫兵追着我屁股后面打，把我从家里拎出来批斗。有一阵，连我也做好被枪毙的准备。据说江青说过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有一个歌子吗？血统论，血统论啊！那个人坏透了，应该枪毙。"我听了吓得腿都软了。我甚至像阿Q那样想象自己上刑场时的表现，以免死得很没面子。后来没找到江青此话的出处，显然是人家吓唬我的。

一九六六年年底，我从外地"串联"回来，在"革委会"遇见秦晓，他满脸无奈地说："你们搞的那个破玩意儿净添乱，现在红卫兵彻底完了。"我惊问怎么回事，他说："血统论呗，中央文革要批红卫兵了，现在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不久就开始了对红卫兵的清算，把"血统论"归罪于刘少奇。"血统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红卫兵特别是"西纠"的清算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先把打死人的那几个纠察队员抓起来，紧接着是对"血统论"的公开批判，最后与刘少奇挂上钩，称之为"刘少奇

的反动血统论”。

我们的丧钟就是这样敲响的。

红卫兵在溃散前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惹是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向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红卫兵的行头也是从那时开始变味的。当初穿军装是为了表示向解放军学习，可到了后来，帽子要呢子的，军装要料子的，鞋子要皮子的，什么三接头，将校呢，将军帽，成了时装秀。风气就这样败坏了。更甚的是，红卫兵和“西纠”中的很多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举行成立大会。我去了，那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西纠”发言，主张不管运动如何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个我的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却成了“联动”的首领。“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四人，他是“三平”之一。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要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

最放肆也是最勇敢的言论，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号了。接着几千个“联动分子”去冲击公安部，被干警打得屁滚尿流，他们重新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

听说正是这事让老人家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一网打尽，孔丹、董良翮、宫小吉等被抓了三百多。第二年，公安机关似乎又想起“血统论”，把我也抓进去。那时监狱已人满为患。

四中的政治氛围很奇特，总体来说，大家都很友善。四中的“黑帮子弟”太多了，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三兄弟，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儿子傅洋、傅亮两兄弟，国家科委主任张劲夫的儿子张渤海，还有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源源。父辈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甚至“叛徒”、“特务”，但大家还是朋友，没人歧视他们。刘少奇被打倒，清华的刘涛、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都受到迫害，只有刘源源在四中平安无事，不但我们待他好，对立派的同学，还有“革委会”、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都没对他怎么样。

马凯在四中的身份有点儿特殊。他应在前一届毕业，保送北大，但因生病休学一年，留在四中做团的工作，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在我们这些刚考进四中的新同学看来，他是老师，当然也就是造反对象，但在老同学眼中，他还是学生。他处在这么一个

尴尬的位置。我们贴过他的大字报——谁让他是校团委的工作人员呢？后来他被高年级同学选进革委会，让我们莫名其妙：这老师怎么也成了红卫兵？马凯不善言辞，性格内向，偏偏又坚持原则。一些同学去查抄档案室，马凯挡在门口不让进，我们就贴了他的大字报。后来在"血统论"的辩论会上，我们就故意臭他，要他表态，他先是不肯，后来逼急了，涨红脸说："同学们，我坚决不能同意你们这个口号！"我们哄堂大笑。其实早就知道他的立场，其实孔丹、秦晓和周坚这些头头们也都不赞成"血统论"，不想招惹他们，但马凯就不一样了，他有教师背景。

从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我初中上八一学校，高中考进四中。这两所学校毫无可比性，四中号称天下第一中，八一学校现在只是个三流中学。其实

就教学方面讲，四中的资源并不比八一强多少，也不比其他学校强多少。四中的老师也一直告诉我们，四中无论师资还是设置并无特别之处，关键是高质量的生源。八一学校是干部子弟学校，固定单一的生源，决定了一般化的教学质量。我在八一学校是优等生，但考进四中就吃不消了。四中的学生个个全都聪明得成了精，老师讲课不用费劲，课本内容往往简略带过，高兴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我哪儿见过这阵势？眼见着就跟不上了。第一学期我是团支书，班长是曲明光，第二学期曲明光离任，我当上班长，王来强担任团支书——原因很简单，曲明光的成绩掉下来。其实我的成绩更不灵，但田佣老师似乎很看重我干事的那股劲头，舍不得罢免我，但我相信，到了高二，就是他不罢免我，我也得自己请辞——成绩一落千丈，根本顾不上班里的工作。我们班同学你追我赶，成绩最好的都不是班干部。在我印象中，最拔尖的似乎是李大成和季如迅。李大成平时不哼不哈，每到测验和考试必定是满分；季如迅是个大活宝，整天嘻嘻哈哈，净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再就是朱之鑫，此人做事极有章法，风格洗练。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在一次化学试验中，我们配制一种叫乐果的农药，要心灵手巧，用滴管滴得极均匀才能完全溶解，稍有差错就会有沉淀物，最后全班只有三四个人做了出来。老师举起朱之鑫的试管对大家说：“多漂亮，香槟酒一

般!”我才头一次知道香槟酒的颜色。我自信是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可那天我的试管里一片浓雾，让我丧气透了。

班上还有一些知识型的同学，也是我在八一学校从未见过的。曹一凡最有意思，他满嘴讲的都是一些知识含量极高的笑话，在我眼中，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狡猾的教授，有些笑话，答案得到大学课本去找。“文革”中，他告诉过我一个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横批是“又圆又滑”。那是他从大学里的大字报上看来的。

这一切让我得出结论：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无法相比。我还怎么当班干部呢？这纯粹是靠天分，而不是靠努力。我看出四中教育的症结就是竞争，这是应试教育的根本，优胜劣汰，天经地义。这是我在八一学校体会不到的。

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唱起来的，一直唱到今天。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让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接班”，八一学校想出个办法，组织同学互相帮助，让优秀生带动落后生，提出的口号是“像在战场上抢救负伤的战友一样抢救学习落后的同学”，掀起一股学习热潮，那年八一学校几乎全数

考上高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考进重点高中。但考进去的往往都感到巨大的压力，自然包括我在内。

四中的学生成分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精英；另一方面，也集中了另一类精英，就是曾被我们认为是“异己”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包括朱之鑫在内。党要求我们把他们比下去，我们按党的要求努力了——可见我们当时的思想有多么狭隘、扭曲。

四中的学生成分确实很复杂。我们在“文革”中曾认真统计过同学的家庭出身。奇怪的是，同学们都争着往坏里报。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高干子弟，不报“高干”报“革干”；“知识分子”子弟报“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因为“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知识分子的名声要“坏”。像陈凯歌他们就要报“高知”，只报“知识分子”似乎有隐瞒之嫌。当时四中的学生成分中号称五“高”，即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和高级资本家，外加高级民主人士。“民主人士”的地位很特别，很多人都受到冲击，他们的孩子也就往“坏”里报。四中有个出身统计表，同学们“踊跃登记”，五花八门，什么名目都有——有填“军阀”的，大概是起义将领。还有一个填“奴隶主”的，简直就像是从数千年的坟墓里蹦出来的，后来才知道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阿沛·阿旺晋美当时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过去是西藏的领主，这么填也没错。

按理说，四中应该是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恰好相反。“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而北京别的中学往往分成三派——“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们这帮人，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主。“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则是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并非“黑五类”。而“黑五类”相当于“贱民”或“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几乎没有“四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们“老兵派”互相争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有个高干子弟叫高中，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势不两立的派系争斗，但绝无你死我活，绝无往死里整人。四中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体现在孔丹、秦晓这些“老兵派”的首领身上，后来则被对立面接了过去，体现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员身上。

后来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母校，校长和老师们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也没批斗过老师，更没打过老师。杨滨校长已去世，原副校长刘铁岭当了校长，他见一个同学这么说一句。其他老师也跟约好了似的，一见面也是这句话。原教导主任赵绩敏老师，和我根本不熟，见到我紧紧握手说：你表现得也不错，你还保护了

老师。

我保护了老师？这才见鬼呢。四中开批斗大会，我虽不在现场，但我谁也没保护过，连班主任田佣老师我也没有保护过，我只是没顾得上批斗他而已。赵绩敏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统一口径——那些往事谁也不许再提了，老师们都忘了，你们还记着干什么，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干吗这样编假话说给大家听呢？看来文化大革命实在是说不清楚，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了。

其实四中和所有学校一样，也有过大规模的批斗，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就都给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赵绩敏那时还是年轻教师，算是他们的“黑干将”，跟在后面。有人做了个大木枷，套在他们头上。周坚快气疯了，黑着脸叫人拿下来。那次批斗会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我们怎么没有批斗过他们呢？但四中的老师，不仅没秋后算账，反而设法把学生保护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也有报应。我参军后，我们部队接到一封外调函，说我在“文革”中带着众多红卫兵抄了李莲英的孙子的家，有一批珠宝和字画下落不明。

这就是那个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他有过继儿子，自然也就有孙子。我在“文革”中从未抄过家，那外调函上的地址刘兰塑胡同就在四中旁边，我隐约记得去过那地方。这下可把我难

住了。人们对“打砸抢”的红卫兵印象极坏，尤其是在部队。可我百口莫辩，只好自认倒霉。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我当兵后雄心勃勃，入伍不到一年就入了党。可外调函差不多把我的前程全给毁了。当时我在北海舰队航空兵报道组，组长刘桂枫是个很有思想也很有性格的人。他观察了我一阵，似乎看出我的困惑，于是给了我一次出差机会，让我“顺便”核实一下。他说：“是你的你就认错，不是你的就说清楚。”

我回到北京，找到刘兰塑胡同的那个小院，一眼就认出来，说明我确实来过。我敲开门，主人是中学教师。我向他说明来意，他顿时眼中充满敌意，说他手里有证据。我请他拿出证据来。他取出一张纸，上面的确是我的笔迹，但看过后我快炸了。那上面分明写着：各路红卫兵，这家虽出身不好，但某某是人民教师，并得到过政府奖励，请不要查抄。下面是四中红卫兵的大印和我的签字。

我这才想起前因后果。一九六六年“红八月”，此人拿着他的奖状到四中请求保护。当时掌管大印的徐东曦正接待来访者，就让我去看一下，于是我陪着他转了一圈，给他开了这张证明。这是以我的名义保护他的证明，并不是抄家的收据，反倒恩将仇报。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有他的道理：在他看来，所有红卫兵都是一回事。他是红卫兵的受害者，红卫兵就都是他的仇人。这就是历史的报应，凡报应总得有人来承受。

在“文革”中，学生保护老师的例子也不少，但往往需要某些条件，比如当时冲击较小的军界干部子弟，像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张爱萍上将的儿子张品，杨成武上将的儿子杨东明，张国华中将的儿子张小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四中的薄熙来和薄熙成，身在困境中帮助过老师。他们的父亲薄一波被打倒，他们从中南海搬到一个小地方。在那里他们保护过老师，特别是他们在实验二小的老师霍懋征，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曾是他们的班主任。我在杂志社工作时拜访过霍懋征，当我提起认识薄家兄弟时，她动情地说，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他们兄弟曾把她藏在自己家里。

我要为中国的红卫兵说句公道话。红卫兵有过非常过激的暴力行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看看当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众性暴行，相比之下，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可以说是够克制、够文明的。红卫兵打人有很多因素，最高层包括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纵容甚至怂恿起了很大作用。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什么“要武”，什么“红色恐怖”，都有过“最高指示”。一九六六年的八九月武斗成风时，军事院校群众代表就该不该打人问林彪，林彪还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虽然“十六条”也有不许打人，不许武斗的条文。这在最高层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这么说不是在推卸我们红卫兵的责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看看红卫兵的武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像日本的

“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就知道这意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暴行，它在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背景，特别是离开世界暴力革命的背景，中共和政府高层允许红卫兵的暴力是很难解释的。

另外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演出脚本的问题。我们这代人都是看革命电影长大的，和上一代人的革命比起来，我们这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强的模仿性。在我们最熟悉的镜头中，当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等反动角色被押出来，群众不都是涌上前去挥动拳头吗？这就是群众运动的仪式。而在这些电影中，当群众纷纷挥动拳头，有红军、八路军或者民兵在维持秩序，但在“文革”中，这一角色却缺席了。武斗的失控由此而来，直到打一个死一个，上面还不控制，这就不那么简单了。红卫兵成立“纠察队”，最初就是想扮演红军、八路军的角色，但又存在着悖论：归根结底，红军和八路军是更加暴力的武装力量，战绩使他们拥有维持秩序的权力，那么“纠察队”的战绩在哪儿？普通红卫兵又凭什么要服从他们呢？在这个意义上，孔丹他们成立“纠察队”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四中的红卫兵，连同三个中学甚至西城的红卫兵就跟着他们走了，当然是只走了一段路。但这把火炬还是被上面无情扑灭了，孔丹的母亲甚至为此招来杀身之祸。

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作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有一次，我们押送一批“牛鬼蛇神”去批斗。其中有个老叛徒，好像是因彭真做保才没被枪毙，也是作为彭真的罪证拉去批斗的。这些人一上车，我们就开打。那个叛徒够老的，跪在卡车上，屁股撅得老高，露着裆。就怕有人往那里踢一脚，要了老家伙的命，我一脚插在他两腿中间，护住他的命根子，这样我离他最近，气不打一处来，拳打脚踢，把他们打得够戗，进会场时，一个个东倒西歪，群众中有人高喊：不许武斗！要说我们确实不像话。押解犯人应维持秩序才对，自己倒先动手打起人来，触犯众怒。

离开会场后，因受到群众的指责，那几个红卫兵心里窝着邪火。那是下半夜，街上空无一人，卡车在红灯前停下。有个过路人推着自行车凑过来往车上看，还问这问那，被这帮红卫兵叫上了车，一顿臭揍。那人被打蒙了，索性扬起脸，让他们打，直到满脸是血还那么挺着。那几个家伙毫无恻隐之心，直到打累了，才把他踢下车，又把自行车砸在他身上。在他们的叫骂声中，那人一瘸一拐推着车走了。那是一个普通过路人，很天真也很善良，我直到现在还能记起他的眼神——困惑、绝望、听天由命。

这几个红卫兵都是外校的高干子弟，心肠之冷，下手之狠，操控他人生命于股掌之间。这完全是禽兽行径。而我也深感羞愧——我和其他在场的人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甚至生出

一丝恐惧，怕他们掉过头来把我们也暴打一顿。这件事一直让我很窝火，后来我和某些军队高干子弟之间也发生了激烈冲突，打得天昏地暗。

还有一种人就是鬼魅，这才是群众中最可怕的角色。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栗钧，平时不太爱说话，老实本分。当时校内满是串联的学生，不知他说了句什么话，被团团围住。我们班的李惠敏跑过来说："栗钧出事了！"因为我是我们班红卫兵头头。待我赶了过去，栗钧已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这事的原委我一直没搞清楚。我根本不懂抢救知识，和大家一起把他拖到水管前擦洗，先看伤在哪里。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人群又围了上来，我们只好再把他拖到宿舍。这时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挤过来，手握尖利石头，朝着栗钧的眼睛戳下去。当时根本腾不出手来制止，我只是瞪了他一眼，他收回手，转眼消失在人群中。这样的男孩就是鬼魅——势单力薄，来无影去无踪，得手便走，倏忽即逝，在混乱中甚至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但历史中最深的创伤却往往就是他们留下的：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折断，新凤霞差点儿被破相，与其说是群众，不如说是混在群众中的鬼魅造成的。杨丽坤的精神病主要来自幻听，那是受到恶言恶语的刺激。能讲出如此恶毒语言的，这就只能是鬼魅了。

如今我们这些"老红卫兵"说起往事，大事就那么五六件：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反教育体制、反工作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

红卫兵的信就是这时写的，这是我们的躁动期；七月，停课“大批判”，主要由学校组织跟着报纸批“三家村”和《海瑞罢官》，让我们很不耐烦；八月上旬，毛主席的信透露出来，纷纷成立红卫兵，在社会上“破四旧”；八月下旬，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造反规模扩大并失控，开始抄家，批斗中出现打人现象，“纠察队”为整顿秩序应运而生；九月，似乎折腾够了，红卫兵运动突然沉寂下来，却与社会上的流氓发生冲突，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这些流氓是由当地派出所协助抓获的，有案可稽。各学校一时人满为患。四中抓了二三十个，关在一个小院里。我自然也参与了。这恐怕在人类社会史上前所未有。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里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红卫兵的暴力主要是为人熟知的皮带，这是唯一的刑具，从未使用其他手段。在这方面，中国红卫兵是很缺乏想象力的。

如果记忆准确的话，我只打过一个流氓，那是我对他母亲的承诺。这个流氓从家中被抓时，他的父母追出来，又打又骂又踢又啐，央求我们狠狠打，好将这个逆子教育过来。尤其是那父亲咬牙切齿，恨不得有人把这个儿子打死。但临押上车时，他母亲悄悄拉住我的手央求说：“别打坏就成！”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我没有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过这样的母爱。我打人时手很重，特别

是听到那些罪行时。我履行了对那母亲的承诺。我每天都要打一顿那个流氓，不让别人染指，每次都转述他母亲的央求。我心存幻想——为一个母亲让浪子回头，但除了虚伪的告饶和对父母的怨恨，一无所获。我抽他抽到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假设给你一根皮带，让你每天抽同一棵树，没几天你就会累趴下。当时四中也打死了个流氓，死因不明。其余的均无重伤，只是皮开肉绽而已。中国毕竟不培养职业打手。

十月，红卫兵陆续离开北京去“串联”；十一月，由于对打倒刘少奇的极力抵制，被上面一脚踢开。

“造反”、“破四旧”、“抄家”和“打流氓”这四件大事，构成红卫兵运动的高潮，贯穿始终的是“鼓吹血统论”和“死保刘少奇”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红卫兵运动以“冲击公安部”事件告终，此后一直处在被历史清算的地位上。这构成了北京红卫兵历史的基本脉络。

# 青春剑

陈凯歌

陈凯歌，北京四中六八届初一（二）班学生。一九六九年赴云南屯垦戍边，后从军，复员后回京，进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在纽约大学电影学院任客座教授。处女作《黄土地》被称为“里程碑式的作品”，《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主要作品还有《孩子王》、《边走边唱》、《荆轲刺秦王》、《和你在一起》、《梅兰芳》、《赵氏孤儿》等。

## 一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

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街。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为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F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唯一一人，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F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绝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

我和F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

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绝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F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F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处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他的眼镜常常掉下来，爱从镜片上边看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有一次他终于遇到一个厉害的，高声叫骂，张晓翔立刻张皇失措，一面飞快地推着眼镜，一面抓住身边所有的人拼命解释。有人指出他应该道歉，他仰头愤怒地想了想，终于说：我道歉。还有一次，有同学故意藏起他的眼镜，让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手……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非洲内幕》、《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好手。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G。他体态峻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谦退温文，从不谈论自己。愈到成年，愈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的哀痛隐衷。以他的资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

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是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子。但在当时，这支朝气勃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的危险力量，正是时势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

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濛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锻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

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 二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读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况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

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碎，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新获得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

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的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

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父亲。

## 三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F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他爸爸。但第二天，F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运

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在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他说的是实话。在他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

《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已经布满了红卫兵。八月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度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取消了军衔之后的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当日的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

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他们和我们区别开来了。F 当然也不是红卫兵，他被逐出家门之后，父母不知去向，搬进了学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间。因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乐。同病的还有 L 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用仇恨锻造的剑，刚刚授之以柄，剑刃就立即对准了她，我不知道张老师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画了×，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

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 四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像一块烧红的铁似的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晚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

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

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本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霁，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有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越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唤回来，又很快地忘了。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的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唯一的逍遥者。他的父亲是军人，受保护的，官阶不算高反倒无事。他的军装永远穿得很漂

亮，瘦，脸很文，有鹿一样无辜的眼睛。他和毛泽东同姓，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张晓翔的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的，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它被扔出门来，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父母是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

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泽东的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是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得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了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

子，放在墙面前，走开。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许多人围着看，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奶奶抱着她。我无意中看到一张一闪而过满意的脸，属于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他的母亲是个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制片厂工作，也住在同一院子中。他的父亲一直待在监狱中，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突然明白张晓翔们是被谁叫来的了。——他本人并不是红卫兵。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又是他们绝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内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霉烂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 五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开来向着世界。我已经知道世界怎样看我，怎么对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

一面铜锣，“砰砰”地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我的胸膈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还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颌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快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睛时天蓝得不敢细看。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察觉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 六

F的被捕，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天，整个过程非常戏剧性。

据在场的人说，他是在离天安门不远、西长安街北侧的邮电大楼前，用一枚大钉磨成钥匙，捅开了一辆吉普车。得手后向西行驶，想作一次无目的的即兴郊游。同行的有张晓翔、G和毛姓的少年美丽。在车子越过西单路口、接近展览飞机和坦克的军事博物馆时，撞倒了一位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的行人。事发以后，同行者下车四散；F畏祸，继续驾车向西急驶，被巡逻的公安摩托车队发现后前后围堵，终于弃车奔逃，被当场抓住。据后来赶到现场的张晓翔说，F当时身着黄色军装，似有背景。故在场公安人员劈头就问他的父亲是谁。F没有准备，脱口而出，结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带走。从此铁窗之内，一待就是五年。没有连累别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F的性格。“文革”开始以后，我很少见到F，但不难想象他心境的荒凉。一位骄纵惯了的公子每天见到自己父亲的头颅瓜一样地被按来按去，必定消灭（或激发）了所有的骄傲；被排除于红卫兵之外，必定伤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远更使他尝到了世态的炎凉。我曾经走进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乱成一团的一张床外，唯一陪伴他的那辆自行车，已经破旧。我熟识的那条闪光绸的被面变成了擦车布，塞在自行车座后，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会开车，我早就知道，记得上学的时候，他谈起在北戴河海滨驾驶他父亲的专用车辆，七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九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眉飞色舞。

在我看来，F 的行为却是对社会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后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斗争 F 的大会是在新华通讯社院内大礼堂召开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囚车开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 F。他被警察在背后猛击一掌，落地时踉跄了一下。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弓着腰。我们几个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见了，笑了，点一点头。我们却赶紧避嫌地低下头去。大会上，宣布了罪状。他被四个人押上来，有灯光从顶上照耀，脸变得认不得；照例是“喷气式”，头抬起来，又被用力按下去，两臂向后高举。他显然挨过打（斗争会上也不断被踢打），脸上有伤，但从容。他两脚分开，努力站得稳些，就像在球场上防守一样，似乎反倒多了些侠气……

再见 F，十年过去了。我们约了在 G 家见面。灯很暗，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吸中华牌香烟。烟有些霉，他解释了，递给我一支。他说他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做电焊工，父亲还未“解放”。别的，没有了。——狱里的事，我没有问。他还是大说大笑，只不过笑声老了许多，和老人一样。仿佛和一个长得很像的人打招呼，发现并不是一样，又心惊又奇怪。这以后，再没有见到。只听说后来他做了某公司的经理，有了一些钱。不知确否。

F 被捕以后，几个同学都受到了牵连。涉及我，是因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个曾打电话约我同去，但没有说去做什

么。因为感冒，推辞了，所以不在车上。本来没有去，是谁说出去的，很可疑。F没有出卖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个出卖了他，以致遭到严惩。这个人就是少年美丽。

“工人宣传队”找我谈话大约在午后一点，是头一天专门派人通知的。到了才发现张晓翔、G和少年美丽都来了，进的屋子却不同，彼此隔着一堵墙。临进门时，无意中看见张老师远远地徘徊了一下。她当时已经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里一紧，知道不好。进去之后，门立即关上，坐在长桌后面的两个，都是工人，大约四十岁模样。桌前一条长凳，是我的，还有一座火炉，烧得极热。四中的“宣传队”是运输公司派来的，多数是司机。这一行的装束，除了蓝色的工作服，还有一顶黑皮鸭舌帽。他们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个给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气，说：“坐。”我心中感激，低头正要坐，忽听桌上一声暴响，接着就听见隔壁房间内一阵怒喝，夹杂着“站起来！站起来！”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张晓翔。接着又听到另一房间内少年美丽突然而尖利的哭声，含糊地说着什么。我对面的一个一声怒吼：“陈凯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来，水洒了出来，漫开，悠悠地漾着热气。这是一次连时间都统一了的审问，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眼中就充满泪水，抽搐之声不能自禁——“陈凯歌，交代问题！”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

骂，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瞄准内心说："不许哭！"抽泣声立即停止，但泪水却一片一片漫出来，凉凉地湿了脸。我喉咙咸咸地想：原来人有这么多泪。在随后的三小时内，我一会儿被柔声地命令坐下，一会儿又被喝令站起来。桌子后面的一个不断站起来给炉子添煤，屋里热得无法呼吸；他们不停地猛吸用报纸卷成的旱烟叶，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了，两颊滚烫，脊背和内衣贴在一起，湿成一片，眯着眼睛看不清他们的脸。审讯的主题是 F，又纠缠着我的父亲："你同 F 是什么关系?！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现在让你知道！！F 是不是盗窃集团头目?！你敢说不知道?！你们偷车想干什么去?！想开到苏联去?！你们想叛国?！对不对?！不对?！站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告诉你，咱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老人家还给咱工人送了芒果，咱还舍不得吃，用药水泡起来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里的红日头！！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审问结束的时候，暮色渐深，外面的景物还很清晰。伙房那边有了火光和炊烟，冬天里的树都简简单单地站着。灯光很黄。桌子后面的两个像刚出炉的铁，还闪着火星。他们又把手伸过来，要我握，其中一个说："茶还没喝呢，喝茶。"

我们先后出来，远一点的少年美丽看不清脸，只听见抽噎声；张晓翔鼻子纵着，拥着要掉下来的眼镜，很狼狈。只有 G 神色不动，依然风度翩翩，其实他家已经出了天大的变故。我们都

不说话，车锁打开时，在暮色中很脆的一声。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弯细小美丽的新月，却无人看。空气清冽，像有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头。

回到家里，我连把经过跟朋友重说一遍的力气都没有。父母不在，妹妹还小，无商量处，只觉很困，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杀。一夜的梦都在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冷静地研究自杀的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终于死了，却连一种方法都还没试过，只知道我是死了，听见亲人的哭声，像许多别人的故事一样。

# “社教运动” 与我

周孝正

**周孝正，北京四中六六届高三（五）班学生。一九六八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九七六年返回北京。一九七七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一九八一年毕业后做中学教师。自一九八八年至今，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负责人，以及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国家资源研究报告》的研究者和撰写者。**

一九六三年暑假，我初中毕业了，在家等着上高中，没有暑假作业，闲得无事，就到处找书看。我的两个姐姐分别上高中和大学，她们的政治教科书和参考书，特别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引起我的兴趣。我读了进去，越读越投入，遇到不懂处就问姐姐，她们也说不清。从那时起，越思考问题就越多，且得不到满意的答案。

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开学。我被北京四中录取了。去四中报到，每班在校门口都有人接待新生，我分在高一（五）班，负责接待的两位同学，一个是四中金质奖章获得者王天博，一个是四中银质奖章获得者孔丹。

从此我们四十七位同学，在同一个班里朝夕相处了三年，直到一九六六年停课。到了一九六八年，大家各奔前程，除了参军、进厂矿，大部分同学“上山下乡”。我们班十几个同学一起到黑龙江宝清县八五二国营农场，成为农业工人，后农场改为“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我们随之成为兵团战士。按当时流行的说法，解放军战士是穿军装的老百姓，我们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

## 提问题

高一第二学期，学校组织去南口农场劳动。解放军某部坦克教导团康股长，给我们高一全体学生作政治报告。康股长身为政委，在我们心目中无疑具有权威性，在他做报告前，我向他提出了一直在思考的诸多问题。

没想到，康股长作报告时，提到有个学生向他提问题一事。提问题在当时含有怀疑的成分，这事非同小可，我可能成为“典型”或“特例”。一时间，我在同学中有了一定“知名度”，当然，这可不是什么好名声。

从六十年代起，解放军在学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后来发展为官方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

非“红五类”出身的在“阶级感情”上出了大问题。越是理性思考就越觉得自己危险。当时主流话语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唯“出身论”、唯“成分论”愈演愈烈。以至发展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血统论”。出身不好的人，从原来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一直发展到“必须脱胎换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当然是正确的，难道是“龙生王八，凤生龟，老鼠生儿满天飞”吗？生物遗传的稳定性变成了“政治歧视”和“政治压迫”的论据。一个非“红五类”子女的独立思考就是立场出了问题，“阶级感情”出了问题。

## 政治课

一九六四年九月，从高一升到高二，我们班成了高二（五）班。在高二的政治课上，刘文明老师开始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一堂课，刘老师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全班同学陷入沉默，只有我举手。

我答对了！这显然得益于姐姐们的政治教材和参考书。在

“突出政治，永远突出政治”的时代，我的正确回答是很值得骄傲的。

高中的政治课和其他文化课地位不同，不用老师维持课堂纪律。整堂课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和团支部发展团员的会气氛差不多。

我们班主任刘绍贞是位女老师。一九六四年的一天，刘老师对我说：“你要正确对待!”我从小就光明磊落、积极向上，对刘老师的话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那是老师对一个未成年人的爱护，用心良苦，她不可能告诉我“正确对待”的真正含义。

从一九六三年起，全国先在农村后在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即“四清”。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某些重点中学，特别是四中、六中和八中推行“社教运动”，提倡贯彻阶级路线，清理所谓“白专”学生。

而这个大背景，是当时我浑然不知的。

## 柳泉居

我们高二（五）班团支部组织到校外参加劳动。我和几位同学被分到西城区的“柳泉居”饭馆，帮厨师剥葱、剥蒜、洗盘子、洗碗。而杀鸡宰鱼，我们都帮不上手。下午五点半左右，几位同学已经走了，我剥完最后一批葱蒜，准备回家吃晚饭。柳泉

居饭馆离四中很近，回家的路上，我顺路拐进教室，空无一人，墙上却贴满了小字报！

凑近一看，这些小字报全都指向我，一共有几十篇。只记住其中几篇小字报的标题，如“火烧周孝正”等。其中大多数还是说理的，也有少数充满了火药味，“上纲上线”。

我这才明白，几天前刘绍贞老师的“正确对待”意味着什么。我想起毛主席的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再说我是向解放军政委、政治老师和团支部书记提问，为了更深入地学习马列主义。何罪之有？

满教室针对我的小字报，让我很不服气，我要和同学们辩论——我觉得他们是错的，我是对的。看过这些小字报，回家吃晚饭，进出教室没遇见一位同班同学。到了家，我心情平静，苦思冥想，被各种问题及如何答辩环绕着。比如，无名英雄比有名英雄更伟大，到底对不对？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全世界三十亿人口，是不是意味着有三十亿分之一的个人主义？还有，毛泽东讲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否有矛盾？“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对不对？“学习董加耕‘脚踩污泥，心怀祖国’”和古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否有矛盾？

前前后后，我写在一张家父记账用纸的背面，共有二十一个

问题，后来被称为“二十一条”。

## 风暴眼

第二天，我来到教室，大部分同学已就座。我直奔自己的座位，坐下，准备上课。我感觉到全班同学都在注意我的反应，而我若无其事，甚至懒得往墙上瞥一眼。我相信当时流行的一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头两节是文化课。下课后，我们到操场做课间操，然后回到教室，第三、四节是政治课。先是老师讲我们听，到了后来，课桌被临时拼成一个长方形，同学们围坐在四周，政治老师主持讨论。最初课堂还像往常一样有秩序，同学们举手发言，气氛平和，我也可以参加——有陈述，有质疑，有答辩，有争论。

可到了第四节课，突然闯进来比我们高一级的高三学生。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站起来，后来涌进教室的干脆站在桌椅上。所有发言都针对着我，发言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不讲理。由讨论、辩论转向批斗。我只有一件反击武器，就是昨天回家放进口袋里的《毛主席语录》（后被称为“红宝书”），是我妹妹不知从哪里借来的。

我故意背诵了一段毛泽东引用恩格斯的话。话音刚落，有个同学马上喝道：“这是哪个反动权威说的？”我从容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到那一页，指出引文的出处。以攻为守，总算换来了

片刻的安静。

第四节下课铃声响了，我照常回家吃午饭，可一点食欲也没有，几乎没怎么动碗筷。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与历史相关的“个人事件”，对于一个从小学习好、守纪律、爱劳动的好学生，对于一个十七岁的未成年人，尽管表面上满不在乎，但毕竟终生难忘，其实是深深的内心创伤。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平时关系融洽的同学，怎么一下全都变了脸……

不久，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四中、六中和八中这三所学校，试图控制北京市中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四中工作组都是市一级的干部，负责人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

我主动找到李晨局长，讲述“事件”原委后，我问道：“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是错误的。他们在辩论中的一些观点我接受；另一些观点，我不接受，可以不可以？”李晨局长回答：“可以。”除了表明党的政策，他还说了些鼓励的话。他待人亲切体贴，让我感到温暖，认为他才真正代表了党的路线。

风波告一段落，教学秩序又恢复正常。

至少从表面上看，一切如旧，同学们的关系和以前差不多，一起学习，一起打球，一起下乡劳动。就这样，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

# 四中往事

秦　晓

秦晓，北京四中六六届高三（四）班学生。一九四七年生于山西，在北京长大。一九六八年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后进中信集团任总经理，继而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现为博源基金会理事长。二〇〇二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纸杂志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专著多部。

## “红二分白五分”

初中毕业，我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上四中高中。我平时学习就很好，并没注意我那成绩可以得“金质奖章”。

四中的校风和育才中学有些差别，就像陈元总结的那样：以

天下为己任。

到四中报到时，学校指定我做班里临时负责人，开学后就当上班团支部书记。孔丹（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孔原之子）和李三友也都是所在班的团支部书记。到了高二，我们认为，应该踏踏实实学习，学习好了，将来在工作中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提出不当团支书，要求换换人，于是团支书就换了别人。后来搞“四清”，有一天，几个同学来找我说，你还得当团支部书记。随后就跟小政变似的，突然召开支部会，大家又都选我当团支部书记。我们几个又都回来了，由我们控制局面。

一九六五年，四中、六中和八中闹学潮——提出学校搞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这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串着的，闻风而动。北京市的中学本来不搞“四清”，学生闹起来直接给中央写信，为控制局面，北京市派来了工作组。他们怎么写的信，开始并没跟我们打招呼，我们是后来被卷进去的。

当时的主流思想，一是阶级斗争，一是“反修防修”。这两条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而学校的“四清”，正是把这两条结合起来了。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子弟被排斥，再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他们由此认为，学校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

我一开始不大接受这种观点，并不认为教育制度有什么大问

题——我们都在努力学知识，学好了建设祖国；老师还是挺胜任的，再说出身不好的毕竟跟“地富反坏右”不同。但后来我也参与了。领头的是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他们用一个不怎么求上进的干部子弟为例证：先是这同学是老革命的后代，而学校排斥他，不发展他入团；再就是有些学生开玩笑摸他头，嘲笑他，这反映出阶级情绪，是对干部子弟的仇恨。接着另一个班团支部书记召集开会，跨支部发展他入了团。我们都觉得那个团支书没条条框框，主持正义，是真正的英雄。在这一思潮影响下，我还写了篇作文，评论搞笑的哑剧“抢椅子”。剧情是有人刚往椅子上坐，另一人把椅子蹬掉，他就坐空了——互相拆台。在作文中，我指出这是在宣扬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四清”中，这篇作文被认为是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好文章。

学潮越闹越大，很多高干子弟都参与了。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认为可能是中央有人借此整他，表现得很强硬，也很谨慎。他让万里、张文松牵头，最初把工作组放到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后来工作组进了学校，软硬兼施。到我们班的工作组长孙岩，是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延安老干部。她完全以前辈的口气跟我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主张在学校搞阶级斗争？这是对的嘛。她还表扬我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后来万里在中南海训话，他嘲讽、调侃，语气严厉，底气也

足，训得我们没脾气，只能静悄悄听。他说，你们老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后来，闹学潮的领头学生也挨整了。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当时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很聪明，学习成绩出色。“四清”结束时，邱承光不断写检讨，总也过不了关。尽管高考的准备时间很短，却考得很好。

学潮结束后，在中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孔丹和后来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佘靖是一九六五年入党的，他们是北京中学第一批学生党员。我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入党，与李三友同一批。马凯比我们高一届，本来要留苏，因生病没去成留校当老师，也是最早的学生党员。党员学生晚上也要留下来，跟党员老师一起开支部会，学习文件，跟老师的待遇差不多。

## 参加建设的接班意识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前，学校基本上还是接班人教育——祖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跟苏联小说《水泥》描写的那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接班人的概念就是要建设祖国。中国的工业、技术还很落后，我们父辈是职业革命家，现在国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搞好建设。即便到了讲阶级斗争的阶段，我们的思想依旧。所谓“红二分比白五分好”只是个极端说法。我们那时候有个明显倾向：重视数理化，不重视政治课程。我的外文字典被翻得破旧不堪，可政治教科书却像新的一样。虽

然我也能把政治考好，但知道那没什么用处。我们的目标都是清华工科，包括前几届学生也如此。从主观上讲，我们没有当职业革命家的念头，那不是时代给我们的使命。

那时候是有机会出国留学的，从我们上一届起，国家就开始派留学生，都是学外语。选的都是政治上可靠的，像我们这些人，如果想去很容易。可我们都不愿去，认为那不是主流，主流是学科学技术，只有学不好理工科的才去学文科，出去的并非最优秀。

这里所说的接班人，是个大概念，指的是我们第二代要接国家这个班，和毛主席说的党的领袖接班人是两个概念。少先队员每天唱的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就是泛指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文革”前毛主席对教育路线所做的批判，对我们影响很深。“文革”开始学生的造反，就是把毛主席对教育路线的批评和阶级斗争的论述结合在一起，作为行动的思想基础。包括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等等。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基本上没参与“破四旧”，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卷入了，虽然并不赞同某些方式。

## “文革”之初

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

村”的社论，火药味十足。运动一开始，我们就感到问题很严重，彭、罗、陆、杨被点了名，又不断冒出知名文人。而江青在北大的亮相讲话和急转直下的形势，则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北大已闹起来了。江青出席北大的大会，赶上下雨，人家给她送雨伞，她说，我们没那么娇气，不要雨伞。还说，赞同我们的站到这边来，不赞同的就滚开。讲话的语调、会场的气氛，就像在进行战前动员。由江青出面，调子这么高，用词如此激烈，让我想到，中国的政局是否出现变数？或者说是毛主席有什么大想法、大动作了？

“文革”一开始，在中学主要批判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刚派下来没几天，毛主席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派错了，又宣布撤回。七月底，在北京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毛主席接见我们。当时，刘少奇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坐在那里讲话，他第一句就说：“和大家平等，坐着讲。”毛主席突然走进会场，在主席台转了两圈就走了，也许是全场鼓掌雷动，没法说话。没几天，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在府右街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都在传递强烈的信息。那时社会上已开始乱起来，但尚未大乱。联想到党内斗争，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意思？可谁也没有意识到“文革”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顶多认为这些领导跟不上形势。

“北京四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是校领导垮台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委员包括各年级的代表。

傅洋、傅亮（彭真之子）也在四中，我跟他们兄弟俩不太熟，彭真出事了，我们对他们一视同仁。后来我们“串联”去上海，傅洋还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不久，我们的父母也都先后出事了，当年没有几个干部是漏网的。看报纸就能看出名堂，谁上了天安门就说明还在台上，没有名字的就是下台了。

海淀区的中学成立红卫兵后，有很长时间，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可能是接受“四清”的教训，我们几个“校文革”的人不赞同成立红卫兵，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更不主张武斗。那时候武斗的概念，还不是群众之间的打仗，而是打校长老师、打“地富反坏右”。

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拉去游街，戴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起手拦着，不让搞过激行动。那帮学生就向校长和老师泼墨水，我们几个都被泼上了。随后，由孔丹主持开大会，他试图把秩序扭转过来，引用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说服学生：你们认为校领导有严重问题，可以把他入另册嘛，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批判他们。

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一路保护，但也要有策略。我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代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那两个孩子尽力执行了。后来杨滨一直念叨这件事，直到临终还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基本上都没挨过打，更没有自杀或被打死的，后来杨滨的儿子宋心鲁把这称为“四中现象”。

四中红卫兵组织是怎么成立的？是高一的学生刘辉宣，他算是比较激烈的，在会上叫板说，各校都成立了红卫兵，你们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见绌了。他提出要成立红卫兵。后来红卫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是他编的（“文革”后他以礼平的笔名写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做了深刻反思，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顺势而为，我们成立了四中红卫兵组织，头头儿也是选出来的，记不清具体是谁，可能也是孔丹和我们几个。

“文革”开始时，四中只有“老红卫兵”一派，首领也都来自“校文革”。这一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这些人都在学校当干部，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有理性与秩序的意识，无法接受失控的混乱状态。

## 近观毛泽东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头天晚上到

劳动人民文化宫集结待命，第二天清晨在金水桥前维持秩序。上天安门是临时通知的，我们都没这个准备。后来有些不是首领的也上去了，队伍里不少人有意见，就乱了。孔丹上了天安门，我没上去，在金水桥前维护秩序。总理特别细心，他大概有所闻，就带着雍文涛（北京市市委副书记）等下来接见我们，说我代表主席来感谢你们，还和我们一起合影。总理在中间，我们簇拥在两边。金水桥一长溜人马，总理分段跟我们照相。后来我到新华社要到这张照片。

“八三一”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刚走下天安门，有个外地学生试图拦专车。红卫兵们认为卫戍区不负责，威胁到毛主席的安全，当场打了那学生。四中有个红卫兵，原是八一学校的。他上课经常犯迷糊，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顶撞老师说，你讲的是什么呀？我都听不懂，反倒把老师弄哭了。那天和卫戍区的争执中，他扇了黄作珍（北京卫戍区政委）一个耳光，把黄吓坏了，可他却成了“英雄”。

“九一六”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我上了天安门。上天安门时，廖汉生跟我们讲，不要争着跟主席握手，影响主席身体。那天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一，毛主席走过来时，举着手看着我们。我们离得很近，见到毛主席很激动，高声欢呼，但秩序尚好。不过让我惊讶的是，毛主席的目光中流露出不快的神情，凭我的直觉，其中包含

忧虑、烦躁，甚至是厌恶。他就这样看着我们。面对这疯狂的场面，他恐怕也感到担忧了。这一印象非常深刻，我事后跟很多人都说过这感觉。

其二，就是毛主席跟刘少奇长谈。当时，我们站在汉白玉栏杆上，下边主席台上站了一排人，最中间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两人长谈主要是毛讲刘听。毛主席讲话时还打手势，好像是一场认真的谈话，似乎完全不顾及这种场合所特有的气氛。回想起来很奇怪，毛主席在和刘少奇掰的时候，怎么还会谈了那么长时间？到底说了些什么？

## 我知道的“西纠”

“西纠”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成立的。“西纠”成立的背景是：“八一八”主席接见之后，红卫兵热情高涨。北京二中发了一个“破四旧”的《通告》，中学生纷纷走出校园向社会冲击。第二天，《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林杰的《红卫兵是天兵天将》的煽动文章，让红卫兵更加狂热了。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从一场政治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我们一方面受到很大鼓舞，一方面也对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感到担忧。在我们的控制下，四中的红卫兵基本上没有走上街头搞“破四旧”。重要的是建立规则，控制局势。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

“西纠”是在我家对面的“九三学社”开的成立会，我也去了。“九三学社”那时候已关闭。“成立宣言”几乎把西城所有的中学都写了进去。四中、六中、八中是发起学校。“西纠”总部最早就设在“九三学社”。从“西纠”总部走几步就到我们家了。经常是一大帮人，一窝蜂似的来到我们家。我母亲陕北人，特别热情，不管是谁都招待，来了就一起吃。后来“西纠”总部搬到别处，可住下两个“连”的人马，分别由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组成。“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

宣传部主要任务是从政策上规范红卫兵的行为。前后发了近十号《通令》，还根据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时三湾改编整顿的经验，发了一个红卫兵整风的文件。作战部的作用，就是哪里需要维持秩序就去哪儿，比如地质部、北京车站，作战部专门组织人马去维持秩序，控制过激的局面。在地质部，“西纠”队员与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对峙了很久，使地质部免受冲击，同时保护了国家机密档案。

就像一位西方哲人所说的“没有秩序的自由比专制更可怕”。“西纠”的出现在社会上立刻得到拥护，也具有某种权威性。很多人让我们去解决问题。比如，西单商场卖《毛选》，革命小将说《毛选》不能卖，只能送。新华书店说，这是国家

财产，怎么能送啊？把情况反映给我们。于是“西纠”发布了第一号《通令》，明文规定《毛选》可以卖。再有很多人的家被抄了，找到我们去解决。我们不主张抄家这种方式，专门发了一道相关的《通令》。还有，一些街道委员会、派出所，告诉红卫兵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并鼓动红卫兵把他们赶回原籍。这些人被带到北京火车站，而原籍所在地不肯接受，北京也不接受他们再迁回，这么来回折腾。加上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北京火车站一片混乱。于是陈小鲁带着“西纠”队员到北京火车站去处理。

关于《通令》的内容，是我们共同讨论确定的，其中制止武斗、制止乱抄家的《通令》比较重要。当时，李三友的父亲（原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已出事了，我和孔丹都知道他的文笔很好，还是让他起草。“西纠”的《通令》大部分是李三友写的，我大概只写了两个。六中办了个《红卫兵报》，我们想收编它，谈判的过程很难缠，不过最后还是被我们收了过来，成为“西纠”的机关报。报纸都是找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出去卖的。

“西纠”没有组织过抄家、打人。打人的事是怎么来的呢？在“西纠”成立前，社会上有流氓打了红卫兵，然后北京市召开了声讨大会，公安部门介入了，把这几个流氓五花大绑押到台前。会场气氛激烈，有人动了手，情绪一下就煽起来了，这一直接信号是，他们打红卫兵是阶级敌人反扑，

红卫兵就可以打他们。那时街头的流氓根本不知道红卫兵的气势有多大，还以为地盘是他们的。后来据说毛主席批评了这次大会。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孔丹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钢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孔丹跟他说，我们成立纠察队了。叶帅说，好啊，我支持你们。有什么事，你们找我。这事据说是许明（孔丹的母亲，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报告给周总理了。周总理说，这事不能找叶帅，应该是我做的事。于是，“西纠”的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和相关费用，都是由国务院供给的。

“西纠”仅存在了两三个月。据我了解，“西纠”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央上层的政治活动。要说跟中央挂钩，也就是周总理帮我们做了些安排。后来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做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领导。于是我们就集体辞职，参加“大串联”去了。我们走后，“西纠”总部的几个留守人员，并非我们正式委派的。有一次，陈伯达带人到“西纠”总部来。听说他挨个儿问他们的父母是谁，有人比较冲，本来就对“中央文革”一肚子气，吊儿郎当一边玩钥匙链，一边和陈伯达说话。戚本禹、关锋就说他不尊重陈伯达，双方戗戗了起来。陈伯达后来提出要看“西纠”刑讯室，“西纠”根本没这种地方。六中打人，

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为此两边戗戗得更厉害了。此后他们给“西纠”定性为反动组织。这样一来，曾支持过“西纠”的雍文涛、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许明等都因此受到牵连和迫害。其实他们就是要整周总理。当时江青说，揪出“西纠”的后台会让你们吓一大跳。

报纸上点名“西纠”是反动组织，除了孔丹因“西纠”而被捕，并没有动“西纠”其他人。我“串联”回来，和徐晓东坐摩托车参加周总理在场的活动，摩托车手还是总理派给“西纠”的。会上，我们把“西纠”《通令》等材料递到总理手里，写了个条子说：“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总理结束讲话时声明：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从来没看过。他予以了否认。我们都觉得出于政治上考虑，保护周总理，就没再说什么。后来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当初成立“西纠”，并非为了对抗文化大革命，而是为了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强调政策的重要性。面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失控现象，我们深感忧虑。我们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革命运动兴起，必定会伴随着混乱现象，认为可以通过组织、纪律去控制。“西纠”在这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不管是在红卫兵内部，还是在群众中，说话办事都挺管用的。“西纠”毕竟是四五十所学校认同的组织。而“中央文革”

认为“西纠”有周总理的背景，是对着“文革”来的，最终把我们搞垮了。

## 为混乱担忧

陈伯达讲话后，“西纠”领导层集体辞职，于是我们一起出去“串联”。第一站大连，我们很受重视，市委书记、市长亲自跟我们谈话，希望了解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大连到了上海，就乱了。十月份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在上海听到中央开会的消息，知道中央出了大事，就从上海匆匆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已感到，毛主席打倒刘、邓的意图已很清楚了，不过我们还是基本上认同毛主席。当然不是简单地认同，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这一拨，在打倒刘、邓的过程中也都被冲击、被打倒了。很难想象我们的父母是坏人，但只能坚信毛主席，不可能去挑战他。那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内心纠葛：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搞成这样，打倒所有的老干部，让江青抛头露面。我本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打倒走资派”打心里有所抵触，但并没有转化成自觉意识。如今不再是什么“地富反坏右”、“破四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是打倒“党内走资派”。

我们第一次出去“串联”，没有明确目的，也没有煽风点火，只是为了走马观花。第二次我和孔丹一起去“串联”，那次去是

为了调查、了解“中央文革”的问题。我们先去广州，一路上有两件事印象很深：一是广州八一学校的某些干部子弟开始堕落。由于被冷落被打压，变得十分消极，他们从楼上往下摔自行车，吃喝玩乐。二是四川、湖南等地，一些工人组织被打成保守派，出现工人与工人之间武斗的现象，这是我们思想上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基本群众，我们党依靠的对象怎么形成一派保守、一派造反的对抗局面？

我们对这种状态很担忧，就跟九九（张延忠，张鼎丞之女）说，九九就跟选宁（叶剑英之子）说，选宁向叶帅反映了这些情况。叶帅说，你们能不能搞个材料来？我们就写了个调查材料。后来我们被四中“军宣队”隔离审查，主要就因为这件事，说我们几个是去搜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当然，也把我们到地质部去保何长工的事，以及后来跟北航“八一纵队”的苏晓前——苏静（中将，时任总参军务部部长）的儿子、赖锐锐——赖际发（时任建材部部长）的儿子、孙茜玲——孙大光（时任交通部部长）的女儿在一起开的会，全部记录在案。“八一纵队”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动组织。

我父亲被打倒得比较早，而且定性很严重。当时科学院有个叫王锡鹏的造反派，他夺了院党组的权，科学院党组把他的做法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来戚本禹插手，给他平了反。院党组开始时还能维持，因为张劲夫在科学家和群众中威望很高。后来院党

组就控制不住了，造反派们开始冲院领导办公所在地。张劲夫连待的地方都没了，就在我们家里召集了一次党组会。我妈妈把窗帘都拉上了。其实，那次党组会并没做出什么决议，大家只是交换信息。而这次党组会就成了秘密的黑会。“中央文革”企图从周总理手中夺科学院的权，总理见很难保住张劲夫，可又要掌握控制权，于是采取主动，比他们更左，直接宣布了“张劲夫反党集团”，包括党组成员：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郁（文）等。随后，周总理又派刘西尧到科学院担任他的联络员，把科学院实际控制起来。他和“中央文革”也是寸土必争。科学院还有那么多科学家，国家还有那些大项目，乱起来可不得了。反党集团的罪名可比“走资派”厉害多了，不过，这个反党集团成员都未被抓，只是隔离审查。

宣布我爸爸是反党集团成员后，先抄家，再扫地出门。搬家时，我正在外地“串联”，是家里几个孩子和同学用平板车搬的。分给我们一个大杂院中三间小房，男的住一间，女的住一间，我父母住一间，我母亲睡在柜子上。就这样一直落魄了好多年。我姐姐和陈昊苏（陈毅之子）谈恋爱，张茜（陈毅夫人）说要到我们家看看。其实她为了表示主动，不摆架子，还在我们家吃了饭。有一次，我和我爸爸搭王震的车回家，王震说，我到你们家去看看。我爸爸说，我们家破破烂烂的。他说，就是要看破破烂烂。我爸爸被“解放”后，任科学院革委会后勤组组长。周总理

知道我爸爸出来了，有次开会还专门问，秦力生呢？我爸爸站了起来。总理说，你为什么坐到后头？你要坐到前头来，你这个老干部现在要承担起责任嘛。对周总理的用心良苦，我爸爸心知肚明。

## 从质疑到抗争

一九六六年底，我琢磨，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关于资产阶级路线的定义，就是“依靠少数人去反对多数人”的路线。我说，“中央文革”不就是这样干的吗？不就是在依靠少数人反对多数人吗？于是我得出结论：“中央文革”在推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路线是一回事。

我把这个观点告诉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张小宾等人。我没有参加“联动”成立大会，但开小会时，包括宫小吉起草宣言，我跟他们酝酿过，他们也接受这个观点。于是这个观点就成了“联动”宣言中的一句话：团结起来，反对“中央文革”推行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

那年冬天，在北京展览馆开过一次大会。“老红卫兵”已被排挤，但还未退出舞台，也不甘心成为非主流，就开始折腾，包

〔1〕《联动宣言》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

括“联动”在内。那次大会上，我、王向荣、戴小明上台讲了话，我提到“中央文革”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台下陷入疯狂状态，掌声雷鸣，众人狂呼：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时“老红卫兵”中还没有直接对着毛主席叫板的。大家对毛依靠江青到处折腾，把社会搞乱、整人这一套是不理解的。但无论如何，大家对他还抱有崇敬和幻想。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孔丹被放了出来，我们开始理性地调查文化大革命，调查“中央文革小组”。我们认为中国是让“中央文革”搞糟了，毛也有责任，但没想太深，也未直接质疑毛。后来我们办了个小报《解放全人类》，主要是想清理红卫兵的思想、红卫兵运动，为此还到外地调查。第一篇社论由孔丹主笔，标题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体现出理性的反思。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解放全人类》大概出了三期。

当时，“四三派”成了运动的主流，我们成了非主流。只要上面来什么运动，我们就挨整、写检查。现在一些当年的“四三派”的人写回忆录，讲的多是“文革”前和“文革”初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压制，但对他们在夺权后，紧跟“中央文革”，表现出更激进的思想，对“老红卫兵”的打压却闭口不谈。他们长期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制度的迫害，但一旦翻过来搞的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到现在都不觉悟不反

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源及影响还缺乏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过去我们在四中威信一直都很高，心里看不起那些“四三派”，也不买他们的账，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有一次，我和孔丹去校广播室，宣传我们的观点。正好是副校长在广播室念他的检讨，我们俩冲进去抢过麦克风就讲，由孔丹主讲，但很快就被他们掐断了。我们当时就是认为“四三派”怎么能当权呢？“中央文革小组”怎么能领导呢？后来学校“军宣队”搜集了很多材料，认为我们反“文革”、反“中央文革小组”、反江青，把我们抓了起来。

抓孔丹挺有戏剧性。那天他正在李三友家的大杂院里与三友下围棋。领头的就是现在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四三派”小头头儿，他长得瘦瘦的，像只螳螂。他本来冲李三友来的，没想到孔丹也在，一下愣住了。他第一反应就是两手一前一后举起来，大叫一声：大家不要动！活脱脱一个舞台亮相动作。孔丹问他，怎么了？他说，抓你们来了。孔丹说，是吗？就你们？抓我们来了？孔丹后来老学他这个亮相姿势。

抓我的时候，我正在家。我们住的是大杂院，院套院。前院的听到有人正打听秦晓，见架势不对，就跑过来对我说，有人抓你来了，快跑吧。我说，跑什么跑，不跑。紧接着进来一帮人，有学生、有老师，还带着居委会的人，进来就宣布“军宣队”拘留我的决定，还搜走了我写的文章草稿。他们说，凭这几张草

稿，就可以认定你的观点是反动的。我当时以为会有戴镣长街行的感觉，豪气顿生。出门一看，没车。我心想怎么没车呀？只好走路，走了好远才上无轨电车。我对他们说，我可没带钱，你们买票吧。真窝囊！一点都没显出英雄气概。

李三友是高唱着《红灯记》中“临行喝妈一碗酒”进来的，一听我就知道他到了。那次一共抓了四个：三友、我、孔丹，还有刘辉宣。我们被关在学校。第二天，我们提出来要锻炼身体，先是跑步，一个人带头，其他人跟在后面，跑到中途就互相串供。关我的那小屋对面是厕所，我在屋里坐着，孔丹上完厕所，用手指指，孔丹走后，我上厕所，取走他留的纸条。孔丹还给我送西瓜，在西瓜里放个条子。串供后把什么都推得一干二净，就跟共产党搞地下工作似的，死活不认账。他们在我妹妹的笔记本里找到一首反“中央文革”的诗，是京工附中李丹刚写的。我就利用他们让我回家取东西的机会，跟我妹妹说，你就说“串联”时一个陌生人给你的，你抄下来，那诗也看不懂。我们反正一问三不知。大概关了两个多月，就不了了之了。可还是不许我们离开学校，说你们都是党员，等到运动后期处理吧。

## 插队内蒙古

我们被放出来不久，学校开始分配工作。第一批是当兵，第二批当工人，工厂在偏远的青海西宁、乐都。我们根本不敢奢

望。第三批是北大荒，我们还真跑到东北农垦兵团驻北京办事处去，要求报名去北大荒。人家后来答复，我们了解过你们的情况，你们是危险人物，是要受控制的。北大荒属于边境地区，万一有点闪失，你们不就跑过去了？我们负不起责任，你们还是回去吧。最后，我明白了学校的意图：你们几个甭想走，得好好整你们。

一九六八年十月，去内蒙古插队的师大女附中刘进回京买文具和生活用品。她告诉我们，内蒙古老乡有多么热情，草原有多么美丽浪漫。我们在北京被整得灰头土脸，再说总要寻求新的生活吧。记得小时候，我哥哥弄来个烧饼夹羊肉，因为是凉的，吃得我差点吐了，此后我就再也不吃羊肉了。有一次，家里骗了我，包羊肉饺子，却告诉我是猪肉馅的，被我吃了出来，就发火不吃饭了。以后我们家包饺子，都是两种肉馅。可要去内蒙古就非要吃羊肉不可，这关过不去，在内蒙古根本无法生存。我一咬牙，到西单商场饺子铺吃了顿羊肉饺子。一下吃了两盘，感觉还行，就决心走了。从此跟羊肉结下不解之缘。

离开北京倒并没有什么思想波折与浪漫情怀。尽管如此，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还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过去的革命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再说解放后农村也搞过“四清”运动。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先要了解中国农民的情况。

我们扛起背包就走了。坐火车、坐卡车辗转两三天才到达内

蒙古阿巴嘎旗。一到那里，就有一种解脱感。我和三友、冯江华、路书奇、狄阜平五个都是四中的，彼此熟悉，经历相仿，而且还都是世交。另有一拨儿女生，是师大女附中的。“知青办”说我们不是正规途径来的，没有介绍信，不肯分配。我们在旗里泡了一个多月，住在男女混住的大车店。有时早晨醒来，一个老太太就睡在我旁边！

我们每天都跑到“知青办”，帮他们刻蜡版，边干活边聊天。“知青办”的人觉得我们这拨儿人少见，要文化有文化，要思想有思想，再说我和三友还是学生党员。他们被感动了，正好赶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终于被分配了下去。我插队的具体地点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属边境二线。

# 我的“红色记忆”

杨百朋

杨百朋，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八年底赴山西省山阴县插队，一九七五年底返回北京。曾担任过工人、教师、研究所主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北京神龙国际旅行社董事长、北京电焊机制造有限公司董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出版了《自然界中看不见的射线》、《夫妻总统》、《巫术经济学漫谈》、《政治与行政》、《世界级制造业》等著述和译著。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一九六六年八月的日子永远都是一段挥之不去的深刻记忆，只是记忆的色彩不同罢了。有人的记忆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给伟大领袖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有人的记忆是在学校的劳改队里遭受往日朝夕相处的同学痛殴。而我的记忆远没有他们这样强烈，但无论如何那毕竟是个红色的岁月，而

且我也终于没有逃脱红色阴影的笼罩，所以无论是将红色看作革命的象征也罢，还是将红色看作是血腥的代表也罢，我都愿意将我的记忆称作是红色记忆。

## 一 “八一八”和钥匙

那年的八月十八日清晨，正当大多数同学意气风发地赶往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相约，到香山樱桃沟去郊游。

按说能够在“八一八”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对于当时的学生来说绝对是一件美事。但显然不能人人都去，有严格名额限制。因此我们班还专门召开了一次班会，讨论到底谁能有幸参加。那次的班会，我和李宝臣，还有刘大猛都没有出席。听说会上有人提议，认为应该在我们三个人中找出一个代表去参加这次接见，因为一般人看来，我们三个人时常凑在一起，的确像是一个反对派，还因为我们三个人都相继公开地反对那个“对联”，并且是在班上气氛紧张、令人窒息的辩论会上。没有想到这个提议竟得到多数人赞同，最终李宝臣被选为我们三个人的代表。

但李宝臣并不领情，他认为将我们三个人划成一个团体，其中隐含着有一个反对派小集团存在的意味，这在当时是个危险的信号，因此绝不接受，这也是我们决定趁“八一八”那天去樱桃沟散心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一早，我和李宝臣骑自行车从市里出发，直奔香山樱桃沟，这是我们在头一天约好的。一路上我们见到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学生与我们背道而驰，正向着市中心疾进。我俩知道这一天天安门广场将有一个大型活动。后来这个活动被冠以“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而载入史册。我们选择这一天去游玩，也与这事有些关系。

但那天留在我记忆中的并不是什么“接见”，而是我的自行车钥匙丢了。就在我们准备从樱桃沟向回返时，我怎么也找不到车钥匙了。翻遍了所有的口袋，还返回了一段路，在岩石缝隙中搜索，都不见踪影。樱桃沟里只有我们两个游人，想找个人问问都不可能。天哪，这下可彻底完了，我想，这么远的路我不可能扛着它回家。而且这车是向我姨借的，我也不能把它先丢在这儿不管。天慢慢地晚下来，就在我俩一筹莫展时，一个路过的农村妇女走过来，随便问了一下后对我说：“那边工地上有人会弄，两下就能给打开。”真的?！我将信将疑，因为那时的我还很稚嫩，认为锁是很神秘的，不可能两下就捅开，但工地上会有一些工具，还有人，可能有办法给它锯开，或砸开。

她说的工地离我们放车的地方不太远，错落着几个简易的工棚，为的是修建那个水坝，就是现在樱桃沟入口不远处的那个水坝。我把车扛到后，向遇见的两个工人模样的人求助，其中一个年岁大一些的，几乎没说一句话，拿出一把改锥，一插，一别，

又使劲一拉锁杆，那锁就开了。我看得目瞪口呆，心里的高兴劲儿自然不用提了。那人指着车锁说了声：修修还能使，然后头也不回就走了。我好像忘了感谢人家，那人似乎也没期待我的感谢。

我不知道这一天算运气好还是不好，反正那天回去的路上骑得挺轻松。

这次事件使我切身感到了锁的脆弱，它的神秘性在我心中消失了。后来沈大智进一步跟我讲了好多开锁的故事，好像他是从一个铜匠那里听到的，据说那时的铜匠需要在公安局备案，就跟会修无线电的人一样。沈大智不仅了解锁，他自己还有一套万能钥匙。我发现它们确实管用，好多看起来坚固无比的大锁，他捅咕几下，就啪的一下自己弹开了，那一刻很是激动人心。当然当时的锁远没有现在的复杂。但这本事也让我深深羡慕。于是他也给我做了一套：几个弹簧钢丝做的小钩，还有一些用废钥匙改装的小玩意。他还告诉了我一些使用它们的要领。

我把这些万能钥匙穿成一串带在身上，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它们也真有发挥作用的时候。

一九六七年春，在我们筹办《只把春来报》的初期，有一个来自四川乐山的下乡青年跟我们有些交往。他给自己起的笔名叫“勒儒”，他说是要勒死大儒的意思。名字倒是挺合潮流，但我之所以能记住它，是因为这名字正好跟法国科幻大家儒勒·凡尔纳

的名字相颠倒。他的鼻子上有几个小坑，我们都叫他“麻鼻头”。他向我们拼命描绘峨眉山和乐山大佛，鼓动我们和他一起走，结果沈大伟、吴景瑞、何大明还有叶林宗和我都动了心。

那次到成都后要找住处，他带我们找到中共西南局。那大楼已经被学生占据，但不幸的是，楼里几乎所有的房间都已经成了造反组织的办公室，没有我们的落脚之处。天快黑了，我们仍在楼内寻找合适的空房，后来我发现有几个房间由于门很牢固而且锁得很严，还没被人占领。于是我们走到了一个贴着“政法组”的房门前，我掏出那套“万能钥匙”，在那门锁里钩了几下，“啪”的一声，那锁竟然打开了。大家都非常兴奋，蜂拥着闯了进去。真不错，里面挺宽敞，还有大沙发，办公桌也可以躺下人，足够我们住了。

我的这一手，吴景瑞说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把我那串宝贝要到手，对房间里的任何一把锁几乎都不放过。还真有几把让他给捅开了。其中有一个柜子，里面有好多印着“绝密”字样的文件，介绍一些正处在侦破阶段的政治案件情况，确实比较重要。

我们在“政法组”可能住了两三天，抽空浏览了成都市，接着就一起去爬峨眉山了。在峨眉山，我记得是爬山的第一天下午，我们走到洗象池后就不想再前进了。那时庙就是旅店，香客住的房子就是客房。房间分成档次，我们没什么钱，当然住最次

的。可能是万能钥匙刺激了吴景瑞，他决定再看看其他的房间。不久，他返了回来，对我说："快，搬过去，那儿棒极了。"接着便拉着我向外走。

那儿显然是高档客房，比我们的房间宽敞明亮多了，床也干净整洁。推开古旧的木窗，云海就在窗下涌动，对面，浸润在云雾中墨色的山峰映衬在淡墨色的天空下，就像迎面挂着的一幅泼墨山水。我摸了摸床上的被子，很软和，但很潮湿，褥子也是这样，可能是云时常从窗子飘进来的结果。我们就盖着潮湿的"高档"被子心满意足地睡了一晚。

除了捅开了高档住房的锁，吴景瑞还有更大的"成果"。一个已经对游人关闭的文物陈列室的门也叫他捅开了。那是庙后院的一间大殿，很清净。他进到里面后不久，就很神秘地走出来，找到正在四处拍照的我。"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金的？"他从兜里拿出一块巴掌大的金光闪闪的物件。我看了看那东西，好像是个黄铜铸件，上面有很古朴的花纹，也好像是古怪的动物图腾。正面鎏了一层金，虽然已经斑斑驳驳，还是有金光闪烁。但背面则是原来金属的本色，一看就不是金的。那上面贴着一个小标签，写着"六朝"和一些编号。"这哪是金的，分量也不对，值不了什么钱。"我跟他说，"你最好给它放回去。别看它不起眼，要是真丢了，可能事大了。"

我说的"事大了"，实际并不是指他"事大了"，人们能找到

他的机会几乎为零。我想的是那些和尚们可能“事大了”。

峨眉山本是清净之地，但倒霉就倒在前些年山下搬来个“峨眉铁道学院”。于是它经历了“破四旧”的大学生们的扫荡，扫荡过的痕迹在庙里随处可见，从那些和尚的目光和举止看，他们好像普遍遭过一劫，这也难怪，按当时的观点，他们本身就是“四旧”。这些人一个个神情木讷，动作迟缓，嗓音乌涂，尽力避免和生人打交道。如果再给他们加上“失窃文物”一条罪状，他们的境遇将可想而知。也许是吴景瑞也有同样的恻隐之心，他把那东西原样放了回去，还把门窗锁好。

当我们返回成都时，路边的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很快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从前一天开始，成都郊区一三二厂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流血冲突。我们这伙拄着竹竿、一瘸一拐的疲惫年轻人，太像武斗火线上撤下来的败兵了。这一天也算有其历史意义，因为它是“文革”中在全国出现的第一起动武器的武斗，从此大规模的群众流血冲突慢慢拉开了序幕。

我头脑里禁锢的思想大锁也随着革命的发展，逐渐被眼前目不暇接的景象渐渐打开了。多少年来，我总觉得“八一八”那天在香山丢掉钥匙而又不合常规地打开车锁的经历似乎预示着什么。

## 二 “对联”与定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那副对联，它是

怎样在“文革”初期在各学校忽然出现，我没太搞清楚。后来据江青考证，从根儿上讲，这对联好像跟黄天霸、窦尔敦等人有关。这么说是想证明这对联很不好。因为他们要搞掉的正是那些“英雄老子”，所以有必要压一压越来越兴奋的“好汉儿子”们的势头。但在毛的伟大战略意图露出端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他们没这样讲。

那次班会好像并不是为辩论而召开的，组织者的原意可能是开个批判会。大家聚齐后，有人就开始给大家念一封信。那是牟志京同学的检讨信，因为他在前一天轻信了传闻：说毛主席公开表示反对“对联”，为此他奔走相告。但后来证明根本没这回事。他对自己犯下这样严重的错误后悔莫及。

朗读者在念那封信时语气不一般，在个别句子上还要拉一拉长声，强调他认为重要的东西，让人感到这个检讨其实暗藏玄机。会场气氛顿时变得令人窒息。牟志京那天刚好没来，但这次并没人趁机对他口诛笔伐，人们好像并不愿碰关于“对联”的事。

见大家没什么反应，班上一位自认为有资格的同学开始说话。他在校外似乎经历过“对联”辩论的大场面，对班上的小把戏不屑一顾，说着说着他就点出了几个人名，还说，对于你们这些人，我就不用说什么了。这下那些被点的坐不住了，有的开始承认自己是混蛋；有的觉得委屈，因为他一直要求进步，于是反

问：我到底有什么不对，怎么就不用说了？

接下来一些细节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人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开始大声斥责他们。紧跟着有人也突然拍了一下桌子，开始面对面大声反驳。对此大家都感到意外，因为这拍桌子的人竟然是我。

现在想起来，当年我自己跳出来真是很幼稚可笑。这些事其实跟我扯不上。在班上我是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之一，也没有人在这方面要求我什么。我最喜欢的是数学物理，连语文都反感，更不用说政治了。我宁愿花很多时间比较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定理之间的规律，也不愿费一点时间去看革命导师和先哲的论述。我觉得那些东西我根本把握不了，似乎它们的每一个命题都可以推导出完全相反的两个结论。我没有资格和人家辩论什么，辩论总要引述一些导师和先哲的话来证明自己，而我一句这样的话也没有。

但这一次恰好有些不同，就在这次班会的前一天下午，我到刘大猛家闲聊。他二姐从学校回来后见到我们，于是就问：你们那儿说起那个对联了吗？我说还没有。她说：我觉得它不对。因为毛主席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对呀，别的话我不知道，这话我可知道，因为语文课上学过那篇《青年运动的方向》，那一段话还要求必须会背。后来我越琢磨这句话就越觉得它不错，因为

它明确地说出了“标准只有一个”，就跟数学定理一样，可以由此得出唯一结论。

我之所以跳出来，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找到了“数学定理”，因此可以像和别人讨论数学题那样去辩论这个问题。在会上拍了一下桌子后，我的发言大概是这样的：好汉当然是革命的，而毛主席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到一起。咱们谁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结合了，怎么能认为自己就是好汉呢？

于是话题还真引向了对这个命题的解释上来。有的人说自己和父母关系如何如何，父母原来就是工农一员，所以也就等于和工农结合了。但他解释不了“广大”两个字。于是又有人说父母的亲戚很多，朋友也很多，亲戚又有亲戚，朋友又有朋友，这样算起来也够广大了。

李宝臣、刘大猛等表示了附和我的看法的意见，刘捷也激动地提出像混蛋这样的语言是不能让人接受的。我想同学间的辩论本应该就是这样。但之后不久有人就将火引到我身上。

“你们家解放前是靠什么吃饭的？”他突然问。

“靠工资吃饭。”我随口答道。我父亲是在大学里教量子物理的，解放前就在教书。

“什么叫靠工资吃饭，资本家也是靠工资吃饭！”他说。

“资本家靠剥削吃饭。”我紧跟了一句。这话绝对没错，一直

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他一下子没话了，停了下来开始清理自己的思想。

然后，他口气有些缓和地对我说："当然不能说你们家直接剥削，但你们也是靠资本家剥削的钱生活的。资本家把他剥削到的钱分一部分给你们，这就是你们的工资……为什么他要把钱分给你们一点呢，因为你们干的事对他的剥削多少会有帮助。"

往下我好像没再说什么，因为他的圈子绕得有点复杂，已经超出了我掌握的那点政治定理的范围，我已经没有资格再辩论了。

后来我好像体会到了他的逻辑线索："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人民"，而劳动，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人们的通俗理解上，都是指体力活动。劳动人民，最形象的比喻应该是指那些苦力。哪个产品能坐着凭嘴说就变出来？所以世界上的财富都是经苦力们的手而创造出的。一切不是苦力的人，自然就都得靠苦力养活。当然那些为苦力们奋斗的"革干"们除外。因此所有非苦力都参与了对苦力的剥削，都可以算作混蛋。

我之所以跳出来反对"对联"，细想起来，也是出于本能的反感。我隐约感到其中有某种让人讨厌的很极端的东西。后来我明白了，虽然"对联"表面伤害的只是那些"老子反动"的少数同学，但它真正想制约的是中间大多数。当时我们班某些人表明的那种逻辑：一切不是苦力的人都难免是混蛋。就是当初那伙人

世界观的客观反映。“敌人太多了，有理由称为牛鬼蛇神的满视野”，这一对世界的看法如果与人性中某些带有劣根性的东西结合起来，真能让这些人热血沸腾，领袖再一鼓动，他们冲杀进社会后的破坏力就可想而知了。

“对联”辩论会后，我虽然觉得自己掌握了辩论“对联”的“定理”，但还是有些后悔：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今后再想考大学怕是吹了。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已上到高二的同学来说，自然是最大的愿望。但考大学不只是成绩问题，更主要的是你政治上是否足够进步。所以面对吃不准的事情，一般同学都不愿意出头，也是完全正常的。当然谁也没料到后来高考取消了，大学停办了，所有人的大学梦都破灭了。这在当时也可算是一种公平。

李宝臣他们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一起聊天时，谈到了“上山下乡”。对于我们这些长这么大几乎还没离开过家的孩子来说，广阔天地还真能引起不少浪漫的幻想。谈着谈着就扯到了自己听说过的那些名川大山和知名城市。既然今后上大学的事要告吹，那么在离开学校前，一定要趁机到各地游历一番。心想事成，一听说有“大串联”，我们就想尽办法跑了出去。

## 三　“大串联”

一九六六年秋季的某一天，李宝臣、刘大猛、张育海和我兴

冲冲拿着去成都的火车票来到北京站，我们就要踏上“大串联”的征程了。北京站广场上人很多，有红卫兵拉起的一道道警戒线。那时正是破四旧后遣返“牛鬼蛇神”的时期，好多人家扶老携幼，扛着铺盖卷，被押送着返回原籍。他们都是被北京扫地出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人。我顾不得仔细观察这些人，只管高高举着手中的火车票，匆匆从警戒线旁走过，一头钻进车厢中去。

这几张火车票是我冒了很大风险才搞到手的。“对联”辩论结束后，李宝臣、刘大猛和我在聊天中就一直向往出行游历。后来，张育海从兰州声援返回又特意找到我，向我描述他外出的详细经历：如何受到欢迎，如何受到围攻，他的大字报如何精彩，他的脚趾如何发炎溃烂等等，更让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出去“经风雨，见世面”。但我们并非“红五类”，想让“校文革”出具介绍信领取“串联”火车票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这很不合理，不符合正在变化的革命大方向，于是决定自己给自己开一封介绍信。当然，首先我要解决的是图章问题。我找到初中时的一位关系不错的同学，请他按照我给的样子刻一枚章，因为他很有篆刻才能。现在想起来，请人办这种事情真是很幼稚。他婉言拒绝了，说特别忙，没有时间。但他给了我一把刻刀，给我讲了一些要领，让我自己解决。在家里找到一块章料：上面是石狮子，下面的底座很平，石头很软。我一点点刻

起来。这中间让我大伯伯发现，将我骂了一顿。但我仍不死心，继续偷偷刻。不过最终未能成功，因为“文化革命委员会”那几个字很小，笔画很细，用我刻的章印出来，竟是一片红疙瘩。

我仔细端详那图章的原样，看看有没有改进办法。那章是盖在一张铅印着北京四中的格式化的介绍信上。介绍信原本是让我到电影院领取电影票的。当时有几个被批判的电影，欢迎人们凭介绍信观看。忽然，我发现只要稍加改动也可以变成领火车票的介绍信。因为它没填抬头，可能是开信人不知我要去哪个影院。于是我先填下“北京火车站”几个字。下面办事一栏原来写的是“领电影票”，但写得非常潦草。“电”字几乎就是一个“N”中间一竖向右一拐，我顺着那一竖向左拐了一下，于是一个同样潦草的“火”字就改成了。就是“影”字不太好改，好在他写得很快，右边的三撇他写成了一竖，将那一竖改成“车”字很容易，左半边“景”字实在不好办，我只好把它涂成小黑疙瘩，好像笔误。

我大伯伯见到这封介绍信后，仔细端详了半天，最后他说：你这图章是假的。我心里直好笑。心想人们这么仔细看都没发现内容被改过，就说明它能用。关键是抬头很清楚：北京火车站。

我把介绍信送进领票窗口，那人又送了出来。他说：“让你领火车票，去哪儿，几个人都没写，这怎么领?”我赶紧说：“四个人，去成都、武汉、广州、上海。我这就给填上。”说着赶紧

在信的后面写上“四人去成都……”。他一边看着我写一边问：“你们那儿开信随便是怎么着?”我壮着胆回答：“像我们这样的，可以随便，别人就不一定了。”他没再说什么。等我把信再送进去，他说了声：“先去成都吧。”就递出四张票。我拿着票，那开心劲儿就甭提了，直到我找到李宝臣，把票交给他，他还说我的眼神有些异常。

上了火车后我们意外地遇见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其中有国家特级篮球裁判韩茂富先生。车上人很少，我们四个人很容易就找到了面对面的两个大长坐椅。我们很满意，心情很舒畅。但显然我们不够老到，不一会儿，韩茂富先生特意找到我们，说卧铺车厢也很空，他专门为我们占两个空铺位。我想，这几位老师之所以这种时期还挺逍遥，一是因为他们都是教体育的，暂时扯不上意识形态；二是他们都很关心热爱学生。我们高兴地搬了过去，最高兴的是张育海，他可以和韩老师畅聊篮球了。

成都给我的印象是过时而破旧。脏乱狭窄的街道两旁全是深暗色木板搭成的铺面房和住房，而且歪歪斜斜。其实后来去过的一些城市都给我留下类似的印象。

对“串联”的学生们还是很照顾的，车站外就有接待站，我们被分配到了成都大学附近的一所中学落脚，还领取了过几天去重庆的车票。

在街上走时，我看见一间临街的旧木板房前，围着一些人，

有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在那里辩论。他们飞快地说着四川话，我一时听不太懂。我发现在那板墙上有一张大字报，仔细一看上面的大意是："我要造我父母的反，大家一定会说我疯了，我傻了。不，我没有疯，也没有傻，我很正常。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时我终于听懂了那个高个子说的话："……他反正是狗崽子，狗崽子还想造反，我们要让他低头认罪。"接着他就伸手将那个矮个子的头按下去。那矮个子将头使劲一甩，又昂了起来，挺直身子，露出不屈的神情。"哦——"，下面看热闹的人发出了一声惊叹，"这娃子好厉害哟"。我边看边想，成都的"革命形势"可能确实要比北京慢几拍，这样的场面在北京早就过时了。

既然是"革命大串联"，总应该有些"革命"的表示，为此我们到成都大学转了一圈。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我隐约感到"破四旧"时铁板一块的"红五类"开始相互指责，大有分成两派的趋势。

老实说，我们既没有什么革命理念需要"串"通的，也没有什么革命战友需要"联"系的，我们的"串联"只是想"经风雨，见世面"。成大的学生发给我们的油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一张成都地图。那上面标明了"杜甫草堂"和"武侯祠"的位置及乘车路线。

在武侯祠，原来很气派的刘湘的钢筋混凝土墓地已被人凿开，巨大棺椁被挖出来放在一边，盖子上有"陆军一级上将刘

湘”几个大金字，而棺椁内的棺材已被取走。另一处景点被改成存放抄家物资的仓库，原来的回廊中堆满了硬木家具，从外面看，屋顶上有许多八仙过海一类的彩色琉璃人物造型，在别处从没见过。但参观者一律被拒之门外。

在成都的街上，我们意外地碰见同班同学赵颐庚、王建复和牟志京。他们出来早些，是从重庆过来的。按计划他们接着要去新疆、西安，然后长途步行到革命圣地延安，体验一下长征的滋味。听赵颐庚说，他们“串联”比较艰苦。有一次肚子饿了，来到一家小面馆，身上没什么钱，就要了三碗光面，想就着酱油吃。人家说死说活不卖，只好退了出去。但肚子实在饿，又没钱，于是又返回去。这回一拍桌子一瞪眼：“三碗白坯儿面，快点端上来！”没想到这招很灵，对方二话没说，乖乖给他们煮了三碗。

我们出去“串联”不止一两次，事先都没什么计划，根据情况随时会突然改变行程。比如，那次从峨眉山下来，在回北京的列车上，我们突然决定和几个南京的学生换票，不回北京而是到上海看看。第一次出行路线是第一站成都，然后是重庆、遵义、贵阳，再返回重庆，乘船经三峡到武汉，在武汉换火车南下，到岳阳、长沙、韶山、株洲，然后向西到桂林、柳州。本想继续向前到海南岛，但忽然精疲力竭，兴趣大减，于是掉头向东，直杀杭州，然后是上海，从上海回北京。

像我们这样的“革命小将”随意到全国乱窜，铁路自然一片混乱。在武汉这个九省通衢之地，聚积了大量的“串联”学生，无论是北上想去接受伟大领袖接见的，还是南下准备去散布革命火种的，乘火车都变得十分艰难。火车票早已多余，只要有本事上车，只管坐就是，没有人管你。从湖北到湖南，我忘记哪一段路，我一直坐在坐椅中间的小桌上。在我双脚下的空地上，蜷坐着一个年岁较大的人，他可能是唯一买票乘车的，一路上他不停地念叨：“小将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小将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只好坚持着，直到双腿麻木失去知觉。

从杭州到上海乘坐的是双层新式客车，可能还属于试运行期间，不久就消失了，几十年后它又重新露面。这短途直达列车不像其他车那样挤满了学生，车上的人穿戴相对干净整齐，即便是学生也比较“时髦”，尤其是沪宁杭一带的学生。相比之下，我们就像“叫花子”，一个个疲惫不堪，皱巴巴的衣服污渍斑斑。

我这身衣服还是在四川时刘大猛帮助洗了一次。他买了些碱面用热水冲开，然后将衣服泡进去。那水变成黑黑的，不知道是衣服太脏还是泡掉了颜色。老实说，那时我自己还不会洗衣服，头一次目睹全过程。

到了上海，我们发现身上的钱快用光了，虽然一些接待单位可免费就餐，但整天在外面跑，不可能特意赶回住地吃饭。

有不少学生在外久了，需要家里汇款救急，因为住的地方不

便联系，就将钱汇到某个指定邮局，然后自取。我在一家邮局的营业室里看到临时的公示栏，上面密密麻麻地列满了领款名单和汇款的地点、日期等等。这种做法一开始还是可行的，只有个别人钻空子，用伪造证件冒领别人的汇款。张育海似乎就碰上这样一次。他第一次出行，他母亲曾委托沈大伟的母亲汇款给他，但张育海根本没收到。他母亲一直记得。后来张育海牺牲后我们去看望他母亲，她由于中风口齿不清，但在吃力的言谈中仍提到此事。

在上海临上车前，我兜里顶多还有几分钱，为了到北京后乘汽车回家用的。此前我买了两个烧饼，剩余的钱买了一小包牛肉干。我计算着一天的时间到北京，怎么都能坚持到家。没想到“串联”的列车没准点，要给其他车让路，整整开了三天才到北京。好在周围的学生对我很友好。有些人来自山东农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他们带着家里烙的大煎饼，每到吃饭时都让我分享，最初我不好意思，他们以为我瞧不上，就不再让了。可架不住越来越饿，我主动向他们要，说尝尝，结果尝了不少。

十六岁第一次出远门就这样结束了。回到家，我又黑又瘦，蓬乱的头发中有两处脱发，从衣裤中找到三个虱子，但自我感觉良好。四五十天，我几乎免费游历了半个中国。但“大串联”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父母和奶奶挤到一起住了，弟弟他们住到大伯屋里去了。我家住房被腾空，据说是为了准备接待外地来京的

“串联”学生。我看到那些空房的地上铺着稻草，上面盖着席子，我在外地就睡在这样的地铺上。

北京满大街都是外地来的学生，他们都是赶来等待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的。每次接见都号称拥有百万红卫兵，那时北京城远比现在小多了，突然增加了一百万人，拥挤程度可想而知。据说能住的地方基本都住满了，于是开始让居民腾出住房接待外地红卫兵，包括我家。接待红卫兵是政治任务，谁要是反对，怎样处罚都不过分。实际上并没有外地红卫兵住进那几间房子，我去房管部门交涉，他们说毛主席的接见还没结束，既然你们已经将房子交公，怎样安排就用不着你们再操心了。

后来有人住了进来，但不是外地红卫兵，而是本地永久住户。

## 四 “破四旧”与抄家

我们住的胡同紧邻东斜街，路北自东到西并列着四个规模建制相仿的四合院。胡同不宽，听我大伯伯说，原来胡同的东西口各有一牌楼，偶尔被车撞坏，西边的那个归我家修，东面的由一号院的人家修。后来车逐渐多了，胡同又窄，经常被撞坏，考虑到妨碍交通，就将那两个牌楼拆了。

昌堂门胡同四号的四合院，我奶奶带着我们的大家庭已在那里住了数十年。我父亲就是在那院里出生的，自然对那院很有感

情。我们家几代都是读书人，听我奶奶说，我爷爷的爷爷在祖籍是教书先生，年纪很轻就去世了。年轻守寡的曾曾祖母支撑着让两个幼子苦读。他们一步一个脚印，最终通过殿试考取了翰林，这就是我曾祖父和他弟弟。从我爷爷参与筹建辅仁大学那时起，我家就定居北京，一直住在这个院里。

小时候，我们时常从犄角旮旯里翻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旧东西，在院里乱耍。有一次我翻出两个像炮筒子一样的铜管，比我还高。那东西下面粗一些，套着上面的一半，上下可相对移动。我们拿着它玩打仗。后来我奶奶跟我说，那是喷水用的唧筒，把它插到水缸里，上下抽动，可将水喷出很高。过去夏天院里搭凉棚，用它向棚上喷水。还有一次，我翻出了一筐蛐蛐罐，还有养蛐蛐的杂物，其中有一种拇指粗的陶制小方管，一寸来长，两头空着，上面是能揭开的小盖，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我大伯伯告诉我，它是“过”蛐蛐用的。将蛐蛐赶进小管，用手指堵住两头，然后将蛐蛐移到其他罐里，好让它们斗。

家里最多的就是旧书，但都不是“闲书”。只是在我奶奶屋里一个犄角的书架上有一些我叔叔小时看过的旧武侠小说。我翻看过，写得荒诞怪异，粗制滥造，不合逻辑。我觉得它们纯属“四旧”。

那天，跟奶奶商量过后，我把它们抱到院子中间，点起一把火。火苗不大，但升起一柱浓烟。就在我的“革命行动”即将取

得成果时，突然听到一声大喊："干什么呢?"我一愣，顺着声音抬头一看，房顶上不知何时站着一人。

"烧旧书哦，破四旧。"我喃喃地回答。

"红卫兵!"他向别处招呼了一句，就下去了。

不一会儿，从外面腾腾地跑进来几个人，臂上戴着红袖章。我一看，原来是附近街道小厂的工人。

"你在这儿干什么?"一个长得很寒碜的年轻女工问。

"这些都是'四旧'，我要把它们都烧掉。"我说。

"你为什么现在才烧?"她紧跟着追问。

"这些东西要是我的，我早就全烧光了。"我实话实说。

她看了看我，语气缓和地说："那注意别把他们的罪证给烧了。"然后这帮人就走了。看来她不知道这院子只住着我们一家，还以为我是在进行"破"别人家"四旧"的革命行动。

不过，这也许是在向我们预示，家里的"四旧"想自己解决是不可能的，外人早晚会闯上门来。

那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就听到父母在低声商量什么。然后我妈从里屋出来，走进我们住的屋子，打开橱柜，又打开箱子，悄悄收拾东西。我预感到要出事了。

果然，他们上班不久，我父亲又返回来了。只不过跟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七八个学生。呼啦啦一帮人拥进院子。这些人好像事先已有分工，我们几个孩子被招呼到一边，由两个人做思想工

作。另一些人则开始翻箱倒柜。

尾随这几个大学红卫兵一起进来的，还有两个散兵游勇，一个小个儿，一个高些，都戴着红卫兵袖章，年岁比我可能小一点。那高个儿的手持锋利的尖刀，不停地削着身边那柏树的树皮。他也许有些心虚，眼睛时不时向我这边扫视。那小个子钻进屋里，打开箱子一头扎了进去。

老实说，让我担心的是这两个散兵游勇。大学生们毕竟受教育多些，从他们做思想工作的语气看，一时还不致“出圈”，而那两个坏小子就难说了。如果他们当着我的面侮辱父亲，我该怎么办？我有一阵很淘，在那一带的孩子中是“有头脸”的闹将。别看那小子带着尖刀，我也是有脾气的，一旦控制不住，后果很难预料。据说一个小脚老太太，用菜刀砍伤了到她家抄家的红卫兵。结果老太太被打得奄奄一息，还被公安局正式逮捕了，不久听说被枪毙了。我们班有些人参加了那次审判会。

好在那两个散兵游勇一直没敢太造次。一会儿，小个子出来向一个当头儿的大学生汇报说，他找到了两个空戒指盒，里面的东西不见了，一定是藏起来了。高个子提出建议，他再去叫几个人来，仔细搜查。他一招呼就能来一帮人。那个当头的犹豫着。这时另一个大学生过来，不满地对那当头儿的说：别再让外单位的人插手了，要不然越来越乱。于是当头儿的冲两个散兵游勇摆摆手：“不用了，你们也回去吧，我们能自己解决。”

那两个家伙走了，我稍微松了口气。大学生们继续搜查。那时人们只看重金银珠宝，尤其是黄金。金条或金元宝最好，金戒指次之，对于字画古籍一类还不太认。

一天下来，他们真正想要的几乎一无所获。为了证明自己行动的“革命性”，他们在我家大门外贴了张“勒令”，大意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某某某，现勒令将你家隐藏的反动物品交出来，否则革命群众是要砸烂你的狗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临走前他们还完成了最后一项“革命使命”，这就是将我家的帮工老文给“解放”了。

老文，我妈叫她文大姐，实际多大年龄我不知道，但看着挺苍老。她就住在东斜街“一贯道”住的那个破杂院里。老文没有文化，自然没有工作，她丈夫好像也没有文化，且脑袋有点傻，干些壮工类的杂活儿。由于我们父母上班，我们都还不大，于是雇她白天帮忙做做饭，整理家务。

我父亲付给老文三个月工资后，红卫兵们对老文说：你以后不用再来了，没有必要在他家受气受累，你从此解放了。显然，老文对于被“解放”不但不领情，而且有些怨恨。但她什么也没敢表示，那天她也很紧张很害怕。我曾听她无意中透露，在老家，她家好像和地主沾点儿边儿，斗地主时给她留下非常可怕的印象。

那些红卫兵之所以收获不理想，可能与那天早上我父母采取的措施有关。家里确实有些金银翠钻饰物，不多，都是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比如，父母的结婚钻戒，庆典饰物，或我们满月或周岁生日亲朋送的吉祥物。

那天早上，父亲预感到学校情况不妙，我母亲将这些东西敛到一起，带去上班。她下班回家，那些红卫兵已经走了。让母亲带在身上毕竟不安全，作为长子，我自告奋勇说："让我来保管吧。"

"你怎么保管?"他们问。

"我给它们藏起来。"

"怎么藏?"

"埋起来。埋到院子的墙角那儿。"

他们犹豫了一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了。

夜深人静，我拿了个小铲，将那些东西放进一个铁盒子，再将铁盒包好，独自来到靠墙的花池边。在紧贴院墙的地方，向下挖了一个小坑，然后向墙的方向侧着掏洞，一直掏到墙底下。我把那小盒放进去，把土重新填好，还浇了些水。它在院墙底下，在两院分界线上。"就是找到了也不要紧。"我自作聪明地想："他们怎么能分辨出到底是我家藏的，还是隔壁的人藏的?"

其实在埋那盒子前，我还藏了奶奶的一样东西，那是一把腰

刀。是我的太外公清末在黑龙江巡抚任上，驯化了土匪张作霖部后，人家送给他的。那刀不到两尺长，刀柄是花纹包金，上面精心镶嵌着好多漂亮的红绿蓝宝石，刀壳也是同样讲究的装饰。那刀柄上有一个机关，一按，刀就从鞘中弹出一两寸来，可以看到刀锋寒光闪闪。我早就见过它，非常喜欢，很想拿来玩玩，可我奶奶从来不让。这次我奶奶有些含糊了，虽说它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但过于锋利，有可能犯忌讳。那天红卫兵在她屋里只表面搜了搜，要是下一次翻箱倒柜，这玩意儿可能要惹麻烦。于是我趁机要了过去，说我自有办法处理。

其实我也不知把它放在哪里更安全。因为非常喜欢，最后我决定放在我睡觉的床屜边上，用褥子和床单将它盖住。

那天晚上我父亲可能没怎么睡，他去奶奶那里安慰她。父亲很孝顺，很有责任心。我爷爷去世早，我生下来就没见过爷爷。听我姑姑说，父亲从小勤奋严谨，二十岁出头就读研究生了，同时在师大附中教书。这么早工作，就是为了挣钱贴补家用。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父亲把我叫醒了。

“你把你奶奶给的那把刀放哪儿了?”他问。

“就在这儿”，我一翻身，掀开了褥子。

他扑哧一笑，“这可不行，你也太胆大了。走，帮我把它搁到东屋的箱子里去。”

“那伙人要是再来，还不一翻就翻到了。”

“他们拿走就拿走，关键是别让它给自己惹事。那些人正想找碴儿哪，你让他们在咱们屋里翻出凶器，那不是自找倒霉嘛?”

我还是不太甘心这刀让别人拿走，但也没办法，只好爬起来，跟着父亲去那间小东屋。

小东屋是间储藏室，长年锁着，红卫兵来时还没来得及光顾。里面堆得满满的，几无立足之地，一个个旧箱子从地上摞到屋顶，箱子缝隙中插放着各种杂物，满是尘土，稍不小心就会蹭一身脏。这不全是我家的，也有亲戚们寄放的，包括“火车婆婆”和“李爹爹”的东西。

“火车婆婆”就是我奶奶的姐姐，“李爹爹”是她丈夫，他们没有亲生儿女。早先他们住在我们隔壁的三号院。在日本人到来前，夫妇俩决定到武汉去住，把三号院卖了。他们把带不走的东西存放在小东屋里。“三年自然灾害”后，也许是武汉的生活条件不行，他俩又回到北京，就和我们住在一起。

“李爹爹”年轻时在比利时留学，在那儿和孙中山一起创立了同盟会，属于辛亥革命的元老级人物。他曾任孙的秘书长，好像主管过民国的金融系统。我们小时候，常向“火车婆婆”索要各种各样的外国硬币玩耍，都是“李爹爹”主持民国制币工作时收集的样品。那些硬币很珍贵，可惜在“文革”前就让我们这些小孩儿乱扔掉了。

回到北京后，“李爹爹”给宋庆龄写了封信。不久来了两个

人，再不久他享受到相当的待遇。可惜和我们一起住了不久他就摔伤腿骨，住了一阵医院因全身衰竭而去世了。“火车婆婆”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她活到九十多岁，寿终正寝。

进了小东屋，我们搬下来一个老式大皮箱子。那箱子上还放着一个几乎同样大小的“八音盒”，由于搬动时磕碰，竟叮叮咚咚地响起来，透过玻璃盖，还能看到那些小洋人儿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敲鼓。这“八音盒”早就不能玩了。

父亲打开大皮箱，其中还有三把刀，有两把是民国初年军人着礼服时装饰用的佩刀。我在老照片上见过，某人穿着元帅服或将军服，戴着插有一根羽毛的高帽，挎着类似这样的佩刀。大概是哪个亲戚前辈扔在我家的。小时候我从旮旯里翻出来过，挥舞着四处跑，让大人没收后再也没见过。

那两把刀纯粹是样子货。外表很漂亮，抽出来细看，根本没有刃，刀身是电镀的，电镀层已经剥落。但第三把刀就不同了，那是一把日本战刀，刀柄较长，两只手攥着富富有余。刀鞘是金属的，刀身透着硬质钢的味道，一看就是一把战场上用的武器。这把刀我也见过，但从未碰过。这些刀的来历我并不清楚。

我们这家人虽世代读书不谙政事，但家族庞大，各种人物都有。从前清到民国，不乏显赫人物。从老人们的谈话中，好像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这些民国大总统都能和我们家扯上关系。家族人中也有在共产党中当上高干的。我的姑

婆，就是我爷爷的妹妹，建国初期曾是周恩来的主要秘书，还主管过《人民日报》。听我姑姑说，这位姑婆曾给她们新华社的全体人员作过报告，讲话精确干练，滔滔不绝，在台上还一支接一支抽烟。五十年代这位姑婆自杀死了，可能是对五十年代后期党内政治生活气氛失望。“因为是自杀，追悼会的场面不够大”，我奶奶这样说。

还有一位叔公，我爷爷的弟弟，曾是党内与范长江、邹韬奋齐名的新闻工作者。他给自己取名叫羊枣。有过一部电视剧《羊枣之死》，说的就是他。

也许因前一天收获不大而耿耿于怀，或许是他们只是先摸清情况。那天早上，就在我和父亲将腰刀安置好不久，父母都还没上班，呼啦啦拥进来一大帮人，还带着铁锹和镐，看来准备大干一场。显然他们带着学生的那种浪漫奇想：这老宅一定存在着藏宝的秘密暗道和地窖。

这一次他们的目标首先是小东屋。他们把东西一一搬到院里，小东屋腾空后，有人拿着镐在砖地上咚咚敲起来，听听哪个地方声音发空。后来确定了一平方米大小的地面，起开一块块地砖，锹挖镐刨地干起来。

挖坑的学生穿着小背心，露出结实的肌肉，看起来就像个老实的青年农民，一声不吭，抡着镐刨地，不一儿会脸上渗出汗来。

挖得挺深了，连块破砖头都没挖出来。其他人一直在清理搬

出来的箱子和杂物，弄得满头满脸是土。他们一件件翻看登记，并在箱上做标记。我在旁边也算开了眼，有些东西连我都想象不出是干什么用的。那个装刀的箱子也被打开了，但并未引起特别的关注。让他们感兴趣的倒是几本满是尘土的英文杂志，可能是“二战”后的美国杂志，有不少百老汇歌舞剧的剧照，一些只穿着三角裤、长筒靴和胸罩的漂亮舞娘在跳踢腿舞。他们围着翻看，“竟然有这么反动的杂志”，后面的人伸长脖子说。

当头儿的也跟着扫了几眼，然后驱散大家。那几本杂志被扔到旁边台阶上。过一会儿，我注意到一个瘦子，好像累了想休息一下，“无意中”坐到杂志旁边，碰翻打开，盯着那些剧照。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他拿着一根棍子这儿敲敲，那儿敲敲，离我埋那小盒的地方越来越近，最后还真敲到了墙边。不过什么也没发现。虽然他在不停敲打，其实心不在焉，从眼神看，他仍在回味那些剧照。

小东屋的发掘一无所获，他们转移到我奶奶卧室的床底下。这也是学生富于想象力的表现。可能哪本书里提过，老太太总是爱把重要东西埋在自己床底下。

奶奶那架几十年没动过的带帐子的老铁床被搬开，露出几十年都没动过的旧东西。一纸箱日本时期的肥皂都干裂了，还有很多老太太穿的小脚绣花鞋。奶奶数十年来主持一个大家庭，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动乱，一直都很节俭，以防不测：成板的锈

针、成轴的糟线、旧纽扣、旧梳子、旧雨伞，等等。这给寻找金银财宝的红卫兵出了很大难题，从柜橱、抽屉、架子、箱子中分辨并剔除那些廉价品，并非易事。

他们似乎意识到这一点。在奶奶床底下的掘宝工作以失败告终后，他们决定放弃挖掘，而是把有价值的东西全部装箱拉走。

整整装满一卡车，仍有大量物品无处放。好在他们早有准备，一些事先盖好印章的封条贴在那些拿不走的箱子上，同时还封了写字台抽屉、五斗橱柜门和储藏室小门。隔了两天，那卡车再次光临，装上那些贴封条的箱子。写字台和五斗橱倒是无人过问。

比起在东斜街横扫“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到我们家的红卫兵的“革命性”要差些，没有批斗、殴打、辱骂，最多有些不客气；也没有当场砸毁、破坏、焚烧，不过是全部搬走，最后还开具一张“共清走五十六箱四旧物品”的收据。

## 五　抓坏人

除了“破四旧”，“文革”的一大发明就是抓坏人。《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破四旧”达到新阶段。坏人并不难找，说你是坏人，你就是坏人。偷过同学东西的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老师被集中看管，连原先最有尊严的校长和教育局长都被学生揪斗。在同学中，只

要品行有一丝阴影，比如，不在学校食堂就餐而到附近小饭铺吃“花椒油拌面”，或暗恋过邻居家女孩之类，均属“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完全可作为斗争与批判的口实。

那天我到学校，听说食堂旁小屋关了好几个头天晚上抓来的“地富反坏分子”，被抓时都还在家睡大觉。“已经打死两个了，尸体刚拉走。”有人跟我说。

我们家紧邻的那条东斜街，管片警察带着红卫兵，拿着大棒子一门一户地逐院查抄，“牛鬼蛇神”全无幸免。时不时能看见从“八宝山”开来的“专车”。但什么是“牛鬼蛇神”并无明确定义。有个最破的杂院，住着几乎是那条街最穷的人，竟然也有被揪斗毒打的倒霉鬼。那人从来衣衫褴褛，佝偻身子，面有菜色。根据派出所记载，其罪行是解放初期参加过“一贯道”。

街上也能见到几个兴奋异常的闲人。“大油鸡”他妈常溜达到别院看热闹，站在旁边甩甩闲话，给红卫兵们助助声势。“大油鸡”是个直眉瞪眼的胖男孩。有一次，他偷了我姑姑家蒸的红糖窝头，被发现后就再也不到我们院来玩了。听我表弟大伟说，头一天还见他妈在大街上趾高气扬，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一辆卡车开到他家门口，一帮戴红箍儿的从车上将“大油鸡”他爸押下来，于是抄了他们的家，可连一件值钱的也没有。

大伟告诉我，当时他妈被叫到一边训斥。

“这些天你老实不老实?”人家问。

“不老实。”她小声嘟囔着。

“都干了些什么?”

“看报纸，听广播什么的。”她小心翼翼地回答。

“那算什么不老实!”皮带啪地抽了过去，“说，老实交代!”

……

比较惨的是住在离我们家稍远点的一对老夫妇。老头儿好像在日伪时期当过教育总署署长，解放后被判了重刑。一九六五年，他刑期未满，但由于身体不好，提前释放回家。“文革”开始不久，他先在街道被揪出来，好在那时还是“文斗”。到了“红八月”，他自然首当其冲。他家不止被抄过一次，最后一次洗劫后，我跟着别的小孩儿进去看热闹。屋内一片狼藉。只看那老太太挪着步子，从旁边屋里艰难地走进来。她看起来很老了，稀疏凌乱的白发被人胡乱剪过，跟狗啃似的，露出一块块秃斑。浮肿松弛的两腮下垂，嘴角拉得很低，嘴唇嚅动，小声嘟哝着什么。从旁若无人的眼神看，她是在向这个世界彻底告别。第二天，人们发现老夫妇一起喝“敌敌畏”自杀了。

还有一对老夫妇也是一起自杀的，不过是上吊死的。那是“黑鸦”的爷爷奶奶。“黑鸦”是我们小时候玩伴中唯一的红卫兵，他戴上红袖章后就再没理过我们。他爷爷奶奶搬到这里也就住了一两年，跟一般人不太熟。“黑鸦”对他们很孝顺。他们住在临街的两间房子里，隔街就是我家院墙。

听别的孩子跟我说，那天快中午了，也没见老夫妇有什么动静，门窗紧闭，使劲敲打也不见回答，于是人们就让一个叫铁军的瘦小男孩爬上去看看。因为临街窗户封得很严，只在最上边犄角处，有个冬天通烟筒的糊纸小窗。人们托着铁军，他把脑袋钻进去，向屋里仔细扫视一番后说没人。就在准备下来时，他一声惨叫，接着就滑落到地上。原来那上吊的老头正好跟他脸对脸，鼻子几乎碰上鼻子。

至今我也不知道这老两口儿为什么自杀，他们并未受到过任何冲击。有人说他们是被这恐怖气氛吓坏了，或许历史上有过什么难言之隐，心里打鼓，承受不住了。“黑鸦”戴着红卫兵臂章给他们收尸，眼里噙着泪水。

红卫兵的抄家虽异常猛烈，但红卫兵却不是什么明确的组织——没有统一的管理和章程，到底什么人可加入也说不清。当然家庭出身是个重要标准，但具体界定也很混乱。各单位、学校、班级都有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甚至还有些散兵游勇也自称红卫兵。这有点像当年的“义和拳”。

可能是幻想将红卫兵运动纳入正轨，有个自称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组织出现了。听说这个“西纠”是由我们学校几个高干子弟搞起来的。他们连续发了几个通令，其中一个要求在“破四旧”中注意政策。后来才知道是某一两个高干子弟，秉承在国务院上班的父母的意思写的，因为许多共产党

干部也在“文革”初起的混乱中受到冲击，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控制局面，保护自家的安全。但他们没想到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正是要打击这些党内的反对派，“西纠”自然像“文革小组”说的那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 六　我与《只把春来报》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大家逐渐明白了，原来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在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一度闹得很凶的“血统论”就是其表现之一。非红卫兵的“战斗队”一个个出现，而当初盘踞学校的“老红卫兵”则一时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血统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挂钩，据说和一个叫谭力夫的人有关。这位同志其实就住在我们家附近，我们胡同东口稍一拐就是他家。他们家老头儿可能是公检法系统的老干部，因为他们住的院子原来是公安部宿舍。那院里有个孩子曾跟我们很要好，常一起玩耍。有一次，那孩子他爹心情不错，决定让我们中最大的一个孩子“学学打枪”。他取出一支小口径步枪交给他，并指指远处院子角落的大土块，那大孩子还真的一枪就将它击碎了。别的小孩也想试试，但他爹没同意，怕出危险。那孩子说他家还藏有几把手枪，但我们没见过。他们搬走后，谭力夫家搬了进来，独家占了院子，看来级别比以前那家高不少。

谭家老头儿后来也“倒霉”了，他家门口也贴过一张和我们家相类似的“勒令”。老头儿其实很低调，常见他出来买东西或办事，背微驼默默走着，像个普通长者，不同的是后面总有老太太跟着。

谭力夫比他的弟弟妹妹们大不少，相貌差异也较明显。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那是一所市立大学，创办时间不长，有不少家庭出身不太好但成绩优异的学生，还有一些出身好但成绩较差的学生。要是两样都好的，往往就去清华和北大了。

不知谭力夫是不是属于后者，“文革”初期他在一次发言中称北工大是“黑窝”，可能是感到前者的压力？他在发言中口气大，竭力模仿大人物的腔调，时常引述首长的只言片语，例如“正如少奇同志所说的……”，似乎让他显得更有水平。他的发言被记录下来，油印成材料，广为散发，影响很大。也许是因为名字起得不错，甚至有材料说谭力夫是某中央首长，这是首长的重要讲话。

他之所以成了替罪羊，差错可能就出在那些引文上——“少奇同志”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司令”。他被“中央文革”点名并关押，看来是顺理成章的。

“对联”和《出身论》的出现让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走了一段“偏锋”，但也成就了我们班办出了“文革”中两份少见的报纸。一份当然是牟志京办的《中学文革报》，因刊登遇罗克的《出身

论》而名噪一时。

我曾在街头看过张贴的油印《出身论》，当时印象挺深，觉得文笔很不错，但并没认为有什么太过张狂的东西。因为那时还有更激进的，譬如有人提出要通过“文革”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据说也来源于马克思对“革命”含义的解释。

我一直认为，这些文章不过是针对社会弊端，寻求在体制内解决的某种诉求，并没有脱离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和革命导师的教导，也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影响，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文章存在。但二十几岁的遇罗克竟因此而被枪决，真是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不得不承认，我们几个人办的《只把春来报》是在牟志京办的《中学文革报》激励下催生出来的，但也有偶然因素。

一天，我们从外面回到自己战斗队的小屋，沈大伟的哥哥的同学董永林来找我们。他说他和南口农场的几个哥们儿成立了一个造反战斗队，他们也可算作“知青”，故将总部设在了农垦部大楼。但他们缺少“笔杆子”，想和我们联合协作。我们正筹划办一张报纸，只是没有经费，而他们好像有些办法。

不久那几个哥们儿还真搞到一张支票。是他们到农场总部造反弄来的，据说还差点揍了那管支票的女会计，把她吓得够戗。但没过两天，这几个人就被勒令回去上班，却不甘心交回支票，便很大方地送给了我们，“你们自己办报用吧。”他们说。过了将

近一年，那位女会计费尽周折终于找到我们，我们将花掉的钱如数归还给她，她如释重负。

有了钱，我们又通过朋友“老罗锅”找来一张“‘三司’中学中专部”的介绍信，“三司”是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是当时最有实力的造反组织，我估计实际上并没有附设“中学中专部”这机构，而是“老罗锅”他们自攒的。但有盖章的介绍信这就足够了。

那天早上，我和沈大智各蹬一辆三轮车，与“敌敌畏第五纵队”的那帮战友一起来到六部口的纸张批发店。我们算好了，这次买的纸还真不少，必须用三轮车才能运回去。那年头大字报大标语太多了，据说捡烂纸的孩子们都发了财。排在我们前面的两个人想用现金买些大字报纸和油印材料，但很快就被打发走了。终于轮到我们，把支票和介绍信递过去。

那人看了一会儿说：“这支票已经不能用了吧?”“当然能用!”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其实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支票，对其中规定一无所知。“你们是想印报纸——想买多少令啊?”他问。“一令”大约五百大张，这是我不久前才知道的。

“四十令。”我说。

“先给二十令吧。”他开始动手开票。

我原以为跟买一般东西一样，交了钱就可以拿货，谁想到还得凭票到库房去提货，而库房在广安门外，还有十好几里路呢。

提货装车后，我的三轮车蹬得飞快，张育海骑着自行车护驾，不时挥手驱赶四周的人。我其实刚学会蹬三轮，头一天还差点撞到马路牙子上。

从广安门外到西四缸瓦市，我两腿酸胀，二十令纸终于运到沈大伟家，他的卧室就是我们的“临时纸库”。

我们的报纸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的，我们找的第一家是离“临时纸库”最近的“解放军报社”，就在平安里，好像也叫一二〇一厂。可我们被拒绝了，却并没太大的挫折感。负责接待的军官拿出了一份计划单给我们看，那是一些表格，上面按不同的军区兵种密密麻麻罗列出数字。他说这可是绝密的，那是他们必须要印刷的“毛选”数量。怕我们不懂，他继续解释说，“毛选”是每个战士人手一册，通过印数就能看出各地兵员的数量，这表格是按军分区和兵种罗列的，军队的整个部署，通过它就一目了然了。我认真翻看起来，粗略算了算，要印的“毛选”可真不少，的确没时间再干其他的活了；况且，为了辞掉我们这样的小买卖，人家能如此耐心细致，生怕我们不懂，甚至向我们泄露国家机密，着实叫人感动。所以我们二话没说，扭头儿就离开了。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取得成功，要归功于那个热心的门卫。进门时，他特地告诉我们，一定要直接去找某某某（具体名字我忘了），他是目前的掌权人，有事必须要他同意。根据他的

指点，我们一路上打听某某某，很快就找到这位新掌权人办公的地方。见到我们，他有些吃惊："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何大明很机灵："您名气大呀。"那人脸上立刻笑开了花。

我们"报社"除了"敌敌畏"的那几个战友，还增加了吴景瑞和何大明等人。那是个最民主的机构：没有领导没有群众，没有组织也没有分工，有事各自主动设法解决；谁想发表文章，写出来就是了，不用征求其他人意见，别人也不会有意见，某个人的观点，大家早就沟通过了。当然对于某些大文章，几个有共同兴趣的会一起策划，然后分头去完成。

为了使内容更充实、版面更丰富，我们有时也用一些外稿。李宝臣曾找过当时有名气的漫画家方成、丁午为我们画过一些漫画。那两人很重视这事，一再询问报纸何时出版，何时能让他们见到。他们的处境恐怕也和大多数文化人一样"危"，自己的"革命"作品能刊出来，即便在我们这样的小报上，对他们本人可能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报纸终于印出来了，第一期大约两万份。大家都很有成就感，虽然费了不少周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发行"，当然也难不住我们，自己上街去卖。

第一天我们在西单路口卖得很不错，天黑时分，三轮车上的报纸基本卖光了。书包里装的钱真不少，可惜都是一分两分的硬币。所有的学校都早已停课，小孩子们整天没什么事可干，很乐

于帮我们卖报。我小弟弟和表弟，还有邻居家的小孩儿都成了报童。我们的三轮车停在路口，他们取走一摞跑到周围叫卖，卖完后再回车上来取。

有一次，在王府井大街卖报，卖完后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李宝臣将那些孩子们叫到一起，跟我说："卖了不少钱，请大家吃完饭再回去吧。"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们来到"东风市场"某饭庄，围了满满一桌，叫了不少菜，美餐一顿。晚上回到家，我大伯伯问我："今天还摆了一桌?"可能是我表弟大成告诉他的。

《只把春来报》不定期出版，一期基本卖光了，下一期就又出来了。本来那些纸只够印两三期，何大明又搞来一批，一共印了五六期。这份报纸恐怕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但确能反映出那一历史时期中学生们的某些思想状况，也反映了我们这拨儿人在那个时代团结实干的成果，如今回想起来仍颇有成就感。创刊后，北京图书馆曾致函，要求我们每期赠送几份供他们收藏。我想它至今还在现在更名为国家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

# 亲历者的见证

刘　东

刘东，原名刘玉岭，北京四中六六届高三（五）班学生。一九六八年分配到中学工作。一九七六年调到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工业局。一九七八年调到国务院信访室（即后来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国家信访局）工作，现已退休。

一九六三年九月，我被保送上了北京四中高中，到一九六八年六月参加工作离开，其中两年的时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三十多年时光过去了，很多往事逐渐淡忘，唯有“文革”那段经历始终刻骨铭心。

## 一　废除高考制度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被毛泽东称为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公开发表，成为“文革”爆发的标志之一，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女一中高三（一）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部分同学，共同提出“废除现行高考制度”的倡议，也成为对“文革”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件事。

我当时是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

倡议书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见报。那时校领导已靠边儿站，工作组还未到，学校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一拨拨人群敲锣打鼓涌进四中校园，校长室前成了临时接待站。人们高喊“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坚决支持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砸烂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和“向革命小将学习、致敬”等口号，把红色贺信交给负责接待的同学。加上围观的师生、看热闹的校外群众和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小院挤得满满的。

次日，在四中操场举行了全校师生大会。我代表高三（五）班学生在大会上发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音，并在当晚新闻中播放了庆祝会实况。又过了一天，全国唯一的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把女一中高三（一）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代表请到电视台。我们班推选王倩倩去了，讲稿是我们班同学连夜加班加点赶写出来的。但播出时我们才发现，原稿中大部分内容被删掉了，问起王倩倩，他无可奈何地说，电视台的编导对讲稿提出种种要求和限制，必须按上面的要求统一口径。后来全国各大

报刊纷纷约稿，各有各的要求，我们几个撰稿人很伤脑筋，只能根据规定的口径编写，即使如此，最后发表的文字往往面目全非。《解放军报》为了赶时间，把我们班几个主要倡议者和执笔者请到报社，让我们边议边写，折腾了大半天，总算交了卷。《解放军报》刊登时署名为“北京四中一群学生”，内容与原稿也有很大改动。

倡议书事件与正兴起的群众运动互相呼应，足足闹腾了一个多星期，才算平息下来。

这一轰动全国的事件，发生在女一中和男四中并不偶然。作为两所北京著名的重点中学，共同的特点就是干部子女多，包括不少高干子女，往往了解一些最高领导层的动向。他们是在获悉中央有废除现行高考制度的意图后，才动手起草倡议书的。

四中的一些高干子弟，对现行的高考制度早有质疑，本来就有了废除高考制度的想法，但由于各种因素迟迟未动手，后听说女一中有人倡议，并通过内部渠道发出，为了不错失时机，他们匆忙准备了附议书。据当事人透露，他们对照女一中的倡议书，试图在气势上压过一头。

废除高考制度的提出，要从历史背景中寻找答案。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中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仅给十七年的教育制度定了性，并明确了今后教育工作的方向。而现行的高考制度自然首当其冲，废除只是早晚的事。

## 二 血腥的前奏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四中、六中和八中师生对北京市委前教育部部长张文松的批斗大会。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在“文革”初期是少见的。特别赶在“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的第二天，其势凶猛，不可阻挡。

为什么四中、六中、八中及北京团市委要共同发起这样的批斗大会呢？这与“文革”前的“四清”运动有关。

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四中、六中和八中先后在北京市委领导下，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进驻北京四中的工作组由市教育局、团市委的工作人员组成，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为主要负责人。经过半年多调查，工作组对四中做出“学校的领导班子是比较好的班子，四中没有四不清的问题”的结论。六中和八中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文革”爆发后，由于这三校的“四清”运动是北京市委领导的，张文松既是市委领导成员之一，又与首先被打倒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有亲缘关系（彭真夫人的胞弟），于是他和其他工作组成员就成了首当其冲的“罪魁祸首”。

大会是三校及团市委、市教育局等单位共同筹备的。四中的代表是张小钢和我，八中的代表是陈小鲁（陈毅之子），六中“文革委员会”负责人董良翮（董必武之子）也派了代表。筹备会决定，每校派一名代表发言；张文松是批斗主角，凡与三校“四清”有关的当权派和各校“牛鬼蛇神”，跟着“陪绑”。

八月十九日晚，批斗大会如期举行。“中央文革”中学组派了代表，还有新团市委两位主要负责人王庆汉、于崇浩出席，并在主席台就座。整个大厅挤得满满当当的，除了三校师生和相关单位职工，还有二十六中、一〇一中、师大女附中和师大二附中等校代表助威。

大会开始前，由三校红卫兵把坐在囚车里的张文松，以及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原团市委负责人汪家镠、市教育局副局长韩作黎、西城区委教育部负责人侯维成、杨荣梅、原八中校长孙国梁、四中校长杨滨、六中校长朱吟宜等人押到会场，立刻有人把事先准备好的写有“黑帮分子×××”的大牌子挂在每人身上。大厅内口号声惊天动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坚决打倒黑帮头子张文松！”

他们一个个被押上舞台，每人背后站着两名威风凛凛的红卫兵，架着他们做“喷气式”，不久，所有的被批斗者一个个大汗淋漓。从观众席忽然传出整齐的呼喊：“跪下！跪下！”押解的红卫兵，向“黑帮”的腿关节处猛踹，顿时“扑通、扑通”，响声

震得舞台直颤，台上呼啦啦跪下一大片。那场面真是惊心动魄。

大会由四中的张小钢主持，各校代表先后发言。我代表四中发言，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四中是“走资派”当道，“牛鬼蛇神”横行，“四清”的结论是错误的，并引证康生的批示：“四、六、八中问题的根子在北京团市委、在北京市委！”结论是北京市委在四中搞“四清”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同样搞过“四清”的顺义县李遂公社的代表也上台发言。

批斗大会在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变得有些失控。每个发言都具有煽动性，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群情激愤，不断有红卫兵冲上舞台，抡起军用皮带，向“黑帮”们劈头盖脸抽去，台上无人敢制止，台下齐声叫好。打人的先例一开，场面就再难以控制。由于大会组织者和主持者听之任之，甚至鼓励怂恿，致使暴力行为逐步升级。有的红卫兵用照相机拍下“黑帮”的痛苦的姿态，甚至示意台上的红卫兵用脚踩在他们身上，手握红卫兵战旗，摆出胜利者的姿态。他们纷纷摄影留念，把这叫做“把一切牛鬼蛇神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教育局局长李晨的脑袋被打得鲜血直流，红卫兵把他带到后台，用凉水冲洗一下，又押回前台跪下。杨滨事后告诉我，她心脏不好，虽事先服了药，但还是被这场面吓坏了，加上年纪大，到后半时已明显感到体力不支。押解她的红卫兵看不过去，悄悄把挂在她胸前的大牌子摘下，放在她跟前作为身体的支撑，以减

轻她的痛苦。老校长说到这个情节时，泪光闪闪，充满了感激之情。而我听得浑身发冷，对我们的作所作为也不禁产生了动摇，但却没有勇气面对，反而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大会开得是成功的，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的威风。”

那次大会开创了北京市武斗的恶劣先例。

三十多年后，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与李晨相遇，他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他没能认出我，而我却又想起了那次批斗大会，目送他和老伴下车，最后消失在人流中。

## 三 “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是十年“文革”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它泛指被批判挨整的所有“坏人”。有“牛鬼蛇神”，就有看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于是几乎所有单位相继建立了“劳改队”。北京四中当然也不例外。“校文革委员会”指派一名委员和我专管“劳改队”，我实际上成了“劳改队长”，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劳改队”解散为止。

“牛鬼蛇神”一词来自杜牧的《李贺诗序》，形容李贺的诗奇特浪漫。不知从何时起，竟成了比喻形形色色坏人的专用名词。“文革”就是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拉开序幕的，那黑色的大号铅字，显得狰狞恐怖，逐渐成为大小批斗会

必用的口号。

四中校园西南角有一小食堂，前面是饭厅，后面是厨房，阴暗潮湿，窄小憋闷，“文革”前就废弃不用了。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到九月底，这里成了关押“牛鬼蛇神”的“劳改关押室”。

自“文革”爆发，学校“当权派”和一些教职员工被隔离审查，关押尚处于分散状态，比如，杨滨被关在教研室小院靠东头一间小屋里。“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们，政策观念还是有的，为了保护老校长的人身安全，专门指派女教师，两人一班儿，日夜看守，以免出现意外。但到了八月四日情况突变，让人猝不及防，于是在非常时期，被动地做出对“牛鬼蛇神”集中关押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红卫兵从校园杀向社会，北京城就像个火药桶，到处都是导火索，一点儿小火星都有可能引发灾难。八月四日是星期日。四中几个学生在王府井附近，碰见高一的某“反动学生”戴着红袖标，冒充红卫兵，于是把他押回学校，自动召开批斗大会批斗他。在教研室小院，群情激愤，气氛异常紧张。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的同班同学、新上任的“文革会”主任孔丹（后“西城纠察队”负责人之一）走上讲台，首先领着大家学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然后明确指出，批斗学生不是运动的大方向，“文革会”不同意开这样的批斗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已不可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了。一些学生把杨

滨拉出来，给她挂上事先准备好的大牌子，戴上纸糊的高帽儿，拉到四中操场游斗示众。这一举动引起连锁反应，几名校领导也被揪出来，除了挂牌子戴高帽儿，还把锣鼓硬塞到手上，强迫他们自己敲打。被拉进游斗行列的人越来越多，包括部分教师和所谓有问题的学生，总数达二十三人之多。我们“文革会”的成员及工作人员，不得不走向前去，分别搀扶并保护游斗对象，尽量避免进一步的伤害事件。在游斗行列两边，挤满看热闹的低年级同学，他们欢呼跳跃。一名学生叫喊：“活该！你们也有今天哪！”拳脚雨点般砸向被游斗的人身上，连我们也难以幸免。杨滨花白的头发散乱了，鞋子也掉了，脸上血水、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滴落在操场的地上。

这一暴力事件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才在师生们胜利的“欢笑声”中收场。但这还不算完，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让那被游斗者对着麦克风当众谈感想。他们一个个异口同声，都说“打得好”。亲眼目睹这样的情景，我感到全身冰冷，好像置身于噩梦中。可在事后，我竟对被游斗者说了这样的话（根据我的日记记载）：“你们应该把群众的打骂当成清醒自己头脑的镇定剂，低头认罪，彻底投降，别走绝路，重新做人！”

这是四中“文革”史上血腥的开端。

游斗虽结束了，但大家感到人身安全已无保障，因为暴力事件会随时再次爆发。“文革会”也意识到，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

"牛鬼蛇神"们集中起来，既可供随时批判，又有利于安全。从八月四日起，"牛鬼蛇神"们被关进小食堂，过着监狱般的生活。四中"劳改队"——"文革"的怪胎，就这样应运而生。

## 四 "劳改队"

说是"劳改队"，其实开始时并无劳动，而是集中在一起学习、写检查、互相揭发，随时接受群众的批判。"文革会"的主导思想很明确，就是要保护这些"牛鬼蛇神"的人身安全，既不能打死人也不能自杀。这是出于政策上的考虑的解决方案。从"劳改队"成立第一天起，就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民愤不大、问题较轻的（主要是教师）解放出来，让他们回去继续参加运动；二是启用低年级的红卫兵轮流在"劳改队"门口站岗放哨，不许外人接近。

我鬼使神差竟成了"劳改队长"。做这样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心里是极不情愿的，却也深知责任重大。任何一个"牛鬼蛇神"出现伤亡，我都无法交代。从接手那天起我就如履薄冰，每天睡在学校，日夜守护，不敢有丝毫懈怠。

随着每时每刻的"亲密"接触，人性中同情弱者的本能逐渐发生作用，我开始在职责范围内尽量保护他们。以杨滨为例，她是其中年龄最大也是身体最差的，我担心她这样下去会撑不到运动后期，我私下多次跟她谈话，劝她千万别干自杀这种傻事。她

虽信誓旦旦，我还是不放心，于是采取了个笨办法：每天等天黑下来，人已稀少，我把她从“劳改队”接出来，护送到公共汽车站，看她上了车再返回。第二天早上，按约定时间，再到车站把她接回学校。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有一天早上，我因事缠身，忘了去车站接人，她竟在汽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不敢动，直到用公用电话找到我。我赶紧跑去，见她满脸是汗，神色惶恐。我问她为什么会急成这样，她说怕迟到了对她采用“革命”措施。

我个人的保护作用毕竟有限，根本无力阻止那日益狂暴的革命小将们的造反行动。随着红卫兵杀向社会，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牛鬼蛇神”被抓进来。由于不明底细，我真不知该如何对待是好。除了皮带与棍棒的酷刑，外加剃阴阳头、戴高帽、挂沉重的大铁牌，无所不用其极。更可怕的是，一个人完整进去，皮开肉绽出来。据我亲眼目睹，死在四中小食堂的就有好几个人。施暴者既有四中的也有外校的学生。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以打人取乐。连四中的“劳改队员”也跟着挨了不少冤枉拳脚。

小食堂越来越阴森可怕，不知是谁在墙上用人血写下“红色恐怖万岁!”更让人不寒而栗。每天晚间传出阵阵惨叫，就连我们这些“革”别人“命”的人，也难以承受。我向“文革会”提出，内外有别，最好把本校的“牛鬼蛇神”挪个地方另行看押。我的建议得到批准，四中“劳改队”转移到校办工厂的仓库。进而根据“劳改队员”的建议，让“牛鬼蛇神”半天学习，

半天在工厂劳动，他们总算得到了暂时的喘息。

由我负责看押的“牛鬼蛇神”，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学校原来的“当权派”，二是有“历史问题”的教职工，三是有“现行问题”的学生。最多时达二十多人，解散前只剩下五六个人。我采取的办法是隔一阵就“解放”一两个，反正红卫兵的注意力已转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流氓等。对我来说，“解放”一个就减少一份负担和责任。我一个接一个把他们找来，名为审问，实为利用聊天给他们一点可怜的喘息时间。我最为担心老校长杨滨受不了劳累之苦，就频繁找来谈话，多给她休息的机会。

这些教导过我、培养过我的领导和老师，逐渐把我当成他们的保护神。“大串联”开始了，全校师生几乎走了三分之二，他们再三央求我，千万别扔下他们不管。可没辙，为躲避造反派的批判，我后来还是离开他们去外地“串联”。而接替我的红卫兵，换了一套更不近人情的管理模式，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在我“执劳”期间，即使采取尽可能的保护措施，但大势所趋，那些“牛鬼蛇神”仍吃了不少苦头。比如，男性一律剃光头。需要说明的是，光头不是红卫兵剃的，而是自知在劫难逃，他们自己主动去理发馆剃的。再有，红卫兵事先写好标有各种坏人名称的牌子，让他们自己选择，“对号入座”。他们手中仅剩的财物，成为红卫兵巧取豪夺的对象，有的“借”手表，有的

“借”自行车，而“借”了就有去无回。“西城纠察队”刚成立时，他们常被派去给红卫兵打扫卫生，收拾屋子。

“牛鬼蛇神”在“劳改队”的日常生活是，每天戴着牌子挥汗如雨，在校办工厂干重体力劳动。出工前下工后，列队低头弯腰向毛主席请罪，朗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语录，高声唱“牛鬼蛇神嚎歌”。

## 五　“嚎歌”

说起“嚎歌”，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革命小将的创造，成为“牛鬼蛇神”们每天必唱的歌儿。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

北京四中“八四”事件后不久，有一天我刚踏进小食堂，就听见一阵类似号叫的歌声。只见“牛鬼蛇神”们正襟危坐，面对挂在墙上的一纸曲谱，由一位音乐教师教唱，教一句学一句。那位老师手持小木棍，不时地提醒大家，必须带着认罪的感情去唱，咬字要清晰，不许走调。在座的“牛鬼蛇神”中，有的表情麻木，有的神色恍惚，但有的居然摇头晃脑，打着拍子，自我陶醉一般。周围站满幸灾乐祸看热闹的人。我内心深感悲哀，但身在其位，无法阻止，也不能阻止。

学得最快的是刘铁岭副校长。他平时就爱唱歌，“文革”前，他常在全校大会上为大家高歌一曲。谁也没想到，刘校长的爱好

在“劳改队”派上用场：老师没教几遍，他就会唱了，于是自告奋勇为大家做示范，他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歌声既嘹亮又有节奏感。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似乎在证实自我赎罪的真诚与信心。而学唱“嚎歌”最不合格的是杨滨，她天生五音不全，唱来唱去总跑调儿，与其说唱歌，倒有点像在念经。

从这一天起，“嚎歌”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任何一个红卫兵，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拦住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令其唱“嚎歌”取乐。没有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对此提出异议，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时至今日，有时我闭上眼，就会浮现学唱“嚎歌”那一幕，还有那像哭一样的歌声。

## 六　工资与“四旧”

“劳改队”迁至校办工厂仓库不久，有人张贴大字报，提出减扣“牛鬼蛇神”的工资的倡议，理由是“绝不允许他们再喝人民的血”。这一倡议得到一片喝彩声。“文革会”命令校财务科，不能再按原工资数额发放。至于每人实发多少，让我们“劳改队”决定。说实在的，我对此很不以为然：连问题还没搞清楚，减扣工资的依据是什么？即使一个人有罪，总不能不给他家人一口饭吃吧？

我们也明白，在当时的情势下，一点儿不减也过不去，既然“文革会”授权给我们，那就来个明减暗不减。我们找来当事人

询问协商，根据不同的经济状况，提出一个减扣工资数额的名单。原则是："民愤"大而家庭条件好的多减；"民愤"小而家庭条件差的少减，甚至不减。我们心知肚明：革命倡议不能硬顶，但没有人认真核查具体操作程序扣减数额。

我们对财务科做出了明确交代：扣除的工资要保管好，不能挪用，待运动后期再按有关正式文件处理。这一举动得到"牛鬼蛇神"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后来，那些钱如数退还给各自的主人。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红卫兵"破四旧"的风潮很快波及他们。"牛鬼蛇神"所在的街道，以及其家属所在的单位，纷纷发出通告，勒令他们限期把家里的"四旧"交出，有的单位已开始抄家，转眼间他们变得几乎一无所有。还没被抄家的则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何时会大祸临头。他们采取了与其焦急等待，不如主动请求抄家的办法。"牛鬼蛇神"排着队找我们谈话，一是请我们赶快派人去抄家，把一切属于"四旧"的东西拿走；二是举报自己家中尚存的金银珠宝，落一个主动交代的名声。

我们真不知如何是好。尽管我们作为红卫兵，也高喊"破四旧，立四新"，但究竟什么算"四旧"，根本没有权威的说法与可行的标准。事实上，很多人家被不同单位的红卫兵多次抄过。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四中红卫兵出面，就可免遭更大的灾祸。我

们决定采取折中的办法：第一，对“牛鬼蛇神”讲明当前的形势，让他们向有关单位主动交出明显属于“四旧”的东西，例如金银财宝、古玩字画，以及含有黄色内容的图书、报刊和照片等，交出时要索要收条。第二，凡强烈要求四中出面去抄家的，让红卫兵派人简单查抄一下，走走形式，然后贴出通告，表明此处已被抄过。这当然是一相情愿，执行起来效果并不理想，多数人并没有逃脱被洗劫的命运。

有两件与“破四旧”相关的人与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涉及的两位都是校领导。其中一位出身资本家，解放初期曾带领学生与资本家父母做斗争。虽经历多次政治运动，但老父还是留下了丰厚的家底。这位校领导回家反复给老父亲做工作，让他丢掉幻想，主动交出来。老父经不住压力，终于含泪把隐藏的几个金元宝从马桶里取出来。这位校领导拿回学校，交到我手中。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见金元宝。但我既不敢替他保存，也不敢交给四中的红卫兵总部，那很有可能永远消失了。当年红卫兵抄得金银珠宝无数，随便堆放在某间小屋，往往连简单的登记手续都没有，将来必是一笔糊涂账。我想来想去，又把金元宝退还给他，让他自己保存，如有外人问起，可说明此事已向单位如实报告了。

另一位也是副校长，他是个做学问的人，喜欢舞文弄墨，家藏大量线装古籍。估计他会为此遭殃，我提前跟他打了招呼，让

他抓紧时间处理。可藏书量太大，总不能付之一炬吧，估计他也舍不得。那几天，老先生像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找个懂行的知音，白送给人家。我也爱书，前几天图书馆烧“四旧”书籍时，我还趁人不备偷偷留下一本。后听说全市的图书馆都在收集古籍，让我开了窍：国家的图书馆总不至于烧书吧，只要能保存下来就好办了。在我的建议下，他把所有的藏书全部捐给图书馆，除《毛泽东选集》外，家里什么书都没有了。我为他高兴，也为那些书高兴。

## 七　农村不是世外桃源

一九六六年九月，造反的声浪进一步高涨，教师的处境更难自保。除了“劳改队”，我们还奉命管理全校教职员工。大家合计，最好找个地方暂时避一避。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外地红卫兵。周总理在讲话中指出：“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基于此，我们决定组织大家到郊区农村去劳动，避开风口浪尖。

从九月十八日到二十九日，全校教职员工外加“劳改队”，一起前往北京顺义县板桥公社西匠营大队，在那里劳动了十一天。“牛鬼蛇神”们终于享受到近于普通人的生活：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一起唱革命歌曲，一

起学《毛主席语录》。在他们脸上，流露出正常人的笑容。只有一件事例外，那是进村第二天晚上，大队召开“地富反坏分子”训话会，四中的“劳改队”也列席了。那是在村办小学的教室，没有电，只有一盏马灯，村里的“地富反坏分子”坐后排，我们的“牛鬼蛇神”们列队站前面，讲台上坐着大队治保主任，警告台下的人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广大贫下中农就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马灯中微弱的火苗跳动。我从前面往后望去，在灯光映衬下，“地富反坏分子”真有点像地狱里的小鬼，阴森可怕。

农村不是世外桃源，“文革”的洪流已波及到此，但毕竟不同于城市。那些饱受摧残的“牛鬼蛇神”，在这里得到农民友好的接待，更主要的是人格的尊重。老校长杨滨告诉我，尽管房东老大娘早已知道她的“身份”，但还是照样热情地表示欢迎，笑着对她说：“快炕上坐，到这里就算到家了！”就这一句话，让老校长热泪盈眶。她对我说：“我们的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带领我们劳动的村干部，在总结“劳改队”的劳动表现时，竟说出了这样的话：“这些‘牛鬼蛇神’同志们干起活来真是十个头儿的（大概是干劲十足的意思）！”

农民自然流露的善良天性对我触动很大。尽管他们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却始终与人为善，即使明知面对的是“坏人”，却不

忘那也是“人”，让我们这些所谓有文化的城里人感到羞愧。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我们正在狂热追求的“革命”，包括自己所做的一切，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惑。

农村生活结束了，我们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返回学校，离北京城越近，歌声就越低。当四中在望，劳动大军突然寂静下来，他们知道，新的灾难正在校园等着他们。

回校不久，“文革”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我们这些老红卫兵、“文革会”的成员，转眼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成了革命的对象。我们想不通，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我于十月十三日主动辞职，到外地“大串联”，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劳改队长”的生涯。

# 风雨飘摇忆当年

冯永光

**冯永光，北京四中六七届初二（三）班学生。一九六八年九月赴内蒙古农村插队，一九六九年五月转到河北原籍插队。一九七三年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深县医院（现河北深州市医院）工作。一九八八年回到北京，二〇一一年五月退休。现在某体检中心工作。**

我家住皇城根儿，马路不太宽，我们大院在路东，路西偏北是皇城根小学，再往北走，就是北京四中后门。我们住的楼与四中仅一墙之隔，暑假我常翻过墙头去逮蛐蛐儿。在皇城根小学度过的六年中，父母多少次对着窗外的四中校园，鼓励我好好学习考上四中，我也多少次望着那校园里的大哥哥们，听着教室传来的朗朗读书声，做着少年时代的美梦：四中、清华、研究生、科学家。

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一天，我收到录取通知书，信封上盖着“北京市第四中学招生委员会”的大红印章。那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啊！

一九六六年四月，也就是初二第二学期，《北京日报》开始批判“三家村”，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以为是文化方面的事儿，没太在意。

六月一日，全校师生在教室听广播，刘铁岭校长声情并茂地朗读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横”从二声读成四声（后来才知道，这是陈伯达授意撰写并亲自拟定的火药味十足的标题）。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电视、广播、报纸一律改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升级了。从此，北京四中和全国一样，卷入到这场运动中来。

那时我上初二，才十五岁，混混沌沌，反正不上课不考试了，挺好。班里成立了核心小组，都根红苗正。组长张小济是我们班军体委员。初一初二这两年，他几乎每天都是踩着秒针进教室。早上第一堂课先是预备铃，两分钟后才是上课铃，有好几次，预备铃响后老师进来了，他还未到，大家屏住呼吸，幸灾乐祸盯着门口，可他总是在上课铃响时跨进教室，让全班大失所望。

核心小组还有李忠民，很朴实憨厚的工人子弟。核心小组好

像还有谭柏和张路，谭柏文笔不错。初一刚入校，我们班主任齐大群老师在课堂上宣读谭柏的作文，其中好几十个成语，令全班刮目相看；张路“文革”前就是我们班足球大门，如今是资深足坛评论家。

接下来几个月，我们班基本上由核心小组领导。七月底或八月初，四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与此同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开始流行，有人加了横批：“基本如此、鬼见愁”。我们这些“红五类”的红卫兵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尤其是横批，让我们进退自如、理直气壮。

八月五日上午，学校大喇叭广播：“全体红卫兵战士到大操场紧急集合！”操场讲台上，一个学生在哭诉：舞蹈学校的“黑五类”狗崽子们气焰嚣张，“红五类”受到迫害……向外打电话甚至被扭断大拇指！

我们群情激愤赶到舞蹈学校，许多学校的红卫兵在那里云集，身穿绿军装打着各自的校旗或红卫兵旗。在操场讲台上，正在进行关于对联的辩论。我们跟着四中的指挥高唱那首由对联改编的战歌，唱完一遍，最后连着喊三遍：“滚他妈的蛋！”从小学到中学，我们受的教育是讲礼貌，不打人不骂人，偶然说话带个脏字，都会不好意思，而今天我和大家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声叫骂，是何等痛快！在八月的骄阳下，台上辩论，台下也辩论，分不清什么观点，听不清谁在说什么，场面热烈而

混乱。

回家已半夜，父亲还没睡，在等我。我母亲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干部。八月三日，红卫兵冲击中国音乐学院。因属于同一系统，她知道五号这天红卫兵又去冲击舞蹈学校。当晚父亲简单问了几句，让我早点休息。

第二天，父母跟我谈了整整一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主要是分析批评“对联”的片面性。我从争辩到口服心不服，最后终于知道错了：血统论好像真的偏激了，真的脱离群众了。

晚饭后，我到学校想找红卫兵负责人孔丹谈谈，他是学生会主席，也是学生中唯一的党员。大约半年前，二月十一日，四中在对面北医礼堂召开“三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有四个同学发言，孔丹讲的是突出政治，我讲的是锻炼身体，高毅存讲的是学习体会，还有一个记不清了。孔丹是我们信赖和崇拜的领袖人物，我想跟他交流关于对联的看法，可转遍全校也没找到。

各校的红卫兵开始抄家、“破四旧”，并勒令“地富反坏右”滚回原籍。但这类革命行动是轮不到非红卫兵的同学的。八月七日以后，再有“抄家”任务，我就有意识地叫上几个出身一般的同学，他们求之不得。

我参加过几次抄家，记不清了，但有一次印象深刻。一天上午，我在红卫兵总部值班待命，来了个居委会老太太，她请红卫兵去抄家，我到班里叫上几个同学跟着去了。那是个资本家老太

太的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什么反动罪证或金银珠宝，我们逼她交出来，还动手打了她。走时一推开屋门，院里站满被号哭声引来的邻居。我环视一圈，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震颤：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向我们投来冷漠、厌恶甚至仇恨的目光，让人不寒而栗！于是我带着人马匆匆撤了。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毛主席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然而对我们的革命行动，人民群众不仅不支持，还用敌意的目光表示无声的抗议。我感到迷惘：难道我们做错了？

此后我很少去“抄家”，更没有再动手打过人。

根据街道居委会的举报，四中红卫兵抓来一些“地富反坏右”和小偷流氓，关在校园临时设置的“牛棚”里，旁边小屋门口挂着“刑讯室”的牌子。白天要一个一个“提审”。因年纪小，我从未进去过，那都是高中红卫兵的任务。从“牛棚”到厕所百十步远，很多同学手持皮带、柳树枝、扫帚条，在这必经之路两侧等候，抽打羞辱上厕所的“犯人”。他们几乎全都光着上身，后背伤痕累累，结成血痂。为了少挨几下，他们抱着头一溜儿小跑。

白天高中的同学辛苦了，晚间的看守让初中的同学分担。出于好奇，我向核心组长张小济提出值一次夜班的申请，得到红卫

兵总部的同意。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这天晚上我值夜班，又骄傲又激动。

“牛棚”内靠墙的地方铺着麦秸或稻草，“犯人”在上面躺卧。我们几个红卫兵来回巡视，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一个母亲来领她的孩子，释放前的最后仪式是剃“阴阳头”，即剃一半留一半。一个同学拿来推子，推子不快，总是夹头发，他故意推两下一拽，那孩子哭哭啼啼。母亲在旁边训斥，让他出去后改邪归正，不许再和那帮小流氓瞎混了。临走母亲还让她儿子给理发的同学磕了个头。

夜深了，我发现“牛棚”深处还有个小门，一推就推开了，门外是小夹道。我警觉起来，会不会有人藏在这儿？小夹道没灯，很黑，我探出身子，借屋里射出的光亮仔细巡查，门口不远处有黑糊糊的一团，我试着用脚碰碰，原来是个人！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壮胆大喊一声：“谁！起来！”听到喊声，别的同学立即跑了过来。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拖到屋里。是个老头儿（大约五十来岁），光着上身，闭着眼，看起来病得不轻。两个同学抡皮带抽他，他一动不动。突然从旁边爬过来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抱住一个同学的腿央求：“别打了，别打了。”看到皮带没停下，那孩子起身扑到了老头儿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皮带。我一惊，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两个同学也住了手，我们把老头儿拖到那孩子的铺位上。

天亮时交了班。这是我唯一一次执行的“看守”任务。

还有一间小屋，关着两个“破鞋”。有一次我从窗口向里张望，两个女人坐卧在稻草上，旁边有一大摊呕吐物，其中有条蛔虫蠕动。我差点儿吐出来，撒腿跑了。

一天，我和同班同学王力平在校园溜达，有人从一间屋子的窗户里呼唤：“同学！同学！”我们凑近一看，是位女老师，没有教过我们，姓什么现在也忘了。她头发蓬乱，面容憔悴，拿着一个捆着的纸包，说：“求你们帮我办件事，我爱人被遣返回老家，今天到厂桥派出所迁户口，求你们把这包蛋糕交给他。这是他的名字。”她把纸包和字条递出来。我和王力平面面相觑：这可是专政对象，帮她的忙是否有阶级立场问题。我又看了那老师一眼，发现她和我妈妈年龄相仿，她眼中充满期待和乞求。我心软了，接过纸包和字条。

厂桥派出所离四中不远。进了派出所院子，四周坐满等着迁户口的人，南屋门口摆着桌子，两个民警正忙着登记。我们喊了一圈，没人应声。我们只好跟那两个负责登记的民警说，我们是四中红卫兵，要找个人。民警抬头，看了看我们的红卫兵袖章，翻着花名册，最终也没找到。

那年头儿物资短缺，几乎什么都凭票凭证供应，每人每月二两点心票。那包浸出油渍的蛋糕，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但我和王力平谁也没有提出来吃掉。不过我不能保证，那天

如果只有我自己，还能不能完好无损地把这包蛋糕带回去。

回到小屋窗前，我们告诉女老师，没找到她丈夫，把蛋糕递进去，老师连声说："谢谢同学们。"我顿生惆怅，这老师身陷囹圄，还要把这仅有的蛋糕留给爱人，或许此后他们将天各一方，甚至永别。而这小小的愿望却未实现，她还谢我们，实在令人惭愧！这事我一直记在心上，不知这位老师姓什么，是否还健在。

一九六六年十月，在外地"串联"，我看到满街的大标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可是个新口号，当时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十一月回到北京才明白原意：刘少奇、邓小平在运动初期派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

"毛主席号召——我响应，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是当时流行的口号。在四中，大大小小的战斗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我们也成立了战斗组。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四）昨晚和狗头（注：楚世来外号）一块找李晓宇去了，通知他今天上午到校商量成立战斗队的问题。他都睡了，才七点多。他又起来一块找的许儒敬、李惟铭、王道士。我真矛盾，到底该不该成立组织？成立的话，把那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和黑七类出身的吸收进来，他们这些红五类肯不肯加入？会不会打击我？会不会诬我们为黑组织？等等……许多问号连连出现，经过激烈的

思想斗争，下定决心，成立！不怕阻力、打击，必须团结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干革命！决不可以自己的出身轻视他们，而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今上午到校，我、老狗、李晓宇找遍全校无空屋。后康校长开个会，让各个战斗组登记，统一分配房屋。……中午爸告我，上午酥鱼（注：沈毅外号）来了。下午找他去了，他同意加入这个新组织。聊了半天，差一刻五点才走。……新的战斗即将开始，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我将被卷入这革命的洪流，千锤百炼，兴奋啊！激动啊！马克思说过：人如果逃避生活，逃避斗争，就像一条藏在乳酪里的蛆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五）今上午在家起草了我们战斗队的成立宣言，晚上沈毅来，宣言写好，他同意。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到校，狗头看过宣言，可。找晓宇，他也看，基本可以，再添几段语录。我们分配初一（一）教室。领了一卷大字报纸。起名为“起风雷战斗队”，……此战斗队人员齐全，短小精悍，共五人。我，主笔。李晓宇，参谋。沈毅，刻蜡版。楚狗，画画儿、抄大字报。赵胖子，可揭西纠。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引自我的日记）

几天后，我们把战斗组改名为“井冈山革命军红卫兵”。由

于“对联”等一系列问题，正牌“北京四中红卫兵”处于半瘫痪状态。而“红卫兵”这名字还是响当当的，众多造反派组织自封为红卫兵，刻公章、印袖章——“红卫兵”不再是某些人的专利了。

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还算是比较坚持原则的。后来我们这个战斗队发展到二十多人，其中也仅有很少几个红卫兵。每发展一个新的红卫兵，不仅要经过核心班子讨论，还要经过全体战斗队成员投票表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二）这些天好紧张。昨天晚和沈毅上西单看滚子。最贱的三块二。今下午去看，三块二的没了，三块七毛五。上午出了份批“总部”的“我们的态度”的大字报。楚狗说西单有卖纱框的，今下午去看，没有现成的，人家说可以说好尺寸，定做。还要做木框，等，麻烦死了。一个纱框约一块八，再定做木框，约六块钱。添茄子（注：于明外号），六个人。一人一块差不多，也许不够，和沈毅说好一人一块五。足够，多了退，少了补。多了也可买点必备品，订书器、年月日的章、本等。妈的，学校他妈什么都不管，连个毛笔都不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星期四）昨晚正准备睡，毕林、汽水来了，说中央文革等四个单位给上海去了贺电，要

今晚赶写标语贴出。我们又找了老狗、三郎、王驰。毕林新制“油印机”还不错，简而易，效果还可以。半夜，印油没了，找“向东辉”借，他们说一张蜡纸两小勺。去他妈的，趁人之危，想捞一把。自力更生！把从鲁迅战斗队抄来的半碗豆腐脑般“墨汁”倒在蜡纸上，居然印得相当清楚。这是油墨和墨汁的混合物。干到今晨三时许，他们回家，我与三郎睡一起，火炉旁。（引自我的日记）

由于成立了太多的战斗组，油印机和文具变得紧俏，尤其大字报纸更是供不应求。总务处发给各战斗组领物证，每周限定二十张大字报纸，于是鼓励自行采购，回校报销，可我们没门路。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在战斗组抄写大字报直到半夜，坐在椅子上和衣睡了。（在此之前，总务处调整了各战斗组的房间，腾出了所有班级的教室，我们被分配到音美教室。）早上起来，我去总务处领大字报纸。校园静悄悄的。值班的老师不知干什么去了，总务处门开着，台子上堆放着一大卷纸。我犹豫了一下，抱起来就走，七拐八拐跑回战斗组。大家乐坏了，但知道老师会追查，得赶紧藏起来。老式平房有吊顶，年久失修，房角的部分垂下来，我们登高把纸塞到吊顶上。不一会儿，总务处老师果然来了，因为那么早，开着门的战斗组没几个，我们装出很无辜的样子矢口否认，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没发现任何迹象，只好到别的

战斗组继续追查。后来一数，有两百多张，够用一阵子了！

后来军训，在全班同学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斗私批修”时，于明当着对立面同学揭发出这事，令我狼狈不堪。我口头检讨，心里臭骂“烂茄子”。这是后话。

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几千个“清华井冈山”的大学生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游行，第一次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此前广播、报纸和大字报只提到“中国的赫鲁晓夫”，从来没有指名道姓。这消息很快就传开来，我们既兴奋又震惊，接着“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满街都是，“刘少奇”三个字还用红笔打×，更有人独出心裁，把“奇”字左旋九十度，像个“狗”字。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四中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红色造反联盟”，包括“红鹰”、“共产主义红卫兵”和“鲁迅战斗队”等，我们“井冈山革命军”后来也被吸纳进去。

一月五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到上海，与王洪文等人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权，紧接着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支持上海夺权。受到“一月革命风暴”的鼓励，我们“红色造反联盟”与“井冈山兵团”等四个造反派组织于一月十八日上午十一点，查封了四中原革委会和“红卫兵总部”，夺了他们的权。不久“红色造

反联盟”内部产生分裂。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星期四）今上午造反联盟说开会，改选，结果什么也没改。下午老狗找我来，说“红鹰”造了联盟的反，开除孟大智，于是，我到校了。“鲁迅”、“共产主义红卫兵”与“红鹰”辩，无聊。真不知应否报“联盟”，嗨。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星期五）今上午联盟大吵一顿，孟大智、王光增、老绿、周××、刘玉纯一派，红鹰、张过江一派，互相揭短，不可开交。下午“鲁迅战斗队”来了，想否认“造反委员会”，撑起旧联盟，问我们同意否，我说需考虑，狗说他个人同意，至于“革命军”如何，明日讨论。这是对他们的答复。晚上我、狗、狼（注：李朗外号）、三郎（注：李晓宇外号）在校讨论以后如何，决定现在对新旧联盟不加入、不退出。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他们见二门北墙大镜上的传单上有“打倒江青”四字。中午贴出大字报揭发，下午公安局来人，询问情况。(引自我的日记)

在这前后，不时看到街上贴出大标语：“谁反对江青同志就砸烂谁的狗头！”“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江青是毛主席夫

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谁有这么大胆儿？后听说“联动”分子骑车在西单高呼“打倒江青！”“刘少奇万岁！”还写下这样的对联：“想当初小将可爱造反有理；看如今血统高贵什么东西！”横批“想不通”（“血统高贵什么东西”是江青批评老红卫兵的原话）。后来还发生了“联动六冲公安部”的事件。我在街上看到署名“联委会”（“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为“联委会”，后来才改称为“联动”）的诗：“山下青松山上花，花笑青松不如它。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我们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大会”。“门头沟区某小学老师代表发言……”听到这里，热泪盈眶，不知什么时候，脸上一条小虫在爬——啊，泪水不由自主无声无息地流下来……胡克实、胡启立和房山县某校长黄福太被揪在场内。群众让他们下跪，黄某下跪，二胡不跪，十几个解放军上前，扳、按、扭、踢腿、抄拐子，他们爬起再站，妈的，好大胆！我气得肺都炸了！跑到主席台旁，准备下去武斗，见道口有服务员把着，没下去。最后，解放军反剪二手，二胡才跪下。妈的，挺硬！（引自我的日记）

一天下午，我们战斗组十几个人在初一（一）教室闲得无

聊。陈小平搬了一把椅子到门口，把带泥巴的破笤帚放在微启的门上端。我们兴致勃勃地"守株待兔"，可等了好一阵也没人进来。有人提议说"把马凯叫来!"大家齐声应和："对！把马凯叫来!"

马凯虽是老师，但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文革"前负责团的工作。"文革"开始后，他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对联一出现，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的学生（北工大"巴黎公社"负责人）谭力夫成为狂热吹捧者，"谭力夫讲话"在全国广泛流行。马凯起初也支持"对联"，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马力夫"。他说话不紧不慢，能言善辩，旁征博引，和大多数红卫兵相比，显得十分儒雅。即使观点不一致，我们还是挺服他的人格魅力。

密谋好了，派了个同学去找马凯，就说我们战斗队要批判他，和他辩论。精于此道的陈小平重新设置了"天雷"：破笤帚换成饭盆，里面装上凉水，关键在于饭盆安放的位置。这大冬天的，该多"败火"呀!

等待是很难熬的。不知过了多久，终于从楼道传来脚步声，由远而近，大家屏住呼吸。门推开了，谁想到探头进来的是毕林这个倒霉鬼，说时迟那时快，饭盆连同凉水正砸在笑眯眯的毕林头上。毕林那年患斑秃，先是后脑勺一小块，没少抹生姜，可挡不住蔓延的趋势。不管冷热，他总是戴着油渍斑斑的旧劳动布帽子。我们常恶作剧摘掉他的帽子，几个人传来传去；或骑车突然

加速，从背后抄走他的帽子……毕林脾气好，从来没跟我们发过火。

饭盆带凉水砸下来那一刻，毕林吓得一缩脖，慌乱中把帽子撸掉了，露出头上秃斑，令众人狂笑不止。随后陈小平重新设置“天雷”，继续等待马凯。他运气好，平时总在学校，那天下午神差鬼使，躲过这一劫。

一天晚上，楚世来、沈毅、李晓宇、李朗和我等人打算把标语贴到西单。正要骑车出发，发现糨糊桶成了问题，那时还没有自行车筐，这二十来斤的糨糊桶怎么办？大家正发愁，李晓宇从屋里拿出墩布把儿，提议两人骑车抬桶。我俩在院里试了试，一个左手提桶，一个右手提桶，配合好了没问题。就这样，我们七八个出发了。西四路口中央有个警察在指挥交通，老远就发现我们在大街“演杂技”，吃惊地盯着我们，骑过他身边，他欲言又止——想制止我们吧，但又说不出违反的是交通规则哪一条。我们若无其事，径直从他眼皮底下骑过去，我相信，这警察肯定很久对我们这帮孩子行“注目礼”。

沈毅、毕林、李朗几个同学买了永久十三型锰钢车，令我们羡慕不已。他们几个没事就拆车擦洗上油重装，乐此不疲。我那辆车是五十年代初父亲单位分配的，早就没漆皮了，呈铁锈色，两条磨平纹路的外带，依稀可见“请用国货”的字样。我从不擦车，风里来雨里去。我们闲着没事时去外校串联，呼啸成群，释

放过剩的精力和能量。李晓宇艺高人胆大，前后带两个人，双手撒把拐弯，外号“拼命三郎”。那几辆锰钢车开路，一路转铃，几辆破车紧追慢赶，招摇过市。

一天我们骑车到天安门附近的二十八中看大字报，走过来一个家伙，挑衅地说：“你们别太狂了！”为“联动”说话？仗着人多，我们一拥而上，把他两臂扭到后面，送往公安部，他挣扎着叫喊：“我不是‘联动’！我不是‘联动’！”

从二十八中往东，过了天安门，路南就是公安部。我们几个推推搡搡，把他带到公安部大门口，对警卫战士说：“我们抓了个‘联动分子’。”不一会儿，从里面出来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一见“俘虏”愣住了，对我们说：“这是于桑副部长的儿子，交给我吧。”我们只好悻悻走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四中所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基本以班级为单位，我们“井冈山革命军”成为“新四中公社”初二（三）支队。“新四中公社”占全校师生的一大半，构成绝对优势，除了“逍遥派”，“老红卫兵”的各零散组织也联合成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兵团”，在我们班的支队是“八月风暴”。

一九六七年春节后，报纸社论一再强调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大联合。我们战斗组也在酝酿与班上的“老红卫兵”联合。这就不可避免地牵扯到运动初期，由

"老红卫兵"领导的班核心小组宣扬"对联"等一系列问题。在我们战斗组内部，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做出深刻检讨，才谈得上联合；另一种意见认为可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只要认识了过去的错误就行了。班主任齐大群老师出面调解，他认为原核心小组并非执行反动路线。

二月二十三日晚，齐老师和楚世来到战斗组找我，取得共识，即核心小组认识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可以联合。齐老师走后，我和楚世来又谈到很晚，决定第二天战斗组开会讨论，统一思想。

>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上午带了《红旗》四期社论，讨论了一下核心组是否算做执行了反动路线，是做检查还是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争论十分激烈，最后基本统一，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昨晚决定（与狗）今天开这个会时，还怕群众扭不过弯来，这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其实群众是通情达理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引自我的日记)

三月三日，核心小组在班里贴出揭发工作组、革委会和"红总部"的小字报，我们随即表示支持。随后几天里，大家坐在一起，总结了自去年六月以来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控诉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虽然各自多少带有对立情绪，但总体上是在达成和解。

>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三）晚，马凯、齐大群、排长、我研究了班上情况。如果明天核心组的控诉（受蒙蔽）态度诚恳的话，在原则上无分歧，以后可联合。
>
>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一）下午陈小平对我说，他和兰小敏（注：原老红卫兵）谈了谈，兰小敏已在写检查，他以前误以为我们揪住核心小组不放。他说李忠民等亦开始准备深刻检查。我听了真感动。我对许多同志太不了解啦！（引自我的日记）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主席作了如下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北京卫戍区派出一万五千多名解放军，对北京市三百二十九所中学和九所大学的三十一万师生进行军训。

三月一日，解放军进驻北京四中，开始军训。三月十五日，"红卫兵总部"在校园贴出告示，宣布北京四中红卫兵从即日起解散。全校按军队建制，以年级为连，班级为排，排长由解放军担任，从学生中选个副排长。经投票，我当选为副排长。

军训前，战斗组多如牛毛，大的几十人，小的三五人；军训

后，各派组织都回到班上参加军训。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条件日趋成熟。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代表。江青批评了北京卫戍区解散中学造反派组织的做法，她说卫戍区："很多做法不妥当，我们有责任，我们没有叫谁支持'联动'，我希望卫戍区同志听听小将的意见，和小将不要搞崩了，要恢复壮大'左派'，以'左派'为核心，以'联动'为核心怎么行呀?"谢富治说："要把'联动'搞垮，必要时把军训停下来，为支持'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这样干不行，怎么叫支持'左派'?'联动'这么嚣张。"康生在讲话中对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的李钟奇副司令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四月四日，"中央文革"的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又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主要还是说解放军应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反对军训反对解放军的倾向。王力在讲话中说："关于班级大联合问题，是毛主席的号召，这个号召是最高指示，是正确的，要执行，问题出在执行这一指示，有执行好的，也有执行不好的，要看主流，全局好的，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也确有一些不太好的，主要是根据学校里'左派'处在什么地位，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大联合。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一定要采取适当方法，不要公开提。关于军训要总结经验，即使军队的同志支持错

了也要给他们提供情况，让他们改，改了就行了。‘揪出李钟奇’这个口号不好，要改掉，要爱护卫戍区，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他们搞臭。”这次讲话又给中学支持军训团的同学以很大的鼓舞，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搞军训没错，解放军没错。

由于对“中央文革”这两次讲话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在北京中学形成了“四三”、“四四”两派。

解放军进驻四中后，主要支持并依赖“新四中公社”，“新四中公社”也配合解放军，通过其强大的组织系统，统领大多数师生积极参加军训。虽然“新四中公社”在批“对联”、打“联动”等方面与（外校的）“四三”派立场一致，但总部负责人许健康、高毅存、王祖锷等却毫不激进，表现出超乎他们年龄的成熟和稳健，把握着“新四中公社”的大方向，与解放军相处和谐。四中的军训，没有受到外校的干扰。

我们初二（三）的排长叫吕德，是个朴实的解放军战士，来自山东农村。那年他才二十岁，皮肤黑红，个子不高，壮得像牛犊子。我们上午军训，读报学社论，或走步操练，下午就没事儿了。吕德常到我们战斗组来玩儿。混得很熟。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全市各校上街游行，关于打倒刘、邓的，近一点才回校，下午没事了。下午和排长睡一床上，睡了一大觉。近五点，他们开会，我才

醒。连长说，有个江西省赣州××中学初二（2）班四十三号雷野梅同学给初二（2）四十三号来信，让他谈谈联合的问题。四十三号是刘源源，他们同学要替他回信，说他过去是第二号人物的儿子，现在是倒数第一号人物的儿子……

（引自我的日记）

江西的雷野梅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的信竟寄给了刘少奇的儿子——这可是七亿分之一的概率呀！

有一天，我们七八个同学和吕德在战斗组聊天，仗着人多，我们想治治他。先形成包围圈，有人堵住门，一使眼色，大家猛扑过去，把他按住，再把双手双腿捆在椅子上，他动弹不得。毕林解开他上衣口袋，从里面掏出毛主席语录，又从他另一上衣口袋掏出个小钱包，除了几块钱，找出一个叠得四四方方的信纸。有人问："这是什么？"吕德回答说："部队番号。"连自己的部队番号都记不住？不可能！大家争着先睹为快，毕林跳到床上，展开信纸扫了几眼，怪声怪调念起来："亲爱的引池，"他停下来，满脸得意地坏笑——原来是封情书，大家更加兴奋，纷纷催促他。那年头儿，谈情说爱纯属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应该批判的。给我们军训的解放军战士居然也写情书搞对象。吕德动弹不得，只好听天由命。沈毅问他："说，这个引池是谁？"吕德尴尬地苦笑，没搭腔。"你说不说？你不老实交代，我们印成传单贴大街

上去，你信不信?”知道这帮浑小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低着头涨红脸，轻声说：“未婚妻。”再闹下去没什么意思，我们见好就收，最后让他保证不许打击报复，吕德点点头。我们知道，一旦解开绳子，放虎归山，凭他的力气，我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松了绑，他整整军装，红着脸独自走了。

后来吕德在我们战斗组里，有的同学时不时来一句“亲爱的引池”，他假装生气，脸一沉，眼一瞪，谁也不敢再吭声了。

军训结束，解放军都撤走了。有一回我们到天安门开大会，吕德的部队也去了，他通过“北京四中”的旗子找到我们班，见了面可亲热了。可惜未留下他的通讯地址，从此失去联系。

在“新四中公社”的主调之外，也有一些“铁杆四三派”的不和谐音符。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星期六）吉振英等贴出大字报：“论中学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四三派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何等的好啊！他们准备印。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星期一）下午在“东风”，几个战斗组代表开会，卫东彪、我们、东风、吉振英、新三四等，准备拉个“新四中公社红旗兵团”，杆团，四三组织，实干的。我们打算拉个“井冈山革命军红旗支队”，加入其兵团。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星期二）晚在“东风”开会，落实“红旗”组织。上午战斗组讨论，参加与否一起，不许搞“分裂”。我打算以个人名义参加。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星期三）下午，“红旗”集合于“东风”，通过了宣言、声明，讨论了一些基本观点。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五）晚，汤池找几个人开会，负责干部问题，我算一个。听说总部要开除马征、吉振英。晚与陈国恩交谈，他在班上无威信，而杨帆、刘明稍右，若退红旗的话，他们全退，他将个人参加。我同情他。（引自我的日记）

在新四中公社总部的“压制”及大联合的形势下，我们这个“铁杆四三派”的“红旗兵团”没有生存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印象中也没有搞什么活动，就逐渐自生自灭了。

一九六七年五六月，“新四中公社”成立合唱团，与三十九中“延安公社”的女生一起，排练了《红卫兵组歌》。我和战斗组的沈毅、刘进进、王喆、王者曦、毕林、李朗等都参加了合唱团。七月一日，我们在北京展览馆首演，获得成功。七月九日晚，电台播送了演出实况录音。后来许多院校及厂矿的造反派组织邀请我们去演出。

我们刚得知“四三讲话”时欢呼雀跃，紧跟着“四四讲话”

犹如泼了一头冷水。“四三讲话”正对我口味——到各校“串联”、集会、游行、刷标语、贴大字报，多么无拘无束，那是我从未体验过的自由与快乐。可要我与对立面同学坐在一起开会、学习、讨论、讲什么团结与联合，从感情上真绕不过这个弯儿。

我们战斗组二十多人，除了我，其他同学，甚至核心成员，如于明、王驰、李晓宇、楚世来等都在逐渐转变态度，与对立面的关系越来越缓和。我却认为他们的原则性、革命性不强，和稀泥，搞调和……我自诩为铁杆“四三”派。在解放军引导和主持下，我们班酝酿选出新的核心小组。按人数比例，“八月风暴”选两名，“井冈山革命军”选三名，分开各选各的。

>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星期三）上午和他们一起，全班讨论联合问题，气氛极淡，无人发言。后分开推领导核心(3:2)，推的我、于明和楚世来。我当场反对，不当，众人强行通过。活该，无论如何，就是不当！
>
> 七月六日（星期四）上午和王驰聊了聊，我为何不当核心呢？一、我也曾是老兵，后造反，他们骂我叛徒，我又是革命军领导，所以他们非常恨我，我自然也与他们矛盾较大。我不愿和他们一起工作，谈不来。二、我有许多问题觉得仍应辨明是非，解决矛盾。若成为核心，带头“打内战”，被动。若当一百姓，运用四大，是百分之二百的革命行动。

要革命，要造反，将路线斗争进行到底！三、我许多观点较左，不代表群众意见，不宜上去。四、王驰考虑问题全面，讲策略，又不失大原则，希望他上。而只有我下来，让出空位，才可能让他上。(引自我的日记)

我早想好了，坚决不进核心组。这个名单我一直没上报，排长问了几次，我都推说还未敲定。七月十七日，我们战斗组再次选举。选举前，我警告大家，不许选我，我坚决不当，建议选王驰。但选票收上来，还是有我。我怒气冲冲撕了选票，说："重选！什么时候不选我为止！"大家面面相觑。再收上选票，哈哈，我只得两三票，总算解脱了。当天的日记，我用"如释千钧重担"形容那种喜悦和轻松。

七月二十一日，全班同学开会，宣读了"联合宣言"，我们班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新的核心小组成员是于明、楚世来、王驰和李忠民、卢平。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假装倒戈，混入"八月风暴"，探听他们的内部消息。我先做铺垫——当着我们战斗组的同学，大骂"四三"派，甚至再度宣扬"对联"，让他们大吃一惊。我还和他们辩论，希望把动静闹得越大越好。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星期五）今天上午到商校调查

"五一六"红卫兵团之事，了解了一些。下午，粮校、电校、建校等来四中武斗，手持长矛、木棒，头戴安全帽，把老兵合唱团打了个不亦乐乎，车全砸坏，打伤几十人，老兵措手不及，赤手空拳，干挨打。我到校后，装同情的样子和王小飞、王兆翰、李忠民、辛新谈了些。打算以后在班上装"四四"，打入其内部，搜集情报。

八月十七日（星期四）昨天，我在校混了俩钟头。和沈毅谈话时，大骂十一日武斗事件是狗崽子阶级报复，学着"四四"加"联动"的口气。沈毅可生气了，和我辩了半天，我狡辩耍赖……晚上，听到校园里有人练歌，心里不禁百感交加、隐隐作痛。合唱队已有一星期没去，我心里多想为造反派演出啊！可是，工作要求我打入"四四"派，有什么办法呢？我精神十分不舒畅，本来是杆"四三"，却偏要装杆"四四"，大骂"四三"。嘴里骂着，心里疼着。几天来，那边还没打进，这边已骂声不绝。多好的同志啊！你们不了解我，我现在有口难辩，但，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我——冯永光，始终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造反派一边。(引自我的日记)

为了实现"潜伏"计划，我绞尽脑汁，精心策划，并付诸行动。

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今上午将以前的一些传单、小报交于明，他不明其意。我说我将加入"革造"，和他谈了半天，他虽觉突然，但并未怀疑我去当奸细。……上午遇刘延安（注：大概是"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之一，记不太清了），问参加他们是否要，他说当然要，让我找李忠民联系一下。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昨上午，和李忠民谈关于申请加入"革造"一事，他当时表示班上已经联合，不要这样做，并说回去商量一下。又和排长谈了。烦死了……今上午，齐老师和楚世来又找我谈话，我没谈什么。心里乱得要命。楚说李忠民说了，这样做不好，起码"八月风暴"不要我。（引自我的日记）

不知是对我这个"老兵"的"变节者"积怨太深，还是人家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把戏，我的阴谋未能得逞，只好作罢。如果说，当初对于那副对联我醒悟得早了几天，但在后来实现大联合的问题上，我是觉悟得最晚的，我自己的派性也是最强的。

"老红卫兵"中的许多人，并不甘心于脱离这场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他们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在迷茫中不断思索，在挫折中站立起来！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底或二月初，在灯市口女中成立了"北京市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只吸收第一批红

卫兵，即“老红卫兵”，但条件是必须造过“血统论”和“对联”的反。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星期五）上午老红卫兵开会，来了好多外校的。在大阶梯开的，水泄不通。主要讨论老红卫兵大方向是否正确，如何深入群众。外校的可多了，门口都挤满了。没什么结果。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上午，听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新生”，请假，去了，可成立大会不开了。又上的一〇一中，这儿的红卫兵“新生”大会正开着，没什么劲，回来了。谭柏、apple（注：我们班“老兵”安晓光）他们也去了。（五月九日上午，北大附中红旗也召开了“新生”大会。后来，又有一些学校的老红卫兵“新生”。）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原“老兵”办学习班，我去了，在大阶梯教室，可班上的其他“老兵”一个也没去。军训二师王师长讲了话，又分了班、排，刘辉宣、王向荣、秦晓、郑丹星、钟加鸣等“小联动”居然当了各排长。张小刚、刘辉宣、袁赛路在王师长眼里成了红人。下午开会，孔丹哥儿俩、马凯、冯小宏、周华南以及原革委会和“红总部”一些要员都出席了。谈到学习班计划时，刘辉宣说批判从去年一月以来的极左思潮、出身论、四三宣言、揪

军内一小撮、反军训等，说一月以来的这些极左思潮一直是代表着反动路线在与革命路线斗争，而其他（如“联动”思潮）都是次要的。王向荣说应以斗私批修为纲，很好地对以前做总结，接受教训，检查思想，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六点结束。明下午两点活动。(引自我的日记)

一九六八年夏，“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首先轮到六六届初中和高中同学，他们一批批奔赴东北兵团和内蒙古兵团。

九月五日，李朗与外校的表哥一起去内蒙古插队，这是我们班走的第一个同学。临行头一天，我们战斗组十几个人去他家看望，他父亲拿出五块钱，让他带我们出去吃点什么。五块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一个工人每月才挣四十多块钱。在街上一家小店，李朗请每人吃了份冰激凌。出发的那天下午，我们战斗组全体成员去北京站为他送行。随后我骑车从北京站往西，忽然发现他父亲在前面骑车，在刺眼的夕阳下，只见他抬手在脸上抹了一下，想必是在擦去泪水。我的心不禁颤抖了一下，我没有打扰他，悄悄放慢了速度……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在学校看到两位老师（王军与石磊老师?）正给高中同学作动员报告，他们刚从内蒙古考察回来。出于好奇，我也进去听了听。那是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属农区，但牛羊肉也很多，正如歌中所唱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

马儿跑”。农民收入高，壮劳力一天可以挣四个工（一个工一块多）。冬季长，一年只干半年多农活，农闲可回北京……东北兵团已不再安置“知青”，内蒙古也是最后一批了，如果错过这机会，以后就是山西、陕西，离北京更远，也更苦……

听完报告，我当即下了决心，虽说初二还没插队的消息，但早晚得走，再说过了这村没这店。我问了几个同学，都说再等等看，只有王驰答应和我同行。经过三天紧张的准备，九月二十六日，我俩和高中同学冯同庆、张卓力、刘北城、王树武、陈岱林、刘昂昂等八人，登上开往内蒙古的“知青”专列。

铃声响起，车上车下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列车缓缓启动，把亲人、同学的泪水和晃动的手臂抛在后面。再见了，四中！再见了，亲友同学们！再见了，我的北京！

四十多年过去了。写此文时，我与李忠民在电话中长谈，回忆那难忘的岁月，当我问起为什么拒绝我加入“八月风暴”的请求，他哈哈一笑，说他早就不记得有这回事了。

# 为争取平等而斗争

王祖锷

**王祖锷，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一年考入北京四中初中，一九六四年考入北京四中高中。一九六八年九月到北京矿务局系统工作，历任采掘工人，《北京矿工报》记者、编辑、主编，木城涧煤矿党委书记，矿务局工贸公司工委书记等职。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调至北京朝阳区，历任区劳动保障局局长，区国土房管局党委书记等职。二〇〇八年一月退休。**

我一九六一年考上北京四中初中，一九六四年又考上四中高中，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离开学校，去京西煤矿当工人。在四中的七年，充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而“红色恐怖”一度把“阶级斗争”推向空前暴烈的程度。回顾那噩梦般的经历，聊以慰藉的是，在“阶级斗争”最狂热的时期，作为群众组织“新四

中公社”的创始者之一，我与那些血统不那么“高贵”的学友们一起，曾奋力追求平等。

## 阶级路线与“血统论”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既然要搞阶级斗争，无疑先要确立阶级斗争的对象。但是毛泽东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初，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明确告诉人们“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在“四清”运动前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按照惯性思维，人们认定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及子女们。

当时的政策是，在培养人使用人时，要贯彻“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阶级路线的三句话中，“有成分论”是前提，是有形的、实在的；后两句则是虚幻的、没谱儿的，实质是诱使“黑五类”分子的子女们老实就范。

“四清”运动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路线也贯彻得越来越严格。凡出身不好的人都会被直截了当地告知，不要幻想参军入伍；不要期望上名牌大学，报某某专业；不要企图留城工作；更别妄想进大机关和科研机构……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还是不满足，终于公开举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大旗，分明要把“有成分论”铁

定为“唯成分论”，把“黑五类”子女们称为“狗崽子”，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出身于军队技术干部的家庭，虽不在“狗崽子”之列，但我对这一套从内心很反感。

当时四中的学生，就家庭出身而言，知识分子居大多数，其次是党政军中高级干部，普通工人和农民则很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中，大多是直系或隔辈的“黑五类”后裔。而红色家庭出身（高干与革命军人）与黑色家庭出身（所谓“杀、关、管”）的学生营垒分明，旗鼓相当。

“文革”前，四中校领导和教师，对不同出身的学生尽量一视同仁，并未给高干子弟特别的优待。高干子弟们也普遍低调做人，不搞特殊化，连国家主席和元帅的儿子也骑自行车上下学，在学校食堂入伙。但随着“阶级斗争”升温，不少高干子弟再也耐不住寂寞了，开始质疑校方和老师的阶级立场问题。

一九六四年暑假过后，市委在四中、六中、八中搞中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试点。其间，某些高干子弟向中央和市委写告状信，指责工作组不让他们参加“大鸣大放”，指责校领导不认真贯彻和执行阶级路线等。据说，万里副市长接见了告状者，当面批评他们搞非组织活动，严厉训斥他们要规规矩矩服从市委的领导。但这一“公案”并未就此了断。

“文革”爆发后，几名高干子弟被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选为“校文化革命领导委员会”（简称“文革会”）的骨干成员，把“四

清”后新组建的校领导赶下台，游斗并监督劳动。不久，四中、六中、八中的高干子弟，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举办了一场批斗市、区教育局和校领导的群众大会，包括“狗崽子”在内的三校师生均被“勒令”到场接受教育。批斗大会的主办者愤怒地声讨“黑帮分子”，指责他们破坏“四清”运动，压制打击“红五类”。“黑帮分子”不仅做“喷气式”，还被强行下跪，饱受拳脚……

这让我感到震惊！据我观察，那些“黑五类”子弟个个吓得噤若寒蝉。何谓恐怖？只有身历其境才能知道。

有一天，在四中校门的影壁上贴出“对联”。独具特色的是，除了横批“基本如此”外，在最下方，还有“鬼见愁”三个大字。这副“对联”，特别是“鬼见愁”，让我既害怕又困惑，真不知道他们还会走多远。

让四中红卫兵名声大振的是“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首领都是四中“文革会”的核心成员。如果说所向披靡的红卫兵如无首的群龙，那么这群龙终于有了管理中枢。实事求是地讲，“西纠”成立之初发布的一系列“通令”，对红卫兵抄家、武斗、草菅人命的暴行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他们仅凭“血统高贵”，就能高高在上、霸气十足，让我等心灰意冷。

## 挑战压迫者与追求平等

红卫兵运动喧嚣一时，在“红八月”达到高潮，随着“大串

联”，各校师生纷纷出走，文化大革命开始冷清起来。而“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

起初，人们并不太明了真正意图，但由于首长讲话、报纸社论和多种形式的宣传，人们终于闻到春天的气息。特别是“黑五类”子女感到压力减轻，甚至有了某种解放感。我的同学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开始行动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我从外地“串联”回京，到学校才知道，我们高二（二）班里成立了“星火燎原”、“长征”两个战斗队，其他班级也纷纷成立了类似的战斗队，基本上是由家庭出身一般或不好的同学组建的，为了与“老红卫兵”抗衡。我为之感动，立即加入“星火燎原”战斗队。“文革”期间，成立群众组织（包括红卫兵），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只要贴出表明立场与观点的声明，或干脆写张大字报，署上自选的名号，就算“诞生”了，并有权到后勤部门领取笔墨纸张等文具。

那时，校园已很少见到“老红卫兵”的身影了，但“文革会”和“红卫兵总部”还在，“西纠”也还没有散伙（总部已搬到报子胡同的大宅院）。某些“血统高贵”的人，咒骂我们的战斗队是“狗崽子们要翻天”。“红卫兵总部”发表文告，要红卫兵也积极投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斗争中去。他们所谓的新形式，指的是群众组织把批判矛头指向了红卫兵与“西纠”，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四中校园出现了署名“解放全人

类”的大字报及同名刊物，顾名思义，所谓“解放全人类”，无非还是以高高在上的解放者自居……

面对这一切，看来单枪匹马不足以形成“大气候”，况且还有不少“黑五类”子女余悸未消，不敢站出来抗争。于是我们走向各班级及北京各中学，深入调查，散发油印材料，宣传我们的观点；联络志同道合者，统一行动，相互声援。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北京六中的战友，吁请我们一起向“西纠”开火。此前我和伙伴们去过六中，参观了“西纠”成员在该校设置的“劳改所”。围墙上拉了电网，装有探照灯；“劳改所”除了有监房，还有专用审讯室，备有皮鞭、皮带、棍棒等刑具。关押的主要是校领导、教师及“反动学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连两次亲自到此处查看，连称法西斯行为，并当场释放了奄奄一息的受害人。

当六中的战友发出召唤时，我们毫不犹豫响应了。一天夜里，几所学校的造反派同时出动，把炮轰“西纠”的大标语贴到繁华的街道。我和同伴还深入虎穴，把大标语贴到“西纠”总部门外两边的墙上。这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首次的挑战！第二天上午，几名“西纠”成员气势汹汹，来到我们“星火燎原”问罪，争吵后才悻悻离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这一中学生组织，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主持召开“北京市中学

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这是“文革”期间北京中学举办的最隆重的群众集会，有上万名各校师生参加。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吴德、江青及“中央文革”其他成员均出席，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先后讲话。我们虽不是主办者，但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筹备工作。大会四个批判发言中，有两个是我们的。一是我们班同学朱景文撰写由我宣读的《宣判反动对联死刑》；另一个是我校高二（三）班汤池撰写并宣读的《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纠察队》。这两篇批判文章具有很大的震撼力，撬动了压在“黑五类”子女心上的两块大石头，终于使他们有可能平等享受政治权利。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们班同学牟志京、王建复等办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刊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数万份被一抢而空。《出身论》对“血统论”的辛辣批判和对阶级路线问题的独到阐述，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它无疑是思想解放的一次交锋。

一九六六年冬天，天气虽寒冷，但校园里却如火如荼。更多的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大字报铺天盖地，油印小报不计其数，铅印报纸至少也有四五份。不久，“星火燎原”与其他几个战斗队联合成立了“东方红公社”。又过了两个月左右，大联合扩展至全校各年级，包括几个老师的战斗队。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一个千余人的群众组织——“新四中公社”成立了。“公社”乃取意于“巴黎公社”，兼有政治地位平等和民主治理双重含义。

可以说，“新四中公社”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四中校园的政治格局和氛围，“血统论”几乎没有市场，那些“高贵者”不再称王称霸，许多“黑五类”子弟挣脱精神枷锁，成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显示了独特的才华与智慧。

“新四中公社”成立时，“军训团”已进驻四中。由于“新四中公社”人多势众，并奉行“温和”的政治立场，“军训团”明确表态，承认并支持“新四中公社”。我们也与军训团建立了坦诚的合作关系——支持并组织师生参加“军训”；倡议回班级参加“斗批改”；动员“复课闹革命”；开展消除“派性”的学习活动，完成全校各派组织的“大联合”。那时，除了“新四中公社”外，四中还有“革命造反兵团”和未宣布解散的“红卫兵总部”等组织。

一九六七年九月，历尽暴风骤雨，“北京四中革命委员会”诞生了。顺理成章，原“新四中公社”的师生进入领导班子，成为核心成员中的大多数。

回首往事，在那血与火的年代，我们凭满腔热情，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

# 走进暴风雨

赵振开

赵振开，笔名北岛，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学生。一九六九年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工人，后做编辑及自由撰稿人。一九七八年底和朋友创办文学杂志《今天》，一直担任主编至今。自一九八七年起在欧美居住并任教。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和荣誉。目前在香港定居，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

## 一

一九六五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志愿四中，第二志愿十三中，第三志愿四十中，这基本是我们那一带成绩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统考时，我因未识破语文考卷中“极积”这一词序颠倒

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十三中。

记得那天是董老师监考。她在我书桌前驻足长叹，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细心检查。我扫了一遍考卷，没错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结果名落孙山，被父亲臭骂一顿，那年暑假我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初中三年，在教室门前那棵大槐树的摇晃中悄然逝去。从初三上半学期起，在父亲的压力下，我起早贪黑，深一脚浅一脚“积极”赶路。

临近统考，我变得越来越迷信，尤其对“四”这个数字。一天，我从学校沿大翔凤胡同回家，闭眼走四步睁开，再闭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荫街，猛一睁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满脸惊讶。一见我睁眼，她咯咯乐了：“我心说，这可怜的小瞎子咋没拄根棍儿呢?”

此情可问天，我这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那年夏天，我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父亲另眼相待，亲戚邻居赞许有加，再别上校徽，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宠儿。更让人高兴的是，楼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们俩还分在同一班。

## 二

北京四中创建于一九〇七年，起初叫顺天中学堂，一九一二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一九四九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学。

距离跟十三中差不多，从家步行二十分钟。

九月一日开学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开书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着一凡去学校。校门是灰砖和石块构筑的牌坊式建筑，带有清末民初的风格，由郭沫若题字的“北京四中”，刻在门楣石头上，涂上红漆。那灰色墙体和大小铁栅栏门有些阴森，曾出现在某部国产故事片中，冒充日本宪兵司令部。

开学第一天是老师与学生见面。我所在的高一（五）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衣纽扣出现在公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

开学后不久，扒拉小算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语文优势不再，但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数理化，梦魇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以数学为甚，一过整数我就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周围同学你超我赶，甚至有人提前读高三的微积分课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该混进这数字的天堂。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指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班主任田佣是数学老师，比我们大八九岁。他戴白框眼镜，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整天跟我们跑步打篮球，蹦蹦跳跳，像个

孩子王。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每月工资五十六元，单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学教书，这是命运的良好承诺。

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除了带头干活，还要照顾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绳，亲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个同学给他打下手。肥肉炼油，白薯切丁，过油后用酱油一烹，香飘四溢。开饭了，他再一勺勺分给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运动，重提阶级斗争。我母亲调贵阳一年，参加当地银行系统的“四清”。而我们下乡碰上的首要难题是，和农民打招呼，万一赶上地主富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认定他们一定鬼鬼祟祟。问村干部，发现这标准靠不住，索性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间休息，K同学用小刀顶住我腰眼儿，先是开玩笑，随后认真起来：我不肯求饶，他就暗中使劲儿，刀尖越扎越深。我们对视，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剧痛难忍，我一把推开他。他冷笑说，这是考验我的革命意志。此后我对他敬而远之。好勇斗狠正伴随着阶级意识而觉醒。

一九六六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

的可能性很大。

我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一凡是我的入团发展介绍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组织，这给我带来希望——毕竟是哥们儿嘛。我试探口风，他守口如瓶。

## 三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六月三日四中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老天有眼，当年把我领进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自五月下旬起，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每天早出晚归，去西郊大红门外的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与饥饿经验有关，难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讲时唾沫星乱溅。食品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费尽口舌，还是闹不懂为什么要罢课，为什么不做蛋糕。在辩论中，一个女学生反问我：“那你说说，蛋糕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的敌意坚不可摧，我

们只好撤退。

四中校党委瘫痪，由高三各班团支部联合接管。我在学校抄写大字报，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三天晚上，和同学一起去清华附中，声援被压制的红卫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软绵绵的，灯光耀眼，声浪忽近忽远。而革命就像狂欢节，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这口号很快就被改编成《红卫兵战歌》，由我们班长刘辉宣作词作曲，一举成名。这首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每次合唱都会不断重复“滚他妈的蛋”，如空谷回声。

在当时的辩论中，对方头一句话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或暴打。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运动之外。

在操场靠校墙一侧的树丛中，我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那辆车倒轮闸，锈迹斑斑，辐条稀少，车铃上拴着细麻绳，一拽

叮当响。观察几日，竟无人认领，我如获至宝，权当借用。

骑破车的好处是，即使没锁，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虽说与高干子弟的永久十三型锰钢车不可同日而语，但自我感觉良好，这毕竟是我拥有的头一个交通工具。由速度所产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我骑车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产生幻觉，自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后读《堂·吉诃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骑把他弄疯的。

一天，骑车沿德内大街从家回学校，快到厂桥十字路口，顺大陡坡滑行，一个跟头栽在警察岗楼前。顿时围满看热闹的人。我浑身是伤，更倒霉的是丢人现眼。那似乎是个严重警告，我急流勇退，把车悄悄放回原处。没过半天，那车就神秘地消失了。

## 四

六月四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六月十五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

六月某日，四中初二的学生刘源，把一封信放在当国家主席的父亲的案头。幕后策划者是高三（五）的几个高干子弟，他们从内部得知中央有意废除高考，决定抓住这一历史机会。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分别刊登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

八月四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

现，带回学校，在操场上打得半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八月二十五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C生性腼腆。他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象，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C被划为反动学生，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公布出来的呢？

八月十八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涌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踮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儿，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是那么几个绿点儿。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是我十七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

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

三十五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 五

当年全北京的中学只有四位特级教师，四中就占了两位，化学老师刘景昆和物理老师张子锷，那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年，张子锷老师辅导高三物理，据说高考六道题押中四道，学生提前交卷，高呼“张老万岁”。

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铁青。每次上课，他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画一道题。那对我来说如同鬼画符——眼晕，而同学们几乎个个胸有成竹，举手抢答。李老师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扫视一圈，习惯性摸一下铁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浓重的河北蠡县口音点名“赵—振—开—”，把“开”还读成第三声，更加勾人心魄。我一问三不知。这竟成了我永远的心病：多年后我帮女儿做作业，一听三角函数，第一反应是头晕恶心。

《学习》杂志一九五八年停刊，部分编辑改行当老师，于是黄庆发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四十出头，谢顶，一脸苦笑，好像在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让我们写批注。他摇头晃脑领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停顿一下，念批注"当乐"，然后继续朗读下去。照猫画虎，没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赏识——孺子可教，于是让我当众宣读。我美滋滋地摇头晃脑，待读到"心乐之"也停顿一下，接着读我的批注——"颇为不错"，竟把"颇"错读成 pi 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语教师凌石军肥头大耳，没架子，但骨子里透着股傲气。他每次上课只捏着一张小卡片，嘟噜嘟噜说个没完，好像那是一种语言戏法。他出过俄语语法专著，且日文好，据说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课本自学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学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报纸，手脚不动。我俄语没学好，倒是暗中偷学了这一手，但一不留神会灌上两口水。

英语老师项立斜穿校园，总会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国绅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带短裤，白色长袜，锃亮的皮鞋。他上课会把全套刀叉带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规矩。据说他当年在教会学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师请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这时他用错了一个词，女教师把蛋糕收回以示惩罚……

两位体育老师韩茂富和吴济民，都是国家级篮球裁判。韩茂富个儿不高，精明强干。吴济民人高马大，都管他叫大吴。据说苏联国家女篮来京与中国女篮比赛，由韩茂富在场上主吹，大吴坐镇裁判台，临近终场正打得难舍难分，这两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时间，被苏联队发现提出抗议，大吴被降级成一级裁判。

女校长杨滨，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参加革命后的重要见证人填的是叶群。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女一中校长，一九六五年调到四中。据说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四中校长两个职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副校长刘铁岭踌躇满志。“文革”中揭发他在日记中的志向：二十岁当校支部委员，三十岁当区委委员，四十岁当市委委员，五十岁当中央委员。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文革”开始时他四十出头，已当上了市委委员。

谁承想，这些老师校长，一夜之间斯文扫地。“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儿、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其中顶数副校长刘铁岭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军宣队主持的批斗会上，大吴跳出来指着校长杨滨

说："杨滨，你胆敢反对解放军。"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军!"愣然惊醒，意识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嗫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弯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噼啪滚下来。

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老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竟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 六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我搬到学校住。学生宿舍在学校东南角，与教研组小院毗邻，由两排相向的平房构成独立的小院。开间不等，上下铺，按数字排列，一律称为"斋"。我先住十三斋，后搬进六斋，一住两年多。学生宿舍本是为家远的同学提供的，趁"文革"之乱，没人管，大家纷纷搬进去。

由于顶棚相通且破败，隔墙有耳，易于小道儿消息的传播。每次生炉子起浓烟，邻居跟着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点熄灯，提前十分钟响预备铃。宿舍小院离厕所较远，由于是男校，毫无顾忌，住宿生纷纷冲出来，在下水池或树旁撒尿。宿舍小院永远飘散着浓烈的尿臊味儿。学生辅导员禹启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点来小

院儿检查，一时奏效，传为“大禹治尿”的佳话。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爱吹牛，好色，说话幽默，是个挺好玩儿的伙伴。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有天晚上，他说刚抓来个本地流氓，关在地下室，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窥视。

那天由Z主审，两个穿军装的老兵充当打手。那“流氓”光着上身，跪在地上。Z厉声问了一句，他含糊其辞，一个打手抡起粗铁链，哗啦抽在他肩上，顿时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铁链再次抡起，Z赶紧拦住……实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来了，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得意，问我观感，我把话题岔开。由于他属于那残酷的一幕，我和他渐渐疏远了。不久我从十三斋搬到六斋。

“文革”期间，学校宿舍的流动性很大。晚上的娱乐就是讲鬼故事。讲鬼故事要先关灯，同时需要特殊音响效果。比如口头音乐伴奏，并事先备好破脸盆，关键处扔出去，或索性推出护床板。一惊一乍，连讲鬼故事的都吓得半死。这几乎是每天睡觉前的保留节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们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给自己做饭。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来学校的同学纷纷到六斋取暖，但要投足硬币才给开门。他们跺脚诅咒，但冰天雪地，没辙，只好留下买路钱。我们还到处收集书报，卖给废品收购

站。眼见着玻璃瓶的硬币快满了，我们摩拳擦掌，先订菜单，再采购，大快朵颐，最后撑得走不动道儿。

## 七

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条件极差，冬天没暖气，天一冷就要安装煤球炉。家境贫寒的子弟多自备午饭，铝饭盒装在网袋中，课间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锅熥热。有的同学图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炉台上，课堂上飘荡各种混杂的香味。

再说食堂，每天伙食费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几百号人。每桌十人，自由组合，没椅子，直立就餐。大师傅用木杠抬着大木桶进来，引起一阵激动——那些年轻的胃。各桌派代表用两个脸盆排队。一个脸盆盛主食，一个盛菜。校长杨滨发现营养标准不够，提出把伙食费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个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学生没有响应，可见平均家境之贫寒。在“文革”中，这成了杨滨搞修正主义和挑动学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发育期，到处是带酸味的饥饿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两个窝头夸好饭，一行长队上青天。窗含师傅丰脸笑，门泊学生瘦骨寒。”

“文革”爆发后，停课串联，食堂秩序被打乱。而学校规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费，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诉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饭票，排他前面的一个同学，为退伙食费跟食堂管理员刘庆丰争了几句，遭到断然拒绝：“不行，开了证明再来。”弄得他面红耳赤，悻悻而去。而刘庆丰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来，跳河自杀了。

## 八

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我自制了个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小木箱刚好装进四卷“毛选”。随后我到积水潭医院去看望父亲。他写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右手腕。我没带水果或营养品，只带来一个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头柜上。

由于搞到一张介绍信，我们六个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学，决定一起去全国“串联”。到医院看望父亲的第二天，我背着装“毛选”的小木箱上路了。

十一月初回到北京，形势大变，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彻底动摇了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班成立的“红峰”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

于“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由此可见，在派系斗争的混乱背后，有着理性的政治与社会诉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两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一九六六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

## 九

“告诉你们，要是你们六斋丢了东西，就是我张育海干的。”我隔着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见他瘦高挑儿，背着破书包，双手叉腰，几颗青春痘随着嘶喊在脸上跳跃。我回应说一凡不在，他这才骂骂咧咧走开。自打他勾上一凡，六斋从此不得安宁，大家嫌他痞，劝一凡少跟他来往。

他所在的高二（二）与我们高一（五）两班关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属“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斋外，主要还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识，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种戏谑态度。按张育海的说法：“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

要说他可是正牌好学生。学校曾实行免修制度，通过免修考

试者可在自修室自学。期中数学考试，他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就交了卷还得了满分，除了数学还免修英文。“文革”期间，他主持数学改革研讨会，连特级教师张子锷都来了。他反客为主，在黑板上纵横勾连，眉飞色舞。若无社会巨变，他本来是块当教授的料。

除了功课好，打篮球、游泳、拉小提琴，几乎样样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绝——只见他嘴唇撮圆，用两腮每块肌肉控制气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问，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后来一听这曲子就会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国，因车祸多年前身亡。母亲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独自把他们拉扯大了。

张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个有望升官的同学："将来嘛，他会过得很殷实，不到四十岁就秃顶。"边说他边模仿那干部派头：懒洋洋陷在沙发里，俩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转动。

这高二（二）能量大，居然一下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牟志京主编的《中学文革报》，发表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另一份是张育海和几个同学办的《只把春来报》。这报名是他起的，用毛泽东诗句一语双关。第二期发表了他写的《论出身》，与遇罗克的《出身论》相呼应。相比之下，《中学文革报》影响大得多，波及全国，《只把春来报》也跟着沾光。我帮他们卖过报，沿街叫卖。人们一听是四中办的，又和出身有关，争相抢购。

高二（二）办报闹得满城风雨，高一（五）不甘落后，由一凡挑头儿，决定为大家做一个纪念章。设计方案是马恩列斯毛并列头像，下面是“新四中公社”几个红字。用尽浑身解数，我们从七机部搞到最佳铝板，托人找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家设计，最后到珐琅厂制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却节外生枝：上面有指示，不许把毛与四大领袖并列。

一九六七年深秋，高一（五）和高二（二）纠集了十几号人，前往永定门外珐琅厂。行动指挥是张育海和我们班的徐金波。打仗先布阵——史康成、郎放和吴伟国守在厂门口，骑车待命；从厂门口到车间沿途安插几个腿脚利索的，装成闲人。由一凡出面跟厂方交涉，张育海如影随形。威胁利诱无效，一凡恳求管模具的刘师傅冲个样品作纪念。刘师傅递过样品，张育海一把抢走模具，夺路而逃，几经转手传到大门口，由史康成和郎放打掩护，吴伟国骑车扬长而去。工人们边追边喊：“抓住那瘦高个儿，他是带头的……”张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厂方扣下仨人质，却问不出所以然，只好放人。

在六斋胜利会师，七嘴八舌，从不同角度回放惊心动魄的一刻。张育海有点儿心不在焉，用口哨吹起《斗牛士之歌》。

一九六八年秋，工宣队要隔离审查他，据说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有关。他仓促做出决定，先到云南农场落脚，然后参加缅共人民军。临行前他跟朋友告别时说，京城终归容他不得，与

其如此，倒不如去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活个自在。

一九六九年春，他跨过边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同年夏天在战斗中牺牲，年仅二十一岁。他从缅甸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死后在知青中广为传抄。就在死前没几天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们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

我有一首《星光》是这样开始的："分手的时候，/你对我说：别这样，/我们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你转身走去，/牵去了一盏星光。/星光伴着你，/消失在地平线上……"

## 十

一九六五年，我刚进校门，四中成了北京市教育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高二（二）成了全校的重点，那里出了个反动学生牟志京。这一心理伤害有如巨大的阴影，催人早熟，使他们成为特殊的群体。

而牟志京本人早就从这阴影中跨出来。他生性乐观，思路敏捷且与众不同。按一个朋友的说法，他是从不说套话的人。他高颧骨，宽鼻梁，专心倾听别人说话。我去过他家。那是个温暖和睦的家庭：父亲在铁道研究院搞翻译，母亲是绘图员，他有个可爱的妹妹。

由于和同学交换日记看，被揭发出来作证据，于是他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倒并不怎么在乎，真正激怒他的是另一件事。“一天，我从操场踢球回到教室”，他后来跟我们说，“很多同学围观墙上一张小字报，我也探过头去，上面写着‘牟志京是爱情至上主义者’。我一下子就想到自杀，因为我不能允许别人践踏我的感情领域。当时兜里有两块多钱，我决定大吃大喝一顿，然后自杀……”

按天性他不会自杀，再说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他去干。

他头一次听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感到震惊，马上到清华附中贴出批判的大字报。紧接着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辩论会上，他上台发言批对联，几个女红卫兵冲上来抢走话筒，并朝他脸上吐唾沫。几个在场的四中同学上台揭发他是反动学生。在四中组织的批判会上，他不仅不屈服，反而为另一个同学打抱不平，结果被杀气腾腾的刘辉宣打掉一颗门牙。

那年冬天，牟志京在街头看到《出身论》的小字报，通过上面的地址找到遇罗文，谈得很投机，于是他决定办一份铅印小报，让此文广为人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学文革报》创刊，其中《出身论》占了三个版面，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真正作者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他成了《中学文革报》的主笔。

十八岁的主编牟志京，当时并不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

谁。他追述与遇罗克初次见面时的印象："他相貌奇特，个子不高，背驼得厉害，脸色极苍白，深度近视，眼镜一圈一圈的，但目光犀利，声音洪亮，机智幽默……那时正是冬天，在他家住房边搭的称为'冰窖'的小屋里，我感到非常温暖……"

《中学文革报》供不应求，不断加印。那一阵，四中门口挤满来自各地的人，焦虑与期盼的眼睛像大海中的泡沫。他们一共出了六期，直到"中央文革"公开表态批评《出身论》。牟志京召开编辑会，说谁要是没有准备牺牲可马上退出。无人退缩，全体都留下来。

一九六八年年底遇罗克被捕，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二十七岁。被捕前他对牟志京说："我觉得对不起你，你这么年轻，我把你拖了进来。"最后他把一封"致毛主席的信"托他保管。遗憾的是，此信在辗转藏匿中遗失了。

一九七五年秋，我和刘羽去五台山，路上把钱花光了。经大同回北京，我找到在铁路局当工人的牟志京借了五块钱，并在他们宿舍过夜。那天晚上，牟志京疯狂地拉着手风琴，他眯起眼咧开嘴，如醉如痴。

## 十一

赵京兴比我低一年级，却比我早熟得多。刚满十八岁，他已通读过马恩列斯全集，仅《资本论》就读了六遍，精通黑格尔、

康德、费尔巴哈等西方经典哲学，并写下《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等书稿。在随革命退潮而兴起的读书热中，由师大女附中同学摘抄部分书稿，油印成册，在北京中学生中流传。还记得初读时我的震惊程度，虽说每个字认得，却不懂大意，而且一看就串行——这个跟我同姓的家伙让我生气。

赵京兴出身贫寒。父亲是裁缝，平日穿缅裆裤，光脊梁，又黑又胖。一个与文化毫不沾边的家庭，居然出了这么个哲学家。

他公然反对“上山下乡运动”，并写大字报贴在学校。他认为，由于每亩地平均人口增加，必然加重农民负担，把城市危机转嫁给农民。他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原生物实验室召开的第二次批斗会上，主持人大喝道：“赵京兴，你狼子野心，竟然要批判毛泽东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赵京兴先引用“马恩”两卷集某页某段的一句话：“批判就是学习，批判就是革命。”接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一一作了具体说明。

他的言论可谓石破惊天。比如“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比如“社会主义走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步，就像火车头一样在那儿左右摇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伴随着人们的地下活动，将会出现新的历史舞台。”他在《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中写道：“要让商品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如此大逆不道，自然会招致种种处罚。

一九六八年年底，我在史康成家见到赵京兴的女友陶洛诵，她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学生，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白色连衣裙。至今还记得她说的一句话："赵京兴不反毛主席。"和艰深的哲学笔记一起，还流传着陶洛诵情书中的字句："少女面前站着一个十八岁的哲学家。"

陶洛诵长得挺漂亮，却被百万庄一个号称"俊男美女鉴定专家"的人评为七十九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美女的标准是维纳斯，俊男的标准是大卫。

一凡和我在家练习气枪打靶，靶纸是冲洗报废的照片，包括我们自己的头像，背后垫着《红旗》杂志，为了回收气枪子弹。正赶上赵京兴托我们为陶洛诵放大标准照，顺手把一张废照片当靶纸。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有一天，赵京兴来借书时说："陶洛诵让我问问，你们是不是特别恨她？"

一九六八年冬，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格外寒冷。六斋越来越冷清，大多数住户先后去插队了。校园人迹稀少，大字报棚区空荡荡的，只有几张告示。

在一个小院里，有四个学生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其中包括赵京兴，他是公安部钦定的"要犯"。他总是笑眯眯的，埋头读书，沉浸在冥想的世界中。他的兴趣正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

除了赵京兴，还有我们班两个同学，一个是刘辉宣，一个是史康成，正好关隔壁。他们分别因宣扬或反对"血统论"而在

押，殊途同归。看守是同学，睁一眼闭一眼。我常去看望史康成，给他送书或捎口信，碰见刘辉宣也打个招呼。他们四位相处融洽，早晚笼火，互相借用火钩子，顺便交流案情或读书心得。

一九七〇年二月，赵京兴和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

## 十二

从一九六六年十月起，北京中学造反派逐渐取代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简称“老兵”），成为主流，但很快就出现了分裂。一九六七年春，由于中央首长四月三日和四月四日的两个讲话而形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温和的“四三派”，或称“四三点五派”。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北京老兵合唱团”在北京四中的食堂排练《长征组歌》，由刘辉宣指挥，当“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的乐句爬升到高潮处，总是被他的咆哮打断。中间休息，一帮合唱团男生聚在校门口晒太阳。

当时我正和同学在传达室抄大字报——那年头儿用不着看大门儿的，传达室被征用了。隔窗传来阵阵闲聊，继而起哄架秧子，骤然转向叫骂与追打。只见他们从校门外拖进一人，拳打脚踢，拽四肢用头撞树。据说是两个追赶游行队伍的外校男生，骑车路过，与合唱团的人发生口角，一逃脱一生擒。

这回可捅了马蜂窝。对手是北京建工学校“飞虎队”——铁杆“四三派”，以英勇善战而威名远扬。因武斗有人阵亡，他们全副武装抬尸到北京卫戍区抗议示威。有人报信，“飞虎队”掉头杀将过来。

那是原始版“闪电战”：先狂轰滥炸——无数石块飞进校园，撼动大地，砸碎房瓦玻璃。紧接着“飞虎队”队员冲进校门，兵分两路，迅速占领制高点，院墙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封锁校园。他们头戴柳条帽加防护罩，手持钢管式长矛。先锋部队开路后，主力列方阵层层涌入，杀声震天，由一口棺材压阵。

“老兵合唱团”纷纷逃向校园尽西头的食堂。幸好“新四中公社”与“飞虎队”是一家人，在我们劝阻下，减缓了大军的推进速度。

突然从宿舍小院斜冲出一人，赤手空拳，破口大骂，拦住大军去路。他就是刘辉宣。顿时他被十几个“飞虎队”队员团团围住，长矛从四面八方指向他，矛头在阳光下闪着寒光。班主任田佣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同学一拥而上，用身体护住他，一边为他求情，一边连拖带拽，把他护送到宿舍小院，他还是骂不绝口。

大军如潮，棺材如舟，绕过这旋涡继续向前。刘辉宣又出现在食堂，在他带领下，合唱团的散兵游勇高呼口号，但一见大军压境，长矛林立，刘辉宣只好下令：“放下武器，撤！”合唱团男生扔掉棍棒，各自逃生；女生尖叫着，乱成一团。我们竭力把双

方隔开，劝合唱团的脱掉军装——这“老兵”的身份标志，混进人群中。少数躲进食堂与院墙的夹道中，最后翻墙逃跑。由于我们介入调停，这场血腥的武斗只造成少数轻伤。老兵最大的损失是，那些停在食堂周围的锰钢自行车被砸得稀烂。

因写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而出名的刘辉宣回顾说：“那时我们学校有一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是我们的对立面。他们当中有一个同学叫杨小青，和我们积怨甚深，见了面就怒目而视。后来有一次外校的武斗打进了我们学校，混战中我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命将我救了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管这叫‘坚持原则’。但我心里却尊重他，当时就敬重他……”

## 十三

一九六八年春，学校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直奔原校长室小院东侧尽南头的“革委会教育革命办公室”，门口还挂着“中学红代会作战部联络处”的牌子——这里也是北京中学“四三派”唯一的常设机构。

他们是北师大学生，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而显得骄横，把桌椅弄出声响。此行目的嘛，是为了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的高考制度，即旧高考制度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导主任屈大同应声而至，诚惶诚恐，但他心里有数——“文革”快两年了，什么阵势没见过。读罢介绍信后沉默片刻，他悠悠叹了口气说：“恐怕我得让你们各位失望了。”事实是，四中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但同在分数线以上，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筛选下来。他说：“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袋正面是张表格，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学政审意见，只要建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

屈大同本人就是国民党少将之子，熬到名校教导主任，深知其中奥秘。见来访者满脸惊色，他更加得意：“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吧，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兼教授，也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绩再好也没用，哪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屈大同是钱元凯的高三班主任，曾对他发誓说出身问题绝不会影响升学。于是钱元凯报考了清华大学，虽获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竟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一九五八年九月，他到石景山钢铁厂当壮工，两年后改车工，他在劳动中坚持自学。由于爱好摄影，一九六八年他自制了照相机等摄影器材，后调到北京照相机厂，从技术员熬到总工程师，成为照相机技术理论的权威。

高考落榜后，父亲对他说：“上学的机会是受人控制的，但读书与实践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课堂，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权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任何人都剥夺不了的。让学习成为一种

生活的习惯，这比任何名牌大学的校徽重要得多!”这番话他一直记在心中。

要说人生这苦酒，最初是他跟老师共同酿造的，却不能分享。每逢校友聚会，只要听说有钱元凯参加，屈大同退避三舍。

## 十四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交，北京出现了一个署名为“红卫兵六五一四部队”的秘密组织，神出鬼没，到处张贴大标语，诸如“揪出镇压北京中学文革的小爬虫李钟奇!”“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公社的原则永存!”同时张贴的还有油印小报《原则》。

其实这是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干的。那番号有虚张声势之嫌，要破译并不难：四中高一（五）班六斋，反之“六五一四部队”。

一九六八年春，由于对中央精神解释的歧义和大学各派组织的介入，“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冲突不断升级。为了控制局面，“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北京中学，成立“革委会”。当时负责中学军管的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

“文革”草率收场，我们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

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红卫兵六五一四部队”在行动——并不是和一个名叫李钟奇的将军过不去，而是为了在官史中留下潜台词，让本来顺理成章的叙述出现漏洞。我们白天刻蜡版印刊物刷标语，半夜出动，甚至把标语贴到卫戍区司令部对面的墙上。

一天半夜，我们骑车蹬平板三轮，来到西长安街小巷深处的北京六中，那儿离天安门不远。在校门外砖墙上刚贴完标语和《原则》小报，从校园内突然冲出十几个男生，手握垒球棒和弹簧锁，而我们只有扫帚铁桶。对峙中，双方身体几乎贴在一起，甚至能听到对方的呼吸。我心跳加快，血向上涌，头脑一片空白，从对方眼中能看到自己渴血的愿望。那是人的原始本能，可追溯到古老的狩猎和战争，在某些时刻仍在控制着我们。

僵持几分钟，如同世纪般漫长。我们后退一步，在对骂中走开。撤退速度要把握好，太快太慢都不行。走出小巷，来到长安街上。秋风乍起，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原则》总共办了三期，无疾而终，几乎没在世上留下什么痕迹，除了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夜之间长大了，敢于挑战任何权威。而在刚刚拉开序幕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中，所有原

则必须修正、变更或延伸。

## 十五

一九六八年冬，我们一行十余人，包括田佣老师，到河北安新县白洋淀地区进行“教育革命考察”。这有点儿不可思议，在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就是教育革命的对象。这旅行多少带有那时代的疯狂印记。

我们正赶上武斗高潮，由省军区和三十八军分别支持的两派打得天昏地暗，战火波及白洋淀——那是抗日根据地，农民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刚住进县委招待所，就接到讣告及追悼会通知。在县城攻防战中，控制县城的一方七人阵亡。在人家地界别无选择，我们除了献花圈，还把鲁迅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抄成巨幅挽联，横挂在街上。高音喇叭播放着哀乐。我们走进停尸帐篷，向死者三鞠躬。那是我头一次目睹死人，有男有女，皮肤蜡黄，在阳光反衬下呈半透明状，让人想起皮影戏。更可怕的是那股恶臭，要尽力屏住呼吸。

作为来自北京的代表，自然成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造反派头头和死者家属一再挽留我们做流水席上宾。婉言谢绝，我们回到县委招待所，一阵干呕，省了顿晚饭，在昏暗的灯下长吁短叹。

为安全起见，调查先从城关中学开始。那些农村孩子读书之

刻苦是超人的：起早贪黑，伴着油灯熬夜，没有娱乐，居住伙食条件极差。他们的心愿就是进城读大学，彻底改变绑在土地上的命运。由于名额有限，要远远超过北京人的标准线才有录取的可能。这让我们震惊，按这个标准，北京四中有一半考不上大学。这种社会的不公平，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烽烟再起，对方开始攻打县城。枪炮声不断，特别是晚上，子弹呼啸声让人难以入睡。县城随时都会失守，而县委招待所是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田佣老师腰扎草绳，蹿出招待所大门侦查火力。只见他猫腰躲避，继而匍匐前进。招待所看门的老头细听枪声后打哈欠说，敌人还很远着呢，不耽误睡觉。

龟缩在县委招待所十来天，除各种传闻，对外界一无所知。在背后军方的压力下，双方终于坐下来谈判。我们乘头一班去保定的长途汽车，逃出围城。

回北京不久赶上过春节。在同学聚会上，杯盘狼藉，醉后高歌痛哭。写旧体诗词成了时尚，互相唱和，一时多少离愁别绪！北京火车站成了我们最后的课堂，新的一课是告别。

# 读书声、风雨声

印红标

印红标，北京四中六七届初二（四）班学生。一九六八年去北京市门头沟煤矿做工，一九七八年入吉林大学读本科，一九八二年在中央团校任教，一九八四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主要著作有《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一九六四年九月我怀着憧憬与梦想进入四中，一九六八年九月我带着解不开的谜团离开母校，其间整整四年。四中留下了我青涩的青少年时光，求知的热望与欢欣，政治风雨中的跌跌撞撞，还有追悔莫及的愧疚。

四年的记忆如同一幅双面的彩图，前两年是正面，后两年是反面；然而对着阳光望过去，正面与反面又会奇妙地重合在一起。

## 第一课与最后一课

一九六四年夏天，经过战战兢兢的等待，我终于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印着“北京四中”字样的信封。升学考试后，老师说我的语文没有考好，成绩在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学校之间。这让我心神不宁。真到了期待的这一刻，又感觉一切竟是那么平常。

四中校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古朴。初一年级的教室是几排老旧的平房，墙上有些许青苔的斑痕，小院绿树成阴，大概几十年前就是这样子。那些未见识过的阶梯教室和物理化学实验室，引发我对未来学习的想象。

开学前就开始了“十一”庆祝游行的训练。我们是少先队的“和平鸽”大队，一百个同学并排走，要整齐划一还真不容易。每个人都必须全神贯注，时时调整自己的步伐，与集体保持协调。每人都会感到自己的价值体现在集体之中，犹如机器上的螺丝钉，渺小却不可或缺。我们踏着《红领巾之歌》的节奏前行，最后一句是：“永远跟着毛泽东”。这首歌早就会唱，当时不觉什么，现在想起来，结尾那一句似乎预示着后来发生的一切。

开学了，各科的第一节课都让我感到新奇有趣。生物课老师在讲台上摆了鲜花，问大家：“这是什么？……对了，是鸡冠花。这个呢？……对了，是玉春棒。生物课就是讲关于它们的学问。”历史课老师让大家闭上眼睛想象：“几十万年前，这里没有高楼

大厦，没有无轨电车，只有成群的鹿和三三两两的犀牛，还有我们的祖先：中国猿人……”英语老师一丝不苟地从ABC开始示范发音。不知怎的，那音调总让我觉得想笑，又不敢笑。同学回答完问题，老师就说：“Sit down, please.”听上去好像是说“象鼻子”。

第一节政治课是在教研室小院的绿阴下听报告，除了初一各班，好像还有高年级的同学参加，主题是“政治课改革”。许多政治词汇，比如“阶级”、“阶级斗争”等，似懂非懂，有个新词闻所未闻，引起了我的注意：“阶级分析的方法”。课后问一位小学同学，他也不知何解。

几堂课下来，我感觉中学老师的风度与小学老师不太一样，和气、有趣，不是靠威严，而是以趣味吸引同学进入知识的殿堂。第一节政治课的新词“阶级分析的方法”，后来成了常用词。槐树浓阴下的政治课内容贯穿了整整四年，成为四中生活的第一课。

开学不久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过我们初中学生只是听听报告而已。一次报告中有个比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于犯错误的人要挽救，就像给孩子洗澡，洗完澡，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那年，部分高中学生酝酿“造反”，北京市委紧急应对，我对此全然不知。

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在语文课

上，批评老舍的散文《养花》的学生作文被选作范文，说是作家宣扬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被推荐的还有批评老师婚纱照是资产阶级情调，以及四合院大门上“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宣扬封建主义思想的文章。作文题目就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周围事物。我苦思冥想，将靶子定在天桥马戏场的伴奏音乐。我家在南城，有一次从马戏场附近经过，觉得那音乐格调与电影里旧中国的马戏团一样，没有革命精神。

教语文的齐老师是同学们最喜爱的老师之一。他讲课生动，写得一手漂亮板书，与同学们亲密无间，连我这个对自然科学一边倒的学生，也喜欢上他的课。而政治正渗透到语文课中。“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一个声音正由远而近隆隆地传过来，震人心魄，难以躲避。

上小学时，德育注重道德品质的教化，诚实友爱、尊敬老师、敬老爱幼、助人为乐等。到了中学，重在政治和社会教育，除了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外，强调阶级斗争观念，同时也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与追求理想的信念。记得为体验“与工农结合”，也为锻炼意志，我曾约同学一道，几次在周末步行十多里路去北郊塔院一个人民公社养猪场劳动，也算是自觉革命吧。

“文革”前的教育改革，提倡“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方式，令人兴致盎然。课业负担减轻了，作业少了，下午早早下

课，大家纷纷参加各种业余爱好小组。从初一起，我每周去北海少年科技馆参加天文组的活动，做着科学家的梦。

校内也组织各种课外小组。在史地小组，听徐健竹老师讲美国地理，说是“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我却从中得知美国自然资源的得天独厚。早春时节，跟徐老师去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凭吊。凄凄荒草之中，雕花的汉白玉石柱突兀而立，无言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和民族的耻辱。

我的弱项体育，居然有了明显长进，在全校运动会四百米赛跑中获得第二名，这是我首次体验得到名次的喜悦。我们班也打了翻身仗，从初一的年级总分倒数第二上升到第二。

初二年级在全校唯一的教室楼上课。这座楼房极简陋，有“三无”的雅号，即无暖气、无厕所、无上下水道。有人说当年把部分盖楼的钱捐献给“抗美援朝”，不知是否可信。操场边胡同公厕般的学生厕所足有一二十米长，课间操后，几百号同学拥进去，小便池前站成一排，顿现宽阔的尼亚加拉瀑布。

值得骄傲的是四百米跑道环绕的操场，听说在北京市内只有四中和回民中学才有。再就是图书馆。从初一开始，我每周课后两次去图书馆服务，在老师指导下，按同学的索书单到书库找书，或把归还的书上架，逐步了解了图书分类法等基本管理常识。

四中校风纯正，崇尚学业上的勤奋与生活上的朴素。衣着以

简朴为荣，即便家境宽裕的同学也不事张扬，只有“回力”牌球鞋和锰钢自行车会引来羡慕的目光。在这简朴之中蕴含着奋发向上的精神。四中的干部子弟多，大多数低调，然而另一种评价标准在逐渐加强：家庭出身、政治表现，干部子弟越来越受重视。

一九六六年春天，学校开始组织学生批判“三家村”。我写了篇稿件，被推荐在会上宣读。内容无非是跟着报刊鹦鹉学舌。记得我写了这样一类话：旧社会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新社会即使遭受了三年的自然灾害，也没有饿死一个人。五月间，学校改成上午上课，下午政治学习。

六月三日，我经历了终生难忘的最后一课。那天早上，我照例在八点差几分匆匆赶到学校。因为我家远些，老师准许我免早自习。穿过校园，感到气氛有点异样——同学们在议论着什么。未及多问，只顾奔向教室。

那是一堂数学课。课上到一半，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和说话声，沿着楼梯从楼上到楼下，一阵风似的出了楼道。过了一会儿又是一拨儿，楼梯与楼道传来“咚咚”的脚步声，操场上三三两两游荡的学生越来越多。我终于明白：他们不上课了！每当一个班几十号学生冲出教室，都传来脚步声与喧哗。

教数学的刘老师要求继续上课。我们班干部子弟少，一向老实顺从，没有出格的举动，但这时也如坐针毡。窗外有同学扒着玻璃看我们，还比画着说些什么。猜得出来，意思是：你们怎么

还在上课呀？甚至有人在轻叩教室门了。我们看看窗外的同学，又看看老师。老师瞥一眼手表："还有十分钟……"，那语气好像是恳求同学再忍耐一会儿，把课上完。

教室楼里的脚步声渐渐退去。大概只剩下我们这样的班级在焦急与无奈中等待下课的铃声。终于，下课铃响了，性急的同学冲出教室，其余的松了口气，摆脱了尴尬的局面。老师默默收拾讲义，走出教室。此后全班同学再也没正经上过课，我们成了永远的"老三届"中的"老初二"学生。

小时候听父亲讲到抗战初期，他的老师在语文课上含泪讲授法国作家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没有想到我也有最后一课，竟是这样。

## 文斗与武斗

停课当天或前一天，校园里有了大字报，质问校领导或某位老师。停课后，大字报多了起来。最初几天，各学校学生互相声援。我跟着去过三里河一带的学校，大概是社会路中学，支持停课闹革命。我们低年级学生对本校情况所知不多，也认识不了几位老师，没有说话的份儿，于是转向毕业不久的小学，几位小学同学相约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大字报的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的两点：一是不突出政治，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必然会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二是我们

班同学没有工农子女，方向有问题。我们班确实有点特殊。一九五八年北京实行小学就近入学，而我们班同学是从小学附属的幼儿园选拔的，受过学前教育，处处拔尖儿。高年级时还配备了最优秀的老师，果然成绩显著：十位男生考上四中，两位女生考上师大女附中，还有一些考上其他名校。我们班大部分是干部和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没有工农子女。我们认为这是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母亲多次说过，我能考上四中，多亏班主任霍老师教得好。而当时我们自以为正投身于伟大的革命，顾不上那么多了，包括师生感情。

那个晚上，你一言我一语，由作文好的同学执笔，毛笔字好的同学抄写。记得一位同学说了我从未听说的新词“魑魅魍魉”，写进大字报。我们兴奋地忙乎了一通宵。那是我第一次彻夜未眠。后半夜我走到操场，见北斗星几乎转到天际线之下了。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小学，把大字报贴在教师食堂前面。快要结束时，班主任霍老师走来了，看到我们老远就打招呼。哪知我们这回是来煽风点火的。老师的热情让我们不知所措，趁老师看大字报赶紧溜了。回头偷看，老师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大约一九七八年初，我与小学同学去看望霍老师，为贴大字报一事向老师表示歉意。一位女同学说：你们是老师最器重的学生，怎么能这样做啊？我和另外几个贴大字报的同学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学校停课后，工作组进校领导运动。由高三（五）班学生发起，并以四中全体革命师生的名义致信毛泽东，支持女一中学生的倡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对于初中生来说高考还遥不可及，我们并未多想就跟全校同学一起上街庆祝。从这封信中，我学到了个新词“桎梏”：考试制度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

七月下旬，工作组一夜间成了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我们从下乡劳动的郊区赶回学校，只见工作组信任的那些学生领袖们，已掉转枪口批判工作组。形势变化快得令人目眩，难以置信，无所适从。

八月四日发生了游斗老师的武斗事件。那天，我正在操场东北角跟同学闲聊，见操场那边乱糟糟来了一群人，沿跑道慢慢移动，人越聚越多。有同学说是押着被批判的“黑帮”和“牛鬼蛇神”游街。“黑帮”一般指被批判的校领导，“牛鬼蛇神”一般指被批判的老师。我们起初没在意，游街的队伍走近了，有同学说，初一做过我们班主任的王老师也在其中。转眼间人群到了跟前，学生站成两排，校领导和老师从中间鱼贯而行，衣服肮脏不堪，一个个低头弯腰，看不出谁是谁。我们走近时，排头那几位校领导和老师已走过去，剩下后面几位。两边有学生伸拳打向他们，群情激愤的样子。我感到一阵紧张，似乎无数双眼睛集中过来，盯着我在重大关头的表现。于是我也伸手打了几下。在我前

面有不少同学，要从他们肩头或缝隙中打到被游斗者，并没那么容易。在慌乱中，我也不知道伸出的手是落在老师身上，还是落在前面同学的肩上。只觉得过了一关，却又惴惴不安。

最后一位老师过去了，很多同学尾随着。不一会儿，那群人越走越快，后来几乎一溜小跑离开操场，向教研室小院方向去了。后来听说，“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是“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得知消息前去劝阻，甚至拦在学生和老师之间，后来索性把人群引到教研室小院，游斗才终止。

在教研室小院，“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讲话，记不清是谁了，大概是孔丹吧。只记得说了两点，大意是：第一，今天的事情表现了同学们的革命激情和义愤，好得很！第二，打人违背党的政策，不要打人。这番话当时让我十分信服。

八月四日，四中是否已经成立红卫兵需要查证。记得在“八一建军节”的纪念会上已有学生提到成立红卫兵。近年来，几位原四中红卫兵的骨干回忆说，四中红卫兵成立在八月中旬。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与红卫兵负责人基本是同班人马。

一九八九年春，我采访原四中副校长刘铁岭老师，请他讲述四中“社教”运动和“文革”历史。同时我为自己卷入那次暴力事件，向他表示道歉。大约在一九九七年校庆，我终于获得王老师的电话和地址，于是给王老师写信，又到王老师家登门道歉。

## “红八月”与批“血统论”

在四中，我是低年级学生，又不善写作，拙于言辞，那一笔字更是拿不出手去，除了和小学同学一起写过张大字报外，不记得写过大字报、传单之类，基本上是跟在高年级同学后面打杂儿。但是我一直睁大眼睛，满怀热情注视着这场革命，试图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九六六年八月被称为“红八月”，实际上是血腥的八月，四中也未能幸免。八月下旬，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真是到了“红色恐怖”的程度。除了校领导和一些老师，不少市民也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学校，遭受非人的折磨。一天，几位同学扒在教师食堂窗户向里张望，我也凑了过去。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有人发出上气不接下气的惨叫，声音微弱而压抑，还苦苦哀求：红卫兵爷爷歇一下手吧，实在受不了啦。我顿时毛骨悚然，腿不住发抖，转身悄悄溜走了。

第二天，我们班接到通知，晚上去几位同学接替红卫兵看管“牛鬼蛇神”，大概他们人手不够了。我们几位同学当晚按时去接班。在食堂昏暗的灯光下，地上躺着不少人。半夜有人叫道：“报告红卫兵！”我四下看看，原来是在叫我。他说他要解手，站起来才发现是个中年人。后半夜，同来的几位同学实在熬不住了，纷纷歪在椅子上睡着了，推也推不醒。听说这里关了不少

"流氓"，什么天桥"丰收队"、"棒子队"的，真怕他们白天挨了红卫兵的打，晚上找我们报复。我又困又怕，好不容易撑到天亮。以后再也不去了。

不久听说有三位市民在四中被打死，未曾核实。本校老师和学生有人被打，但没听说出人命。我还模糊记得，红卫兵强迫劳改的老师唱"牛鬼蛇神嚎歌"的场面。听说红卫兵写这样的歌，教给被批斗的人唱。第一句是："我是牛鬼蛇神，……"红卫兵教唱："你是牛鬼蛇神"，学的人要唱："我是牛鬼蛇神"，无奈其中每句都有"你"和"我"的转换。心力交瘁的老师一不小心就跟着唱成："你是牛鬼蛇神"，少不了招致斥责和拳头。

"破四旧"开始了，我也不得不清理自家的"四旧"，我心爱的金鱼成了牺牲品。那是小学毕业时同窗好友送给我的。两年中，几只黑色鱼苗先后死去，只剩下一条长成了的淡红色金鱼，虽说不上名贵，却寄托着老同学的情谊。眼睁睁看着金鱼在下水道口挣扎，我不忍再看，转身离去。

一天，母亲一脸为难找我商量件事。红卫兵驱逐"黑五类"分子，风声日紧。表姨打算把地主成分的婆婆按普通旅客买票送回江西老家，免遭被遣返的厄运。她担心街道居委会探知，想让我家收留一天，避开风头，次日再去车站。表姨性格开朗、干练，原是育才中学的教师，后来去了某国家机关。我去她家玩过。面对母亲恳求的目光，我无话可说，算是认可了。第二天，

来了一位衣着整洁的清瘦老人，我含糊嘟囔了一声，算是打过招呼，就匆匆出门了。我在躲避，不知在亲情与革命之间如何选择是好。翌日表姨接老人走了，后来母亲没再提起，想必她们躲过了一劫。当时我并不知道，八月二十四日以“四中革命师生”名义发布了一张通令，勒令“地富反坏”分子“滚出北京”。这恐怕是最早驱逐“四类分子”的通令，得到北京市和中央的支持与配合。这倒很像四中“文革委员会”及红卫兵的一贯风格——总是与中央精神合拍的。

有人贴出这样一副对联：“红卫兵闹革命轰轰烈烈，其他人看革命冷冷清清。”批评当时红卫兵自视高人一等，孤家寡人；也反映出不少被排斥的学生并非不满这场革命，而是想参与而不得。这正是我当时的思想状况。

另一则大字报讽刺那些在运动中没主见的人：“一头小驴，左边一捆草，右边一捆草，不知先吃哪边为好，最后饿死了。”好像就是在说我——我看了这张大字报，觉得有理；再看看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也觉得有理，不知应当站在哪边好。

七月底八月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盛极一时。我虽然算不得“混蛋”，但也感到某种莫大的侮辱，不过还是不自信，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缺乏阶级感情。

入秋后，政治风向发生了变化。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看到一张笔锋犀利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对联”及其鼓吹者，头一次唤起

我内心强烈的共鸣，同时让我震惊不已："还可以这样讲话?"接下来又看到类似的批判，我马上掏出笔记本抄写，发现自己的手竟激动得发抖。

批判"血统论"让我感到精神的解放。"串联"也不再是红卫兵的特权了，大家都有了参加革命的机会。我去派发"串联"车票的地方排队领票，旁边有一幅标语，大意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角吹响了，同学们要在北京坚守战斗岗位。这标语令人不安，我犹豫了，最后决定留在北京，全身投入我打心眼儿里拥护的这场战役。

我全心支持批判"血统论"，却以"党的阶级路线"为界限，不能接受遇罗克《出身论》的观点。第一次在校园读到《出身论》，我感觉作者对社会冷眼相看，不同于我们的满腔热情。认为那是从右的方面违背党的路线。我把这个看法讲给身边的同学，某些赞同，某些认为没那么严重。造反派主流是既反对"老红卫兵"的"血统论"，又反对遇罗克的《出身论》。一九六七年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讲话称《出身论》是反动的，算是代表中央作的结论。

再次听到遇罗克的名字，是当工人以后。一天，下班后政治学习，讨论北京市处置一批反革命犯的意见，在名单中竟然有遇罗克。每逢这样的情况，师傅们想早点儿结束学习回家休息，一概漫不经心地说："枪毙！枪毙!"我低头没有做声，心中既困惑

又沉重：一篇《出身论》再怎么也不至于判死刑呀？

一九六六年十月之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血统论”、“校文革委员会”和“老红卫兵”成了造反派攻击的对象，“劳改队”也散了。六中和一中红卫兵主管的“劳改队”成了靶子。因出身被压抑的学生得以崭露头角，显示才干。一九六七年春“新四中公社”成立了，得到“军训”解放军的支持。其中有的学生曾主张解放校长杨滨，后来没了下文。据说“新四中公社”鼎盛时，在全校一千七百名学生中网罗了一千三百人。我也算其中一员，有一个印着镰刀锤子的红袖章，这图标在北京大概是独一无二的。那时红袖章满天飞，凡是没被打倒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参加一个组织，领来一个袖章。而我已没兴致戴了。

“新四中公社”成立不久，中学造反派出现了“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分裂。经过辩论，讲策略的立场与观点占了上风，“新四中公社”由此成了“温和四三派”或“不三不四派”。

一九六七年夏天，来自校外的“老红卫兵合唱团”与一所中专的“四三派”在四中发生武斗。四中学生（多是“新四中公社”成员）居中竭力劝阻，协助弱势的“老红卫兵”逃离险境。“新四中公社”在各种活动中，常唱的是毛泽东语录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被戏称为“社歌”。这不由使人想起，在“老红卫兵”当中，其领袖人物也是注意政策的，例如发布通令反对

武斗。两派虽政治观点对立，但其主流都倾向于强调策略，争取群众，避免走极端。这是否多少反映了四中学生普遍的精神特质？

一九六七年秋冬，运动退潮，同学们无所事事，传来了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消息。一天，父亲要与我谈谈。坐下来才知道，他希望我不要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倘若可能，还是多读一些书为好。对我来说当然没问题。然而这一线希望很快成为泡影。

一九六八年，大家感到告别的时刻临近了，纷纷郊游、照相，打探毕业分配政策。我买了张市内公共汽车月票，从一路公共汽车坐起，把所有没乘坐过的路线、没去过的地方转了个遍。在左安门还看到了菜地，像是农村。几位同学相约去香山和颐和园爬山、游泳，在四中校长室前面“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壁画前合影留念。我已做好下乡的准备，却赶上京西煤矿招工，我报了名。为了掩盖近视的缺陷，我背了下两行视力表，勉强通过体检和审查。

四年的同窗加“战友”，难舍难分。我在赠给插队同学的日记本上，抄录了一段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语录（大意）：我们这代青年将亲手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其实我心里没底儿，无论对于过去还是未来，都摆脱不了困惑与迷茫。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三家村”主帅邓拓撰文议论明朝东林党人的这副对联，在批判文章中被指有反骨，而我读后却深深印在心中。回首四年的四中经历，不禁又想到这对联，并非出于士大夫的家国情怀，而是少年读书时被卷进政治的急风暴雨，见了世面也沾上泥水，无论如何评说，都是忘不掉也抹不去的。

# 往事岂堪容易想

李宝臣

李宝臣，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北京人，一九六四年考入四中。“上山下乡”期间，曾在山西山阴县常辛村客居。高考恢复后，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旋入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从事明清礼制制度研究，累迁至研究员。有《文化冲撞中的制度惯性》、《礼不远人》等著作六部及论文四十余篇行世。

也许追忆中学文化革命运动，最难让人忘记的就是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了。中学各校无不被它搅得天翻地覆、四分五裂。革命的千秋大业，革命的理想憧憬，变成家庭出身的图腾崇拜。这可以说是自一九六二年以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忆苦思甜”以及贯彻阶级路线结出的硕果。为时不久，“文革”当局对“对联”的态度由纵容转向批判，这

是出于党内路线斗争的政治需要，而非彻底清算抛弃“成分论”。如果有谁企图冲破运动设计的牢笼，挑战对联的政策基础，呼吁权利平等，后果必将是灾难性的。

## 《中学文革报》缘起与《只把春来报》本末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向社会发出批判血统论号召。一时间中学造反组织风起云涌，无不对“对联”口诛笔伐。当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工人体育馆举行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两万余中学生参加，四中高二（二）班王祖锷代表中学造反派宣读《宣判反动“对联”的死刑》的讨伐檄文。此前，许建康、朱景文、王祖锷等七八人占据原数学教研室成立了“星火燎原”战斗队。这是本班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发言稿本出自朱景文之手，及至大会召开，由谁上台宣读，却动了一番心思。历史选择了“革军”出身的祖锷，而委屈了“右派”出身的文章执笔者。其实朱景文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平日模仿著名播音员齐越朗诵几乎乱真。可见，造反派精英还不能完全放下血统论思维与对血统论的恐惧。

随后批判血统论运动展开，本班相继创办《中学文革报》、《只把春来报》两份小报。在批判血统论的道路上，《中学文革报》走得最远、最彻底。《只把春来报》受其影响，紧随其后创

办。因之有必要先说说《中学文革报》的起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张育海、杨百朋和我“串联”归来后，占用原体育教研组，成立“敌敌畏第五纵队”战斗队，不久吴景瑞、何大明加入。战斗队没有采用流行的主席诗词语录或革命圣地命名，则是为了表明我们既非红卫兵也非造反派。育海还从生物教研室拿来骷髅模型挂在门内。“敌敌畏”是强力杀虫剂，选用出自百朋提议，“第五纵队”则是育海的主意。“第五纵队”是间谍内线组织的代称。西班牙内战期间，佛朗哥攻打首都，除了四个战斗纵队之外，把潜伏在马德里市内的间谍组织，称为“第五纵队”。战斗队一成立就编辑油印小报，内容则偏重动态报道。

“文革”期间，小道儿消息远比各大官方报纸的报道受人关注。打探消息成为时尚。捕捉到重大消息，弄清运动走向是冒险投注的前提。如果你认为那桩桩件件引领风骚的轰动事件完全出自造反者的政治判断与造反精神，那就错了。那些载入史册的事件都不是纯粹的巧合。造反者差不多预先都得到了准确情报或是受到上峰的暗示。然而，顶级消息需要顶级关系资源，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优势，所以编辑报道的主要工作就放在一般消息的整理上，广泛收集传单，阅读后分门别类，重新遣词造句。为了引起社会注意，甚至不惜移花接木添枝加叶故弄玄虚。这一手果然奏效，曾招来一位自称是“地质东方红”的部门负责人的大学生，

力邀我们加入他们的组织为其搜集消息。当然，我们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委婉拒绝。

编辑《动态》，免不掉四处串联交换材料。当时看到师大女附中一份《动态》，觉得与众不同，就按地址东四北大街二九八号，前去联络，不想是住家，叩门之后，出来一位女生。我拿出《动态》询问，她说就在这里。这是一座不算规矩的院落，院子狭长，一溜北房大约七八间，我们进了西头一间。她叫陶洛诵，师大女附中高二学生。交谈中她特别推荐了一份六十五中"北斗星"的传单《出身论》，并告诉我，两天后在六十五中，将举办相关问题的辩论会。也就是这一次不经意的访问，开始了我与陶家几十年的交往。陶洛诵敏感直率，充满激情、想象。二〇〇五年，她在香港出版了自传《生之舞》，读其文则其人可知，岁月裹挟着生命历程而去，不变的仍然是那天生的性情。

两天以后，我约百朋一道去六十五中参加辩论会。我们到达教学楼阶梯教室时，只见后排靠近窗户坐着一位年纪稍大的人正在与人交谈。他自称马列，一听就不像真名，四九年以后起这样的名字，恐怕难于户口登记。现场气氛没有想象的那样热烈，参与者也并不多，问答皆三言两语，很不得要领。不一会儿便草草收场。触及"对联"阶级路线政策基础的批判，绝非易事，不但需要勇气，同时还要破除成见。而被阶级教育调教出来的中学生普遍关心的是主张的现实可行性，而不是主张的正确性。这次辩

论会是由该校高二学生、遇罗克之弟遇罗文操办的。

回四中，在校门外碰见牟志京，他说刚刚在西什库大街上看到一篇文章《出身论》，连称写得太好了，太好了！言辞略显激动，目光透着惊奇而钦佩。我说我们刚参加过该文的辩论会，下周在六十五中还要举办。

牟志京个性鲜明，说话低沉缓慢，像牧师似的极富感染力。我们都称他“老牟”。上高一时，因个人日记暴露，不合时宜的内心独白与私事外泄而遭到班内的严厉批判。当时教室内墙壁贴满了批判他资产阶级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小字报。至今我也不清楚他的日记是怎样公开的。在那个整天讲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年代，一个闪念流露出来就可以成为批判对象，老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血统论”狂躁期间，老牟坚决反对“对联”。四个月后，偶然读到的《出身论》，让他兴奋不已，遂萌生办报宣传的想法，很快联络本班王建复一道创办了四中第一份小报《中学文革报》。那时“敌敌畏”与《中学文革报》交往密切，我还在该报首期、第二期、第四期上发表了三篇杂文，分别署名敌敌畏、洋扬和梅灵。

可以说《中学文革报》就是为了刊登《出身论》而创立的，可是老牟并不知道文章的真实作者是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出身论》作者是个谜。该文署名“北京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我

在六十五中见到的那位马列，曾被误认为作者。不过，从一开始我就不以为然，与之对话，他言辞闪烁，多用反问句，不像是思维清晰、文思泉涌的人。后来才知道他是遇罗克的朋友，轻工学院的大学生，姓郝。也许遇罗克清楚他的工人身份参与学生运动多有不便，才会有挚友自告奋勇替他露面。《中学文革报》首刊登载的《出身论》并不是油印传单时期的原文，而是老牟改动加工过的。

《出身论》发表后，风靡一时，遇罗克遂成《中学文革报》主笔。是《中学文革报》选择了遇罗克；是遇罗克玉成了《中学文革报》历史清名。在数不清的民间“文革”小报中，没有哪一家像《中学文革报》那样备受关注；也没有哪一家受到那样多的磨难与重创。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表态：《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出身论》争取平等权利的希望破灭了。三年后的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遇罗克被罗织罪名处死。

遇罗克是英雄是猛士，让人钦佩震撼的是他的执著与勇气，而非理论建树。“生而平等”不是什么新鲜高深理论，而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已经载入英国宪法。西方人权民主理论在晚清时流入中国，外交家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甚至把它当作实现儒学“三代”民主理想的良方。即使一九四九年以后到

“文革”前，此类民主理论书籍也很容易读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认知水准低下，而在于熟谙民主理论的人文学者普遍选择了沉默与逃避，历次政治运动将他们的风骨气节与公共精神几乎扫荡殆尽。结果由一位不见经传的民间读书青年做了民主诉求的仁者勇士。

遇罗克的死多少有点出人意料，虽然以他的言论判断一定会招来严厉惩罚，但罪不至于必死。至今我也不认为仅靠那几篇文章就能名正言顺地要了遇罗克的命。不管怎么说，他始终是在体制内寻求公平，引经据典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他的著作不是反动标语，做不到一望即明、顺理成章的定性处置。况且批判“血统论”是“文革”当局号召的。

恍惚还记得当初发布“文革”命令时，上面曾经要求按系统、按部门单位搞文化大革命，禁止不同界别系统之间串联，唯一例外是对在校学生，可以跨出校门走向社会，各处造反。让当局不能容忍的是遇罗克染指了中学运动，事实上他左右了《中学文革报》，并显露出青年导师、青年理论偶像的气象。《中学文革报》虽名为中学，实际上已经走向社会运动层面，广受各界关注。上面不容许自己之外，有人与之争夺“接班人”。戚本禹那句“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道出了问题实质。由此也注定了被重处的命运。当权者决心给予重处，却不想通过《出身论》本身的论证实现目的，否则就不必等待将近三年，非要找到

够得上重处的刑事犯罪才肯实施。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七个人自称“联合调查组”，把我叫到四中教师食堂小院的一间南房内，让我坐在中间，调查者环坐，其中还有位熟人。他们开门见山，问遇罗克的事，我回答说不认识也不知道。那位在办《敌敌畏动态》期间结识的东城某女校高中生马上说：你怎么不认识，怎么不知道，你不老实，谁不知道你对《出身论》的态度，你们办的《只把春来报》与《中学文革报》是一回事。遇罗克是现行反革命已板上钉钉，你不要心存侥幸！

我不客气地回答：如果你们要整我，就先去别处调查，等攒够了材料，再来这样对我；如果要问遇罗克的事，我刚才说过了，一点也不知道。

交锋几回，仍是僵持局面，只见其中两个年纪较大的人目光碰了一下，私下嘀咕几句，就让我走了。这段往事，起码表明当局查证的重点是遇罗克本人的所作所为，而不关心《中学文革报》其他的人与事，我与老牟、建复同班，可是在调查中，对方根本没有提及。那两位虽然也不断地接待调查者，却没有受到惩罚性牵连。那位女生天生丽质，风姿婉约，曾不遗余力鼓吹《出身论》，也对《只把春来报》大加赞赏，一年后，她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到调查遇罗克的行动中。

据说官方最初拟定的刑罚是十五年徒刑。不幸的是，“手榴弹

事件”让当局找到了既合理又能服众的借口。“遇罗克宣判书”只字未提《出身论》，只是笼统地说他书写反动文章，组织反革命集团，要命的罪名则是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至于“手榴弹事件”是怎样移到遇罗克身上的，还要等相关审讯档案全部公开后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中学文革报》首期发行获得巨大成功，更刺激了我们办报的热情。“敌敌畏”成立之初，就想办一份铅印报纸，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天遂人愿，百朋通过一位朋友借到了一张南口农场的五百元现金支票，又找到一张“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中学部介绍信。立即就去六部口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批纸，第一次购买了二十令新闻纸，每令五百五十张（其中五十张为损耗），好像是一令十七块五毛。再到广安门纸库提货，由百朋等人运至沈大伟家堆放。跟着就是印刷问题，先后找过西四印刷厂、西便门印刷厂和花园路解放军画报社印刷厂，皆遭拒绝，最后位于北太平庄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只把春来报》报名出自张育海的创意，选用毛主席《咏梅》词中的一句，“报”字一语双关，真的妙极了。由于急于出版，很快选用了本班同学范泰林自荐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和育海力荐并由他加上“编者按”的清华大学“五四战斗组”谈干部子弟的文章。我写了一篇小文作为发刊词。

一九六七年二月创刊号问世时，《中学文革报》已出了四期。首刊较为平淡，没能引起社会反响，却留给日后藏报人一个悬念。这就是登载内容完全相同，却存在两种日期，一个是二月二十三日，另一个是二月二十六日。盖因印刷厂为了赶制学习《毛选》的宣传材料，而中途下版，等到第二次上版时，将日期剔改。说实话第一期出版后，我们并不兴奋，面对《中学文革报》的巨大成功，决定赶快讨论“出身”问题。两周之后，三月十二日第二期出版，刊登了署名第五研究小组的《论出身》。

尽管当初在高二（二）班辩论会上，我们曾经公开反对过“对联”，百朋还与对方发生了激烈抗辩。但是由于阶级教育与赎罪教育的结果，不能不考虑现实安全。血统论必须批判，但完全否定出身作用也行不通，不是我们不想彻底否定，而是心有余悸，怕落下“阶级报复”罪名。那么，仿照《宣判反动“对联”的死刑》的路数，站在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批判，也不是我们的风格，况且时过境迁，再老调重弹，恐怕也没人感兴趣。出身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而不是纯粹的党内路线斗争的附属品。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非无产阶级出身青年的命运前途，绑在了爹妈的成分与政治问题上。“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在执行上，越来越向简单明了的“成分”集中，而“表现”变得更像说辞与遥不可及的橄榄枝。我们决定在“重

在政治表现”上大做文章，弱化而不取消“成分”作用。最终以张育海为主，沈大伟与吴景瑞辅助完成。《论出身》发表后引起了社会注意。记得当时一车报纸四万余份，在西单东北路口叫卖时，排起了长队，二分钱一份，不到三个钟头就卖光了。

在非此即彼、非红即黑主义盛行的年代，是不承认中间路线的。不可否认中间路线从来具有倾向性，因此《论出身》一出，即被扣上对《出身论》小骂大帮忙的帽子。办报期间，常有一位《红旗》联络员来四中了解情况并索要报纸。此人低调谨慎，只发问而从不发表意见。有一次在教研室小院中，一帮同学围住他，非逼问他对《论出身》的看法不可，他终于经不住同学们的纠缠，说了一句“基本上是《出身论》的观点”。我正好路过，听得此言，回去告诉育海、百朋诸位，大家听了不免有些怅然。毕竟戚本禹刚刚对《出身论》表过态，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

《只把春来报》从筹办那一天起到结束，谈不上什么管理，组织成员共六位，除了“敌敌畏”的五位之外，再加上高三的沈大伟，大家从来没有坐在一起正式讨论过类似问题，从来没有设过主编、副主编之类的职务，更不用说分设二级部门管理出版、发行、财务、编辑等事项了。彼此之间灵犀相通，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比较默契。每期报纸的主题，则紧跟社会形势，只要一人提议，多数人不反对，即可实施。《只把春来报》受《中学文革报》的影响较大，从第二期起主要议题紧随其后。譬如《中学文

革报》第四期刊登《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只把春来报》第三期则有育海撰写的《从一封血书谈起》。

无管理的结果也使本报出版周期紊乱，最短的两周，最长的一个多月。每期报纸印制，都是在稿件凑齐后交到人教社检字科，由该科的沈师傅负责划版，容量问题通常用字号解决。内容多则字小，反之则字大。排版以后，毛校、一校都在检字车间完成，我们只负责终校。

一九六七年初夏，“军训”与“复课闹革命”已经开始，纸张已停止供应，报纸不可能再办下去。为了用光存纸，必须尽快出报，因缺乏满意稿件，故用两个版面刊登了方成、丁午和我的初中同学纪成岐的漫画，于六月二十九日出版了最后一期。从首刊二月二十三日算起，四个多月共出版了五期。

从“敌敌畏”到编辑部，我们这个团队不像是个组织，倒像是沙龙或联谊会。我对外常说我们是《只把春来报》俱乐部，育海、百朋皆以为然，很快就叫开了。为促进四中各派大联合，本班成立的“捲巨澜”，就是在俱乐部基础上临时组建的，与另外三个班内战斗队相比，历史最短，但人数最多，皆因“俱乐”性质比较招人喜欢。

《只把春来报》每期印制四万四千份，其中四千份属于预算的百分之十的损耗。停刊结算后，剩下五百六十余元，五百元归还给南口农场，剩下的买了拳套、板带、篮球、足球等文体用

品，由班内公用。

## 七尺男儿从天埋——育海其人

育海是《只把春来报》主笔。这张小报倾注了他的心血，也是他短暂生命历程的志趣性情事业证明。我与之订交始于上高一时的馒头事件。

一九六四年我由二中考入四中，开学后被安排与百朋同桌，马上熟悉并很快成为朋友。育海是因肺结核休学一年，而降到我们班的，开学差不多一个月，他才出现，没有引起我注意。那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教育紧锣密鼓的年代，忆苦思甜教育盛行，一时间革命家书铺天盖地。

冬日一天的傍晚，放学后召开班会。班主任动情地朗诵了一位同学母亲的家书，讲的是这位同学的姥爷在旧社会逃荒要饭最终吃香灰而死的家史。故事很感人，全班同学无不动容。家书读罢，依照惯例，班主任先要引导启发，接着同学们暴露思想现身说法。班主任不愧学中文出身，虽是老生常谈，却激昂顿挫，由大到小，终于联系到了班内实际，伸手从讲台内拿出半个干馒头向空中一晃，厉声问道：这是什么行为！刹那间穿越时空，浪费粮食与饿死对接上了。教室里安静极了，夕阳早已隐去，窗外一片漆黑，身后的火炉已是有气无力。顷刻之间，群情激昂，都指向了丢弃馒头行为，炽烈得足以使火炉熔化。调子也越升越高，

直至把丢弃馒头说成是喝先烈的血。

我听得一头雾水，不想发言也不敢发言，因为不知道怎么说，说什么。我也为同学姥爷悲哀，可是再怎么想象也无法把眼前的干馒头和昔日死者的悲惨遭遇连在一起。不就是半个馒头，犯得着大动肝火吗？或许是饮食观念作怪，我家一向不主张多吃，也允许剩饭，自幼就老听大人说“与其撑着，花钱受罪吃泻药，还不如当初少吃点呢”。于是裹紧大衣，趴在了课桌上。

突然一声断喝“谁扔的，站出来!”随即右后方椅子滑动响声传来，站起一人。回头一看是育海，撅着嘴，瘦长的身躯显得有些佝偻，双手撑着课桌，一脸忧伤无奈的样子，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漫长阴沉的班会终于盼到结束的曙光。

“馒头事件”后，育海反倒引起我的注意，与之交往渐密。他待人真诚、坦率，不拘小节，生活俭朴随意；聪睿好学，尤喜理科。若非“文革”中断学业，必定能成为出类拔萃的科技精英。平日相与畅怀，深感其志在数理科学久矣。

一年半以后，文化大革命风暴降临了，一夜之间校园沸腾了。从此这六届中学生永远告别了中学课堂。

育海也许是第一位走向外地“串联”的中学生，一九六六年六月，他看到街上“兰州告急”求援的传单，便扒火车去了兰州。此时社会、学校秩序尚未大乱，正当我们懵懵懂懂不知所措之际，育海特立独行，让人感佩叹服。

《只把春来报》停刊后，育海就力主不能荒废光阴，抓紧读书。他占据废置的教师食堂，将门堵死，出入由灶口。灶口矮小，进出必须深弯腰。屋内用大量的废桌椅搭建曲折通道，迷宫一般。这里曾是他读书与聚会的地方，不过时间很短，随着“大联合”秩序恢复，就撤离了。之后我们改去他家聚会。

张家在钱粮胡同北巷，院子不大，南北房相对，各三间半，他家住北房，南房“文革”后搬进一家街坊。西头半间，前头向外伸出少半间，育海起居读书就在这里，他戏称是他的“老虎尾巴”。读书当然少不了马列毛著作。此外，他最想读的是《资治通鉴》，但全本找不到，只得读节选本。从那时起，我就隐约感到他放弃了走父兄的科技道路，转而对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做事效率极高，乱中取静，入定极快。譬如，我们一起串联在黎塘等车的时候，那时行车时刻完全打乱了，不知何时来车，又不敢远离，只能耐心等待。只见他找了个角落躺在地上一会儿就睡着了。再如，有一次他来我家聊天，见桌子上有一本英国萨道义著《外交实践指南》，拿起翻阅，不一会儿就沉浸在书中，见状，我只得干自己的事。将及中午，我弟弟叫我吃饭，他才如梦方醒，起身告辞，还没来得及留他吃饭，就已经远去了。

人称育海是四中的“大痞子”、“大疯子”。其实，所谓“痞”，是他完全颠覆了教育所提倡的循规蹈矩和一本正经。他厌恶道貌岸然的说教，厌恶刻意营销自己，厌恶沾沾自得的绅士派

头，平日不修边幅，也从不在乎别人的议论指摘。似乎服装到他身上就不能平整似的，冬日一件蓝格短大衣，扣子永远系不全，栽绒帽子两个护耳向上折起时，常常是一支垂向帽顶，另一支耷拉下来，走起路来呼扇呼扇的。一次在学校大门口，远远地见他晃晃悠悠地走来，近前一看，蓝格短大衣紧裹，腰扎草绳，栽绒帽子歪戴，见我就问“宝臣，看咱扮的平板儿车夫斯基（对拉三轮的戏称）像不像”。所谓“疯”，是他干什么事只要参与，一定全身心地投入，精力充沛仿佛不曾疲倦过。性喜冒险，他母亲禁止他骑车，他却积攒下零花钱，背着家里用三十块钱买了一辆旧车，这辆车真的像侯宝林相声《夜行记》描述的那样，除了铃不响，其他地方哪儿都响。可是他就敢骑这辆车，一手扶车把，一手抓住疾驰卡车的后槽帮挂钩，一路从美术馆直到西安门。无论是“串联”还是郊游，凡够得上有探险价值的地方，他总要尝试一番。一次到碧云寺，登上五塔，他借助两塔之间的空隙，双手支撑悬起，登上主塔外檐，迅速攀至塔顶，我们在下面无不揪心。以世俗实用眼光来看，无谓的冒险很不值当。不过世间的事情若都以有用无用、能用不能用来判定，十之八九要丧失创造力的，同时也会丧失情趣、乐趣与快感。冒险性格必出自天性，不在目的而在过程与展示的体验。

育海对这些绰号从不理会。英文 John 的发音近似张，而汉译“约翰”又与育海发音相近，故他自称“约翰”，也愿意我们这么

叫他。他读苏联十月革命史著作，对红军之父列夫·托洛斯基的才干甚是钦佩。办报期间，偶然看到了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读后推崇有加，经常挂在嘴边，仿佛不知道托洛斯基是“反面人物”似的。我便与之开玩笑说，干脆叫你约翰·张洛斯基算了。

一九六七年初夏，中学运动的使命实际已经终结，只不过学生被激发的革命热情还没能立即冷却，仍幻想通过彻底革命支撑起个人事业的一片蓝天，可是盼来的却是上山下乡。凡是推行阻力大的政令必以“运动”形式出现，明明是生产萎缩，城市就业艰难，却偏要说到农村去更有作为。如果你拒绝，一定累及父母家人，一并被扣上抵制“上山下乡”的帽子，直到屈服为止。

高考废除后，我们就感到前途不妙。我与百朋在四中游泳池边上还谈论过去新疆建设兵团的事。一九六六年冬，西北农垦战士来京，到西四羊肉胡同农垦部造反，很是热闹。育海、百朋去过后，约我再次前往。到了那里，只见楼道过厅满是横躺竖卧的青年男女，有的还在打情骂俏，一片乌烟瘴气景象，我不禁流露出厌恶目光，不想百朋说了一句：“甭急，待会儿再看，将来我们也许还不如他们呢！”我们去了一间屋子，翻阅凌乱不堪的昔日内部材料。读之真的惊呆了，六十年代以后，一些农场几乎成为城市出身不好青年和劣迹青年的发配所。这难道就是我们向往的地方吗？刚进门时的厌恶顿变作愤怒、同情与悲凉。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育海口无遮拦，一语中的，说知青下农村无异于“贴钱劳改”。我们在思想改造的教育环境中成长，面对世界，愈到后来愈常发生困惑彷徨，归根结底，就是体制宣传教育与现实感受之间的冲突。读书思考的结果，唯一能自己做主的只有做清醒的愚民一条路可走，而注定逃离不了劳民与贫民的命运。我曾戏称这就是我的新三民主义。

就在“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走向高潮的那年冬天，育海遇到了麻烦，外边有人来四中，到“工宣队”揭发他诬蔑林副统帅。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被叫到原数学教研室。进去一看，六位“工宣队”队员、一位解放军，已经在那里。他们让我坐下，然后开始问话，东拉西扯好像是拉家常，我不明就里，想不会如此简单。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一位突然发问：“听说你与张育海的关系不一般，一块儿办报，还常去他家聊天，你们都聊什么?”“瞎聊，现在已记不清了。”我脱口而出，也立刻警醒，大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在几个月前，有一次在育海家闲聊，中途出来上厕所，刚一开门就见窗下站起一位中年妇女迅速进了对面屋子。我惊愕不已，回来后和育海说起，大家一致认为是偷听，也决定不再到他家聚会了。

“你们议论没议论过林副主席?”

“没有！我们聊的就是游山玩水、照相的事情。”

不断盘问，回答的不是记不清了就是不知道或不清楚。

“工宣队”顿时失去了耐心，命令我站起来。一位刘姓师傅拍桌子瞪眼睛咆哮起来，连祖宗三代都骂遍了。他本是汽运五厂的装卸工，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志得意满，常常用这种粗暴恫吓，逼迫“有问题的人”交代，据说相当奏效。不过令他失望的是我没那么好吓唬，我估计他什么也不知道，不然以他那火暴脾气，早就耐不住性子点拨我了。倒是另外一位苗姓师傅一直态度温和，他的一句俏皮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你倒好，一问三不知，神仙也怪不得。”这无异于一服清凉剂，醍醐灌顶，我差点没随口说出：既然连神仙都怪不得，你们还费什么劲，非让我说什么。他们见我如此态度，就让我站在那里好好想想，不再发问，而各自做自己的事情。

眼看已经九点了，最后一番轰炸开始了，可是我依然如故。那位刘姓师傅终于拿出了杀手锏：“你再不说，也甭想回家了，明天台上见，看你说不说。”我一语不发，任凭他们怎样诈唬。差不多又过了半个钟头，一位留守的“军宣队”负责人终于出面圆场：今天先到这儿，你先回去好好想想，想起什么，随时来报告。屈指算来我在这里已经待了将近六个小时了。我不太相信他们能把我留下，然而真的把我留下，一天两天三天或是更长，施以威逼利诱，我将会怎样，真不好推测。所幸的是他们再没有找我。

我们确实议论过林彪，只不过是以貌取人的揶揄玩笑而已。

我们只是一帮学生，与副统帅的距离那样遥远，凭什么反对一位主席刚刚提拔起来的接班人？当然这些议论如果被指实，必遭到严厉惩罚。

“文革”中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免让好事又胆小的人回归动物世界，遇事出于本能，往往急于择清自己，而不去考虑他人的灾难。我能够挺住也算不得仗义，我知道情急忙慌乱咬他人，一定会惹火上身的。我得感谢我的祖母，小时候我和其他孩子一样，犯了错被大人逮着，一定是百般辩解尽情推卸，全是别人的错。可是让我祖母遇见，她从来不听我解释，只要我一张口推诿，立即命令我住嘴，随之就是罚站面壁自省，直到我“赎嘴认错”为止。她常说一个男孩子遇事就慌，不敢担当，受不得委屈冤枉，长大了能有什么出息。正是这种罚站思考的做人训练，逼我不得不思索，不得不想办法摆脱怨恨、委屈的困扰，从而建立自省、担责、冷静的信念。人能管却往往管不住的就是自己，想管住却根本管不了的是他人，与其改变世界，不如改变看法。看法变了，世界就变了。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把秋天以来的“上山下乡”运动推向高潮。

十二月二十四日，百朋、刘捷等人赴山西山阴县插队。二十三日在百朋家的小东屋我们几个聚在一起算是给他们送行，气氛

有些沉闷压抑，没了平日的高谈阔论欢声笑语。大家再次一起合影，与平日不同，育海张开双臂搭在我们几个的肩上。

育海决定不参加学校分配，而远走云南农场。我与何大明商定二十八日蹭知青专列去山阴探望百朋等诸友。二十七日晚上九点多钟，我与育海一道回家，出了校门，我推着车与他沿着西什库大街南行，一路上默默无语，不时地相顾一眼，露出无奈的苦笑。冬日的寒夜，街上静悄悄的，平日昏暗的路灯，竟那么刺眼，手脚冰凉，却没有马上离去的意思。是兄弟之情的眷恋？还是预感到了生死离别？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们已经说得太多太多了，此时此刻慰藉、鼓励似乎已经多余。走过北海大桥，该分手了，两只手紧握在一起，对视的那一刻，禁不住泪水模糊。这时来一辆三路无轨电车，他说问杨（百朋）他们好，转身奔向电车。望着他疾去的背影，仍是那件蓝格短大衣，栽绒帽子的护耳飘忽不定。吴梅村“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顿时萦上心头。我呆站着，直望电车远去，才蹬车回家。

幼时长辈授读苏东坡《留侯论》，常说能忍少年刚锐之气的人能做大事。上高中后结识育海，发现他是一位能忍得冤枉、忍得议论、忍得困苦的人，却一刻也忍不得庸碌乏味的生活，忍不得虚度年华的生命浪费。他远走云南，不是因为组织系统的分配，而是冒险性格所致。其实以他的肺结核病历，完全可以“病留”北京，即便身背“反林彪”悬案，也很快就不了了之了。然

而乏味的等待，不是他能忍受的。

十二月三十日，育海毅然出走。他先到昆明去找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几经周折，终于获准去瑞丽农场，就在去农场的路上结识“缅共”方面的老苏同志，立即决定随他而去。他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一日参加“缅共”游击队，六月二十一日战死沙场，前后仅仅一百三十一天。

育海参军以后，便给家里写信报平安，也接上了与同学们中断了半年的联系。几位同学给育海去了信，很快得到回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六月二日复何大明的信。这封信长达三千余字，娓娓道来，情感真挚，自心底流出一位长兄对昔日朋友的期待与开导。正当知青彷徨困惑、处处碰壁之际，这无疑是一缕清风，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他说：“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在前途渺茫、走投无路的知青眼里，这无疑是条无限灿烂的路。

育海虽然对自我选择的道路表现出异常坚定，却绝不希望好友步其后尘。他说：“要珍惜和平和幸福，例如：不饿饭、夜里不必半夜起来站岗、转移，不必倾盆大雨爬泥泞的山路，不必雨中往山头冲击等等。适应战争太不容易！”他怀念朋友，希望朋友们平安上进，在给育堂三哥的信中曾说：我正在站岗，想到了我的这些同学，他们都是我的手足，我感到心如刀绞。

育海服膺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学说。他对拿破仑统率法国孱弱的军队完成欧洲霸业十分崇拜，尤其欣赏“不是命运特别眷属他，而是命运降临时能够抓住他”这句名言，所以紧紧抓住了天赐的参与“缅共”革命的机会，梦想开创一番事业，甚至设想了缅甸革命胜利以后情景。抱负极大的人必定是自负的，必定拥有舍我其谁的气概。这种自负绝不是轻狂，也不是傲慢，更不是自吹自擂。育海平日最讨厌色厉内荏、沾沾自喜与炫耀自吹的作风。读他的来信深深感到他的变化，一改平日倚仗天资聪慧，不知限制自己兴趣的毛病，而全神贯注于自己选择的事业。

育海来信在好友之间传阅后，很快被传抄，每次复写五份，以几何级数的增速在北京知青中传播，引起官方的注意。毕竟信中暴露了知青的困境：“消沉、痛苦、颓废、堕落，或发疯或自杀，有些人几近土匪。十几年的教育，学生成了一些胸怀大志，但是没有生活能力的人；一旦原来习惯的生活道路走不通，落到从来没有想到的地位，物质条件、精神生活条件极低，而且远离亲人，远离（现在回想起来更加）灿烂的城市和家庭，自然要感到前途一片黑暗，不知怎样熬下去，而被单调的生活、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得精神分裂!”这与官方报道大相径庭，虽未见官方公开彻查，但“反动信件”的传闻日盛，让何大明有点寝食难安。

育海来信激起了同学们跃跃欲试的雄心。育海之路的憧憬，起码可以解决现实的烦闷与无奈。

最终只有一位勇敢者踏上了征途，他就是育海挚友，也是《论出身》的作者之一，北京四中高三（二）班的沈大伟。大伟满怀希望与育海会合，共同战斗，不料迎接他的却是育海牺牲的噩耗。三个月之后，大伟也在战斗中牺牲，而子弹是从背后打来的。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一次遭遇战中，面对敌军密集的火力，育海为了扭转战况劣势，奋不顾身地冲出隐蔽所，端起机枪横扫，终于改变局势，自己却永远倒在了异国冰冷的土地中。

育海阵亡消息是沈大伟传递过来的。之后，我与百朋、刘捷、渠川玙共同发起纪念育海活动，主要就是收集育海照片，放大结集一本相册，并连同育海给同学们的来信原稿一同交给了育堂三哥。

育海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留英工程师，母亲供职于北京工业学院（今理工大学）图书馆。兄弟四人，育平、育曼、育堂、育海，皆以出生地命名。育海最小，他母亲叫他小四，哥哥们称其老四。他的母亲许幼芬是一位善良和蔼谨慎的知识女性，也许育海最小，又较早失去了父亲，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爱。育海阵亡以后，兄长三人为了不让病中的母亲着急，合计决定暂时封锁消息。不久以后张家换房从钱粮胡同搬到了西城石驸马大街，而他母亲的病愈来愈重，被育曼二哥接到清华大学六公寓奉

养。我与百朋、刘捷经常前去探望，而每一次的探望都是沉重的，老人想念儿子近于疯癫，常是泪流满面地反复呼喊：小四怎么还不回来？两年以后，这位善良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育海出走前后，确实有位漂亮高挑的女人经常出现在张家，不过，她并非育海的红颜知己，而是张家亲朋故交中人。所谓“小四女友”要等待育海归来只是美丽的文学创作，并非信史。

多年以来，不断有人问育海的死究竟值得不值得，而每一次我都回避了，真的不好妄下断语。自从人类赋予生命各种意义的那一刻起，死亡价值也就不那么简单了。不过，作为战士，育海深知自我选择之路的风险，对死亡的认识也极为清醒。他说：“大多数牺牲，不一定很壮烈，冷枪冷炮激战中，冲冲就被打倒，甚至没有到位置没有打抢，连敌人都没有看见就完了的也不少。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死也往往是受伤，因后方医院远，来不及治，流血多，经过长途痛苦地挣扎，头脑清醒地死去。”

记得曾文正公曾对吴敏树、郭嵩焘说过：“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据饰，铭辞结句，吾自有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可惜命运之神没有眷顾育海，没有假以天年让他施展才干。然而，路既出于自择，那一定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 飘然孤行者——毛子逸事

其实，好友之中，育海并不是第一个出走的，吴景瑞早在一年多以前已经离开北京，不知去向。景瑞来自八中，个子中等，背微驼，头发稀疏而坚挺，嘴大而微凸，一双明亮滴溜转动的眼睛，透着几分狡黠，平日着装随意不怎么整洁，似乎患有慢性鼻炎，总是忍不住地吸溜，收回溢出的鼻涕。只要陷入思索，必用食指与中指夹鼻子的两侧，不一会儿鼻尖就冒汗了。他的父亲是原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负责国际邮政结算的官员，一九四九年以后留用，任职邮电部，一九六三年下放邮电学院（今邮电大学）教书。兄妹五人，他行四，家人称他毛子，我们入境随俗，也跟着这么叫。

毛子与育海一样，极富冒险精神，不同的是，他没有育海那么多的革命激情和理想主义。“文革”刚一开始，他也去了兰州，回来后，又与牟志京去了越南，不想一入境就被发现，遣送回来。一九六七年初夏西单商场武斗，他闻讯立即前往，混了进去，不幸被气枪流弹击中左眼眶下部，万幸没有伤及视力。他在《中学文革报》草创之初，曾是其中一员，不知为什么退出而加入我们的行列。育海撰写《论出身》时，他自告奋勇，担当文章后半部的主要工作。平日好读书，尤喜大部头经典著作，悟性亦佳，想法奇特常有出人意料者。

他胆大心细，性好博弈，与朋友相交讲义气。最喜欢和百朋

打赌，虽然十之八九，以他失败告终，却屡败屡战。他好围棋，技艺不佳，却爱挑战。有一次，他声称一定能赢我，于是开战。就在他败局已定，我劝降催促其认输之际，他却陷于长考，习惯动作不止，样子极其认真。我等得不耐烦，便与旁边的同学聊天。他趁此暗自挪动盘上棋子，而使自己的大龙活出赢得胜利，偷袭成功之后，眉飞色舞十分得意。我哭笑不得，怎能理论得清，只好推枰认输。事后他也不否认，说这是盘外招，兵不厌诈无中生有，谁让你光顾得聊天了。他对熟人同学，从不虚与委蛇，只要性情投缘必倾心相待，否则一定疏远，也不隐讳自己的看法，交游圈子远不如育海广泛。他家住在邮电学院，校外就是庄稼地和果园，他半夜去掰棒子、摘桃子，不止一次叫我们几个到他家开玉米聚餐会和蟠桃会。

《只把春来报》停刊前后，毛子急于弄到一笔钱，一个展览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九六七年六月，经过八个多月的筹备，“红卫兵破四旧展览”终于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了。所谓“四旧”，系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际上，破除四旧的战果不好也不必通过展览表现。人们就生活在打破旧世界的展览中，每天一睁眼，满目疮痍，该烧的烧了，该砸的砸了，该毁的毁了。看见的，听到的，说起的无不是横扫、破坏的成果。满大街的店铺纷纷换成了革命名称，门脸涂抹成一片红海洋。至于旧思想是否真的被涤荡殆尽，则无从验证，谁也没有进入他人内心世

界查看究竟的本事。不过全民话语、行文为之一变，一道进入了喊口号、表决心、诉忠心的时代。

其实那个展览叫做“抄家成果展览”更为确切，更符合展品构成。所有的陈列都是抄家得来的，除了用来证实阶级敌人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如枪支弹药、地契、变天账、国军军服、委任状、反动日记、反动诗文之外，最让人心动也最能体现抄家成就的是那些金银财宝和现金。毛子去参观过一次，便萌生了一个可怕念头。他回来说起那些金条金砖金元宝时两眼放光，能想得出他当时垂涎欲滴的样子。也许是说得口滑，他按捺不住流露出盗取的意思。我们以为不妥，不过他有他的说辞，狡辩也好，歪理也罢，听起来很是入耳。现金不用说了，金银也是官方承认的硬通货，按理不应划入“四旧”范围，可是红卫兵打着“破四旧”旗号，明目张胆地从人家里抢走不是“四旧”的东西，岂不就是发不义之财？既是不义之财，他去拿也算不上偷盗，而且还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开始我还以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不承想他还真的去了，可是建筑结构远比他想象的复杂而不得不罢手。他真是胆大包天，幸亏知难而退失败了，不然不知要闹出多大的乱子来。

此前，他确实也弄到过一些浮财，但还没等到自己拿去换钱，就被他信任的寄存之家弄得不知去向。毛子爱钱也需要钱，对于金钱的认识远比我们成熟，但他从来没有把手伸向过报款。他急于弄钱，完全是为了出走准备。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下午，毛子终于走了。那天我和百朋去北京站送行。他没太多行李，一挎包，一小旅行袋，谈笑风生，全无留恋之情。他说先去东北，然后见机行事，走到哪儿算哪儿，总之不打算回来了。还特地告诉我们，他此前找过陶洛诵，并请她到北海公园划船聊天。我们知道他心仪陶氏久矣，这也许就是男校青年萌动的初恋吧。有朋友也曾假设，如果当初陶洛诵接受了毛子的爱意，或许能让他留下来不走？我想恐怕没那么简单，毛子一向好勇斗狠，绝不会受任何情感的羁绊，而打消早已坚定的信念。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他对我们说，走吧，待下去没什么好日子过。他走向车站，再没回头，一会儿就淹没在人流中，从此音信皆无。就在那一刻，我隐约感到，他早就有了出走的念头，回想起上学时，他拼命地练习长跑与游泳，几近自残程度。是不是就为了出走在做准备？毛子真是一位充满个人奋斗情结，不服输不认命，神奇而又令人捉摸不定的人物。

岁月流逝，“血统论”悲剧一去已四十余年。中国人遇到麻烦难缠的问题，总喜欢归为历史传统。我常想，历史传统果真有这么大威力吗？什么是历史传统，东拉西扯宏论一番似乎可以蒙倒一片，但要认真梳理，恐非易事，亦难概括成条条，替今人担下罪过。不错，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与血缘意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在社会活动中，总摆脱不了血缘信任。历代朝廷为了维护家

庭完整稳定，甚至不惜放过眼见的罪犯，而允许“同居亲属相容隐”。“文革”伊始，一方面，把这一融进中华民族血液中的血缘信任升华为巩固政权、继续革命的信条而大加发扬；另一方面，却在彻底革命的名义下不断地上演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争斗、朋友弃义的亲缘悲剧。

传统社会从来没有提倡过背叛家庭抛弃父母批判父母去求功名富贵。相反，如果谁这么做了，将会受到舆论谴责与司法追究。朝廷在选才用人机制上，一反“亲属容隐”的宽容，特地制定了血缘回避与地缘回避制度：同一亲属不在同一行政系统内工作；科举考试，参考人回避亲属主考官员而取消考试资格；官员不在家乡省份任职。皇朝明白，将血缘信任引进国家管理中，必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增加结党营私机会，分享本属于君权一统的国家利益。

文化大革命一再宣称要与传统彻底决裂，创建全新的社会价值观。诸如：“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贫穷光荣”，“劳动神圣”等等。这种在具体语境中对具体对象而发的议论，并不能扩大到放之四海而皆准，成为全民的行为准则与终生追求。实际上，最聪明的人几乎没有人不想变为最愚蠢的人。世间也许只有那些曾经富贵的人能够产生对富贵的厌恶，而贫穷的人大都不会放弃对富贵的孜孜以求。同样，贫穷光荣与劳动神圣，只不过是恩赐给人们的一种心理安慰剂。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

见对贫穷与体力劳动的厌恶歧视。如果价值观果真被当权者与社会彻底认同，怎么会对那些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实行制裁时，无一例外要取消待遇，放逐进行劳动改造。体力劳动已经成为惩罚的最常用手段，可见其在社会中的真实地位。在彻底摧毁传统伦理与价值观念的运动中，必然形成道德宣言与实际追求之间的悖反，道德宣言充斥社会，实际行为龌龊不堪。

现在无从考证是谁，也没有谁站出来争夺“对联”的发明权，但它是“老三届”红卫兵的专利是不会有争议的。如今公开的优势群体利益维护与劣势人群人格歧视已经荡然无存，社会走向开放平等，可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血缘友爱、血缘关照、血缘信任、血缘纽带营造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并没有因政策废除而消失殆尽。时下血统关照仍然大行其道，成为职场公平竞争的杀手，就业演变成家庭社会地位与关系资源的角逐。

也许用“知易行难”来形容血缘关照的社会认知与实践的各自程度，再恰当不过了。似乎人人都明白家族、亲信、裙带用事，对社会、国家各项事业的危害，但是社会实际发生的状况却与此认知水准大相径庭。看来人类超越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太难了。西方不是也流行“施舍先及亲属”的谚语吗？面对血统关照与血缘信任的盛行，寒门子弟进身之路愈来愈窄。我们有理由时刻保持警醒，绝不能让它再次成为社会公平的巨大障碍。

# 四中的“先生”

黄其煦

黄其煦，笔名维一，北京四中六六届初三（一）班学生。一九六九年先赴内蒙古阿荣旗农村挑水种庄稼，后去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砍树栽橡胶。一九七二年回京闭门读书。一九七六年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大门。“文革”结束后，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后到德国科隆大学继续研读。一九八九年后，至美国哈佛大学及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访学。现任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一九六三年的暑期一过，到了秋天，我升入中学。录取我的学校是北京四中，一所在京城还算说得出去的学校。所谓说得出去，我想原因无非有二，其一是学校的历史长久，建校于一九〇七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四中初名顺天府中学堂，这是有碑文为证的。然而四中之为四中，而不是一中，可见它又并非

是京城里最老的中学。

京城里的一中、二中和三中都比四中办得早，只是这三所学校原先全部是前清朝廷为了培养八旗宗室子弟而设的贵族学校。东城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里面的北京一中原是清人入关以后设立的高等宗学，据云距今已有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清政府又分设清室觉罗八旗左右两翼宗学。八旗左翼宗学位于如今的东城内务部街，右翼宗学原在西城石虎胡同，后来迁往祖家街，其地就是明末清初名将祖大寿家的宅子。一九一二年入了民国，它们分别改为京师公立第一、二、三中学。有了诸如此类的一番来历，京城里这几所最早的中学堂便显得不但历史悠久，其名人逸事与顺天府中学堂相比也不遑多让。民国元年京师中学堂重新排定座次，有它们在先，顺天府中学堂只能屈居其后，成为第四中学。

幸好四中还有第二个可以说得出去的理由，这就是它乃京城里第一所并非面向权势贵胄，而是以平民子弟为教育对象的中学。自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起，由于袁世凯和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的极力推动，废除了科举，参照西洋成规施行癸卯学制，社会教育风气为之丕变。四中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倒是确实值得一表。

大概正是因为其历史的久远，作风平民化的缘故，四中的名望才得以不坠。而另外一面，四中挟其声誉而依然故我，固守成

规的传统惯性也就颇大，其中让我记忆最为清楚的就是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学生仍然坚持将教员统统称为“先生”，而且无论男女。如果想到当初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已是风雨满楼的时节，就更加能体会出其中不为外界所动的独往独来精神。

在以往的中国社会里，读书人不做官，或是做官而不做贪官，便免不了清贫，但是一般民众对于读书人总还是看得起，称作“先生”就是一种尊重。后来是因为上面慢慢地怠慢了读书人，称人为“先生”反倒有了一些瞧不大起的意味在里面，不过这也端看说话人的立场。例如我家邻居的房东李太太，出身旗人世家，最是讲究礼数，从来都是称我的父亲为“先生”，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斯文扫地之后，她才在公开场合改口称父亲为“同志”，不过在院子里仍是叫他“先生”，出了大门如果没有旁人私下里也还是称“先生”，只是声音低了许多。后来父亲被造反派抓了起来，李太太虽然搞不大懂“人民内部矛盾”或者“敌我矛盾”这些名堂，但也明白不好再称父亲为“同志”了，只好随着我的辈分，拐弯抹角地称父亲为“毛毛他爸”，说完还总要迟疑片刻，觉得到底有辱斯文。可见在李太太那里，称“先生”永远是怀着一种尊敬。后来我特别尊重旗人和旗人的礼数，道理就在于此。

可是自从熬过“三年困难时期”后，在公开的场合已经很难

再听到“先生”的称谓了。我升入中学之际，广播、报纸当中终日都是“移风易俗”、“兴无灭资”这类口号，此时称教员为“先生”其实已有非常棘手之处。多少年之后，我的一位同窗谢兄对我补充说过，当年就有两位教师因为坚持让学生管他们喊“先生”险些划成右派，后来还是因为右派定得实在太多，而上面下达的名额有限，这才将他们剔出在外，逃过一劫。几十年后改革开放，“右派”平反，这两位教师成了德高望重的特级教师，报纸电台纷纷凑趣采访，他们这才敢向报界透露当年这段有惊无险的经历。因此，虽说四中有的教师还是愿意学生喊他一声“先生”，觉得到底校园里还存有几分对师长的斯文尊重，可也有的教员觉得学生叫他“先生”是对他见外，唯恐长此以往被划为另类，心中惶惶，总担着一份心。这也是时势所趋，无可奈何的事情。后来我就此向一位高我几班的学兄傅同华请教，他的一席话让我如梦初醒，发现里面确实还有如此这般的一番学问。

记得那是我上中学不久，有天我向傅学长讨教对教员的称谓，他沉吟片刻说，一般来讲，咱们四中对老师都是称“先生”，当然女教员也不例外，要称“先生”。不过如今风声日紧，政治身份最好还是要讲究。我看你不妨认定这样一条标准：凡是职务有政治色彩的，例如管人事档案的，负责安全保卫的，教导主任、共青团书记，等等，甚至有些班主任，都不宜称作“先生”。你叫了，人家也未必愿意，但凡是科任老师，譬如教音乐的曹先

生，教图画的霍先生，那都最好依旧称“先生”，人家大都也特别受用。作为总体来说，“党内称老师，党外称先生”大致不会错得离谱儿。

我得了他的点拨，心中便有了些底，但拿捏这个分寸并不十分容易，因为对政治我一向懵懂。为了印证我的记忆大致不错，最近我特意向同学卢兄征询。他很靠牢地告诉我，我们那个时候确实不顾社会上的变化，仍然称男女教员为“先生”，只是他并不记得有“党内称老师，党外称先生”的政治标准，而且说，那些身在党内的教师听到学生称他们为“先生”，似乎并不见怪，听过之后也无愠色。如此看来，这一点还有待于今后的考证，姑且存疑。

记得刚上初一的时候，不知道班主任齐老师哪里来的这么大面子，居然请动了四中的“镇校之宝”，物理课特级教员张子锷老先生给我们班单独讲了一回学问之道。张老先生那时候很少在学校里露面，据云只是在升学高考之前会来校给应试的考生点拨一二，真称得上是金口玉言了。惭愧的是，如今我对张老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全然忘记，只记得张老先生讲完话，我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散了会，我从张老先生身旁走过，不知怎的，张老先生的目光突然扫到我身上，四目相对，我为了不失礼貌，赶紧对张老先生鞠了一躬，说声“张老师好”。因为那时我刚上初中，小学里已经没有叫“先生”的规矩，一时竟改不了嘴。

没有想到，站在张老先生身侧的齐老师有些嗔怪地赶紧纠正我说："哎，哎，你要叫张先生。"张老先生连忙摆摆手，笑道："一样，一样，都一样。"

我羞红了脸，但终于体会出"先生"比"老师"似乎高了一个层次。可何种人物，何种场合，如何使用，还真是一门学问，其中对女老师称作"先生"尤其不容易。

也是刚上初一的时候，我们班的英语教员是个二十出头、大学刚刚毕业的女教师，姓唐，人也长得漂亮。当时我被安排做她的英语科代表。所谓科代表，并非在这一科目里成绩优秀，只是分配给教员打个下手而已。例如地理课就有地图、地球仪之类的教具需要布置，化学物理课也要事先准备好仪器仪表，等等，因此教师都需要有人帮忙才好。不过英文课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教具需要准备，只是收收作业、分发卷子之类的琐事。我们班的英语教员是初来乍到，又是个女教员，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斟酌一番称谓。

正在迟疑之际，傅学长上次的话提醒了我：在四中，女教员一般也是要称先生的。于是我赶紧清理好思绪，到教员预备室与新来的唐先生见面。

尽管得了学长的点拨，心里有了底气，但到底是刚升入中学，第一次面见新老师，要开口叫女教师为"先生"也不十分容易。我大起胆子，打开房门先嗽了一下喉咙，然后把声音放自然

一点，喊了一声“唐先生”。大约唐先生也是初来乍到，听了这声“唐先生”似乎比我还不舒服。她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是在叫她，看了我一眼，还扭头环顾了一回，然后惶惑地说，你找哪个？

这时我倒坦然了许多，听她一问，连忙说：“唐先生，我就是找您。”唐先生听了，不好意思地飞红了脸道：“哦，原来是找我。听你叫先生，我还以为你找房间里面的哪位男老师。”

我这就摆出一点见多识广的样子告诉唐先生说，这是四中的传统，老师无论男女，一律称先生，今后您慢慢就习惯了。唐先生没说话，低头沉吟，似乎还是有些惶惑。后来，唐先生也就习惯成自然，乐于接受“唐先生”这个称呼了。

唐先生是个性情随和的人，我们都喜欢她。由此我又想起来一位同样也喜欢她的“先生”，然而我却对他叫不出“先生”，只叫他作“老师”，这还是我前年回京休假，经老同学提醒才想起来的旧事。

那次中学的同窗好友朱兄夫妇请我吃饭，还请了高我一年的一凡兄作陪。一凡兄与我多年未见，寒暄之际，他满面春风地一边大笑一边支起嗓门叫道：“还记得你我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吗？”

没等我回话，一凡兄立刻又说：“六九年那回，你被当作特务抓起来，关在鲁老师的看守所里，我去看我们班也关在那里的

同学大康。还记得不？你们，还有赵京兴，三个被关押的‘犯人’还以借捅火的通条为名互通消息？没想到吧，如今你们一个变成洋人，一个当了经济学家，一个还是大学校长了呢！”

这样的人生经历我怎么会忘记呢。那是到了“文革”后期，我家也因为父亲的问题而被机关军管会抄家，从我自己的房间里抄走的无线电零件装了几箱子。尤其是我对通讯很感兴趣，除了装置收音机、电视机之外，还自制了几台可以在野外旅游时候互相联络的小报话机。这些军人抓不到父亲的把柄，就移花接木将这些零件作为父亲“特务”的证据，我也被移送到四中工宣队私自开设的“牢房”里。虽说那个年月私设牢房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与“里通外国”、“特嫌”沾边儿还是让一般人谈虎色变。记得关押我的那些天，到食堂打饭，负责劳改队的鲁老师都要派两个“狱卒”提着体育教研室打垒球的木棒子跟在我的后头。

其实稍微懂点通讯基本原理的人一看就知道，用我做的这些装置从我家发信号，不要说和美国、台湾地区联络不上，就是公共汽车两站地之外的西单也接收不到，信号太弱。我知道鲁老师文化大革命前就是校保卫组的负责人，在其位也只得谋其政，但我一想起那座学生宿舍小院改成的看守所，一想起那几支可以随时打在我身上的垒球棒，让我将“鲁老师”改称“鲁先生”实在是心有不甘。

话说到这里，朱兄也似乎想起来什么，补充说，鲁老师自从唐先生一来四中就在追求她。无论大小各种场合，他都会钻头觅缝地寻了来，坐在唐先生旁边大献殷勤。

鲁老师与唐先生的这段逸事倒是记不得了，但这时我才感觉到，把有的教员称“老师”，有的教员称“先生”，这点区分还是很有必要，当年傅学长说得一点都没错。

除了教英语的“唐先生”和保卫组的“鲁老师”之外，我还想起来一位当初被我称为“老师”，而后改称“先生”的女教员，她就是我们初三年级的班主任张先生。尽管她在我们班只当过一个学期的班主任，但四十年后我对她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张老师教政治课，从说话的口气和平素人家对她的态度，连我这个对政治最为懵懂无知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叫她张老师绝对错不了。不过张老师对学生特别和气，还没说话脸上就堆了笑。那时候“四清”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班上团支书已经和我围着操场上的四百米跑道转过好几回，一再跟我“谈心”，嘱咐我不要和班上的某些同学接触太紧，免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张老师出奇的和气反倒让我受宠若惊。我心存犹豫，但还是按照学长的指点，起初叫她张老师，以免造次，后来我是通过一件小事才终于改了口的。

初三一开学，我就间接从好事的同学那里听说，新来的班主任张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单亲母亲，但又是个非常爱好游山玩水

的人，几乎每个周末都会约同学一起到京城里的大小公园名胜去游览。可是按照我做人行事的习惯，平素对班主任教师都是本能地退避三舍，所以这种游园活动我是能免则免，绝少参加。记得后来终于有个星期六放学的时候，张老师突然对我说：你好像从来不参加我们礼拜天的活动。这个周末，你要是没事，就一起来中山公园吧。

既然张老师已经发觉了我心中的小盘算，我就只好“舍命陪君子”了。那天出乎意料的是，我还见到早已和张老师离异了的前夫。后来有位和张老师过从密切的同学告诉我说，张老师的丈夫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张老师是个党员，受到的压力当然也不小，于是就只好和丈夫离了婚。可是婚后两人照样往来，几乎每个周末我们的活动，只要有工夫，她都会邀她的前夫一道来游园。张老师也从来不避讳，率直地告诉大家这些往事。听到这里，我大为感动，没有想到张老师原来是这么个有情有义的性情中人。所以下星期一上学时，我便上前和她打招呼，并且改口叫她“张先生”了。

其实，张先生在四中做了多年教员，经过的风雨无数，我一个十几岁中学生心中的盘算当然她是了然于心。不过张先生当时并没有声张，而是在放学的时候转身低声笑着对我说：“昨天游了园，今天就改叫张先生啦?”我只好支吾其词道：“那倒也不全是。”

初三第二个学期，张先生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班主任。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风声越来越紧，隔三差五的，报纸上还会点名批判某部电影，例如《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等等。当时电影一遭禁演，电影院里立刻就统统下档，从此与观众再也无缘，唯一的机会就只有等到开放“批判专场”，众人才能一饱眼福。记得那几天报纸上突然心血来潮，轮到了批判电影《桃花扇》。一听《桃花扇》遭到封杀，我们都在翘首以望，期盼着批判专场赶紧开始，就可以欣赏这部早在《大众电影》杂志上预告的新片。另外我从精通电影界掌故的同学那里还听说，出演李香君的电影明星王丹凤在接受角色的时候曾经对导演提出过要求，一定要找英俊小生冯喆扮侯朝宗来给她配戏。如今我还记得其中的一段感人至深的台词，那是侯朝宗望着秦淮河上满载歌舞笙弦的游船，不免发出一声长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江上听到此话的李香君顺口应了一句：“不知亡国的又岂止是商女！”就这一应一答，让我们这些中学生听了简直倾倒得如醉如痴。只可惜这是冯先生最后一次出镜，“文革”中他含恨而死，饰演“汉奸”侯朝宗一角当然是冯先生的罪名之一，这也是后话了。

此后过了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便成急风暴雨，横扫千军。这时学校里的教员免不了人人自危，主事者也乐得鼓动大家互相攻讦。于是每个教员芝麻大点儿的毛病，都被事无巨细地翻将出

来，大字报也是铺天盖地。那天我在密密麻麻的大字报围墙上果然看到一份揭发张先生的，其细节是说学校组织全校师生看批判电影《桃花扇》，当剧情演到媚香楼上李香君头撞桌角，血溅侯公子的诗扇，杨龙友借意画出桃花扇那一折，张先生居然哭得几乎昏了过去，出得电影院来，张先生像个泪人儿，眼睛肿得有核桃般大小。

这样情节过细的揭发当然杀伤力极大。张先生在事实面前哑口无言，只得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好在张先生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太大的瓜葛和破绽，于是不久也就过了关。

后来张先生在四中待得终归并不如意，“文革”接近尾声的时候，她就借故调走了。不过泪洒《桃花扇》的细节让我至今仍旧记得这位性情中人张先生。我的心里也多少存些悔意，后悔当初真是看走了眼，错待了张先生。

说罢张先生，还不得不说说继她之后，担任我们班最后一任班主任的李先生。不过当时我还是称他作“李老师”，后来改口叫他“李先生”已经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文革”过后有人说过，就像是击鼓传花，谁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当校长、当班主任，谁倒霉。这话不假，因为在那个天地翻覆的时刻，你要首当其冲，面对一群不晓世事，最容易受到蛊惑的青年人。

不过李老师虽是班主任，但他还算是幸运。“文革”初起，一条不成文的逻辑是，谁的年纪大，谁在旧社会的时间就长；待的时间长，染上旧社会的毛病就多，于是也就最容易成为批判的靶子。可是李老师大学毕业没有两年，年纪轻轻，应该算是“革命的动力”，而非“革命的对象”，这是其一。其二是李老师生性谨慎，不苟言笑，又加上寒假刚过才来接手我们班，社会上涌动的“革命”风声早已是一日甚于一日，李老师年长几岁，经历过的各类运动比我们多，想必不会傻到在这个关节上说出造次冒犯的言论，让人抓到把柄。

果然，刚刚教完“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些平仄铿锵的句子，李老师和我们一道，都迅速进入“一根藤上三个瓜，邓拓、吴晗、廖沫沙”的革命文体。

他和另外两个年轻教员组成“战斗队”，从三个人名字里各取一字做成笔名叫“毛亚扬”，写出的大字报不但文辞漂亮，道理也还能服众，本校师生都赞不绝口，一时成为来我校“串联”的外校师生争相传抄的美文。后来才知道，李老师原先就是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高才生，不但文字功底好，书法也是一流。

不过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不但很快从文斗转成武斗，而且从“一根藤上三个瓜”变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将这种“横扫”推向了极致，李老师也不免招惹上

了一点麻烦。据说李老师的父亲是资本家，后来还听说，李老师在中学的时候就是个有名的大才子，自视甚高。要是放在过去，按李老师的资质，不要说师范学院，就是北大、清华，还不是随他闭着眼睛挑。可是李老师报考大学那年，正好特别强调考生出身，幸亏李老师平素做人还算谨慎，时时向组织上汇报个思想，交代个问题，凭了那么优异的考分成绩，总算混上了“兜底”的师范学院。毕了业，就进四中当了中学教员。

没有想到，这回李老师的麻烦也给我惹来了麻烦。

自从当年“废除高考制度”，就彻底断了我继续升学的念头，我也破罐破摔，很少到学校去，一门心思在家里组装我的高灵敏度收音机。少年人最不缺的就是好奇心，我没日没夜地在家收听世界各地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评论和消息。不过，与其说是我对外界小道消息好奇，不如说是我对无线电装置的灵敏度好奇。一来二去，差不多忘记了我还是个在校的中学生。

可是总不在学校露面也不是个办法，况且街上陆续传来消息都是诸如拉倒“亨得利”的霓虹灯，改成“要武中学”的校名，要不就是剃掉长发，剪去裤管。形势一日三变，我也只好隔三差五到学校探听探听风声。

那天我正在校园里各处和大家混个脸熟，就听到我们班临时革委会的朱兄叫住我，说是今天下午到班主任李老师家“抄家”去。我听了先是吃了一惊，这是我头一回听到把“抄家”说得这

样轻松随便。看小说中写的，古代“抄家”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大罪，不是满门抄斩，就是充军发配。虽说前几日就看到街上有装满家具书籍和头戴高帽“人犯”的卡车呼啸而过，隔壁人家也半夜闯进几个红卫兵将树上的梨子打得遍地都是，但这次听说要我也参加抄家，而且就是班主任李老师的家，还是不免心惊肉跳。

大概是朱兄看到我脸上难以遮掩的神色，就立刻向我解释，说这是李老师自己主动要求的，说罢还放低声音道：“你看，与其让街道上不明身份的人去折腾，还不如咱们走一趟，应付一下要好得多。”

我一来是怕多日不在学校露面，本来就给人留下参加运动不积极的印象，好歹总要表现一下；二来既是李老师自己提出来，还有“成人之美”的缘由在里面，我也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记得李老师的家在灯市口路北。来之前听说李老师家是资本家，我很好奇。过去除了电影里的资本家，我还确实没有见过真正的资本家是个什么样子，想象中总归要有一处深宅大院，三四个仆人吧。所以一进李老师家大门我就四下打量，可是失望得很，普普通通的院子，普普通通的人家。说是家徒四壁有些夸张，但至少是和电影里面的资本家相去实在太远，房间里的陈设甚至还没有我家像样。资本家的生活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心里直犯嘀咕：难道革命就是要和这样的人家作对吗？

我们几个同学进门的时候，李老师已经在家等我们了。他将

户口簿、购粮本一切证件都准备好，抽屉里、箱子里的东西也统统拿出来，倒在桌子上和床上。

朱兄一见，赶忙说："李老师，赶紧收起来，收起来。"我真是觉得有如芒刺在背，难堪至极。平素讲课条理清楚的李老师，语无伦次地大致交代了一番他家的背景，大家无言，嘿然以对，李老师也只好强笑。尴尬刚过，我看枯坐实在无聊，发现有副散在桌上的象棋子，就提议和李老师下两盘象棋。我的棋艺原本很臭，没有想到那天竟把六神无主的李老师赢了。之后另外几个人又互相捉对厮杀了数盘，好容易混了几个时辰。朱兄看看天色不早，就随手将盖了四中革委会大章的便条交给李老师。李老师谢过说，以后再有别人来抄家，用这张收条总可以抵挡一阵。

最后大家各自回家不提，但我看见李老师送我们到门口时的黯然神色，想到学生竟会以"抄家"的缘由造访老师的家，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也真是斯文扫地了。那天我是顺着灯市口向南，经王府井大街骑车回家，一路原先繁华热闹的街道上满眼是封条、传单、大字报，遍地狼藉。

后来在学校再见到李老师，他明显折了锐气，不见再写什么大字报，他也很少到我们班上来说笑。要是不巧彼此碰上，大家都是赶紧低头而过。有时候远远看见李老师宽阔的额头，我一边夺路而逃，一边就不免感慨起来：老师不得不叫自己的学生来抄家以自保，还有什么师道尊严啊！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和张先生一样，李老师在四中待得也并不如意，在“文革”后期借着支援外校的名目调走了。我直到李老师离开四中都没有机会喊过他一次“先生”。

后来还是过了许多年，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我到考古所读书。那个时候，斯文有了一点点地位，对所里的老先生大家也都又改口称“先生”了。考古所就在灯市口北口，离原来李老师的家不远。有天中午吃过饭，我在研究所门口看到有个人从北面骑车而过，正是李老师。我连忙冲出大门，一边招手，一面脱口而出“李先生!”

不知是李老师真的没有听见，还是李老师不愿意与四中的旧事再有任何牵扯，只见他奋力骑车向前，我看到的仍旧是宽阔的前额，只是平添了白发和更加趋前的驼背。

在称谓里，我在四中的最后两位班主任就这样先后从“老师”改口成了“先生”。

除了班主任之外，在四中，体育教研组是我们学生称“先生”最痛快的教员群体，无论教研组长叶先生，国家级裁判韩先生，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朱先生，统统是“先生”。他们中间还有位吴济民先生，是篮球的一级裁判，据说，如若不是在“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他在某次篮球比赛里面将苏联人判作犯规，只怕是也会像韩先生一样升为国家级裁判了。因为吴先生人望高，所以每年一度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中学生运动会上，或者

"十一"练队，他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大约是能者多劳的缘故，课间操一般也由他来主持。吴先生人也热情，没有一点架子，与学生们更是水乳交融。有些与他更为熟识一点的同学当面就叫他"大吴"，吴先生非但不恼，反倒觉得学生将他看得这样年轻，便会笑着走过来，拍拍肩膀，以为称兄道弟，不时地，他还会有球赛的票子送给大家。

文化大革命后期，学校开展"军训"，这时已经没有太多人喊老师为"先生"了，但也不叫"老师"，见面都是顶多点点头，要是分为两派的，互相都不正眼看一下，能够直呼其名已经可以算是引为同志了。大约是吴先生经常喊操，嗓门儿的音量和音色都很出色，连主持军训的解放军士兵和军官都不及他。吴先生是个老好人，自己又是个学生出身，家世清白，所以召开批判大会的时候，军人经常指定由吴先生领头喊口号。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听说吴先生也被揪了出来，投进了劳改队。当时我很奇怪：要是吴先生有问题，"文革"初期最是老师难挨的时候，但凡有一丁点儿的破绽都会被揭发出来，可是吴先生那个时候却没有任何问题，到了军宣队进驻学校，吴先生还是个依靠对象，怎么反倒出了问题？

后来才知道，在那年的二月，下发的中央文件里明确鼓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号召"认真整顿和清理教师队伍，把教职员工中坚持反动立场而

又不接受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除出去。这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当时学校里被军宣队揪出来的坏人越来越多，教师队伍里剩下的“好人”日见凋零。大约是这个缘故，吴先生精神负担越来越重，难免走神。那天在批斗老校长的大会上吴先生带领大家喊口号，他竟把“谁反对解放军就打倒谁!”的口号喊成了“打倒解放军!”当时吴先生的嗓音又高，会场上一声嘹亮，刚开始下面还是鸦雀无声，吴先生自己也没有察觉出来，他见大家不跟着喊，先是一楞，等大家都反应过来，几个阶级觉悟特别高的革命群众立刻冲将上去，将吴先生反绑起来，推上了批判台，与那些挨斗的人站到一起。当时我已经抽空偷着溜出了会场，所以没有看见这戏剧性的一幕。听在现场的同学事后告诉我说，吴先生一省悟过来，腿都软了。吴先生人胖，长得也高大，被人架到台上以后，低着头，弯着腰，顺着额头大把大把地流汗，把身前的地面都湿了一大片。事后，吴先生立刻被押入劳改队。

说来也巧，几天之后我在校门口无意撞上了吴先生。大约当时吴先生刚刚参加劳改，还不适应，觉得晚走一点，省得碰上熟人彼此都尴尬。那天我在学校踢球，回家很晚，见了面，我竟然不知如何称呼他了。不知怎么，我突然觉得，这时候他可能最想听到的还是“先生”，于是痛痛快快地叫了他一声“吴先生”。我是好几年都没有喊过哪位教师为“先生”了，如今喊出来这一嗓

子，我觉得痛快得不行。我偷眼望了望吴先生，看得出来，他也特别高兴，这件事让我舒坦了好多天。

不过，体育教研组也有我从来没有叫过“先生”的人，这就是罗老师。罗老师教体育，“文革”前印象不深，我对他的记忆只是“前滚翻，后滚翻”，“单杠引体向上”。一口勉强可以听懂的福建普通话，像是个大舌头。

罗老师没有被我们称为“先生”，原因倒不是别的，一来是他到四中比较晚，大约和我前后，资历不深；二来他又兼着班主任、辅导员之类的头衔，于是我就把他归于“老师”一类，没有喊过他“先生”。罗老师当然对此并不在意。

罗老师有个那个时代的“硬伤”：他是印尼的归国华侨。当年“海外关系”可是要命的问题，不管你家里在外国是开中餐馆，还是洗衣房，都先假定你是坏蛋。当然，也不能说归国华侨在当时就一点出头儿的机会都没有，这位罗老师就混得相当不错，据说还是个党员，直到我一九六九年底离开四中去西双版纳插队，罗老师一直风调雨顺，和军宣队、工宣队都处得不错，叫人暗暗称奇。

“文革”初起，罗老师也和另外两位老师合组了一个“战斗队”，巧的是他们和我们班主任李老师的战斗队一样，也是从三个人的名字里各取一字，做成一个笔名叫“李罗史”，也写了几份大字报，只是立场、观点、方法和李老师他们针锋相对，全然

不同。后来打了几个回合，“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才见分晓，原来李老师属于“造反派”，而罗老师他们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我就更不把罗老师放在眼里了，其实我根本搞不懂什么是“造反”，什么是“反动路线”。

最让我对罗老师刮目相看的，是到了“上山下乡”的时候，他居然成了工宣队属下负责学生分配的要角。

因为自从分配北大荒、内蒙古、山西、陕西、吉林插队以来，我是次次都没有“服从分配”，所以在工宣队师傅们的眼里成了眼中钉。特别是有次工宣队的耿师傅动员我走，我一冲动，仗着我家只有我一个独生子，竟向他说出“两丁抽一”的狠话，让耿师傅大大生了一回气。紧接着，我又因为在家自攒无线电，被父亲机关进驻的军管会当成“给美蒋发报的特务”，投进四中的看守所。尽管不久查无实据，放了出来，但也算是有了“污点”。耿师傅就说得好：怎么不抓别人，单抓你呢?!

罗老师全看工宣队的脸色行事，自从知道耿师傅对我的看法，心里有了底，对我当然变本加厉，步步紧逼，一见到我就说：无论下批分配是什么地方，你都必须马上下乡。

正在危急时刻，有个已经到了云南农场的小学同学替我们联系到他那里，来信通知说，来接收学生的农场干事老陈马上就到北京，让我们迅速与他取得联系。那个时候我东奔西突，去了山西、内蒙古看过了其他同学插队的地方，都不十分中意。想想大

势已去，走总归要走，但要走得潇洒一点，不能让罗老师像赶牲口一样，任由他说了算，至少我要争取到我愿意去的地方。大概是“距离产生美”的缘故吧，我对万里之外的西双版纳突然产生了憧憬。于是落实了云南的消息之后，我就敲响了学校下乡分配办公室的门。

那天罗老师和耿师傅正在屋里看东西，我想不外是拿着我们几个“钉子户”的名单研究来、研究去。

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们，这回我是真的要下乡插队了，目的地已经选好，是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农场。农场接人的同志这几日已经到了，请他们将我的人事档案送到来人的下榻处。

罗老师和耿师傅听了，互相对视了一眼。罗老师大概觉得领会了耿师傅的意思，就趋前一步，收了笑，板下脸来对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按照学校的统一分配方案下乡插队，一定要自己乱找门路呢?”

看那阵势，罗老师大概是听说我最近到内蒙古的阿荣旗探过一回路，刚刚回到北京，所以他一听我说又要到西双版纳，觉得有些突兀。

“买东西还要货比三家，更甭提这是一辈子安家落户的终身大事”，我不以为然地说。那个时候，学生对老师早已没有敬畏之心，我怕的不是罗老师，怕的是罗老师身后的耿师傅。

“这不行。你虽然从看守所放了出来，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

决。云南农场听说马上就要改兵团了，属于军队建制，他们怎么会要你这样的人呢?!”罗老师断然地说。

攻心为上，我知道罗老师是想抓住我的把柄，在气势上压住我，所以他的口气多少有些鄙夷。

我一听就心火直冒，立刻反驳道：“那好！咱们这么说吧，你如果送我的档案去，而人家不要我，那算是我倒霉，我就服了你；要是你不送去，那是你的不对，今后就不要怪我不服从分配了。”

你一言，我一语，很快我和罗老师就戗戗起来。我看到罗老师身后的耿师傅脸色由白转红，由红转青，两腿哆嗦着朝我逼近。我早就听说，前次有个同学不愿意下乡，和耿师傅争辩起来。耿师傅上前抡圆了就是一巴掌打到那同学的脸上，嘴里还恨恨地说：“你要是我的儿子，我就打死你!”

派到我们学校的工宣队听说是广安门火车站行李搬运处的，个个都是五大三粗、力举千斤的汉子，不要说打我一巴掌，就是把我举起来，再狠狠摔到地上都游刃有余。

我看到这个阵势，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赶紧几步撤到门口，嘴上当然还是不软，指着罗老师大喊：“姓罗的，你要是不把我的档案送去，这辈子你就别指望我会下乡了!”

说罢，我朝地上丢下云南农场来人的地址电话，大步跨出教研组小院，看看身后他们没有追来，就壮起胆，气咻咻地跑出了

四中的校门。

大约是罗老师和耿师傅事后消了气，想想如果给云南来人送去我的档案，云南不要，我就再也没有话说，只好服从他们的分配；要是云南要了，我就更没有理由泡在北京不走，他们也算是送走一个“钉子户”，无论如何都没有坏处。

几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一同去建国门内的招待所，看望云南来的农场干事老陈。老陈对我们说，你们的人事档案都送来了，过些天我们就可以上路。

我觉得这样也算出了一口鸟气，就借势转了户口，安心到云南过天高皇帝远的日子去了。

到云南之后过了一些年，我才知道另外一些原委。那时云南农场也和全国一样，开始“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有人传言说我们几个从北京来的学生都是“五一六”分子，北京混不下去才逃到边境上来躲风头。其中有个朋友坐不住，就找当初带我们到云南来的老陈打探，想知道是不是我们档案里有什么记录。老陈现在算是兵团营部的参谋，他大约也是想稳住我们，就将当初的内情告诉了我的朋友。

听朋友的转述我才知道，老陈看了我们的档案也是吃了一惊，没有想到这几个年轻娃儿个个都是家庭背景问题重重。老陈知道，农场就要改兵团建制，他也吃不准，把这些人弄到农场来是否会受到上级的责怪。但受到我们的朋友之荐，脸面上却也不

好推托。从北京到西双版纳，火车五天，汽车四天，停停走走，一共十天。老陈一路上思来想去，心里七上八下，于是就在从昆明回西双版纳的半途，车停墨江的时候，趁着夜黑，一把火将我们的档案全部烧掉。回到农场就谎称路上遇大雨，行李打湿，档案洇坏，只好半途销毁了。好在西双版纳农场本就是个荒僻所在，大部分老职工全是“三年灾害”时从全国各地逃荒来此的农民，根本说不上什么档案，所以此事并未深究，人事科给我们重新填写了简单的履历充数了事。

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回北京之后找工作，因为从云南转回的人事档案干净得像一张白纸，故宫警卫队爽快地接收了我，于是才有我此后一路的人生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能不感谢当初罗老师将我的档案给了云南的老陈，也算歪打正着地做了一桩好事呢。

如今想想，当初非但没有叫过罗老师一声“先生”，而且竟然指着他的鼻子叫“姓罗的”，真是对老师大大的不敬，心中实在不安。后来听说，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当初那么“进步”的罗老师也一溜烟似的跑回印尼，再也没有回来。我这才明白，罗老师原来也是杨绛先生笔下的一只“披着狼皮的羊”，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有鉴于此，今后若是在世界任何地方再有幸碰到罗老师，我肯定会由衷地喊他一声“罗先生”的。

离开四中已经四十多年了，后来偶然碰到一些还与母校保持联系的旧日同学，或者如今正在四中上学的后辈，我的兴致来了，就会顺便问问他们：现在四中是不是又把教师称作“先生”了？他们都回答说没有，说罢还会以诧异的目光打量我，像是看着一个怪物。他们的回答和神情让我想到，如今毕竟时过境迁，我的问话不免太过迂阔。不过单凭这件事，我也就懒了再回四中瞧瞧的心思。

或许是对当初四中仅存的斯文余韵依然恋眷的缘故吧，如今我无论是写信，还是与人交往，也无论对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小，更不论有没有“博士生导师”，或者“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待遇”这类有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仍旧喜欢用“先生”向对方表达尊重。不为别的，只为这个斯文有礼的称谓让我想起了四中那些温馨和荒唐的日子。

# 我的阅读与思考

赵京兴

赵京兴，北京四中六六届初三（三）班学生。一九六九年初因文字入狱，关了三年。一九七三年先做临时工，一九七五年在北京市一轻局工程处当工人。自一九八〇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任编辑，自一九八六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为研究员。

## 引　子

“文革”十年，我基本是在阅读与思考中度过的，包括坐班房那三年，虽然只能阅读《毛选》，我思考的时间反倒更多了。不过由于条件所限，有时“玄想”的成分更重了。有一次“队长”（犯人对看守警察的称呼）把我叫到“小号”（关押重犯的单人牢房），问我是不是又散布什么唯心主义言论了。我回答说没有。队长提醒我“馒头”二字，我一下子想了起来。

头一天上午正赶上每周伙食改善。每天两顿饭，上午九点半，下午四点，由“劳动号”分送到牢房。为落实毛主席把犯人当人看的人道主义指示，“队长”宣布，每周改善一次伙食：除了照例每餐一碗汤菜外，馒头代替了窝头。每到这一刻，总会引起一阵莫名的激动，本不准随便说话，馒头一到手，大家话就特别多。

大家正欣赏那白白的馒头，我和另一个“政治犯”开始讨论一个问题：馒头掰开前里面是否有颜色。当时社会上正在批判陈伯达，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认为，馒头掰开前里面是无所谓颜色的，颜色是光与物质作用后留给我们的视觉印象，而馒头掰开前见不到光，虽说具备反射全波段可见光的属性。我罪加一等：宣扬唯心主义，这回和马赫挂上了钩。[1]

## 一 为什么读书

“文革”爆发那年，我十六岁，在北京四中读初三。在我看来，“文革”似乎有一种必然性。“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死亡”，如果把其中的“沉默”改为“沉闷”，就更符合我

---

〔1〕 恩斯特·马赫（一八三八——一九一六），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当时的心境。在“文革”前几个月的日记中，我用鲁迅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概括我的深切感受——我们将面临的是一场时代的疾风骤雨，甚至已听到遥远地平线上的滚滚雷声。在同一篇日记中，我用高尔基《海燕》的名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结束。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如今回头来看那段历史，正是学校教育的危机触发了一个少年学子的内心矛盾，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终于走上一条不归路。

按教科书和老师的讲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事实并非如此。四中一大特点就是高干、高知子弟云集，父辈包括部长、将军、教授、工程师，甚至国家领导人。要说绝大多数很低调、很平民化，但不经意的一举一动却透出生活的富裕与优越——他们显然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等级。而我，父母都是工人，每月收入加在一起才一百零八元（这在他们工厂已算高工资了，他们以此感到自豪），要供养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吃饭穿衣，特别是按时缴学杂费、书本费，还是紧巴巴的。他们不是政治口号中那种正儿八经的工人阶级，公私合营前靠小裁缝铺糊口谋生，合作化后进了工厂，成分只是“独立劳动者”而已。与许多同学的家庭相比，我家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差了一大截，除了下意识的自卑外，也让我深感困惑。

还有一件更让我痛苦的事。当时在学校，对人生观教育抓得非常紧，不仅老师课上课下讲，还让我们读了大量《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一类的书——不仅是完美无瑕、高尚的一生，还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让我感到绝望的是，按此人生标准，这辈子看来都无法企及。我往往既是自己的心灵拷问者，又是被拷问者。内心折磨得支离破碎，为自己乱七八糟的想法而羞愧，甚至恐惧。

无人可请教，更不敢问老师。在“文革”前不久的一次政治课上，我问政治老师“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老师一脸茫然。要不是他素知我这个人常有古怪念头的话，我很可能会被打入反动学生的行列——居然敢质疑这样普通的政治常识。

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读书，读文学、读哲学。我在初二读过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希望从中找到答案，可书中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思想无出路的苦闷与循规蹈矩的课堂生活的反差，让我备受煎熬。“文革”终于爆发了，它首先宣称砸碎修正主义教育制度，让我获得某种解放感——至少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寻找答案，不必再照本宣科了。

毛主席的内部讲话在同学中流传，他鼓励青年人看点“封资修”，要“钻进去再爬出来”，这对我鼓舞很大。虽说我从未在阅读上设限，但有了“尚方宝剑”，我可以堂而皇之把托尔斯泰

《复活》摆在晚自习课桌上，没人敢说三道四。

某些书让我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倒不是书中有什么现成的答案，而是那些作者的处境跟我差不多——在思想的泥潭中挣扎，我引为知己。从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到费尔巴哈、黑格尔和康德，我在他们的书中读到别人读不到的东西。即使艰深晦涩如黑格尔、康德，写的其实都是个人的思想历程。有一次赵振开（北岛）问我，听说你读哲学就像读小说。我不记得是怎样回答的了，但我确实觉得二者没什么区别，《精神现象学》[1]是另一种形式的小说，只不过是用哲学概念讲述的个人故事。

## 二 《出身论》与遇罗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大串联”已接近尾声，我和几位同学组成长征队，开始了一个多月的徒步旅行。我们从北京出发，翻越太行山，穿过山西，进入陕北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最后到达延安。“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一样，解开了我脑袋里的种种谜团。在我看来，认识世界是需要“眼睛”的，否则除了现象，你不可能发现背后的意义。所谓“眼睛”，指的是主观认识客观的能力。事实本身不会说话，认识既来自客观也来自主观的认识能力。这是我在那一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后来我在《哲学

---

〔1〕 黑格尔的一部哲学著作，以晦涩难懂著称。

批判》中做了系统阐述。

一九六七年初，我们从延安回到北京。在一份《中学文革报》上，我读到《出身论》，当即写了大字报，署名“牛虻”，支持《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主办这份报纸的是“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其实背后就那么几号人。头头是我校高二（二）的牟志京。我和刘力前、刘新等同班同学组成“红旗”战斗队，支持《中学文革报》。

有人通知我说，“老红卫兵”要在北兵马司胡同举办关于《出身论》的辩论会。我和刘力前等人前去应战。据说那是叶子龙的住宅，被没收后成了“老红卫兵”总部。会议室很大，能容下五六十人，挤得满满的。作为主辩方，我们坐在长桌的尽头，辩论对手围坐在桌子四周，后面站满人群。当时我并不知道遇罗克也在场，他在窗外观看。

在辩论会上我说过什么，早就不记得了。作为主辩手，我临场发挥不错——思维敏捷，引经据典，外加一摞马、列、毛经典著作在桌上压阵，我方显然占压倒优势。这引起遇罗克的注意，他随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寄到四中。但他把名字误写成“赵金星”，正好我校有个高一的同学叫这名字，信先到他那儿，辗转了一个多月，才落到我手中。

遇罗克在信中以鲁迅为例，讲述了伟人的悲剧命运——往往被后人利用，失去他们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显然是对当时极左派

对马列思想歪曲滥用的不满。结尾处，他邀请我去他家一叙。

就在不久前，由于某些同学家长得知遇罗克的家庭背景后出面干涉，“红旗”战斗队集体退出《中学文革报》的活动。对此，我深不以为然，还是如约去了他家。

他住在山墙与院墙的夹道中搭建的小屋里，除了床，还有写字用的小桌，墙上有两层木板的简易书架，放着哲学、历史、文艺理论书籍，其中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正在找这本书，他借给了我。没想到这书和它的主人一样命途多舛——书从我家被抄走，遇罗克和我锒铛入狱，他不幸蒙难，书再也没回到主人身边，恐怕早已成了纸浆。

遇罗克给我的印象是，思维敏捷，谈锋犀利，阅读范围广。在我们交谈中几乎未涉及《出身论》一文，我相信《出身论》只是他思想中极小的部分。与其说是交谈，不如说是辩论。他当时是工人，按今天的标准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嘴唇很薄，用词犀利，咄咄逼人，激发了我辩论的热情。我们享受着思想交锋与词语撞击的快感。

我还参加过由遇罗克发起的一次郊游，参加者多是中学生。我们一起骑车去爬香山。他那年二十五六岁，似乎还没有女朋友。他是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兴致勃勃，爬山时总是走在众人前头。

一九七〇年三月，我在狱中得悉他的死讯。同号们都认为我离

这一步也不远了，在批斗中，我的罪名之一就是与《出身论》和遇罗克的关系。而我们这些支持过《出身论》的中学同学都逃过这一劫，据说与戚本禹有关，他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讲话中表示，对涉案《出身论》的中学生概不追究。

我当时就认为，《出身论》只是个简单的真理——父母的政治面貌当然不会像血型那样是可以遗传的。若无“血统论”，它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那么多人摇旗呐喊，更用不着遇罗克献出生命。但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我才明白，它触动的实际是某些人感情背后的权力与利益。《出身论》对特权势力造成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冲击。其实，出身只不过是特权势力把持特权的一张牌，据我所知，至今很少有人从这一角度解读《出身论》。相反，人们往往把悲剧解释成闹剧。遇罗克几次临刑前宣称有重大问题交代揭发，以期延缓刑期等待转机。不少人解释为遇罗克惯有的机智，使之看上去如同闹剧。在我看来，他一定怀有真诚的信念，相信自己的行为与“文革”发起者的动机是一致的——矛头指向特权势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可以说，一代人的斗争，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特权势力，否则改革开放不会那么顺利，但真正对中国特权势力造成冲击的不是“文革”，而是改革开放。在引入市场机制后，金钱的力量摧枯拉朽般地打击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特权势力。但在那时的中国，几乎所有的

探索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恐怕就是悲剧的根源。

## 三　北京图书馆

一九六七年中到一九六七年底，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北京图书馆对外开放了。除了被列入淫秽图书如《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类文学作品外，一律敞开阅览。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恐怕难以置信。

那一段时间我风雨无阻，从不缺席。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我带上干粮，来到北海公园旁的北京图书馆大门外排队。为了确保每天都能进去（每天只发两百多个座位号），并继续借到头天没读完的书，唯一的办法就是早去。最难熬的是冬天，在严寒中站上两三个小时是一种考验。北京图书馆就在中南海北门对面，那里日夜有人站岗放哨。警卫战士对这些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学生很是好奇，最初常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

除了阅读大量的文史哲书籍，还结交了各路朋友——交流思想，分享读书的喜悦。而北京图书馆最后关闭像开放那样突然，那些朋友大多不知去向，后来保持来往的只有林大中、林大庆兄弟俩。林大中长我几岁，那时是北京摩托车厂技术员，他感兴趣的主要是文艺批评，对姚雪垠的《李自成》很有研究。林大庆小我几岁，借阅的主要是乐谱和俄罗斯文学，他长得如我想象中的《白痴》里的梅茨金公爵，后来进电影学院，最终成了电影导演。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关于中国阶级划分问题的讨论。

当时都自带干粮，图书馆提供白开水。一到中午，大家就聚在大厅或楼梯拐角处，边吃边聊。一天，我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同学聊起马蒂厄的《法国大革命史》。他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只有官民两个阶级。那时我倾向于用社会力量来描述中国不同的社会集团，认为用阶级这概念已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的社会结构。即使用阶级概念，把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结构仅仅分为官民两大阶级似乎过于简单化。尽管如此，这一观点在我脑海里萦绕了多年。后来我的研究结果证明，对于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来说，它离真理的门槛最近。

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图书馆关闭了，我的读书生活并未中断。我常常泡在旧书店；或在废品收购站，从别人手里买下当废纸处理的旧书；或与同学互通有无，他们几乎个个都是书痴。

为了写这篇回忆文字，我特别翻阅了近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中国国家图书馆大事记（1909—2009)》，发现对"文革"期间北京图书馆开放一事要么一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我猜想，这些书的编著者实在无法解释，在一个"焚书坑儒"的年代，为什么北京图书馆还会对外开放？

## 四　大字报与隔离审查

从"文革"爆发到一九六九年初，我总共写过三张大字报。

第一张是我和同班同学刘力前一起写的一份声明，缘由很简单。刘力前的父亲是全国总工会的普通干部，我父亲是“独立劳动者”，都不算红五类，也非黑五类，我们认为剥夺我们参加“大串联”的权利违背毛泽东思想，按当时的逻辑就是“造反有理”。我们俩说干就干，光天化日之下撬开那间代表权力的办公室，取出公章，一连盖了好几张外出证明信。这势必招来红卫兵组织的质问和围攻。为说明我们行动的合理性，我奋笔疾书，写了这张大字报。这是我“文革”中唯一一次造反行动。随着读书兴趣日益浓厚，我参与社会实践的冲动越来越小，或者说读书就是我最热爱的实践。

第二张就是上面提到的支持《出身论》的大字报。第三张的题目是“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时间应在毛主席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发表之后不久，即一九六八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初，为了申明我不参加上山下乡的理由。即使在今天看来，这张大字报的题目也过于胆大妄为了：不仅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还敢公然与学校工宣队叫板。由于熟读毛主席著作，用起来得心应手，我首先从概念上阐述毛主席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的含义，然后引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按照这篇文章中的说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有三种形式，一是走马看花，二是下马看花，三是安家落户。我在大字报中写道，即便是安家落户，也不是你们所说的上山下乡——纯粹

为解决就业问题。而我的志向是从事理论研究，通过走马看花、下马看花照样可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爱抠字眼，注重如何正确理解经典作家所用的概念，尤其对“文革”中流传的毛主席指示，我认为这也是他一贯倡导的学习方法。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就特别强调过“党内共同语言”的重要性。[1]在我看来，是下面的人不了解毛主席的语言，歪曲了毛主席的指示。我自认为真理在握，更加理直气壮。

本来工宣队对我整天捧着《资本论》而不学毛主席著作就极不满意，质问我“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却要读‘资本’论”。这张大字报正好提供了借口，正赶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们把我抓进学校，隔离审查。那是一九六九年春节前，关押在四中音乐教室小院。自“八一八”以来，那里一直关押着“牛鬼蛇神”，后来都是所谓有问题的老师。我被关进去时，廖锡瑞老师还关在那儿。和我前后关押的还有黄其煦和史康成，还有其他人，名字都记不住了。

那时廖老师似乎刚满四十，在我们眼里已是学富五车的老先生了。他是我们班语文老师，总能带来某些课堂以外的新知识，比如“莱塞”（激光），让我记忆犹新。我们亲热地称呼他廖先

---

〔1〕《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331页，一九六七年横排本。

生。在关押期间，他的房间就在对面，每天他总是低着头被几个学生带去劳动，却没有机会打声招呼。改革开放后，廖老师连续三年带出北京市的高考状元，后来在北京办了所高考复读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前几年，我们班部分同学还为他庆贺了八十大寿。

我和大康（史康成）那时还不太熟，只记得他有一次用暗语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事。黄其煦是初三（一）班的，因为鼓捣无线电发报机，被派出所以“特嫌”之名送到学校，他和我同年级，时不时能聊上几句。

掌握学校大权的工宣队，组织了几次对我的批斗会，除了针对那张关于上山下乡的大字报，以及我的日记片段，再就是我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提纲。幸好阴差阳错，批斗我的人尚不知《哲学批判》的存在。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写在《哲学批判》之后，手稿早已遗失。我能记起的主要观点有：一是农业的社会化问题，以及社会化必将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这在我的《哲学批判》中有所反映；二是关于银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我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工农业之间缺少社会化的联系，从而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社会主义要想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就必须实现包括农业和工农业关系在内的生产社会化。农业社会化主要是

因地制宜基础上的分工，而发展商品经济是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银行的作用是对整个社会资金进行管理，从而在资源分配上发挥核心作用。我后来报考研究生时选择货币银行学专业显然与此有密切关系。今天，从一名职业经济学工作者的眼光来看，这一想法与其说是研究结论倒不如说是猜测更恰当，它来自于我对历史逻辑的认知，既缺少严密的经济理论基础也缺少经验材料的支撑。

批斗我的人认为提出这些观点本身就是大逆不道，原因很简单：毛主席没说过。为了自我辩护，我只能说，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这下更是罪加一等，因为触犯了林彪的“顶峰论”。

对工宣队的种种做法，我认为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本原则，故决定上告。

被关押近一个月时，我趁上厕所的机会逃跑了。厕所紧挨着院墙，由于院墙很高，几个看押的学生放松了警惕。我经常练单杠，一个引体向上就轻而易举翻了过去。我一路狂跑，找同学借了点儿钱，冲向永定门火车站，搭火车直奔白洋淀。

上山下乡早在一九六七年底就开始了。到了一九六八年，大部分同学已在学校安排下去东北、内蒙古、云南等地的建设兵团，或山西、陕西的农村，剩下的少数人自找门路。有两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一个是东北的莫力达瓦，一个就是河北的白洋淀。这两地不仅收入高，且风景优美适于生存，一个是草原牧区，一个是北方的鱼米之乡。北京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等校的

同学，于一九六八年陆陆续续到白洋淀安家落户。其中有我的女友陶洛诵。这里后来还出了一批诗人，像多多、芒克、根子。

陶洛诵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学生，也是《中学文革报》的一员，我是在卖报时认识她的。由于顶不住校方和街道的压力，一九六八年底她和几个师大女附中同学来到白洋淀插队。我曾在这儿住过几天，和当地老乡的关系不错，也算是“下马看花”。逃脱后，我自然首先想到白洋淀。

陶洛诵住在名叫邸庄的小岛上，那是个仅有几百户的渔村。在这儿插队的还有三个师大女附中同学，后来她弟弟和一个我的同班同学也来了。一度招来不少北京的地下诗人和画家，他们在此留下足迹。

话说回来。我一到白洋淀，立刻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申诉信，又返回北京把信寄到中南海。我住在同学家，既没钱又没换洗衣服，只好打电话找我弟弟，我弟弟告诉了我父亲。他是过来人，知道逃跑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把我送回学校。不过没多久工宣队就把我放了，估计是申诉信起了作用。工宣队队长找我谈话时说，四中再有两个像我这样的，他们就得卷铺盖滚蛋。这里的“得”是老北京话，发“děi”的音，意思是“不得不”。

这次虽把我放了，但还是埋下了祸根。没过一年，工宣队找了个碴儿，把我直接送进了公安局。

## 五　《哲学批判》与牢狱之灾

我对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初二就看过我大姐上中专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读本。我也喜欢文学，尤其偏爱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鲁迅等带哲理性的作品。在北京图书馆读书后期，我系统地阅读了西方古典哲学的译作，诸如黑格尔、费尔巴哈，加上更早的培根、洛克、贝克莱，以及古希腊哲学家的篇章；当然还有马克思（包括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为吃透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我用很长时间钻研《资本论》。

通过阅读，我对哲学有了独立见解，并提出自己的哲学命题。我有抄书的习惯，把我喜欢或认为重要的文字大段大段抄在笔记本上，并每天写日记，整理一天的思想。有一阵，我为“自由”与“必然”这对哲学概念着迷，它们在辩证法中居于特殊位置。每天夜深人静，我进入沉思默想的特殊状态。有一天我用日记的形式整理自己的思想时，一个命题“人的本质就是对必然争取自由”脱颖而出，没有逻辑推理，突如其来，就像闪电照亮大海。那一刻甚至伴随着生理上的亢奋，对我来说是难忘的精神历程。

上述命题成了我的《哲学批判》的核心命题。

按今天的眼光，《哲学批判》只能算是一篇不到十万字的论

文，而我却是按哲学专著的形式处理的，分成上下两卷，外加一篇序言。上卷为“哲学的认识”，包括“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两章；下卷为“哲学史”。全书是按对立统一的辩证结构铺排的。我认为，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真正的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只是从现代开始的。“哲学史”的两章分别论述了我认为是现代哲学代表的英国古典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已不属传统哲学范畴，并未专门论及，于是另辟“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与人本主义哲学”的附录。

之所以称为《哲学批判》，主要是在我看来，认识论哲学最终必然演变为人学，即以人的活动（实践）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则是传统认识论哲学的顶峰。而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哲学，实现了研究对象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传统哲学，即使是认识论哲学，实际上已被扬弃了。这里批判一词的潜在含义是“终结”，模仿《资本论》副标题的用法——政治经济学批判，随着无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诞生，作为资产阶级理论学说的政治经济学已经终结。

认识既然要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合理解释，那么进一步要研究的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这是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自然延伸，也是西方古典哲学内涵的发展方向，在“哲学史”部分我试图发掘的就是这一内在逻辑。

在“哲学原理”部分，我首先把哲学定义为“是研究人的活

动规律（或者说人的本质）的科学”，再进一步把人的活动（实践）规律归结为必然向自由的转化。这是一个分析综合的过程，概念与认识正是通过这种分析综合获得的。实践就像眼耳鼻舌（医学上称为分析器官）一样，同样是人的“分析器官”。这是《哲学批判》的核心思想，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并说明其创新之处及在哲学中的意义。这是我最珍视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我的哲学专业知识的部分。

《哲学批判》的写作始于一九六八年七月，每天写几百或上千字，至十月底才完成。这刚好是我预定的时间——我准备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陶洛诵。用一本哲学著作做生日礼物，一是浪漫，二是把我的心得与她分享，尤其她正处在对人生对社会无限困惑与迷惘的阶段。按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阶梯式，我在扉页写下：献给我亲爱的朋友不倦的真理探索者陶洛诵。

陶洛诵把《哲学批判》借给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她们似乎对“历史哲学”部分更感兴趣，恐怕因为包括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我把人类历史归结为劳动史，从劳动引出分工，再由分工引出阶级，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改造，需要“用商品经济来打破农业个体的自给自足生产的桎梏”，从而使农业像工业那样实现社会化生产。只有如此，人类才能进入到一个没有阶级的理想社会。

这正是陶洛诵的理想。她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文革”一直被批斗，她对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感到厌恶。我想告诉她的是，不理想的现实是某些人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在历史长河中，这只不过是小小的插曲，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其实这部分是受逻辑与灵感支配，涉及现实的思想完全脱离现实，不仅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纯属异想天开，在结尾处展现的未来社会更是遥不可及：“整个人类劳动将用强大的工具体系为自己与自然建下巨大的屏障，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劳动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几个师大女附中同学把它刻成蜡版油印出来，谁想到闯下了大祸。当时公安部门正在追查一份油印的反革命传单，首先追查油印机、蜡版等设备材料的来源。那几个师大女附中同学如惊弓之鸟，试图把油印机从学校转移出去。她们用塑料布包住油印机，送到余永定（他也曾是四中的学生）的家。多年后，我在社科院再见到余永定，才知道故事原委，为此他还受到牵连。这一神秘举动难逃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的眼睛，很快就报告了公安局。

由于没有经验，那几位女同学又把蜡版扔进插队所在地附近的井里。对此我一无所知。

一九七〇年一月的一天晚上，我和陶洛诵在我姐姐家刚吃完饭，突然一帮我们学校的人闯进来，把我带走。到四中不久，来了几个警察，不由分说把我铐起来，塞进轿车。

到西城区公安分局已深夜十二点多。搜身登记随身物品后，警察把我带到一间木栅栏监房，那小门弯腰才能进去。犯人分两排躺在木地板上，头冲墙，脚对脚。后来才知道，这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虎笼式牢房。

犯人们被惊醒了，纷纷坐起来，为我腾出地方，我终于靠墙坐下。没过多久，第一次提审开始了。那是个高大壮实的警察，提审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称费尔巴哈为唯心主义，我纠正他说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我还引用了宪法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自己辩护。这让他极为震怒，没几分钟就把我押回监房，上了背铐。一戴就是半年，除了上厕所，吃饭睡觉都不打开。

第二天上午，我听到陶洛诵的声音，她在院里大声向队长提出什么要求，显然是告诉我，她也在这里。出狱后才知道，公安局本来并没打算抓她，而她坚持"不论到哪儿"都要和我在一起，结果作为同案犯也被关进来。

和我关在一起的几乎都是所谓"政治犯"，虽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没有这个字眼。犯人自然而然被分成两类：刑事犯和政治犯。我有大约十多个同号，包括前西城公安分局局长、北京医学院大学生、女六中语文老师，[1]其他几位也都因思想或

---

〔1〕 恕我在此不能一一披露他们的姓名，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

言论而获罪，只有一个所谓“老炮”（即长期关押的老犯人），是国民党军政人员，解放后被捕入狱，“文革”中趁乱从劳改农场跑出来，再次被捕后暂时羁押在这里。

刚入狱那几个月，社会上“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运动正轰轰烈烈，几乎每天都把我拉出去批斗。从四中开始，向四周延伸，几乎遍及西城所有的中学。每次批斗，都把我全副“武装”起来，上有背铐，下有脚镣。我昂首挺胸走在校园里，与其说是被批斗的反革命，倒不如说更像被押往刑场的壮士。我成了活靶子，只要社会上的运动流行什么罪名，肯定都安在我头上。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架着我胳膊，低头弯腰，汗珠子往下淌，也只能听之任之。其实我也不想辩驳，麻木如道具，似乎那是别的什么人不是我。我相信，我的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迟早会被释放并得到平反。

再往后的故事，超出本书限定的时间范围，为了给读者个交代，还是简单说几句。在西城分局关押了三年，仅提审三次。据说，起初不相信一个十八岁中学生能写出《哲学批判》这样引经据典、自成体系的长篇巨作，上面指示一定要查出背后的黑后台，花了大量的人力进行外调而一无所获，于是送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专家审查只得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结论（这可能是当时最善意的“罪名”）。一九七二年末，离新年仅隔一天，我终于被释放了。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

在当时是常用的说法。除此结论，实际上还有一个内部结论，具体内容我不得而知，但因此我被剥夺一九七八年第一次报考研究生的考试资格。直到一九七九年六月，我才接到西城分局书面的平反通知，肯定了我写《哲学批判》的大方向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遇罗克已平反，参与《出身论》不再构成问题；关于那张大字报，由于知青已大批回城，上山下乡是解决城市就业的权宜之计已得到社会公认。他们还把没收的《哲学批判》手稿还给我，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的手稿则遗失。

陶洛诵早我半年出狱，重返白洋淀插队，在小渔村做民办教师。我出狱后做临时工，空余时间重操旧业——阅读与思考，只不过改变了阅读方向，从哲学转向经济学。促使我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看到周边的工人、农民是多么渴望过上好日子——白洋淀农民为住上新房，顶着烈日，围海造田般用河泥筑成一块块宅基地；北京家庭主妇把劳保手套拆成线，再一针一针钩成装饰窗户、桌面的针织品。此情此景，常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 一个七〇届眼中的四中

白　羽

白羽，北京四中七〇届三连五排（按当时名称）学生。一九六八年进北京四中，一九七〇年离校后当小学教师。一九七七年进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毕业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节目主持人、编辑和记者。自一九八八年起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和导演。导演的电影故事片和电视剧，获得多种国际国内奖项与荣誉。

一九六八年初我进入北京四中时只有十三岁。所谓“进入”，是由于那时已取消了入学考试和男女分校的规定，我们这些“七〇届初中生”，连男带女，按居住区域就近分配到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当然，我自认为即使没有“文革”也能考进来，因为我在小学成绩突出，又是少先队大队长，原来的理想就是考四中。虽说就近入学已无昔日的荣耀，可迈进四中大门那一刻还是

挺激动的。

## 辅导员们的精神向导

第一次走进四中校园，到处是西北风撕扯翻卷的大字报碎片。而高年级学生和老师们却文质彬彬、几乎没有社会上革命造反的火药味，我恍如回到“文革”前父辈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感到很亲切。虽有“新四中公社”等群众组织在，但很少在校内搞政治活动，只看过他们的合唱团演出的《红卫兵组歌》、《长征组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诗歌联唱。在那短暂时期，政治空气并不怎么浓烈，学校已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复课闹革命”，似乎有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承继了“文革”前四中的传统，我们七〇届和六九届以及后来的七一届各班，都有“老三届”的学生做辅导员，正是这些辅导员和他们的同学，把我带入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我很崇拜这些辅导员，他们博览群书，谈吐不凡，善于独立思考；他们在讨论或辩论时，或慷慨激昂，或沉潜深邃，或妙语连珠；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或崇尚理性，或性情浪漫，或以天下为己任，或独善其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阅读和讨论的内容，譬如德国古典哲学、国际共运史、世界局势、“文革”内幕以及西方文学名著，令我们这些渴求知识的少年如沐春风，为之陶醉。在思想禁锢的

年代，应该说那是我们启蒙的开端。辅导员及其同学们就像大哥哥，他们取代了老师，成为我们的精神向导。

我清楚地记得一位“老三届”同学的文章第一句便是：“法国大革命这个真正的金刚力士……”，读得我热血沸腾。他们传阅的一位高干子弟的文章则开宗明义写道：“中国共产党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历史感。

潘廷宏在老校长室给我耐心讲解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还画了图示。刘志民每天下课后仰靠在窗边的课桌椅上，啃着大部头理论书籍，低年级新生常扔石子骚扰他。有一天，我去郭世杰家，他讲述了美国宇航员登月之举，以及尼克松就职演说提到的“那个蓝色的小球”。“上山下乡”前，他送我一本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化革命大事记》，我至今依然珍藏着。王小平登台讲解“反右”和彭德怀事件。廖致杰听说我家藏书幸免于难，趁夜色专程来翻阅品评。娄宾用复写纸传抄“九大”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讲话以及各种内部文件。王文光读遍了巴尔扎克全部的中文译作，认为其笔下的人物仍活在今天。在我看来，常去他宿舍的曹一凡就长得颇像某个插图中的人物。我常常倾听高一学生在宿舍的高谈阔论，有柏铮、金铮、祝文、褚维春、高中等。马凯每天都打乒乓球，登台为我们讲解马丁·路德·金和美国黑人运动。唐华谱写了许多歌曲，我们排练后去中央电视台（当时的北京电视台）直播演出。还有一位高手常给我讲解康德、黑格尔、

费希特的哲学，穿着打扮像农民，言谈举止像大师，个儿不高，圆头圆脸，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

## “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暂时的平静，很快就被“清理阶级队伍”打破了，一大批教师成了“阶级敌人”。

在我记忆中，留下某些难忘的画面：学生们冲进校长室质问杨滨为什么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她气得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刘铁岭在全校大会上批判自己的“反动日记”态度平和；一位中年女教师用剪刀铰断自己的喉咙，惨死在大礼堂后面的夹道里；不久前还登台演唱毛泽东诗词的音乐教师曹会澄穿着破工作服，神情黯然地砌墙垒砖；有一次，我们在长安街游行，把“打倒刘少奇！”错喊成“打倒廖锡瑞（语文教师）！”让别校的游行队伍莫名其妙；二十多位中老年教师（阶级异己分子）关在“牛棚”里，由红卫兵小将日夜轮流看管，饮食、起居、劳动、学习、批斗、“早请示晚汇报”……

不久，一些学生也受到迫害。我们旁听过对刘源源（刘少奇之子）的班级批判会，刘源源站在讲台旁，面对发言和口号声似乎无动于衷。后听说他挨了打，红卫兵团长张杰（其父是总参军械部某处处长）通过关系把他藏在白洋淀。八届十二中全会刚结束，军代表向全校传达说，周恩来把刘源源兄弟姐妹几人找到中

南海谈话，告诉他们：他们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还参加过批斗傅亮（彭真之子）、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孔丹（孔原之子）等干部子弟的全校大会，他们的“罪名”是“对‘文革’不满”，一共二三十人，一律“喷气式”……

我还有两位校友也是邻居，一位是电影导演陈凯歌（北影导演陈怀皑之子），一九六六年几个红卫兵抄家，罚他面壁而站。另一位是同龄同学刘平梨，他父亲是老红军、“八一厂”创始人之一，母亲是“三八式”干部、北影的医生。刘平梨把江青三四十年代的逸事讲给一位要好的同学，结果被揭发出来，打成“反动学生”，在全校批斗并劳动改造。最尴尬的是学校指令我代表学生上台发言批判，我不愿意，老师说：“你是跟刘平梨亲还是跟毛主席亲?”吓得我只好遵命。上台前，站在一旁的刘平梨笑眯眯对我说：“快点儿念啊！让我少站会儿。”他一贯是乐天派，从来不生我的气，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

## 赵京兴案

最为惊心动魄的是遇罗克、赵京兴案。一九六八年，初三学生赵京兴在校园贴出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声称要利用宝贵的青年时代饱览群书，将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虽然我自己对“上山下乡”充满了浪漫想象，却由衷地理解并赞同赵京兴的选择。首先我认为年轻时应该多读书，尽管当时社会舆

论鼓吹实践重于读书，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再者我认同使命感：“天生我材必有用”。

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时，公安局逮捕了遇罗克，作为他的密友和同案犯，赵京兴被关进了学校的“牛棚”。巧合的是，我不仅是“牛棚”的看管，还参加了学校“专案组”，专门负责对他的批判，也就是说，无论在北京市任何地方批斗赵京兴，我都要跟着登台作批判发言。这样，我与赵京兴“朝夕相处”，对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赵京兴当时十七八岁，已是饱学之士，文、史、哲、政、经无所不通。他不仅协助遇罗克办报，并撰写了八万字的《哲学批判》和三十万字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他还对一九六六年以来的“两报一刊”社论逐一写了批判文章。

他在日记本扉页上题词自勉：“卡尔，努力吧！”他在被关押的小屋墙上挂着条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我经常向赵京兴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则欣然指点，侃侃而谈，让我受益匪浅。有时批斗回来，赵京兴会告诉我今天批判稿写得怎么样，哪些地方批得好，哪些地方应该怎样批才深刻，我简直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批判他的发言稿的！

不久运动升级了，遇罗克被枪决，专案组对赵京兴封锁消息，据说是有利于审讯。一天晚上，我们严阵以待，等来了三个中年便衣警察。他们说奉谢富治命令而来，一进门便厉声喝道：

“站起来！你叫赵京兴吗?”赵站起来从容回答：“我是赵京兴。”警察问：“你对你的言论反悔吗?”“不反悔!”警察说：“你被捕了!”两个人上来给赵京兴戴上手铐，押进停在校门口的黑色大型高级吉姆轿车，扬长而去。随后，赵京兴经常在警察的押解下被批斗，我就像他的影子一样，每次都陪他登台发言，不过他从未再看过我一眼，也没再跟我讲过一句话。这类批斗会比从前多了一项内容，就是在会前会后有一拨人在小屋里或卡车上毒打他，拳打脚踢外加扇耳光，赵京兴总是默默忍受着。最后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同时被判的还有一位名叫闻佳的美女，气质高雅，清丽脱俗，令观者无不动容。

七十年代末一个夏日傍晚，我在故宫筒子河边见到赵京兴，他正与三两个朋友散步，谈笑风生。我犹豫再三，没好意思跟他打招呼，至今引为憾事。

# 性压抑与政治中立

高　中

高中，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一）班学生。一九六九年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当工人。一九七一年入伍，一九七五年复员至北京海关工作，一九七八年就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后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项目经理。一九八六年留学德国，一九八九年在瑞士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后分别担任英国石油公司高级经理、英国国家电力公司中国总经理、法国苏伊士水务集团中国首席代表等职。自二〇〇二年起创立环保非政府组织“清水同盟”至今。

## 一

父亲给我起名的原则是，要让孩子从小会写自己名字，也容易被人记住——姓高的，生在中国，于是乎高中。这名字也是中性的中，中庸的中。

三十四岁前我从未和女人接过吻。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父亲恐怕是天下最本分的男人。妈妈去世前说，最对不起爸爸的，就是从没让他碰过别的女人。我知道，爸爸是心甘情愿的。他们共有七个孩子，五女二男，男的我排第二。哥哥生性腼腆，优柔寡断。妈妈对我说：红灯没停，不能绿灯先行，哥哥没找女朋友没结婚，你就不能抢先。我十分孝顺，可最终还是先结了婚。哥哥至今未娶。

包括幼儿园部，我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待了九年。考初中填写志愿，我在父亲的好友汪宝熙（八中教导主任）家坐了一晚上，在四中和八中之间犹豫不决——我哥在八中，可四中名声大，我第一志愿还是报了四中。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九年，我在北京四中度过了七年的光阴。

性压抑在所有男校是普遍现象，在禁欲的时代更是如此。性压抑往往可以其他方式转移或释放，比如刻苦学习。“文革”爆发后，性压抑就跟着转到政治上去了。

小时候玩“过家家”什么的，对性却一无所知。在实验二小，我喜欢上石玲玲，她聪明活泼。四十多年后，在巴黎换乘地铁去中国城，问路时觉得眼熟，一细问，果然是她。

在实验二小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妈妈将口粮分给孩子们，自己因营养不良而浮肿。每次开饭，我用筷子敲着碗碟念念有词：妈，我饿，我要窝头！早上出家门，妈妈塞给我的饼子，半路被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从身后抢走，两口就吞下去。考初中的作

文题目是“一天的早晨”，我写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早上去偷军属老大娘仅有的一只鸡，被我发现并制止。大概基于亲身经历，写得真切动情，我得了满分。

上四中第一年，粮食紧张，体育活动暂停。我们班生活委员张大力，他父亲是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研究员。有一天，张大力带来一盒蛋糕，让大家分享。大家狼吞虎咽后，他宣布这蛋糕完全是用苍蝇做的，蛋白质丰富，且无菌。我们全都傻了。

我的初恋情人叫香莲，两家父母是好友，常来常往。上初一那年，一天晚上我躺在自己房间，听大人在外屋聊天。母亲们说到香莲和我是天生的一对，将来结婚就成了亲家。一句戏言引发我的性冲动，想着香莲的可人之处，我头一次手淫，把床单弄湿了一片，第二天早上妈妈不声不响拿去洗了。

一个同学擅长画画，他寥寥几笔就勾出女人胴体。我觉得很神秘，转身告诉别的同学，他却告诉他家长。于是家长会有了对班主任的质疑：为什么学生在校画裸体画。我很不自在——由于传言导致一场风波。

班上教政治的女老师，年轻漂亮，皮肤白嫩，胸部高耸。她举手投足，引起同学们内心的躁动。一个同学在课堂上所答非所问，在团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检查：他上课时走神，没听见老师讲什么，夜里总是想着老师的胸部手淫。于是大家上纲上线，一顿狠批。这个同学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虽说我并没太注意那位老

师，但引以为戒——克己自律，关键是守口如瓶。后来那个可怜的同学才知道这是青春期最普遍的生理现象。在校友聚会上回首往事，他大呼上当。

“抄家”开始不久，华一家倒了大霉。她父亲辛野是正骨医生，曾任国民党骑兵中将，起义后改行行医。我自幼淘气，伤筋动骨是常事儿，都是他治好的。华内秀矜持，深居简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是我心目中的公主。红卫兵来“抄家”，先把她母亲剃成了“阴阳头”，罪名是嫁给了起义将领。他们全家被关在后院阁楼上，大门贴上封条，全家手脚被缚，大概挣脱时弄出噪音，邻居以为有坏人撬门，通知那帮抄家的红卫兵。她们遭到毒打。她母亲自认清白，激烈抗辩，被打得奄奄一息，在运往火葬场的卡车上还一息尚存。

“文革”打破了男女校的隔绝状态。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我实验二小的同班同学，“文革”初期担任师大附中革委会主任，常到四中看大字报，与我互有来往，我们也到邻近女校串门。有一天，一个女孩到四中找熟人，闯到我单人独处的教室。我们攀谈起来，甚是投机。她身穿崭新“国防绿”军装，当时是最时髦的。大概是出身名门的缘故，她比同龄女孩子早熟得多——嘴唇红艳，秋波顾盼，散发着奇异的体香。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她滔滔不绝，讲到与男友私奔。她身体离我越来越近，目光变得呆滞，突然轻声问我：你说，拥抱和接吻犯法吗？我呆若木鸡，毫无反应。时间好像停滞了，直到她离去。

第一次肉体接触终身难忘。那女孩是我妹妹同学的姐姐，叫瑞香。全家兄弟姐妹八个，女孩在我们那一带最出众。她母亲是国民党某战区司令的五姨太，住深宅大院。一天，我带俩妹妹和瑞香的妹妹一起去游泳。进陶然亭游泳池深水区收费一角，我是大哥，门票自然由我包了。回来瑞香不肯，撕扯着非把钱还给我。她两手握住我的曲池穴，一股电流直冲头顶，后来当赤脚医生，才知道那是“得气了”。我一礼拜神不守舍，那臂弯滑腻的感觉挥之不去。

有人说，游泳池男女混泳可致使女孩怀孕。我还真信了，游泳时我尽量避开瑞香，却一不小心撞上了别的女孩。四十三年后，日本电视台报道，瑞香在日本非法居住十七年，涉足滚珠赌博店、按摩、汽车修理等行业，家财过亿，却不幸遇刺，死在东京六本木的豪华公寓中。

在男校除了智力，还得比肌肉。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比我们高几年级，全市中学生比赛铅球第一。那天，他在球场练投篮运球，我不知好歹上前断球，被他健硕的身躯弹到场外。我参加舢板队，与高三同学一起划舢板，胸大肌、肱二头肌有了明显长进。我家住在西单附近，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我把重达五公斤的铁砂袋绑在腿上。每周至少一次，我带着绑腿绕操场跑二十圈，汗流浃背。可体能消耗对性压抑并没多大缓解作用。

“大串联”给我带来和女生接触的机会。外出要“校革委会”

开介绍信，被拒绝了，让我坐立不安。三个姐姐外加邻居的张晓燕姐姐，还有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几位女同学结伴而行，把我也捎上。第一站上海，再从那儿搭民主五号轮船去青岛。谁料到我扁桃体发炎，持续高烧，躺在上海某中学教室地铺上。男女宿舍分开。在空旷的大教室里，我嗓子冒烟，脑袋昏沉沉的，无助地望着天花板。忽然一只小手放在我额头，原来是师大女附中的孙某某。她为我买面包打开水，体贴备至，整整陪了我两天，直到痊愈。虽朝夕相处，我却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回到北京，生怕别人说闲话，我从未去师大女附中找过她。

女一中有个漂亮女生，姓庞，我们管她叫“螃蟹”。她经常带几个女生到我们“战斗队”来玩。她机智幽默，性格开朗，总是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那时候辩论会很多，多半在高校。我哥是北航毕业的，我们常去北航听大学生辩论。那次辩论会一拖再拖，直到晚上十点才开始。与我们同行的是“螃蟹”和几位女一中同学。辩论会两点半才结束。当晚已无公交车，我们又困又累，决定在北航的教室席地而睡。“螃蟹”咯咯笑个不停，说她爹肯定今夜睡不着了，她模仿着她爹的口气：“夜不归宿啊!”我们俩找了个墙角，用桌椅围起来，为御寒保暖。我们各自盖着大衣，她紧挨着我，背过身很快就睡着了。我似睡非睡，心神不定。她忽然转过身来，和我面对面，气息扑面，秀发飘拂。更出人意料的是，她在梦中突然抱住我，把我吓得直冒冷汗，浑身僵

硬。我最终轻轻推开她，翻过身去，却一夜无眠。

戴士和在“文革”中以画毛主席像出了名，一进四中正门的影壁，总是贴着他的巨幅画作。一九六八年某个冬夜，我去戴士和家，请他画毛主席与陕北农民交谈的插图，做油印校刊的封面。没有钢板，我们到附近的民族学院附中去借。民族学院附中坐落在西单的仿古深宅大院中，从西厢房的耳房透出光亮，我们推门而入。屋里坐着一位身穿彝族服装的妙龄美女，唇红齿白，目光深邃，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在幽深冷清的大院里，她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我和戴士和全都看呆了。

我首先打破窘态，说明来意，她很随和，于是攀谈起来。我突然问，你是黑彝还是白彝？这问法极有挑衅性：在彝族，黑彝是奴隶主，白彝是奴隶。解放后我党将不少奴隶主的后代招到京城进行教育，除了进行改造，或许还有某种人质意味？她扫了我一眼，抿嘴微微一笑，反问道：“你说呢？”

回忆这一幕，多年后我和戴士和一致认为，她是我们一生所遇到的最美丽非凡的女人。

## 二

从实验二小考进北京四中，对我来说天经地义——最好的小学中最优秀的学生当然要进北京四中。薄熙来、张小军、白迪祺、余开衡、王金中、赵东平加上我，我们七个小学同班同学进

了四中。小学毕业互相赠言，薄熙来写给我的是：高中同学，希望你在新的学校里，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对胜利的回答是谦虚。谁承想，我们不仅考进同一所中学，后来还分到同一班。

四中不愧为名校，老师不仅素质高，待学生也格外好。初二上体育课，我从楼梯纵身一跃，在楼梯转弯处扭伤脚踝骨，站不起来了，正巧刘铁岭副校长（兼任蹲点班主任）路过，抱起我立即送到附近医院。四中学生几乎个个是尖子。由于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社会各阶层的家庭背景兼而有之。一般来说，每年级一班是重点班，高干子弟也最集中，我们班同学包括副总理、北京市市长、国务院外办主任和将军们的子弟。从幼儿园起，我就是在干部子弟堆里长大的，对他们的行为做派一点儿都不陌生。

知识就是力量，这本来是北京四中学生的基本信条，但政治逐渐取代了知识，聚集着新的能量，不可避免地带来狂风巨浪。自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每个学期校方都会组织各种报告会，包括陈毅副总理，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号称“青年鲁班”的李瑞环，还有参加过欧战的老工人、志愿军战俘代表等等。自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深入学校，同学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对“白专”道路的批判从高中波及到初中，搞得人人自危。

我们班的孙安民老实巴交，与世无争，人缘特好，他擅长书

画，却似乎成为“白专”的典型，成为某些同学批判的对象。一天，我们俩躲在体育教研室后面的夹道谈心，对当时的局势深感困惑。一个跟我同上实验二小后来同班的干部子弟，一边画篮球进攻路线图，一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与工农相结合”这口号落实在学校，就是要与干部子弟相结合，因为他们代表工农。他的话让我瞠目结舌。

本来挺和谐的班级开始四分五裂。我们班团支部书记是北京市市长彭真之子傅洋，班长是总后勤部副部长之子唐双津。唐双津与我仿效当时解放军的模式，叫“一帮一、一对红”，我对他什么都不隐瞒，连日记都给他看。而他对我的总体评价是，你怎么哪方面都中不溜儿呢？准是你名字闹的。傅洋的弟弟傅亮是四中初二的学生。“文革”期间，他偷开了辆吉普车，在西单附近撞上电线杆，被群众扭送派出所。我恰好在场。一问是“黑帮分子”彭真的儿子，有人脱下布鞋猛抽他嘴巴，满脸是血。作为目击者，我感到浑身无力，无法制止。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北京四中虽是废除高考制度的始作俑者，但经过一年多天翻地覆的折腾，大家开始盼着天下太平，恢复高考。谁知这一等就是十年。

自从“中央文革”对“西纠”、“联动”持批判态度后，大

多数战斗队在“新四中公社”大旗下实现大联合，老红卫兵在校销声匿迹。而“复课闹革命”则以“新四中公社”为基础进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我由于立场中立，成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成为“四中革命委员会”成员。我分工负责宣传，主管广播站及《新四中报》的编辑工作。在北京中学生“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对立中，由于“新四中公社”的温和立场，被称为“不三不四派”或“四三点五派”。我之所以成为“新四中公社”核心小组及校革委会成员，显然与四中大多数师生普遍的温和立场有关，多年来我们接受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正统教育，容不得独立思想。

“新四中公社”虽反对“血统论”对联，当《中学文革报》推出《出身论》的“异端邪说”时，我们紧跟“中央文革”批判《出身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主张：用你的右手打倒国民党，用你的左手打倒共产党。我们多少有点儿像戴季陶，举起右手打倒“血统论”，举起左手打倒“出身论”。

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我的偶像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缅甸总理奈温将军来华访问，我和其他几个小朋友被选中献花。那天专机延误了，几千名欢迎群众在北京机场停机坪冒雨等候，而我们献花的小朋友在机场贵宾厅休息。周恩来总理突然出现了，我从沙发上跃起，跟别的小朋友一起问候致意。周总理亲切地与每个小朋友握手，询问来自哪所小学，叫什么名

字。当我回答叫高中时，周总理连忙问，哪个中字？我答道，中国的中。周总理向身边的陈毅外长说，他叫高中，中国的中，这个名字有意思。总理记住了我的名字。后来常有外事迎宾任务，周总理好几次都叫出我的名字。父亲为此感到十分自豪。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某一天，四中接到通知，选派两个人开会，我是其中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来自北京高等院校和中学的几百名代表等到夜里一点多。终于，周总理，还有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出现在主席台上。由于爆满，有些人没座位，只好站在后面。周总理挥挥手，请大家安静，他想先听听同学们的意见——“哪位同学讲话，请举手”，他说。一时全场静默，我举起手大声说：我要发言。“好，这位同学，请上台来！”其实我毫无准备，脑袋里一片空白。上台后，周总理问起姓名和学校。我答道：北京四中，高中。周总理似乎在自言自语，哦，高中，我们见过。我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从复课闹革命到中学生的闯劲儿。讲到中学生群众组织不需要大学生当保姆——我们已经长大了，成熟了。周总理笑了，带头鼓掌。

初三的赵京兴贴出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在校园引起轰动。他才十七八岁，文史哲政经无所不通，除了帮牟志京、遇罗克他们办报，还撰写八万字的《哲学批判》和三十万字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

我们校“工宣队”大都是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四场的搬运工，

过去拉板车、抬棺材，即所谓“杠房”出身，基本上文化不高。批判赵京兴可难为了工宣队的师傅们，那些哲学政治经济学词汇让他们如堕五里雾中，不得要领。当赵京兴戴上眼镜回答问题时，在场的工宣队师傅让他摘下眼镜，赵回答说摘眼镜我看不清东西。那师傅勃然大怒：这些都他妈是人，不是东西！引起哄堂大笑。

作为校革委会委员，我主持了那次批判会。开会前，一个姓韩的博览群书的同学悄悄告诉我，赵京兴的理论基础不过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我比那些师傅强不到哪儿去，批判会搞得稀里糊涂。我们和赵京兴完全处在不同的层次上，根本谈不上真正的交锋，主要靠的是那些政治口号，以势压人——反对上山下乡，明摆着与党中央政策唱反调；怀疑一切，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然是异端邪说。批判会后，赵京兴对我的评价是“中间偏右”。

“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铺天盖地，作为革委会委员，我以身作则。第一批插队报名的是陕北延安地区。那里是革命圣地，激起同学们的热情与向往。我立即贴出大字报，写上自己和女八中的妹妹的名字。我回家对母亲说，妈，我要插队去了，她问什么时候，我回答下周就走，并补充说，带妹妹一起去。妈妈一下愣住了，埋怨我做这样的决定太匆忙太草率。

工宣队队长通知我，下一批是甘肃边远地区，更艰苦，由你带队去。我看了看中国地图，用手量了一下，很满意。不知怎么

回事，我上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名单，却因一句笑话改变了命运。分配小组组长赵金镛是北京火车站炊事班班长，我们在锅炉房打水碰上。他跟我打招呼，我没吭声，装作闷闷不乐的样子（尽管我完全不知道被分到内蒙古），我突然开玩笑般地问，听说给我分到内蒙古兵团了？赵师傅说你不愿意？我连忙答道：服从分配，可我愿意到更艰苦的地方去，不想当个穿旧军装没领章帽徽的二等军人，还是让我带队去甘肃吧！

谁承想这有意无意的几句对话改变了我的命运。赵师傅回到办公室，对北师大的工宣队秘书说，给小高调一下，拨拉到工矿去。工宣队找我谈话，通知我去北京电机厂，我当场拒绝了——绕线圈是女人及老弱病残干的活儿，我要去艰苦的地方。最终我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去房山燕山石化总厂的工地报到。

刚到工地不久，我趴在工棚的通铺上哆哆嗦嗦写信，给我们班那几个要好的同学，他们抢先报名去了陕西延长县插队。在回信中有个同学对我指责，说我害怕艰苦逃避下乡。那里确实很苦，特别是缺水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我们班张大力插队八个月，他那件白衬衣因缺水未洗而碎成条条缕缕。后来他当上赤脚医生，深夜出诊，不幸跌入山崖身亡。

四十年后，我去看望曾在陕北插队的同班同学朱晓明，他年迈的母亲还记得当年我去他家解释，为什么没和他们同去插队，为什么没一起在山沟里度过艰难的岁月。我至今有口难辩。

# 走在大潮边上

唐晓峰

唐晓峰，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八年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一九七二年五月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一九七五年秋毕业，先在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一九七八年考入北大地理系做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一九八一年留校工作。一九八六年到美国 Syracuse 大学地理系读书，一九九四年获地理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五年回到北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书至今。

在那个年代，对北京的中学生来说，考上男四中，是“前半生”一大功名，不管后来运势如何，这份小小的骄傲或虚荣都不会泯灭。

## 上四中

我初中在四十一中，也是个男校。一九六四年考进四中上高中。那次考试，数学考得不好，移项时把负号忘了，错了一道大题。同院的刘羽关心我，听罢说："咱们这辈子都上不成四中了。"刘羽比我大，在十三中。

万万没想到，收到通知，四中要了我。那时考高中，报三个志愿，如果都没考上，据说也由第一志愿的学校发通知。在传达室拿到四中的信，心里悬着，打开信大喜过望，旁边的女孩儿扑上来打了我几拳。

我琢磨可能是作文把分数补回来的。考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如获神来之笔，写一句是一句，一挥而就。我这辈子，状态超好的感觉有过两次，一次是写这篇作文，还有一次是插队时到县里比赛乒乓球。在决胜盘比分落后的关键时刻，我气壮如牛，连得七分，反败为胜。

还没开学，一个叫赵永明的"老四中"同学来电话（我们宿舍院里有公用电话）。"老四中"同学，是指那些初中就在四中的。我们高中班，由原来两个初中班的同学，加上新考进的外校同学组成。在学号上，头十几号和后十几号分属两个初中班，中间十几号是外校来的。我学号是二十九。

赵永明找我，是要筹备"十一"活动。我填写的各类表格

中，家庭地址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宿舍”。尽管没见过面，他认定我可以做文艺骨干。

我果然帮了大忙，从北影免费借来十几套红军服装（拍电影用的）。在赵永明带领下，我们班排练了舞蹈“长征”，在学校评比中，成为最优秀的两个节目之一。另一个是高年级的“水兵舞”。那年“十一”晚上，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跳了好几场。

第一天进四中校园，看见有人在树下读《毛泽东选集》，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天下真有这样的人!”不久又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有些本事：赵永明朗诵，十分专业；陈哈尔推铅球（北京市少年冠军），铅球在空中横行好一阵；朱景文游泳（北京市少年冠军），姿势不怎么样，但速度极快；刘捷测向二级；李宝臣夜读《史记》；邵立功摇头晃脑，讲述各种大道理。

## 开头的日子

“文革”前，我只喜欢自然科学，对文科毫无兴趣。上了高中，我参加北京业余体校航模组。这是个很正规的少年体校，拿出大量精致薄木板，任我们锯开黏合，制作机动模型飞机（配有小发动机，真可以飞上天）。寒假还要集训，天天泡在木屑和化学胶水气味里，但伙食好，按正规运动员标准，竟有油焖大虾。夏天，我还参加了后海舢板训练班，在大太阳底下“一二一二”划舢板。旁边的何大明提醒我：“小心硌破屁股。”

无论航模还是舢板，我都没长性。我最爱的还是攒半导体。几年前，在邻居郑保民叔叔（常演匪兵角色的演员）家见到他自制的小木盒居然能出声。“这就是半导体收音机”，他说。我从此着了迷，开始自攒半导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一管耳塞机到七管超外差，还设计万能电表，自制多刀开关。深更半夜，焊好最后一个线点，接上电池，飘出美妙的声音！

转年班上来了王大理，他因病休学一年，插到我们班。他才是半导体行家，有一天，他拿出自制的线路板，小板焊接得极其精美，导线塑料皮统统剥掉，精心布局，互不交叉，真把我镇住了。从此我跟王大理摽上了，常去他家欣赏他的新成果，课上也偷偷交换线路板设计图。

几乎每礼拜，我都要骑车出去，趴一遍电器商店的柜台。商家深知我们业余爱好者的心理，把新款收音机后盖打开，亮出“内脏”，摆在玻璃柜里，让我们看个够馋个够。

身边尽是有本事的同学，老师讲课引人入胜（王钊老师的物理课我最喜欢），这是进四中最初的印象。四中也重视体育。我个儿不高，但投篮准，也成了班上篮球主力。虽说学习成绩不像初中那样总排前头，但眼下的日子倒挺合胃口。

## 政治来了

生活总不会由着我这样玩乐下去。学校空气中潜藏着什么，

浓度越来越高，我是渐渐意识到的。首先是听报告。印象最深的两次是听李瑞环（劳动模范）和李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报告。费尔巴哈这奇怪的名字，就是在李瑞环的报告中头一次听说的。

奇怪的是，政治课女老师讲课像作报告，班主任开班会也像作报告，把人说得热血沸腾、心情沉重。校一级的报告就更不用说了，往往通过有线广播，我们坐在各自教室，屏息凝神，鸦雀无声。

原来在四十一中，没这么多能作报告的老师，只有大队辅导员贾老师的时代感比较强，校长则老气横秋。四中大不一样。那些报告，道理夹着声势，声势夹着道理，搅得人灵魂深处不得安宁。核心是解决“做什么人的问题”。做什么人？不是做科学家，而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习不重要，斗私才重要，因为做接班人要从斗私、斗自己开始。人人要过这道大门槛。团员应该算过了一道小槛，接近接班人的标准，没入团的自然是落后分子，落后就证明还有私字，就得斗（起码自己斗自己）。好在我到家就把这些事忘了。

我有一张幼时的照片：五官端正，学生头，蓝制服，红领巾，左臂有臂章。有这副相貌的学生，都会受老师表扬，在班里总有一官半职。我从小学到高中，总是当官儿（只是级别越来越低，小学三道杠，初中二道杠，高中退队，在班上是科代表，算

最低级职位），但不会有大政治，大政治是入团、入党一类，所需的条件我没有。初中时，我是中队主席，学习成绩优秀。一次，一个很淘气的同学对我说："别看你，我入团肯定比你早。"我一笑而已。没想到，那同学不久果然入了团，而我一直没入上。后来上四中，政治开了窍，才意识到，那同学的父亲是"革干"。

那同学的家庭背景比起四中许多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四中的高干子弟多不淘气，我刚进校时，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工作积极，穿着朴素。我见同班的任志上衣有针补的痕迹，还以为他家庭困难呢。伍贻龄家离我家不远，放学常一块儿回家。路上，他一一告诉我，哪个同学（不光是我们班的）家里是哪种高干，让我连连吃惊。我那时想象干部家庭，天天夜里给儿子讲革命大道理，就像《红灯记》里的"痛说革命家史"。

我对革命大道理敬而远之，革命不是我的事。我想求进步，但进步是件很难受的事，最难受的是谈心，当年英语课本上译成"heart to heart talk"。我平生头一次谈心，是与一个要帮助我的干部子弟，我俩在校园找了个背人角落一坐，那种感觉，比头一次搞对象还别扭。

革命无私心才能上战场，才能不怕牺牲，才能受得住老虎凳。我暗自想象自己坐在老虎凳上，肯定受不了，这说明自己不够革命标准。

我一直是满脑子科技人生模式，全然不知有政治一途。还有，虽然我们大院里都是拍电影、演电影的，但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去计划人生。一次晚上叫我去帮着配音，我老大不高兴，导演叔叔看出来了，只好白送我一顿夜宵，让我回家了。

那年头儿时兴“忆苦思甜”。对旧社会不能忆出甜来，但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必须忆甜，忆完了好接着批判。一次全校大会，有个外班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大会上自我革命，先忆甜，说他们家当年吃的猪肉有“这么厚的膘”，说话间，他五指并拢，横立手掌，比画了一下。他的手势太形象，我一直记着，每次看到肥膘猪肉，都想到他的手掌。总的说来，城里人“忆苦思甜”不易，苦都在农村。

某次班会，出身好的讲光荣，出身不好的讲罪过，表示划清界限。那是第一次气氛紧张的班会，不知是怎么开的头，几乎人人要表态。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富农，也糊里糊涂站起来讲了几句。我忽然知道富农意味着什么，心里吓了一跳。开始还没有什么，这和做半导体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学校的气氛，就是要把我心里这一角放大，再放大，直到成了一块心病大石头。看得出来，周围不少同学都有心病，脸色气质渐渐变了样。

中学也搞“四清”。“四清”运动告诉人们，你身边就有敌人的思想，甚至活动的敌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活人，挖不出来不算

完。终于有一天，我们班教室后面墙上贴出了进步同学写的小字报，批判某落后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学校的政治压力是从政治老师、校领导那儿蔓延过来的，某些进步同学也加入鼓动，于是乎，校领导和进步同学（多为干部子弟）渐渐拧成一股劲儿。

## 讨论《海瑞罢官》

这件事开始还有点儿学术成分，引发了爱思考、爱发言的同学的兴趣。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组织讨论，同学发言挺热烈。讨论很快变成辩论。辩论时，站在报纸立场比较容易，现成的词儿很多。“反方”就不容易了，但因此也才有意思，学习好的、能言善辩的都愿意做“反方”。他们说的有意思，我们听的也有意思。

这次讨论不是脱离实际的课文中的陶渊明之类，而是外面社会上鲜活的大题目。有些同学又让我吃了一回惊。许健康引经据典，范泰林满嘴演说词汇，何大明情绪激动，观点出人不意。他们个个像小大人。校长杨滨大概听了汇报，在校园见到许健康，说：“许健康，你可真健康啊！”关于《海瑞罢官》的报纸文章我一篇没看过，但同学们讲得都很神乎，各有各的道理。抽象继承论对不对？真理有没有阶级性？清官能不能推进历史？我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题。

后来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看来还是姚文元水平高，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击中要害。

## “文革”爆发

我永远记得作为“文革”爆发标志的头两篇社论题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牛鬼蛇神”一词，早在近几年的政治词汇中就被使用了，现在升了级，要“横扫”，而且是“一切”。这“一切”里面都有谁？报纸上点名的除了吴晗，还有几个文人，他们已经被扫了，还要再扫哪些人？“触及人们灵魂”，据这两年经验，凡是触及灵魂的事，没有什么是好受的。多数人的灵魂自带三分罪，因为都达不到雷锋、坐老虎凳的水平。

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公布了，北大成了革命焦点。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骑车去了北大。大饭厅（后来叫大讲堂）门口有把门的，我们自称来取经，就混了进去。大饭厅很大，人很多，里面满是大字报。有的贴在墙上，有的顶端粘在绳子上，下面悬空，随风飘。

由于是晚上，气氛有点阴森，你一转身，不定看到哪个熟悉的大名竟是“牛鬼蛇神”。“啊，李晨?!”“啊！这还有彭真!”北大的人是得了内部消息，还是水平高，自己看出来的？半夜从北大回来，几个同学到我家，和衣过后半夜。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这不一定是上级指示，但“枪声就是命令”，革命号角已经吹起来，受了多年革命教育、一直等待革命机会、要实现做革命者梦想的各色群众们，投入革命大潮中。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盖子揭开，没有“牛鬼蛇神”可不行。我们的运动向来是：抓“右派”，没有不行；找“活雷锋”，没有也不行。现在是揪斗“走资派”，哪能没有！

革命的首要标志是揪斗领导，校长、班主任就是眼前的领导，即使今天没揪，迟早也得揪。报上说要认清革命潮流，跟上形势，于是北京几所中学（有四中、八中等）联合召开了揪斗教育口“走资派”的大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只见一个个教育口的“当权派”被押上台，随着会场革命温度的升级，他们被勒令下跪、挂牌子、自我招供。张文松的声音纤弱，回话文绉绉的。“到底是领导，毕竟有些水平。”我心想。上台押送或主持会场的是根红苗壮的同学。记不得从谁开始，因为招供“不老实”，开始动武了！台上有人流血！这是我害怕但预感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忘记是哪一天，我们班也把班主任史老师的头发给剃了。当时把课桌排成方阵，大家坐在周围，让史老师坐在中心，由会用推子的同学执行。当时心情很复杂：我们终于也革命了，可实在对不起史老师，同时暗自庆幸，得亏我不会用推子。

## 废除高考

“文革”开始那几天，高三的同学还在看书复习，准备高考。但忽然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广播了北京四中、北京女一中同学“废除高考”的倡议书——嘿，到底轮上我们四中了！“文革”开始好几天了，一直没四中的事儿，习惯当老大的四中人有点儿着急。

当天晚上，北京各界革命群众敲锣打鼓来四中祝贺声援。我到学校看热闹，灯光中见到去年刚考进北大的老四中同学，站在高处向母校致意。大家知道倡议书是高三（五）班少数人写的，但身为四中人，也沾了点儿革命的光。

准备高考的人收心了，这可能是永远的改变。对擅长考试的四中人来说，算是断了门路。课早就不上了，现在课本也不看了，同学们每天坐在教室聊天、辩论。

后来听说，是几个干部子弟先知道上边精神才写的倡议。看来革命需要有背景，普通人要想革命，只能蒙着来。

## 学马列

大家心中的革命样式主要有这样几种：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农民运动（造反不怕过火）、武装斗争（政治的最高形式），钻研革命理论（做革命导师或党内理论家）、革命檄文（以

大字报一鸣惊人)，构成了“文革”运动的基础。

不过这不是人人学得来的，许多都要有资格（比如上街斗人)。对于出身不够好的同学来说，革命的路其实很窄。读马列、研究革命真理，成为四中某些同学不得不选择的进步道路。况且，上边也在号召“认真读书，弄懂马克思主义”。

毕竟是书生，不少同学相信马列书中有人类终极真理，可征服世界。赵京兴、许健康是这方面的厚重代表。赵京兴在同学中很有知名度，他以理论见长，善于独立思考，质疑流行观念，马列语录张口就来，辩论时拿他没辙。对这样的人，我们既佩服又担心。当时有人把满口经典理论词汇的人称作“克思”，去掉“马”字，换上个人的姓，比如“赵克思”。克思，代表诚恳、厚重，开玩笑地说，中国的“克思”们只恨缺少大胡子。

“文革”初期，我与郭海军“一对红”，这是从部队学来的，一个先进的帮一个落后的。郭海军是我们班团支书，约我认真读《毛选》，逐字逐句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读这类书。因为认真，小有感觉。我后来自己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读读到深夜，真是读进去了，顿悟开窍，激动万分，在桌子前头直转悠。由这本书，我似乎开始明白了什么是“主义”。以前感兴趣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可实验的东西（物理、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现在打开一片抽象的天空——“原来这就是辩证法!”

也可能是学得不彻底而落下了毛病，辩证思维害得我黑白不分，左右难辨。每件事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英语“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很亲切）。见那些同学爱憎分明、言语痛快，很是羡慕。对我来说，真理越想越乱。多年后读陈独秀所言：“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真不愧是廓清云雾的大时代先驱！

赵京兴日后评论自己说，他的思想习惯是从怀疑出发，遇事先生疑问，然后证实。这又是我所不及的。我的特点是接受现实，遇事倾向于理解，寻求解释，这大概是从自然科学那儿来的。

我发现领头的干部子弟其实不读马列，而是读内部政治书，甚至是敌人写的书。我明白了，这才是真政治，而书生与政治无法同步。

学习归学习，话又说回来，在革命大潮中，比的是疯狂，不是理性，要“忠”不要“理”。那其实是个不讲理的时代。人们舞文弄墨、摇唇鼓舌，只是学会了豪言壮语，学会了挖苦损人，学会了诡辩上纲。

不过，写传单大字报，倒也是个练字的机会。有一阵，我负责刻蜡版、印传单，摸索出一种快速字体，像隶体，扁扁的，看着很整齐。有一回形势紧急，伍贻龄口授，我刻蜡版，一张传单转眼完成。还有一回写大字报，因为毛笔顺手，那字迹连我自己

都吃惊。宋德镇在旁边看边夸：“你小子肯定是一笔一画练过。”我自然很是得意。

## “老子反动儿混蛋”

某天，学校里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我看了，心里一紧。我出身职员，不算“反动”，但那股杀气照样令我战栗。那明摆着是错的，我们都摇头，但也知道，此刻已经没有地方讲理。从“对联”得到好处的人，正在社会上疯狂造势，别人没有吭声的份儿。

校园里传出《鬼见愁战歌》。关于“对联”，社会上很快生出变种，原来横批“基本如此”，有人觉得不够狠，改作“绝对如此”、“永远如此，鬼见愁”等。《鬼见愁战歌》是我们班陈小田与高一（五）刘辉宣作曲，我现在还记得那曲子：

1 · 1 5 5 | 5 31 2 – | 1 · 1 5 3 | 2 1 5 – | 6 · 6 5 5 | 15 12 3 23 | 5 · 6 5 – | 31 22 1 – |

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此结束，接着是叫喊：“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最后的“蛋”字喊得最响亮。这是仅次于《造反歌》的中学生“革命”流行歌曲。无论男生女生，张嘴“他妈的”，成了革命激情词汇。

“文革”开始了，我们照样下乡劳动，没干两天，突然接到回校通知。校园气氛异样。教室里播放北大附中彭小蒙的讲话录音：“江青同志感动得哭了……”什么什么的，声调激昂。又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撤销工作组。

一天，有个同学（干部子弟）冲进教室说：“海淀红卫兵受压，我们得去支持……”这是我头一次听说“红卫兵”。没几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名声大噪，引领时代潮流。

某天下午，忽见穿旧军装的同学云集操场转圈喊口号，不用说，他们都是“红五类”，都是“好汉”。原先班里除了几个身份明确的干部子弟，还有谁是“红五类”，我并不清楚。他们现身操场，我依次查看：噢，他，还有他，原来他们也是“红五类”。其中好几个人，原来都很谦和质朴，如今夹在气焰万丈的队伍中，也跟着挥舞臂膀，高呼口号。

阵营变得泾渭分明，我从教室望着操场，感到一道深深的沟壑出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

那几天，干部子弟纷纷换上旧军装，腰系武装带，足蹬将校靴，佩戴红袖章，显出逼人的英姿。比如刘辉宣，他虽然不是我们班的，但我对他印象深刻。那年春天筹办校运动会，我注意到有个身材不高的人反复苦练跳高，直到黄昏仍不罢休。他朴素执著，还以为是工人子弟。可如今他一身戎装，在校园风风火火，判若两人。

起初非“红五类”不准戴袖章，后来成立“新四中公社”，才人人有权戴袖章。我的“新四中公社”袖章现在还留着。

在“红五类”、“黑七类”之间，按张育海的说法，还有“麻六类”。我听了，觉得好玩，也对，中间的混乱如麻，左右不是人。

许多地方都搞起“对联”辩论会，那根本不是什么辩论，而是以势压人。我去过灯市口中学的辩论会。强烈的灯光照在台上，“红五类”排队上台，在麦克风前厉声叫喊：“我出身革军！”（欢呼声热烈）“我出身革干！”（欢呼声热烈）“我出身工人！”（欢呼声一般）。台下出身不好的都沉默着。沉默干吗还来？是要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最好是“红五类”）能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基本没有，绝大多数没这个胆儿。

四中干部子弟中有头脑的人私下说过：“谁真把对联看成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但现在需要这么说说。”潜台词是：过去对“狗崽子”们压得还不够（虽然早就受到限制，比如不准上大学），非得叫他们彻底屈服不可。

从“对联”开始，我对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原有的敬意全无（与个别人还是朋友），他们身上再无父兄折射的光芒，只剩特权带来的狂傲与利益。而在另外的群体中，却有着真正的智慧、才华、幽默与尊严。

“红五类”与“非红五类”，这两大群体间的冷战热战，渐渐成为中学生的主旋律。要说这两拨人根基都不弱，成熟干练，满

嘴马恩列斯毛的大道理，背后可大不一样。差异不是嘴上决定，是背后决定的。一边是说对了也没用，另一边是说错了也没事。高干子弟中的党员不再是学生，他们早就准备接班了。“文革”一开始，从校一级到班一级，领导都换成干部子弟。工农子弟虽属“红五类”，但地位不高，他们的父辈是老干部的群众，自己则是干部子弟的群众。

“对联”在社会上逞够了淫威，才被上边叫停。此后人们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细，每次填写人事表格，上面都有“出身”一栏。填表填到这里，不同出身的有不同滋味。出身一直是沉重的政治包袱，党的政策虽然不“唯成分”，但还是要“讲成分”。这包袱直到改革开放才卸下来。

## “八一八”

前一天得到通知，要去天安门广场开大会，说有大首长出席。校方要求每班先确定参加者名单。我们班坐在教室桌子上开会评选。我是一般人儿，没问题，但说话尖刻的刘捷没选上，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他是团员，还一直是我的入团联系人呢。

那天排队出发，一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四中被安排在正面偏东的位置，离城楼很近。我在一个灯柱下，眼见着各校一队队人陆续到来。

等了好一阵，城楼上还是空荡荡的。忽听大喇叭喊：“各校

派×名红卫兵到天安门下集合，有任务。”当时还以为是叫去执勤、站岗维持秩序什么的，学生领袖们都没走，而是派了些勤快的人手。没想到，他们很快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得意地向下面的人挥手。我非常吃惊：“嚯！居然让他们上了天安门！”革命总是出新招。

原来空旷的城楼上显出热闹气氛，渐渐，人越来越多，有些显然是首长。

不记得是否伴有《东方红》的乐曲，身穿军装的毛主席和林彪出现在中心位置。我是远视眼，看得很清楚。刘少奇没穿军装，一身灰蓝制服，也没有与毛、林站在一排，他在前面一排，台阶位置低一点，身边也没有簇拥多少人。周总理的身影很明显，穿浅蓝色短袖衬衫，在上面来回走动，像是在维持秩序。

大会开始。

林彪讲话，显得气力不足，声音尖细，与我期待的差别很大：他是大元帅，名字又是“彪”，应该铿锵有力。好在讲到“立四新”：“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声调忽然悠上来，加上湖北口音，有些力量。再就是讲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也是这样。事后看《参考消息》，外国报纸评论，也说林彪这几句话讲得有些力量。

彭小蒙这一阵正出名，她上来讲话，一点也不意外。我记得她的豪言壮语：“前面有刀山、有火海，但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

泽东思想!”她口齿凌厉，飒爽英姿，皮带一扎，效果比男生强。

还有谁讲话，忘了。

讲完话，毛主席走到城楼西头，招手，我看到那身姿，十分英武，有统帅的样子。我跟旁边的人说，这个姿势肯定会有照片特写。

散会后，大家自由往回走。我碰上同班的杨英杰（“红五类”，但不是高干子弟），他劈头一句话：“我他妈上城楼子了!”他接着激动地说：“想跟毛主席握手，挤不上去，一回头，看见刘主席旁边人不多，我上去就满手握住……我站在李聚奎旁边，让他签了字，你看——”他掏出小本让我看。我原来不知道李聚奎，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报纸登出了许多照片，引人注意的是干部子弟们。宋彬彬走到毛主席身前，报上自己名字。毛问“是哪个彬字?”“文质彬彬的彬。”“要武嘛!”几天后，听说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八一八”过后，红卫兵小将以革命的名义，在社会上掀起“破四旧”的狂潮。“要武”的社会作用很快显现，大批“黑五类”分子和“流氓”被殴打。北京城充满血腥的恐怖气氛。

一天我进校门，看见花坛被抽得一片狼藉。到处贴着标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 “西纠”

海淀区“红五类”创造了红卫兵的奇迹，四中不甘示弱。“八一八”以后，社会秩序大乱，一拨拨红卫兵为所欲为，借这个机缘，以四中干部子弟为主，成立了“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最初的目的是要管束街上红卫兵们“无组织、无纪律”的状况。当然，“西纠”的头头自认为比一般的红卫兵要高一等。不用说，比一般老百姓就要高好几等了。

“西纠”发布了一连串《通令》，宣布某些革命纪律和公共政策，印成一大张一大张的，贴到大街上，比警察的话还管用。有些内容我觉得还不错，比如实施多年的晚间骑车要带灯的规定（连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也提到），被某号“通令”给取消了。《通令》说，北京城大街上路灯明亮，骑车没必要再带灯。我很拥护这一条：晚上骑车总有警察或志愿者找麻烦，没有灯，就得推着走。北京人的车灯，从此成了家中犄角旮旯的废物。

不过，“西纠”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很快就与更“革命”行动对接了——“西纠”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比红卫兵更激进、更残酷的组织。比如，“六中劳改所”发生的一切，令人发指。“西纠”的名声很快就完蛋了。

我们班有几个人，批判“西纠”最勇敢、最有力。那一阵，我们常聚在教研室小院某间小屋议论时政。一天晚上，王祖锷提

出到“西纠”总部门口去贴大字报。这可太悬了，那帮人说打就打，铜头皮带抡起来，很危险，没几个人敢去。王祖锷说：“那有什么，你们不敢去，我去。”他果然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除毛主席、林彪外，中央首长悉数出席。王祖锷上台做主题发言，批判“西纠”。有人照了照片，前面是念稿子的王祖锷，后面坐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这次大会标志着“西纠”的终结。

批判“对联”、“西纠”，还有后来的“联动”，令干部子弟大受挫折。很多人不服气，于是喊出著名的口号：“二十年后见高低！”

其实干部子弟中也出现了分化，因父辈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的子弟底气没了。我们班陈小田，大串联出发时还是队长，路上看到批判他父亲的大字报，就地被免了职。最早那批红卫兵不到一年就“老”了，为了与新红卫兵区别，被称作“老兵”。批判“血统论”后，所有学生组织均可自称红卫兵，于是红卫兵满街都是了。

## 我们高二（二）班

“文革”高压，我们班的“黑五类”、“麻六类”却没怎么退缩，很有几个敢干的人。再有，按何大明后来的分析，因为班里

“红五类”的小首领邵立功与学校那些大头头儿们有矛盾，隔着邵立功，大形势渗透不进来，于是我们高二（二）班的气氛有些不同。

班上辩论“对联”，反对的声音很大。杨百朋反对“对联”，对方称他为“混蛋的平方”，也只不过是借助外边的声势，在班里没什么作用。听说牟志京到外校公开反对“对联”，差点挨打。他淡定、自信，从不大喊大叫，但胆量过人。他从不在班上结伙，独往独来，到社会上结识了遇罗克。牟志京与王建复创办了《中学文革报》，刊登遇罗克的《出身论》，轰动社会。随后，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何大明等人又办了《只把春来报》（“报”字双意），登了张育海的《论出身》。那阵子，常见张育海等人蹬着平板三轮车到大街上卖报。

我们班的“非红五类”成立了三个战斗队：“长征”、“捲巨澜”、“星火燎原”，合称“长捲星”，听起来好像是天上的妖星。三个战斗队合而不同。

“星火燎原”有许健康、王祖锷、伍贻龄、朱景文、黄琪等。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最认真，在批判反动路线、批“西纠”等事上贡献不小。许健康（我们称“老许同志”，是模仿《红岩》中对许云峰的称呼）是北京市“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常委，王祖锷和吴宝麟，都是四中“大联合”后的校革委会副主任。

不少重要的批判稿是由朱景文起草的，他还热爱朗读其文。我们半真半假，夸他的声音像齐越（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男播音员，主念中央文件、重要社论等）。

我和任志、陈小田、王大理、赵永明等在“长征”战斗队，我们最喜欢大串联，打算徒步去井冈山，买了绑腿、“红卫兵长征地图”等，就等开春了，故叫“长征”。比起“星火燎原”的人，我们玩性大些。一九六七年夏去成都，住在西南局大楼，正赶上武斗，在子弹的呼啸中讨论下一步任务。我们说要去桂林，黄琪则批评我们“抓军内一小撮”不认真。

“长征”战斗队占了生物教研室，里面有架钢琴，我在那学会了“乱弹琴”，后来唬了几十年。没想到在那儿的储藏柜中见到杨百朋家的相册和照相机等，估摸是我校红卫兵从他家抄来的。“一二〇”相机好像已经坏了。照片显然都是解放前的，打扮庄重，很有身份的样子。

生物教研室有个大桌案，我们开会用，也包过饺子。那次过年包饺子，大家分工，我擀皮，王大理找肉，何大明偷食堂的白菜。他溜墙根偷白菜，我在后面望风。我们常常“战斗”到半夜才回家。

王大理热心，认识各校不少人，他脑袋大，张育海叫他“交际瓜”。任志记性好，尤其善记事实真相（后来在北京市档案馆工作，上级可算知人善用），他是保校长杨滨的重要人物。

杨滨的专案问题集中在一份会议记录本上，有几句杨滨的话很“反动”，有点不像是真的。于是其真假成了侦辨的焦点。有一天晚上，在阶梯教室举行伪造记录“听证会”，是“保杨滨派”组织的，张育海、孙沛都出场为杨滨辩护。张育海还特意穿了件新衣服，戴上围脖，像“五四”革命青年的样子。孙沛考证细密，娓娓道来，根据记录本上字迹的颜色、摩擦程度论证其伪。

“捲巨澜”（简称“捲派”），是一帮才华横溢的“痞子”，有张育海、吴景瑞、李宝臣、杨百朋、刘捷、何大明等。这帮人的性情与那个时代反差最大，压力也最大。参加“文革”，他们是半真半戏。

不管什么关头什么事件，只要张育海在场，都是中心人物。赶上班里讨论（或辩论），他既有见解又有乐子。某校运动形势吃紧，张育海偶然在场，大家素不相识，因其见解过人，部署合理，当即被推为司令。但熬完夜到第二天，这位司令却不见了。

杨百朋被张育海誉为“班里最聪明的人”，相对论的原理，就是我高一刚进校时听他讲的。吴景瑞不善言辞，但心大，有毅力。一九六五年参加京密引水工程劳动，挖了一天土，够累的，收工往回走，他却挑着两个土筐，里面各放一块大石头，摇摇晃晃走在队伍后头，为了炼出铁肩膀。他在大串联中神秘消失了，不知所终。李宝臣文科底子好，经常与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辩论。我是语文科代表，毛老师私下对我说这个学生其实不错。

“斗批改”时，他去颐和园参加“运动”，住当年皇家房舍，我去转了一圈，正值夏天，里面很是阴凉舒适。中学期间，宝臣多次造访西太后御前女官容龄，得知不少清宫秘史。

“卷派”自然而然与遇罗克这样的人走到一起，常听他们讲遇罗克哥儿俩的事。他们的观点、言行，总是与革命主流格格不入。

## 复课逍遥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大家都被叫回学校，有军代表进驻管理，每班有个排长（其实是战士）。回到学校并没有什么“复课”，“闹革命”也是虚的，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逍遥起来。我也看明白了，这革命，底下怎么“闹”都没有用，一切都是上边说了算。

除了继续攒半导体，还多了一样，我开始拉手风琴。手风琴是从北影借的，一百二十贝斯。我们班一下冒出三个拉手风琴的，除了我，还有陈小田、赵颐庚。小田和我一样是新学，赵颐庚练得早，已有相当水平。陈小田拉琴不连贯，一顿一顿，听着让人着急。杨百朋评论说：“小田拉琴像拉屎一样，赵颐庚拉琴像撒尿一样。”我善拉革命歌曲，只要会唱就会拉，很实用。我和赵永明合作的手风琴伴奏《红灯记》，后来成了保留节目。

我们班，还有张育海拉小提琴，蒋效愚打扬琴，杨百朋吹黑

管。一天，杨百朋吹《阿拉伯舞曲》，让军宣队“排长”听到了，觉得味儿不对，问：“杨百朋，你吹什么哪？”百朋答得妙：“阿拉伯人民热爱毛主席。”在对面北医礼堂开全校文艺联欢大会，轮到我们班，呼啦啦上去半个班，人人手持乐器，真真假假排出乐队的规模，引起台下一阵骚动。

大家都喜爱文艺活动，于是有人出面组织正式的合唱队。报名的不少，我们班赵永明、陈小田、渠川玙、范泰林、张幼声、伍贻龄、刘勇，还有我，都报了。分高低音部，我们都争当男高音，没人挑低音部。音乐老师曹会澄动员说：唱高音只是唱主旋律，容易，而唱低音难度大，因为旋律不同，所以唱低音的才水平高。我们几个改挑了低音部。

合唱队还需要一半女生，都是从附近三十九中请的。四中的老爷们儿从没有“处过”女生，于是殷勤备至。张育海赞扬朗诵的那个小女生有“深情”的眉毛。

排练大合唱《红卫兵组歌》（其实是造反派组歌，“造反派”的狭义概念是指受过“血统论”压迫的），曲调套用流行的《长征组歌》，歌词由语文老师李颐扬改写，有“国防科委擒如璋”（揪斗“走资派”），“何处青山埋忠骨”（大串联），“阴云布，恶风狂”（反动路线），“造反派想念毛泽东”等。唱到“中央文革”，背景大幕上出现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照片。人们认为“中央文革”救过造反派。

在合唱队，我们班赵永明是台柱子，又唱又朗诵，声音浑厚，相当“男一号”。蒋效愚去新疆串联，回来晚了，一个萝卜一个坑，而老蒋凭着一手新疆学来的手鼓，终于挤进合唱队。没过多久，他倒成了主心骨，合唱队头头儿们开会：“老蒋没来商量什么劲儿，得等老蒋来!”

“老兵”也组织了合唱团，由刘辉宣任指挥，不记得唱什么歌。有一天建工学校“飞虎队”闯进四中，个个头戴柳条帽，武器有铁刃和螺丝母弹弓。他们找“老兵”寻仇，杀气腾腾，一下改变了以耍嘴皮子为主的校园气氛。“老兵合唱团”正在食堂排练，一见“飞虎队”那架势，四散逃离，逃得最快的数四中的“老兵”，他们熟悉地形，很快从后面翻墙而遁。刘辉宣是指挥，背对“飞虎队”，毅然站立，直到最后一刻。

六斋（宿舍）是个痞子窝，以高一（五）的人为主，我们班陈捷也在住。这里渐渐成为高二（二）与高一（五）两班臭味相投者的窝点。较熟的高一同学有表面文质彬彬的赵振开和大头曹一凡等。赵振开用文雅声调说痞话。曹一凡略施小计，为制作“新四中公社”铝质徽章露了一手，一时成为英雄。我记得到六斋熬夜洗照片，放大机是陈捷借来的，环状灯源，很奇特。

“复课闹革命”期间，也常有游行任务，每班一个方队，全校走成一条长龙。每班有个带头喊口号的，我们班是蒋效愚。他嗓门巨大，别人带头喊，只有本班听到，老蒋一声吼：“打倒某

某某!”只见前面五六个班的人跟着挥手呼应，声势壮观。

## 又去“串联”

“复课闹革命”不到半年，学校又乱了，我们趁机上路，这是一九六七年夏天。

头一次“串联”是一九六六年九月，我们去上海，那次上面最支持，我们最舒服。住在华东师大，白住白吃，每天逛大上海。当然，也要摆出几分革命的架式。我们乘公共汽车，宣读“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不知从哪儿捡的），传单用的都是狠词儿，车上的上海人一声不吭。下了车，我们消失在上海食品商场的迷宫中。

有一次在饭馆吃晚饭，不知怎么与上海人戗戗起来，后来演化为大辩论，招了一屋子人。我们这头有几个“红五类”，目中无人，横竖有理，把上海人气坏了。大概是谁讲了“中央的人也可以反”，有个站在高处的上海青年激动地喊：“誓死保卫党中央!”他的手举在头上挥舞，差点碰到旋转的电扇。

后来还去了北大荒赵光农场，白天坐马车收玉米，晚上访问上海老知青。那是冬天，天气寒冷，我们都在鞋里塞了乌拉草。

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去西南，上面已明令禁止白坐火车，只有另想别的招数（包括坐车厢顶上、搭货车等），一路辛苦。我们从成都转到桂林、贵阳、昆明、广州，游山玩水，品尝各地小吃，也目睹了武斗场面。从广州回来，火车已被严格管

制，扒不成了。出路只有用学生证借车票，事后还钱。我们几个借票时都把学生证上的名字改了，任志改作李林，宋建华改作勇求实，我改作唐逢喜。四中收到催债名单，发现大多数都“查无此人”，我们班只有王大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老实实还了钱。

从广州回来，不但没车票钱，连饭钱也没有。头一顿饭我们都不买，两位北京铁道学院（后改为“北方交大”）的大学生问：“你们怎么不吃饭？”“不饿。”第二顿饭我们又不买，大学生问：“你们是没钱吧？”大学生马上给我们每人买了两份盒饭，后来顿顿买（如今连他们的名字都忘了，真是忘恩负义）。到北京下车后，我先到学校，因为头发长，脸黑，衣服脏（现在说，有点像“犀利哥”吧），进校门把一个同学吓了一大跳。多年后他还老提这件事：“你那回那副德性真吓人！”

## 离开四中

上面不让我们老泡在学校，开始叫我们到社会上就业了。这是大势所趋，当时的说法是新的革命大方向。

有去北大荒的。老蒋在张罗去新疆，但没什么结果。我迷迷糊糊的，工厂对我没新奇感，“文革”中我去过北京无线电三厂“学工”，无聊。

一天早上到学校，门口小黑板写着“内蒙古土默特旗下乡插队，自愿报名”。我看了也无所谓。碰到陈小田、任志，他俩拿着

地图，说土默特旗虽然在内蒙古，其实不算远，而且在铁路线上，要去插队，这个地方还行。越说优点越多，越说越觉得合适。

插队看来是躲不过去的“大方向”，插就插吧，当时就这么简单，一个上午敲定下来。我心想，到农村插队也只是个过渡，总不会有去无回。下乡劳动不也好几回了吗？先走了再说。

很快赵永明、黄钧也加入我们的行列。进村不久，蒋效愚、王大理、陈捷也赶来了，形成我们班内蒙古插队的一伙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们登上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土默特旗。车上陈小田拉手风琴，赵永明唱歌，似乎豪情不减当年。

四中的岁月结束了。

一九六九年夏秋，在山西山阴县插队的刘捷来我们村玩。我俩坐在哈素海的岸上聊天。刘捷说：“你们这儿干得还不错，不过你的志向恐怕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县吧？”我说：“那当然了！”其实我底气不足，但不能说软话。现在回顾我的官运，我这辈子当过的最大的官儿只是生产队长，在农村垫底。后来到学校当教研室小头头，在学校垫底。被任命为教研室头头儿时，我说：这是平级调动。现在系里的会计还叫我“生产队长”。

那时我妈常说我：“上了四中，净想一些不实际的事情，还不如不上呢。无线电没干成，手风琴也没干成。”

# 留在北京

曹一凡

曹一凡，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学生。一九四九年生于四川成都，在北京长大。一九六五年考入四中。一九七一年八月分配工作，做烧火工，先后做技术员、工程师、总工程师，有专利成果若干。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工作与生活变动，此后在中关村经营电子科技公司。

## 一

一九七一年八月，我被分到北京西城碳素厂当工人，差不多是最后一拨儿离开四中的“老三届”学生。多年后，我岳母惊奇地问我，你怎么就没“上山下乡”留下来了？她老人家是“老清华”，周围那些大学附中留下来的本来就少，更甭提像我这样“泡病号”留下的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

代会”）一些人带头儿去内蒙古牧区插队，四中有李南飞、刘力前等七人响应。此后“上山下乡”的浪潮接踵而至。最初“红代会”去内蒙古插队时还在天安门广场宣誓，让毛泽东主义的光芒照亮内蒙古草原、照亮全中国、照亮全世界……到了一九七〇年，内蒙古军垦兵团招工的口号已沦为：住砖房、吃白面、发工资了。

四中学生“上山下乡”的高潮，始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黑龙江农场（当时还未改称“生产建设兵团”）的招募。老初三的牛硕儒（牛耕），高三（四）的老驴头（吕斌轩）属于这意气风发的第一批。可死水微澜，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那时节，躲在家中看书、装半导体的谓之“逍遥派”，赵振开还在顽强追求革命理想，他和我们班几个同学以“红卫兵六五一四部队”的名义半夜三更在西单路口贴标语“炮轰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钟奇”，并穿越武斗的枪林弹雨，到白洋淀搞教育革命调查。振开和我自小学二年级起就没分开过，但本人出身旧官吏，碰到这等危险事，我退避三舍。

一九六八年一月，兰州军区军马场招工；北京外文印刷厂招工；北海舰队招兵。二月中旬，青海乐都铸造厂招工，那可是杜甫“兵车行”的地界，初三的王祖荣和高三的周琨报名，他们是我三不老胡同一号的邻居。京郊招中小学教师。七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招募；陕西汽车制造厂等企业招工。九月，京西矿务局招煤矿工人；去内蒙土默特左旗插队。十二月，北海舰队

第二次招兵；动员六七届毕业生去山西雁北地区山阴县插队。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宣队要求每人表态，校园到处张贴着同学们响应的大字报。在校长室西边大字报主墙上，高一（六）班班主任刘永章贴出“忽如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正值此时，张育海在教研组小院对我说：“我被漏划了。”带着一丝仓皇的苦笑。公布的下乡名单没有他，等着他的却是传闻中隔离审查的命运。

一九六九年一月，北京电机厂招工。二月，到陕北延安地区延长县插队的六八届毕业生动身。三月，北京第六建筑公司招工；去吉林白城大安县插队。四月，内蒙古军垦兵团动身。五月，云南瑞丽军垦兵团动身。八月，黑龙江兵团的六九届毕业生动身。

风卷残云，校园里没剩什么人了。大规模动员转成由学校、街道与父母单位相结合的方式，督促剩下的学生“上山下乡”。

## 二

一九六八年末，大潮滚滚而来，北京实在待不下去了，史康成、徐金波和我决定结伴而行。我们仨去拜访师大女附中李燕翎，她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传闻是张育海的女友。她暂住在东四十二条的叔叔家。李燕翎个儿不高，大眼睛，身材

结实，脚蹬皮靴，头戴羊剪绒皮帽。没聊几句就说到张育海，一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一〇一中的贾平在赴阿荣旗行前作诗，第一句“壮辞名园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草原本来就诱人，听说工分值高，能养活自己，我们决定一起去阿荣旗。

西单商场设有“知青”专卖店，除了被面、大衣、皮帽、棉帽，还有木箱和手提包，上面印着林彪手书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挤得水泄不通，我们跟着排长队。

我母亲单位的局长听说我要下乡，叫我去她家一趟。她和我母亲正在京郊南口农场改造，关在同一个牛棚，两个月可回家一次。局长的丈夫李琪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因著有《矛盾论浅说》而闻名。“文革”前顶撞江青，“文革”初为保护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而自杀。我走进万明路的偏僻院落中的一间低矮厢房，屋子很冷，局长盖被坐在床上，头戴北方妇女那种方格头巾，她话不多，除了勉励，还叮嘱我下乡要注意身体。她送我一床被面和三十块钱。那紫红色的被面光泽像缎子，但结实耐洗。想到她还要抚养四个孩子，心情甚是沉重。

正当我们整装待发之际，工宣队把史康成抓起来，关在音乐教室小院。史康成要我们先走，他以后再加入。可他身陷囹圄，情况不明，怎能在此时此刻弃友而去？担任看守的都是就近入学的新生，对我们很客气，只要“军训团”和工宣队的人不在，我

们可随时探视聊天。

灾难使友情升华，我们赋诗应和。我写下“肝胆誓分兄弟难，头颅掷处血斑斑”，徐金波在绝句中信誓旦旦：“天涯海角陪小东”（小东是史康成的乳名）。史康成的妹妹史保嘉去内蒙古扎鲁特插队。我去找她的朋友，一个叫刘钢，一个叫鲍婉婉。刘钢拿出保嘉的诗词给我们看，冰雪聪明，令人神往。

史康成隔壁关的是赵京兴，就在前不久，在同学们纷纷表态下乡的大字报中，赵京兴贴了张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光这题目就够吓人的。他还有理有据，引用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到的下乡的三种形式：走马观花、下马看花和下乡落户。而他的首要任务是要留在城里读书。

阿荣旗之行就这样被搅黄了，徐金波和同班的朱之鑫、张友筑、罗超、赵岳伦、曹侠洲和周之穗去了吉林白城地区插队。

## 三

史康成被放了出来，我们俩又改了主意，不想去插队了。眼看当兵的当兵，进厂的进厂，凭什么我们非得插队？史康成留下一句颇有哲理意味的话：“每个人都有上山下乡吃苦的义务，也都有留城进工厂的权利”，一时间成了我们自我激励的箴言。

可要想留下来也要有点本事，工宣队毫不留情。他们的口号是“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工宣队

的师傅苗小发管分配，颐指气使。高三（四）班的徐文连是海军大将徐海东之子，几次下乡都没走，苗小发专要拿这号人物开刀，顺便到大将家里瞜一眼。他自知四中工宣队级别不高，特地先去开出指挥部的介绍信。徐海东家住东城，大门上有小门，小门上有小窗。苗小发按响门铃，小窗打开，解放军战士露头询问，苗小发要见徐海东，被回绝，他递上介绍信，大讲“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当兵的不为所动，最后留下句话：“实在要见，到总参换介绍信去!”把小窗哐地关上。苗小发回校破口大骂：妈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是总参领导一切！他把气撒在学生身上。高一（二）班姓白的同学被分到云南军垦兵团，但他患有严重的过敏症，申请能否去个不毛之地，代替那鲜花盛开的云南。苗小发破口大骂：“什么？青草过敏！我还窝头过敏呢！少废话!”那同学只好勉强去了云南瑞丽。

一九六六年冬天我去井冈山和韶山步行“串联”，回来住在冰窖似的四中十三斋，曾得过风湿热，恰好用来作借口。一个积水潭医院大夫给我开了三天风湿病假条，逃过一劫。这大夫后来成了我姐夫。史康成曾患肺门淋巴结核，吃中药短时间内转氨酶增高。他把化验单往学校一交，工宣队拿他没办法。

“各村都有很多高招”，比如蹬腿攥拳头血压准上去。我们班杨晓云赶上体检，照此办理怎么也不灵验，溜出来在新街口力生药店买了麻黄素，这药管用，忽悠一下升得太高了，医生直安慰他别紧

张，坐了一个钟头看没危险才让他走。有人装肾炎，躲在厕所往尿里掺蛋清，这招我不看好，人体蛋白和鸡蛋白到底不一样。

天不灭曹，我偶然获得重大发现：尿糖检验，各种医书化验书都讲比色法，用试纸、试剂，不同颜色对应着一到四个加号，到底这加号多少与糖的数量关系，没有哪个化验室的医生知道。全世界这核心机密被我探知！如果能对应着加号配制尿糖浓度，颜色已无意义。而配制尿糖浓度用的滴管，连婴儿用品的柜台也能买到，每十四滴是一毫升。药店卖的葡萄糖注射液有两种浓度：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五十，你要再知道了加号对应的浓度，怎么干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装糖尿病的朋友们，欢迎带着试管和葡萄糖找我，本人乐于效劳：很简单，往试管的尿中滴葡萄糖，四个加号滴多少，一个加号滴多少。那年头儿医院设备少，一般只化验尿常规，够开假条就得了。如果大医院验血糖，甚至做糖耐量试验，本人均有对策。至于这浓度到底是多少，血糖化验怎样应对？在此不便泄露。

七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北海公园聚会，有个同学的妹妹嚷嚷："糖尿病的照一张！"呼啦啦，因糖尿病留京或返城的竟有七八个，我都傻了。我被"糖尿病患者"幸福地簇拥在中间，一起合影。

## 四

等分配的日子还是挺美好的，我们多用来学习。北京图书馆

的琉璃瓦殿堂自然是最佳去处，不过进门要凭单位介绍信，我等无业游民均被拒之门外。好在赵振开总有办法搞到介绍信，单位五花八门，包括六建公司和他父亲所在的“民进中央”。介绍信有时限，这就要看涂改技术了，比如把有效期从十天改成九十天，甚至改了又改。调制涂改液的配方，前人之述备矣，无非草酸、漂白粉之类，反正不是氧化就是还原。幸亏流行用钢笔，介绍信纸又好，修改比较容易，但赶上粗糙淡黄的信纸、外加渗入纸纤维深处的圆珠笔油，不留痕迹还真不易。有一天去北图，介绍信又换了单位，管理员老太太从眼镜片后面抬起眼睛，满脸狐疑，让我怦然心动。好在她研究了好半天，也没看出破绽。

北图大阅览室快成同学聚会的场所了，多达十几号人，包括高一的潘鲁全（外号大狗）和高二的施以政。潘鲁全的姐姐专攻化学，开的是山西省山阴县化肥厂介绍信。施以政从我闻所未闻的嘌呤、嘧啶概念开讲，听得我云山雾罩。

赵振开、史康成和我友情甚笃，人称“三剑客”。每人一门外语：振开学英语，史康成学德语，我学日语。人家二位一度靠外语为生，我日语上手最快，终未成气候。我在北图开始翻译一本日文书《可怕的公害》，由岩波书店出版。最初尚有一一〇中高三的张树人参与。日本人根据切肤之痛，提出“公害”的概念。谈到污染严重处，甚至引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批判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我和张树人每天早上来到北

图，借出此书，查词典翻资料，直到关门。有次递进书单，紧盯着来自书库的绳拉小车，等了大半个钟头，被告之借走了，吓出一身冷汗。等了三天，那小车终于把《可怕的公害》拉了出来。后来张树人回了山西，我独自译完。

外文资料只许在科技目类中借阅。要是谁煞费苦心，淘到可读的擦边踩线的书报，就成了大家的财富。有本杂志《科学技术の広场》逃过审查，这是日本共产党《赤旗报》办的刊物，有文章披露中朝两国边界纠纷："文革"中金日成倒向苏联，中朝交恶，高音喇叭互骂，甚至筑起堤坝拦水冲击对方河岸。其中有段文字涉及长白山主峰和天池的归属争议。

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的夫人在四川时是我母亲的同事，两家熟稔。我有时到钱先生家小坐，谈起这杂志和中朝边界。钱先生对政治有特殊的敏感，又是大杂家，对中朝边界问题门儿清。"知识分子就是讨厌，地图都有好几本。"他自言自语，取出两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一九五〇年版，天池和主峰明显都在中国境内；五十年代中期版，分界线把长白山一分为二。钱先生很生气："改国界，是要全国人大批准的，连政府都没有权力！"他不敢再深说，怕我生事。对我翻译《可怕的公害》，他倒是很鼓励，介绍给来访的旅英女作家韩素音，后来又推荐到科学出版社争取出版。

## 五

那时节我收集不少好书，甚至成套的经典，请楼下小京刻了个随形章“一凡藏书”，盖在书扉页上，得意地称之“用印”。很多书是在旧书店门口“守株待兔”，或是向收破烂儿的小贩争来的，这方面不乏好手，黄其煦、郎放均是也。

有一次，在西单商场旧书店，一个高贵美丽的阿姨提着篮子卖书。书店按斤收购，每斤一毛三，跟烂纸价差不离。她摇摇头，倒空篮子，把书都送给我。算我走运，那些精装的好书中，有《侯外庐选集》和《别林斯基选集》。还没来得及“用印”，高二（二）刘捷一伙来家串门，我正在里屋洗照片，出来时那几本书不翼而飞，不知哪位卷走了。当年这种书的流动方式很正常，到别人家看到如意的，顺手牵羊，没有偷与被偷的概念。

我还有过几本世界美术全集，日文版，是同班的“狒狒”（大名张永和）从图书馆“顺”来送给我的。狒狒比我们早一年进四中，某校金质奖章保送生，结果进四中头一年就留了级，成了我的同班。自一九六八年起，北京打群架成风，狒狒是财政部红楼宿舍的头头儿。他平素骑锰钢车，套头帽翘得很高，军挎包装着菜刀。他常有些来历不明的物件：一个帆布行李箱卖我五块钱，正好我妹妹去黑龙江兵团用上了，还有件军用雨衣也五块钱，内襟有白漆手写的“总字129部队”。凡是书自然都是“顺”

的，源源不断，且有时批量出货，有一本关于阐释《资本论》的“论著”，同学几乎人手一册，但没人看，都堆在宿舍床上。

经过我手的有二十世纪上半叶王云五编的《万有文库》，还有一本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的培训教材，纸黄字糙，内容包括跟踪与反跟踪、偷拆信件（或称“邮检”），其中又分熏蒸、信封角卷出、透亮等方式，以及购置常用信封信纸以备替代。读过此书，让我神情紧张，后落下毛病，收信先端详四角，再对亮照照。

当时中学“红代会”作战部由“四三派”金坚掌控，办公室设在四中，主任是高三（四）秘增凯。他们派人去西单某地检查某“联动”分子的信件。据说为了保证邮检，所有本市信件一律四天以上才投递。“红代会”作战部还去搜查“联动”分子，我跟着去过女一中“联动”分子的家查抄。那家的妹妹叫李明冬，姐姐叫李小石，是北大学生。那是个不大的院落，有车房、锅炉房。其父是纺织部副部长。我没进正房，站在东厢房门口张望，那是她姐姐的房间，有个纸盒里除了叠得整齐的军装和皮带，还有一封信，姐姐执意不许看，说是她男朋友的信，检查者非看不可，于是发生了争执。最后说撤就撤了。

在地下流传的内部书籍分几类：文学类的黄皮书，比如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卡夫卡的《变形记》、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

票》；政治类的白皮书，比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托洛斯基回忆录》；还有科技类的蓝皮书，比如关于美国原子弹研制过程的格罗夫斯将军的《现在可以说了》以及泰勒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等。

我在文学上开窍晚。记得“红八月”，在音乐学院“对联”辩论会上，我们班季如讯居然抱着《安娜·卡列尼娜》，还边看边议论，音乐学院红卫兵大为不满，把我们赶了出来。大家几乎都是从《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开始扫盲，进而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巴尔扎克等大师挺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共有九十一部长篇，据说女附中姚宇红家有全套。有一天听她在电话中跟同学聊《驴皮记》，这书我没读过。跟她讨论尚可，要是想借书，没戏。

史康成是个爱读书有思想的人，他也看小说，但不痴迷。特别喜欢的是杰克·伦敦，既喜欢带有资本主义向上时期野性进取的力量，也喜欢坦诚的狡猾和注重手段的人生态度。杰克·伦敦说过：“当名誉和金钱一起来的时候，我选择名誉；当两者分别到来时，我选择金钱。”这句话被史康成推崇备至。他最崇拜的还是卓别林，电影看不到，他读了传记《卓别林——不朽的流浪汉》，其中把卓别林描述成“一个晃来晃去的人”，让他触动很深，他本人外号也跟着改成“老晃”，直到今天。

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斯宾塞的《进化论》，他不吃不

睡，几乎到了发痴的程度。我俩痛感世道艰辛，一天议论时政：假如毛主席不在林彪接位，是抓经济还是对外出兵？记得天渐黑下来，没开灯，我俩坐在黑暗中说。他还讲了个当时要杀头的政治笑话。我一听不禁慌了，赶紧摸黑走人。

有一次，高二（二）班陈捷牵头，把大家带到北大的郑昕家听他谈哲学。郑昕是第一个到德国攻读康德的中国学者，自一九三三年起在北京大学讲授康德，历时三十余年，国内研究康德的学者，或直接出自其门下，或间接受其教益。一九五七年“反右”，自然在其列。郑夫人与陈捷母亲是西南联大同学，闻孩子们好学，于是安排这次见面，我和史康成也混在其中。郑先生很谨慎，显然做了准备，先拿出几本《红旗》杂志，以署名唐晓文的《要读一点哲学》一文开场，让大家朗读，给讲课添点正统色彩。任志和蒋效愚发问，认识论是不是科学？如果是科学，将向什么方向发展？老实说，这类问题着实让郑先生为难。话题一转，谈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立。认识过程，从感觉、直觉、表象到概念、判断和推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到表象为止还属于感性认识阶段，此后就是理性认识阶段，大家刨根问底儿，非要把感性怎么就变成理性说清楚不可。尽管郑先生谨慎，涉及真理时也正色说：由于思维的非直观和复杂性，到目前为止，“科学尚未彻底揭示思维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史康成不吐不快：“既然唯物主义者解释不了这种转化，我看还不如

唯心主义。”郑夫人略显惊恐，招呼大家喝茶，把话岔开。

## 六

史康成有个四中初中同学，叫于友泽（后笔名“江河”），也属待分配之列。有一天，他读辛弃疾有感，与我共享：“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他既写诗又画画。他画的月票足以乱真。月票底板和照片上盖“骑缝章”，每月更换的是底板下半部印有月份的彩图。仔细对比，还是能辨别真伪，可装在皮夹里上下车一晃，轻松地蒙混过关。

有一天，于友泽来找我，神色慌张：“赵京兴被抓起来了！”“那怎么了？”“进局子身上还拿着我画的月票呢！”我安慰他说，赵京兴犯的是谋反罪，弄不好要掉脑袋的，警察才顾不上鉴定那月票真假呢！

对我们来说，赵京兴可算得奇人了。他读古典哲学的速度跟我们读小说差不多。他住平安里，离我家不算远，有时来借报纸，有时访问振开顺便来坐坐。我很少主动打扰，怕影响他的时间。

赵京兴思想的边际和轨迹，我是在批判会上才大致知道的。我曾试读哲学，怎么也看不懂。我问赵京兴，我怎么看不懂，甚至到弄不懂这段话最终是肯定还是否定。我用手指数着：肯定，否定，肯定，再否定。赵京兴并不笑我，但也没教给我什么“绝

招”，他只说凭感觉，“一看就明白说的是什么，就像看小说”。

我参加过三次赵京兴批判会。第一次在一斋宿舍，校方没什么准备，喊喊口号、平平淡淡过去了。第二次在生物实验室，由高一（一）班高中主持，他是“校革委会”委员，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他一声喝道“把反革命分子赵京兴押上来”，赵京兴低头弯腰，眼镜掉下来。他把眼镜戴好，直起腰，嘟囔了一句，“摘了眼镜看不清东西。”惹得工宣队的师傅勃然大怒：这屋里是人，不是东西。紧跟着一串脏字。然后是一篇接一篇大批判稿，原来赵京兴还说过“批判毛泽东思想”，我都替他着急。可他振振有词：“批判并不是简单否定，这是普通的常识。”他还引经据典：马恩两卷集某页某行，批判就是否定，批判就是继承，总之批判就是革命。朋友们暗暗叫好。主持人高中质问他：狼子野心，你还敢说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你说说你到底怎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赵京兴还真的阐明他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如今我只记得有哲学、农业和货币这三方面。私下见面时我从未和他谈过理论，倒是在批判会上听到了。赵京兴被押了下去，主持人高中做最后总结：革命师生把他批得体无完肤，表面他不认输，按他自己日记里的一句话，这叫“硬着头皮，高唱凯歌”。这时押到门口的赵京兴，挣着脖子喊了一句：“那是鲁迅先生说的！”全场哗然。

第三次是斗争大会了。他戴着脚镣。由市公安局的警察从监

狱押来的，在大操场举行。他的样子很憔悴，但依然镇定。会场旁还堆着轮胎。多年后赵京兴告诉我，白洋淀老乡托他从北京带的旧轮胎，成了投机倒把的罪证。赵京兴坚信马克思主义，一直到今天，他是真心的。

## 七

四中待分配队伍中又添了新人。自一九六八年二月起，六九届、七〇届新生分别就近入校，四中开始有了女生。而六九届和七〇届分配待遇不同。六九届全锅端去军垦兵团，七〇届有不少进了工厂和服务业，下乡也只限于郊区。

六九届的男生张文新，长得英俊，待人热情，遗憾的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腿有残疾，孩子们起了个很刻薄的外号“瘸美丽”，他并不介意。他借给我两本日汉字典，每本都有十多厘米厚。当时市场无货，有货我也买不起。这字典居然是原北京军区司令杨勇家的。杨勇的小儿子杨北北和张文新同班，离京托他看家。杨勇为贺龙的死党，因所谓“二月兵变”身陷囹圄多年，所谓家，不过是我家隔壁正觉胡同的小平房，堆放些东西，字典是杨北北哥哥的财物。几年后张文新找我要字典，原来杨家要回京了。听说杨勇病重无子女能出面，张文新挺身而出闯中南海，把材料交到周总理手上，才救了杨勇一命。他从不居功自傲，后来杨勇当新疆军区司令，小舅子是新疆驻京办事处主任，张文新在那儿找

了个烧茶炉的差事，他告诉我轻省。他在京城高干圈儿里名声极好，万里外派去安徽，北京家也交他看管。我曾去北京邮局办事，把他找的推荐信递上，那局长看了诚惶诚恐：“是边涛推荐的，是边涛推荐的!”后来才知道边涛是万里夫人。他最熟的还是杨勇和胡耀邦这两家，他俩表兄弟，都是湖南文家市人。有一回，张文新坐着杨勇的“大红旗”来找我借五块钱，原来胡耀邦病了，他在看望途中发现钱不够，临时向我求助。这就是跟我一起等待分配的小兄弟。

开科技先河的首属老初三“玛瑙”，还真不知道他的真名。“玛瑙”在家搞科学实验，用空气（准确说是二氧化碳）和水变成葡萄糖，我赶紧去学习。他家在四中对过儿的一条胡同里，院子大，满地桃核，烧得黑糊糊的。“玛瑙”介绍说这是活性炭，作为催化剂，物理特性越硬效果越好。实在让我佩服，相信他一定能成功。以后我设计过化肥厂，合成塔内压力三百二十公斤，于是想起“玛瑙”。把氮和氢合成氨，再撒在地上长庄稼多麻烦，既然氮和氢能合成，那么二氧化碳和水将来也一定能合成。

大家时兴做万用表、攒半导体。连语文老师黄庆发都下场装了个收音机，放在耳边听着得意。做万用表，离不开波段开关和表头。我虽毫不入门，也跟着他们凑热闹。高二（五）班高光宇又拉提琴，又攒电视，但给他介绍女友时，这些特长好像还提不上。

我们常去高三（四）班陆天育家。“文革”前，他在北海少年科技馆无线电组，他弟弟在少年宫车工组，哥儿俩动手能力极强，我们玩的相机、气枪、唱机、收音机、乐器几乎都是委托店的便宜货，时不时得送到他家修理。陆家有各种小机器：洗相片的曝光箱、放大机、裁纸刀、上光机；弄来个轧面机，配上齿轮，哥儿俩轮流上阵还轧出面条来。连自行车座都是自制的，比摩托车座还舒服。陆天育在朝阳门专买旧货的小市看中块电流表，顺手牵羊时被发现了，扭送派出所，警察哭笑不得：“拿什么不好，拿这破玩意儿。走！”

陆天育住东城，街面高过院子，进院下台阶，家小，仅一间。他母亲是河北北京中学的英语老师，见我们来总是很高兴。那年头儿，人们去干校下乡，家具电器半卖半送处理掉。那天伯母碰上架小尺寸钢琴。他们那间小屋并排只能放两张单人床，而这琴长度窄，刚好塞在两床中间。她兴奋地比画着，琴凳转过来，两头接上椅子就能睡在上面，用不着俩孩子挤一张床了。可从来没见过他父亲，我们都没问过。大家嘻嘻哈哈拆卸气枪，伯母坐在一旁默默看着，脸上浮出微笑，一种隐忍的微笑。

我们常到各家委托店“淘宝”，东单的那家叫三洋、西单路南的叫中昌、护国寺的叫益民，隆福寺那家是委托店第三门市部，索性叫“当三门”。黄其煦亲眼所见，有人只花了三百块就从东单委托店，前呼后拥推走一架三角钢琴。

留在北京，相当于驻京留守人员，尤其冬天，接待任务繁忙。一到农闲，插队的同学云集北京，开春再带足挂面和酱油膏回乡下。而军垦的同学每两年才能回京探亲，每次也只有十二天假，远不如插队自在。同学相聚，嘻嘻哈哈，争先恐后说话，我不禁诧异，看来插队生活挺有意思的。一个插队的同学回答："有意思？一年里有意思的事一个钟头都跟你说了！"

一九六九年底，以高二（二）班同学为主，在四中教室追悼张育海，我家离得近，用自行车搬去电子管收音机，接上唱机怎么都不响，十分狼狈。没有灵堂，没有鲜花，由蒋效愚和任志主持，最后大家低沉地合唱阿尔巴尼亚的《献给游击队的战友》"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和你生活战斗在一起，唱起战歌冲锋杀敌，我们的歌声就是武器，唱起那游击队之歌，就想起你啊亲爱的战友，在暴风雨中唱一首歌曲，献给你啊亲爱的兄弟！"这是一首大家喜爱的歌，谁想到竟成了悼亡曲。

## 八

音乐是"文革"中学生生活的重要部分，同学们私下流传唱片，自学乐器，早就突破了八个"样板戏"的禁锢。最流行的是《外国名歌二百首》，这是"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歌曲集，简谱，袖珍本，被大家奉为经典。第一首是国际歌。依照《外国名歌二百首》，史康成咿咿呀呀地学唱，一板一眼，比如印度的电影插

曲《拉兹之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学唱此歌的过程想必很痛苦，切分、符点、连线、装饰音俱全，有的音符下画三道横线，还有可怕的升降号。

史康成的音准，赵振开的小钢声，郎放的纯正音色，还有徐金波和刘志鹏的假高音（被戏称“鸡婆”）。我不唱歌——走调，别人走调听得出来，自己走调却浑然不知。是张育海救我于水火之中。有一天，他带黄其煦来找我，育海胳肢窝下夹着提琴盒，黄其煦规规矩矩提着黑管盒。黄其煦现身说法，指出吹笛子的害处及改吹黑管的好处。还告诉我个秘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北京管乐器厂出了不少处理品，新的黑管才二十八块。于是我改学吹黑管。哥们儿中吹黑管的还有杨百朋。

在学校混过政治学习，结伴而行，到某人家听唱片去。骑车到叶林宗家，两个弟弟叶林江和叶林辉，都上四中，其父是师大教授，“文革”中改住筒子楼，楼道堆满杂物，不侧身过不去。叶林宗捧出唱片，七十八转，《天鹅湖》的“拿波里舞曲”最吸引人，那小号清澈流畅，听了一遍又一遍，如醉如痴。

叶林辉很活跃，他和孙沛蹭火车去广州玩，事先配好列车员用的三角钥匙，回程时钻进火车厕所的阁楼，睡到终点没下车，在车库被发现，一顿臭揍。一起听唱片时，他脸上还带着伤。

“文艺宣传队”出了不少人才，高一（四）班小提琴手刘克希，先分到六建，后考上中央广播文工团。高二（二）班赵颐庚

拉手风琴近乎痴迷，不知疲倦地练习指法，一个指头动时另几个指头闲着，左手和右手配合得像两个杂技演员，甚妙。有一次，在东单委托商店见到牟志京，他在等着买一台意大利手风琴，在身上不停地做分指练习，好像在寻找穴位。那天，北边柜台地上立着一架电子琴，上面用红漆写着“马国光”的繁体字。马国光受迫害，前不久被抓，他的琴竟流落此处。

我手上有不少唱片，都是四处“淘”来的，更多的是赵振开家劫后余生的。除了七十八转老唱片，还有四十五转、三十三转密纹的。七十八转多是古典，密纹的往往比较新。史康成父母有文化，他家的唱片有陈刚、何占豪的提琴曲《烈士日记》和《红旗颂》。振开从中央乐团的姑父那儿，借来一张帕格尼尼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是“德意志唱片公司”的三十三转密纹唱片，我们如获至宝。另一个圈子干部子女也有这么一张，后来丢了，认定是史康成偷走（有人听说他家有），于是打上门来，被警察拘留，写了检查才放人。

像我这种不下乡且交往杂的人，早就被四中和街道盯上了，尤其我夜里开红灯冲洗胶卷照片，被当成从事特务活动。一天下午，先是街道积极分子敲门查卫生，紧接着警察就冲进来，把抽屉柜子翻了个遍。抽屉里有个大牛皮纸公文信封，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字样，警察眼睛都亮了，可惜不是军事机密，而是一张人腿骨的 X 光片。警察宣布没收全部唱片。我拿出《烈

士日记》求情，警察怒喝道：少废话！他们命令我用自行车驮着一口袋唱片，把我押送到厂桥派出所。审讯者有“片儿警”也有西城分局的。问不出所以然，最后要我写检查。至今都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学校事先知情。第二天我回校汇报，分配组黄立环老师脱口而出：“他们已经去了？真快。”

## 九

留在北京的压力越来越大，学校、街道、父母单位，甚至与公安部门相结合共同管理我们，批斗会、下厂劳动、政治学习都是必须参加的，再加上一波波的下乡动员。我告病躲到清华大学亲戚家，陪伴孤老太太，实在寂寞。有一天被召进城，原来是我母亲的机关让她动员我“上山下乡”，办不成就别上班。没辙，我和母亲拉着手，来到学校报名去内蒙古兵团，她一路安慰我，只要妈还有工资，一定会支援你。内蒙古兵团负责招工的头头儿，拖长声调打官腔：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没走，愿不愿去啊？“不愿意”，我坦言道。他一下愣住了：你不愿意，我们还不愿收你呢！

四中安排我参加了三次下厂劳动。头一次是第三轧钢厂，分在仓库。第一天上班怕迟到，进了厂门猛跑，被工人师傅拽回来。原来厂门口立着毛主席画像，必须先鞠躬，敬祝万寿无疆。仓库也按军事编制，开工前对着仓库里的毛主席像“早请示”：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三轧钢某连某排向您请示，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每人每天的工作安排，在说给毛主席的同时，我们也就听见了。晚上下班时“晚汇报”，表扬谁批评谁都是冲着毛主席说的。

一旦中央电台播出毛主席最新指示，工人们当晚就得赶到工厂，连夜敲锣打鼓上街庆贺，我们没跟着去。第二天“早请示”，每个人背诵最新指示，轮到我们四中同学，张口结舌。

第二次是到朝阳区汽缸垫厂干活。工序很简单，两层铜箔夹着石棉，下片套上片，用木槌砸扁就成。这是个典型的街道工厂，一个小院三间平房，远比不上“三轧钢”，人家号称产业工人，毛主席还送了芒果，泡在装有福尔马林的瓶子里。而这里静悄悄的，只有女工们聊天，家长里短。

最后一次是发配到北京灯泡厂，佟玉馥老师负责，带队是高一（六）班吴泽林，一起参加劳动的还有六九届“泡”下来不走的孩子们。北京灯泡厂在关东店，满街的京字牌灯泡就出自这里。有个吹高压汞灯泡车间，大火喷燃，师傅手持一人多高的金属管，蘸上玻璃熔料，对着火边吹边转，像吹泡泡糖，再放在模子里边转边吹，最后成型。师傅们不停行走，交错站位，数根金属管一边旋转一边随着身体摆动，犹如舞蹈一般，煞是好看。白炽灯车间最壮观，每条生产线都有几十米长，灯头密密排列，很像纺织厂。排列的灯头在火焰中旋转，远远看去是一排排火球，

再加煤气、压缩空气和氧气发出啸声，令人震惊。

我和几个六九届的孩子被分到设备维修车间，我当上了管工，很得意。第一课就是锯管子，从六分、一英才开始，张师傅示范，上锯条，拧紧，两三下就把钢管锯开。我刚上手锯条就断了，张师傅说："再来！"在他充满信任的目光下，我拉开弓箭步，把身体重量转移在锯上，双手前后移动划出弧线，终于成功了。接着学套扣，就是在管口套上螺纹。再往下是缠麻刀、抹油灰、接管子。我学得用心，张师傅对我很满意，连接煤气管这样的活也放手让我干。有时，我爬到大车间房顶维修，四下张望，黄色是氮气，蓝色是氧气，红色是煤气，还有压缩空气和惰性气体，各种颜色的巨龙般粗管子到处延伸，加上火球飞舞的绵延不绝的灯泡生产线，蔚为壮观。手上是沉甸甸的管钳，不由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很久很久没这么痛快舒畅了。

好景不长，我惹了麻烦。有一天学《毛选》，有几个六九届的孩子打瞌睡，我替他们辩护了两句，说管工在户外干活儿冷，进屋暖和犯困是正常生理现象，结果被汇报到学校，上纲上线说我扬言学《毛选》犯困是正常生理现象；还有一次闯祸与波兰有关。瓦文萨闹罢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意是苏联坦克压不垮波兰人民，我就顺着为波兰人民说了两句，又犯大忌。批判会在维修车间举行，带队的同学立场坚定，佟玉馥老师也来参加，工人师傅们坐在另一边观看。学生逐一发言，我曾为之打抱

不平的男孩是贫民子弟，为人仗义，死活就是不发言。我越是解释，就有越多的质问，而沉默又是对抗。只见张师傅突然起身，走向锻床，用大钳子夹住烧红的生铁，用气锤狂打，伴着一声声巨响，火星四溅。他大声吼道："干活了，干活了……"

## 十

张幼声的母亲在新华社工作，总能带点内部材料与大家分享。那阵子党中央开"九大"，严格保密，张幼声居然搞到会议抄件。比如中央委员会选举，江青缺了几票，引起我们的极度兴奋。更甭提选政治局，由周总理主持，统一计票时，总理问：这张选票是谁的？是空白票！后面一人慌忙举手站起来，"是我的，我弄错了"。于是补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自然是全票。这材料传到工宣队手上，追查到我这里。我信口开河，那时碰上追查"反革命谣言"，就说要么公共汽车上听的，要么厕所蹲坑听的，信口胡编。工宣队追查了一阵不得要领，就捂住不敢再追了，这事太邪乎，弄不好自身难保。

四中经常组织"老泡"们学习，没固定地点，有时在教研室，有时端小凳坐在院子里。交流病情，议论时事。老初二的刘学煌见多识广，他知道 NBA，说那球打得像杂技，过半场一扔球准进。高二（五）班王伟擅长丹青，在生物实验室随便画两笔，就是虾米，一抹一挑，青蛙跃然纸上。

李宝臣是个人物，祖上是清朝提督，人家不说满族，在那时代坦然说“在旗”。宝臣潜心清史，为了研究清朝宫廷礼仪，热衷于参加“首都革命人民砸烂旧颐和园联络站”的活动。他常坐三十二路郊区车去颐和园。蹭车的都知道，到终点站查票最难办，不像中途，临关车门皮夹一晃跳下，心理压力最小。有一次，售票员一路喊着“查票”过来，宝臣纹丝不动，“你的票呢?”“月票”，他坦然答道。“拿出来。”宝臣掏出皮夹给她看，“打开!”售票员失去耐心。宝臣沉着地打开皮夹，里面是个购货本，其实根本没有月票，可还没等抬头，售票员已经走远了。那年头儿，慈禧太后的宫廷女官容龄公主还在世，门前冷落车马稀，家人都唯恐躲之不及，宝臣却上门嘘寒问暖。老人作古后，宝臣的脑袋也就成了孤本。

一日，听说李宝臣和分配组长罗炳康顶嘴，互相揪着脖领子找工宣队评理去了。我赶紧跑到教研组小院东边的工宣队办公室门口观望。少顷，宝臣出来，气定神闲地说：“我不吃亏，国家给他发工资，让他管学生，管不了还找工宣队，无能，干吗吃的?!”他补充道：“我没揪他脖领子，我从不干这等事儿……不怕，到时候他还得给我分工作，气死他!”

这事真还让宝臣说中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北京四中紧急召集我们开会，在大阶梯教室。果然出了大事：美国派基辛格秘密来华，为尼克松总统的访

问做准备。首先要铲除所有社会不安定因素，其中一条就是安置我等闲杂人员。

我们的命运和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连在一起。真快，一个月后，韦振邦、徐宝平、沈龙飞、王淼和我被分到西城碳素厂（又称“展览路电碳厂”），史康成、张幼声去了拔丝厂。最后只剩下住宿舍的老初三的王文光。他有小儿麻痹症，走路艰难，坚持练小提琴，自强不息。我们走了，他的分配还没着落。行前去告别，我说，“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以后我可就不是四中人了，可别不认识我这烧火工啊。他强忍眼泪，还跟我开了个玩笑。

离开宿舍，身后传来王文光的提琴声，那是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主题曲，乐曲起伏激越，应和着我们的迷惘与惆怅。头上阴霾聚散，忽明忽暗，回望那进出六年的校门，显得分外肃穆，古色苍然。

别了，我们的学生时代；别了，北京四中。